

蘇聯

及東歐

民運

資料輯

(第一輯)

資料輯

十月評論社出版1990年5月 \$30

1 東歐、蘇聯的巨變與勞動人民的出路

捷克

- 4 民間力量傳統深厚（輯前言）
- 9 哈維爾訪問記
- 11 「公民論壇」和反對派運動近況（訪問）
- 13 「公民論壇」綱領
- 14 「左派出路」的呼籲
- 15 「左派出路」綱領
- 17 「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
- 20 評「公民自由權運動」
- 22 《七七憲章》（全文）

東德

- 25 東德民主前路滿風險（輯前言）
- 28 「新論壇」政治綱領
- 29 訪問「新論壇」職員
- 30 呼籲成立「社會民主黨」
- 31 組織「綠黨」的呼籲
- 32 獨立婦女運動宣言
- 33 訪問《獨立婦女運動宣言》的作者
- 35 東德左派九月會議文件
- 35 建立獨立社會主義左派
- 37 成立獨立工會的呼籲
- 37 工會分子談組織自由工會（訪問）
- 39 訪問「民主社會主義者小組」
- 40 訪問「革命自治青年組織」
- 41 「革命自治青年組織」成立宣言
- 42 知識分子反對科爾統一方案

匈牙利

- 44 匈牙利：革命與改革（輯前言）
- 48 訪問「左派出路」
- 49 「左派出路」五一呼籲
- 50 建築工科學著名十六點要求
- 51 匈牙利作家聯盟宣言
- 51 知識分子革命委員會決議

波蘭

- 53 團結工會走向調和主義的低谷（輯前言）
- 57 華里沙談圓桌會議（訪問）
- 58 工會活躍分子評新政府（訪問）
- 59 呼籲杯葛選舉（文件）
- 60 訪地區交通工人團結工會領導
- 61 法西紐克向中國民主戰士致意
- 62 「社義黨——民主革命」對新政府的聲明

64 訪「社義黨——民主革命」領袖談時局

- 65 「社義黨——民主革命」誕生的經過（訪問）
- 67 「社會主義黨」政治聲明
- 「社會主義黨」文件：
- 67 政治宣言
- 68 行動綱領
- 69 民主革命（黨綱）
- 70 重建團結工會架構
- 70 「革命左派流派」綱領
- 71 團結工會基層左派談恢復民主架構
- 72 工人權利憲章
- 73 格但斯克二十一點協議（全文）
- 77 團結工會首屆全國大會通過的綱領

羅馬尼亞

- 88 堅持獨立自由代價沉重（輯前言）
- 91 壽西斯古倒台日誌
- 93 訪救國政府成員布魯坎
- 95 訪全國最大工廠的工人活躍分子
- 97 巴拉索夫拖拉機廠救國委員會綱領
- 98 巴拉索夫拖拉機廠自由工會章程
- 98 印刷工會及記者工會綱領

蘇聯

- 100 官僚改革造成巨變（輯前言）
- 103 「莫斯科人民陣綫」談民間左派發展（訪問）
- 106 「莫斯科人民陣綫」簡介
- 107 「莫斯科人民陣綫」的選舉聲明
- 107 「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募捐運動
- 108 訪問「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
- 109 「社會主義社團聯盟」立場書
- 110 礦工罷工浪潮衝擊蘇聯改革局面
- 118 礦工罷工要求
- 119 談「經濟改革」的婦女政策（訪問）
- 122 訪問愛沙尼亞「人民陣綫」領袖
- 123 拉脫維亞「人民陣綫」綱領
- 126 訪問立陶宛人民陣綫主席蘭茨貝吉斯
- 128 「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綱領

南斯拉夫

- 131 市場箝制下的工人自管（輯前言）
- 133 南斯拉夫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關係
- 134 阿爾巴尼亞礦工罷工的前因後果
- 135 在地層深處的罷工者
- 136 「正義委員會」談政治動盪及種族衝突（訪問）

出版說明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國爆發了史無前例的規模廣泛的民主運動。香港民衆從中國民運爆發伊始，一直是最先、最前，最大規模動員走在聲援之列。「六四」鎮壓後，中國內外的民運和聲援行動似乎一下子降到低點。然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下旬羅馬尼亞暴君齊奧爾古倒台，遠在香港的民衆從表面沉寂中迅速抬頭，出於本能地以行動，物質聲援戰鬥中的羅馬尼亞人民。香港民衆經過中國民運和「六四」的血的教訓，從切身體會中領略了被壓迫人民互相激勵、支持的國際主義的真正精神。

中國民主運動激發了蘇聯和東歐人民的戰鬥精神，遠在東歐的民衆運動又反過來鼓舞了暫時挫頓的中國、香港和全世界爭取民主的華人。當前，香港興起了一股旅遊東歐的熱潮，不少旅行者出發之時不是抱着遊樂心情；他們知道，蘇聯、東歐和中國有着同一「共產黨統治」模式，那裏社會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制度性危機和中國的基本相同，因此他們希望親臨當地了解、交流民衆奮鬥的經驗，摸索當地人民如何探尋出路，俾為迎接中國再起的民運鬥爭預備更充實的思想武器和鬥爭工具。

環顧目下的中文出版書籍，有關鬥爭中的蘇聯、東歐民間運動的材料極少；另一方面，有關新聞通訊由於以西方財團、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為主導，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為關注焦點，民衆透過報章閱讀所理解的事態和材料便不免有限和變形，最起碼的缺失，是不能讀到當地民間組織百花齊放的原始材料和意見。有鑑於此，就有需要由民間提供同樣屬於民間的另一消息渠道了。這本資料輯因此應運而生。

本資料輯的選材範圍，一如本題，着眼於蘇聯及東歐最新民主運動團體的綱領及立場文件，有關訪問及少量評介文章。由於消息阻隔，及資源、來源有限，所收錄的原始材料也只能具備起碼輪廓，難免掛一漏萬，如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的民運材料便遺憾地闕如。

本集在每一國家資料輯前配備一篇

介紹文章，以讓讀者掌握該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運歷程。此外，又在材料可及範圍內，收錄了該國民運發展的重要的歷史性文件，以助讀者了解當地民運的經驗累積及淵源。

另：蘇聯新政策Perestroika及Glasnost中文譯名繁多，本集統一為「經濟改革」（Perestroika），「開放」（Glasnost），並冠以方括號，以資識別一般性使用。

[]號內文是英譯本按語。至於文內另註明「編按」的，是本集編者按語。

本資料輯所集材料來自歐美國家出版的左派英文期刊、公開發行的資料文集等；除訪問及顯示文件日期所需外，不刊出處。

鳴謝

本資料輯的編輯、繙譯、校對、美術設計和貼排工作，主要由義務工作人員擔負。他們不一定贊同本出版社的政治立場，然而他們都毫無例外地支持人民有自決、自主、知情的民主權利，因此不計思想異同而各盡所能無私地支持這項出版工作。沒有他們的協助，本資料輯不可能在從籌備到出版的相對地短的時間內面世。★



東歐、蘇聯的巨變與勞動人

十月評論社

一九八九年是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下的人民大規模覺醒和開始動員的一年。整個變化的背景是斯大林主義在嚴重危機之下，官僚向西方求援，向資本主義倒退，因而引發進一步危機，觸發羣衆動員起來。羣衆史無前例的動員，又進一步深化斯大林主義危機，令它進入全面崩潰的階段。

從人民的角度的來看，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打破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控制之後，人民有什麼前路可走。資本主義能夠提供出路嗎？除了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還有第三條出路嗎？如果說民主社會主義是出路，又有什麼經驗可作憑藉、指引呢？

斯大林主義徹底破產

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特點，是在官僚專政之下，人民普遍陷於消極、分化，受控制的狀態。中國八九民運可說是中國、東歐、蘇聯人民大規模動員起來的轉捩點。始於學生，繼而在北京和各大城市千千萬萬的市民、工人的行動，顯示了人們已積極站出來，以團結行動打破官僚的控制。在全世界的電視、電台、報紙面前，持續達五十日的大規模動員，在人們心中造成極大的振奮和激動。「六四」鎮壓更在全世界的面前，宣告了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破產和陷入垂死掙扎的危機之中。

東歐和蘇聯的人民動員浪潮，更突破了共黨的一黨專政。匈牙利共產黨自我解散；東德人民逃亡潮迅速發展為東德人民的大規模示威、罷工，共黨強硬派領導層倒台；羅馬尼亞大獨裁者齊奧塞斯古企圖鎮壓，觸發人民武裝起義和軍隊倒戈。

羅馬尼亞人民血戰勝利，更加速了全球斯大林主義的崩解和克服了中共「六四」鎮壓在人民心中的陰影。取消一黨專政的要求，席捲整個東歐，遠在亞洲中部的蒙古也受震動。蘇聯人民更爆發十月革命以來最龐大的示威，迫使蘇共取消一黨專政的憲法條文……

羣衆覺醒和找尋出路

中國、東歐、蘇聯的人民鬥爭運動，有一個共同點：以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打破共產黨的政治權力壟斷為中心目標，顯示這些國家的人民體驗和認識到：共產黨的政治權力壟斷，是社會前進的當前障礙；不移去這個障礙，社會關係的重建和經濟改革是無法開展的。

在這次飛躍發展的政治革命中，最突出的一點是：與共黨官僚層抗衡的人民力量，主力落在工人身上。在這些國家，工人（特別是各首都和工業重鎮的工人）經過長期的沉寂和消極後，紛紛動員和初步組織起來，協同學學生、知識分子以至農民，形成巨大的力量。在東歐和蘇聯，人民羣衆的動員，開拓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間。論壇式的組織、人民陣綫、工人委員會等，紛紛成立；人民渴求消息和知識，希望找到出路。

然而，斯大林主義數十年的愚民式高壓統治，阻礙了人民有組織力量的凝聚，同時又阻礙了人民對自己和資本主義世界的認識；斯大林主義的種種罪行，更嚴重敗壞了人民眼中的社會主義名聲，掩蔽了它真正的內容，形成了巨大的意識形態真空。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大輿論和意識形態攻勢，建造了一幅美好的圖畫：只要投向西方資本主義的懷抱，行資本主義道路，便會有西歐人民的高生活水平……於是，在捷克、東德等國，在揚棄斯大林主義的同時，不少知識分子和工人卻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西方援助，西方高生活水平有很大期望和幻想。

資本主義能提供出路嗎？

不過，根本的問題是：資本主義能否提供真正出路呢？歷史和現實的發展情況，可以提供重要的啟示。

當初，蘇聯、中國、東歐各國推翻資本主義，基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危機觸發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危機局勢。當時，資本主義證明不能為這些落後和飽受帝

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提供出路，資本主義危機是這些國家的人民求變或接受轉變的主因。從第二次大戰到現在，第三世界仍不斷爆發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解放戰爭，顯示了即使到現在，資本主義仍同樣不能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提供出路。第三世界的廣大人民，現在仍處於極困苦的狀態，外債、通貨膨脹、失業以至饑荒等問題嚴重。

回顧多個斯大林主義官僚政權的歷史，當它們出現政治和經濟危機時，亦曾向資本主義和西方國家求援，引進市場因素，開放本國給外國投資，引入西方貸款等。結果幾乎無一倖免的是：外債愈來愈嚴重；市場紊亂；物價高漲；大小官僚貪污、投機倒把、化公為私；生產結構更加失衡；社會不平等和地區不平等加劇。在市場經濟下，即使人民有較大的選擇自由甚至自管權力，也不能緩和上述矛盾。匈牙利的第二經濟結果是加強人民的勞動強度，南斯拉夫的工人自管和社會自治結果引致社會更大分化割裂。明顯地，斯大林主義官僚在退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之中，令社會各方面的危機更為尖銳化。

事實上，不單是斯大林主義官僚政權出現危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表面的繁榮底下，也是危機重重，無法向斯大林主義官僚廣泛提供援手。西方經濟早已經要靠信貸支撐投資和消費，結構性的失業嚴重，生產利潤率下降。對於絕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西方長期以來只有藉高息貸款榨取資源和剩餘價值，令它們生產衰敗，而不是提升它們的生產，擴大它們的國內市場和結合在世界市場之內。以國際貨幣基金會為代表，西方普遍的對第三世界的政策，只有叫它們緊縮國內經濟，減少國內消費，加強出口，這一條道路，令這些國家陷於破產、人民貧困不堪的境地。

波蘭的例子

以波蘭為例，它現在的情況，正是第三世界國家普遍走着的同一條道路。

民的出路

波共政權在七十年代向西方大量借貸，形成沉重的債務。八十年代，由於波蘭人民普遍反抗軍政權，所以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政策不能順利實施。現在，由仍然享有合法性的團結工會領導層組成的政府，正在加緊推行這個政策。短短幾個月內，物價升了幾倍至幾十倍，波幣大幅貶值。嚴峻的進一步緊縮政策從一月起已開始實施。政府自己估計，工業的解體將會在未來幾年帶來數百萬人失業。斯大林主義官僚造成的惡果和西方資本家的掠奪，正在假借團結工會政府之手，要波蘭工人和勞動羣衆負擔代價。

波蘭新政府的政策，正逐漸激起社會更大的反抗，為保衛最起碼的生活而起來鬥爭。一月中數萬名礦工罷工，便是社會開始反抗的明顯迹象。

工人的鬥爭也許會碰到兩難的局面：生活的實際體驗告訴他們，資本主義道路不通，但回頭走斯大林主義官僚計劃經濟，又是死路一條。有沒有第三條出路呢？

工人自管的民主社會

一九八〇到八一年的團結工會運動，其實已描繪了這條出路的大綱：一個由勞動者自管，基於生產資料由社會擁有的，結合着計劃、自管和市場的制度。當時由工人民主討論和擬定的這個前景，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同。但爭取實現它的努力，被波蘭軍法統治打斷了。

現在，這個前景再次由波蘭的左翼提出。如果隨着工人保衛生活的鬥爭興起，工人的力量再次凝聚，並從消極或佔領廠房式的罷工提升到「積極罷工」，由工人掌握生產和分配，結合社會其他勞動者，剷除官僚國家機器和把持着各級行政和經濟架構的官僚，是有可能逐步走上這一條出路的。

在東歐其他國家和蘇聯之內，也逐漸出現以工人委員會或其他工人基層民主組織為基礎的民主自管共和國的主張，以對抗官僚計劃經濟和西方資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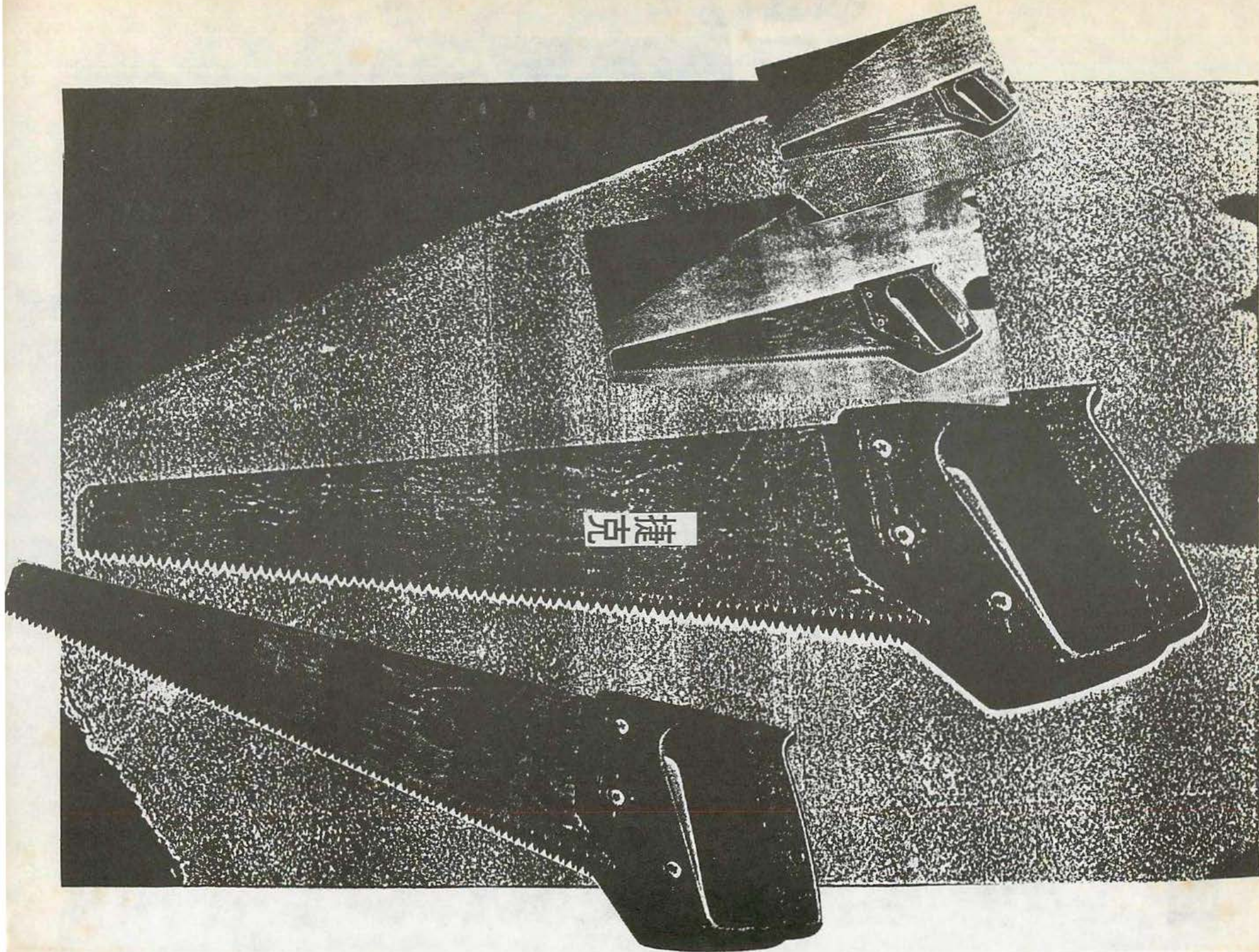
義掠奪的死路。雖然這些主張目前仍然限於少數左翼和工人團體之內，但隨着西方資本主義進一步入侵，吞併人民數十年來積累了的勞動成果，超級剝削廉價勞動力，導致國內危機深化，對西方的期望將逐漸被現實打破，在勞動人民保衛生活和現有社會成果的鬥爭之中，這個前景是有可能逐漸取得更廣泛認同，為之而奮鬥。

經過八九年的民主鬥爭後，東歐蘇聯各國人民爭取到的最大成果，是打破了長期以來官僚的政治控制，開創了自我組織的政治空間。匈牙利工人發覺第二經濟其實不能提供個人出路，已開始用罷工等行動尋求集體出路。南斯拉夫科索沃省的阿爾巴尼亞礦工和人民的罷工鬥爭，突破了民族的界限，爭取聯絡其他工人和民族。東德工人由於兩德統一和西德資本湧入，擴大了與西德工人的接觸交流，有利於他們在面對共同的矛盾和敵人時組織力量共同鬥爭。捷克、蘇聯的工人也在迅速恢復他們的鬥爭傳統和組織力量。只有當人民尤其是工人集結力量，才有條件推動社會走向以人民利益為本的出路。

八九年中國和東歐巨變顯示，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是互相緊密影響的。一國羣衆的覺醒和動員以至犧牲，鼓舞和激動了另一國的羣衆起來。同樣地，一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實踐經驗，也應該被另一國的人民參考，減少失敗的代價，增加成功的機會。雖然目前中國民運仍處於被壓抑的狀態，但東歐蘇聯各國的發展，特別是現時波蘭和東德的發展，很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為中國以及全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提供經驗教訓，為勞動人民的鬥爭提供真正出路。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五日★





捷克

捷克：民間力量傳統深厚

文樂

自從蘇軍在六八年開入布拉格之後，捷克斯洛伐克一直處於嚴密的社會控制之下。雖有「七七憲章運動」，但大多數人在秘密警察監視和國家機器強制之下，保持緘默。一股低壓的沉鬱籠罩着捷國。到一九八九年，社會開始蠢動，出現幾千以至幾萬人的示威。參與者最初一直主要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是，從十一月十七日起，形勢卻急轉直下，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七百萬人民進行全國大罷工大遊行，參加者佔全國人口幾乎一半！就是這個龐大的人民動員，迫使捷共取消憲法第四條保障捷共一黨專政的條文，讓出部分權力，與非捷共人士組織聯合政府，由反對派領袖哈維爾出任總統，聯邦議會三百五十席有一百多席分給四十多個新成立的政黨，並預定在九〇年六月舉行自由選舉。

人民力量再抬頭

人民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後打破捷共政治壟斷的破竹之勢，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缺口一旦沖開，就無法阻攔人民的要求湧湧般推進。

十一月十七日，四萬學生上街遊行，警察祖暴鎮壓，一名學生被打死。學生發動總罷課，隨即組成宣傳隊伍，到各城市各工廠向工人、市民遊說。一向堅持與政權抗爭的異議知識分子，也積極與學生協調，行動起來。彼得·歐爾和幾名「七七憲章運動」成員被政府逮捕，罪名是散布學生被打死的「謠言」。

在學生和知識分子推動下，各地成立「公民論壇」，團聚所有尋求打破捷共一黨專政的人士和團體。「公民論壇」發展迅速，在十一月二十日正式成立，全國發展了二千多個組織。「公民論壇」又推動工廠內成立工人罷工委員會，醞釀全國大罷工。（罷工委員會到九〇年初發展到一萬多個）二十二日，工人開始上街遊行示威，警察的祖暴鎮

壓引起更大民憤，全國準備在二十七日舉行兩小時大罷工。二十六日晚，政府開始讓步。

從這十日的發展來看，捷共政權對付人民運動的手法，初期照舊使用高壓：驅散示威者，拘捕反對派領袖；後來，它在人民巨大的團結力量面前被迫屈服。導致轉變的關鍵，在於「公民論壇」成為所有非捷共力量集結的手段，而強大的工人階級則通過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

工人運動曾是捷共後盾

捷克的工人力量對該國的發展舉足輕重，捷國統治者一直試圖控制這個力量。捷共當權後，一面聲稱代表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一向加強對工人的控制。八九年工人卻獨立地組織起來，成為結束捷共一黨專政的主力。捷國工人力量崛起、壯大、自主行動的歷程，為國際工人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以下，讓我們看看這個經驗的正、負面。

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一八年十月脫離奧匈帝國，建立共和國，前奧匈帝國七成的工業劃入捷克之下。一九三〇年，工人佔捷克勞動人口的37.5%，一九六一年，達到52.2%。捷克工人是從手工業者轉變成工人，而不是來自貧困化的農民，因此大半世紀以來都組織在工會內，有一定的文化生活和政治意識。

一九一八至三八年，捷克工人運動非常分散，根據不同行業、民族、政黨組成工會各自為政。一九三七年，全國有七百多個工會，其中四百多個屬於十八個工會聯盟，其餘沒有與任何中央架構聯繫。這個散漫狀況，令工運不能團結力量保衛工人利益，抗衡經濟大衰退的衝擊。

一九三八年，捷克被德國吞併，德國為加強控制，將所有工會合併成兩大工會。戰後，當捷國工人擺脫侵略者的統治後，卻也不願返回戰前的工會涣

散狀態。

在抗戰期間，工人在抵抗運動中起着積極作用。在捷克，地下工會與捷共是「捷克國民會議」的主力，領導抵抗運動和一九四五年五月的布拉格起義。起義時，八萬人築起一千六百個街壘，與德軍火拼，反映了工人羣衆的參與規模。也是這個羣衆的積極參與，令抵抗運動不僅有民族主義色彩，也有爭取社會主義解放的精神。布拉格起義戰鬥最激烈的五月七、八日，「捷克國民會議」的廣播這樣說：

「我們只有一個條件：德軍向捷克國民會議和捷克軍事力量無條件投降……同志們、工人們、勞動人民、勞動婦女，上街去！我們的起義、我們的革命，是我們工人的事。我們知道為什麼而戰——不僅為我們民族的自由而戰，也為我們的社會自由而戰。新的自由的共和國……將是我們的共和國、勞動人民的共和國。我們將會是主人，管理國家。不會有資本主義的吸血鬼，不會有貧窮、剝削。人民將走向富裕，人民將走向幸福。」

這段宣言，活現了起義的革命精神。

一九四六年自由選舉中，捷共比其他政黨取得更多票數，在聯合政府中佔領導地位。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工會運動的發展。一九四三年，地下工會戰士組成了「中央工會會議」（URO），不僅推動成立「捷克國民會議」，也在全國有廣泛的組織網絡，成立了工人民兵。解放後，它建立了團結的工會運動，主張在所有工廠成立由「中央工會會議」領導的革命部隊。捷共大力反對這個主張，內政部在四五年六月發出命令，取締所有軍隊和警察以外的武裝力量。「中央工會會議」只獲准在工廠內成立民兵，但功能被大大削弱。由此可見，捷共從一開始已經對工人自我組織採取高度戒備和抑制。

「中央工會會議」與捷共領導層的另一分歧，是前者在四五年五月解放後不斷主張實行國有化，而捷共則猶豫不決，恐怕國有化計劃會開罪西方列強和資產階級。四五年七、八月間，由於工會和工人施加強大壓力，政府才開始實行局部國有化。

捷共竭力操縱工人運動

四五年五月後，捷國工人運動在「中央工會會議」基礎上建立了「革命工會運動」(ROH)，其成立時宣告了兩個方向：基於歷史教訓，工運不能分散分化，也不能從屬於任何政黨的利益。這個統一的工會運動在四五年大半年發展迅速，到年底已有一百五十萬會員，在布拉格等幾個大城市，工人有六至八成加入了工會。

統一工會運動克服了以往工運的渙散狀態，但同時受捷共支配，被捷共限制在一個框框內，利用「革命工會運動」取代工廠委員會的發展。

工廠委員會歷史悠久

捷克社會經歷了人民的廣泛動員，工人和民衆對建立新社會有很大的期望。趕走侵略者後，工人在工廠內成立工廠委員會，清洗以往與侵略者勾結的人士，進而提出工人控制生產、管理工廠的要求。工廠委員會有潛力發展成爲工人階級運轉權力的獨立機關，確保人民民主控制社會生產。一九四五年五月後，工廠委員會的發展大大超前於工會的發展。

捷共感覺到這個發展會脫離它的控制，於是刻意壓抑它，尋求將「工廠委員會」納入工會架構之內，限制它獨立活動的範圍。

許多流亡的資深共產黨人在五月以後重回工會領導地位，他們在工會內推行捷共的「羣衆組織路線」(即把羣衆組織從屬於捷共領導之下，忠實地執行捷共的路線)；這些共產黨人有一定聲望，在他們「領導」下，工廠委員會的發展大受窒礙。「中央工會會議」主席沙保托基(Zapotocky)在八月多次重申：「工廠委員會在未來會扮演重要作用，但只會是勞工和工會運動的附屬機構。」「工廠委員會的活動，是監察生產、貿易、行政，令國家和僱員利益不

致受損……它們沒有權獨立發出命令，或在生產和行政問題上自行作出決定。」

捷共刻意把「工廠委員會」納入「革命工會運動」中，後者又受「中央工會會議」統率。捷共維持操縱控制最重要的手法是在組織上控制工會。工會的上層架構大部分由資深的捷共黨人擔任。「革命工會運動」第一次大會以克服以往工運渙散的致命弱點爲理由，主張集中化，通過決議將決策權交給一百二十人的「中央工會會議」、四十二人的管理委員會和十四人的主席團。結果是，儘管「革命工會運動」在四六年四月有一百七十萬捷克會員和二十四萬斯洛伐克會員，但它的內部運作像捷共一樣，是不民主的，權力集中在中央領導層手裏，甚至連工人進行罷工，也要得到地區工會領導層甚至「中央工會會議」的批准。至於工廠委員會候選人的提名和選舉程序，全由「革命工會運動」的領導人包辦。這個上層控制的惡果在日後更爲明顯，但四六年的時候，並沒有基層的異議反對，也沒有組織性的反對力量，僅有少許異議批評。

捷共一度深受民衆支持

必須留意的是，捷共在這個期間，一直在與其他政黨爭奪政治領導權。它在四八年二月受到國民陣線政府內右傾力量的聯合進攻，屬於其他幾個政黨的政府官員集體辭職，向捷共領導的哥特瓦爾德政府施壓。在這個危機時期，捷共訴諸工人羣衆的廣泛動員，反過來採取攻勢，把全部權力取到手上。它能夠這樣做，因爲在四五至四八年間，捷共發展成爲全國最大的羣衆黨——四五年五月時黨員人數只有二萬八千人，兩個月內增加了五十萬人，到四六年超過一百萬人，其中近六成是工業工人，十幾萬的農民黨員令它可以結成強大的工農聯盟；而且，它通過對工會運動的支配，能動員社會上廣大民衆。

在四八年二月危機時期，捷共動員人民的支持，在二月二十四日，二百五十萬工人罷工，支持捷共的政策。罷工前夕，捷共更給布拉格工廠工人民兵派發六千支槍械，持槍的工人民兵維持大示威的秩序，對反對捷共的黨派是另一種示威(實際上，捷共並不依賴武裝工

人民兵的力量，因爲它控制了軍隊和警察)。

可以說，四八年捷共奪取全權並開始實行一黨專政的過程，除了捷共在戰後已基本上控制國家和軍隊之外，還通過組織羣衆黨和羣衆組織，取得廣泛的民衆支持——不過，即使在四八年二月，工人羣衆也沒有自主地採取主動，而是由捷共領導層指揮。工人不能民主地掌握龐大的工會組織，基層黨員不能民主地決定捷共的發展，這個嚴重的缺陷，要到六八年才有較重要的突破。但之前，在五〇年代初期，社會爲此已付出代價，甚至在捷共黨內，五一至五二年，數萬黨員被迫害整肅，一些領導人(如總書記斯蘭斯基)也不能倖免。在高壓下，連五六年席捲東歐多國的局部非斯大林化浪潮，對捷國社會竟也沒有任何衝擊。

六八年布拉格之春

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源起的動力是捷共黨員(及被黨開除的成員)尋求改革捷共來推行政治經濟改革——經濟上引入市場政策，以發展被官僚僵化統治所窒息的經濟；政治上，容許黨員和人民享有若干自由權利，如言論、政治組織等自由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權利，以緩和社會的緊張關係。

說布拉格之春是一場黨內改良的嘗試，是從這次變革的推動者的主觀願望、改革藍圖和現實實踐的角度來看。但是，布拉格之春的意義，卻不僅顯示了捷共內部自我改革的動力及局限，及蘇共支配沒落，它更重大的意義，在於工人和其他社會層分開始擺脫捷共的支配而獨立發展。一般理解布拉格之春在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華約軍隊開入之後便結束。其實，結束的只是捷共黨內的改革。至於民衆(尤其是工人)力量，在八月二十一日之前，大體上仍在捷共提出的改革藍圖所提供的政治空間和可能性(包括其限制)內發展，在八月二十一日之後，反而激發了更大的自主性。

雖然這個自主發展被蘇共支配下的捷共領導層所卡壓，但它卻爲七十年代後期發展的知識分子異議運動和八十年代後期發展的工人運動和全民主運動奠下基礎。

捷共自我改良運動的淵源

捷共黨內的改革運動，在六八年發展至最高潮，它的戲劇性變化，反映捷共在蘇共支配和本國社會壓力兩者矛盾之間搖擺。

早在一九二九年二月，當共產國際插手干預撤換捷共領導層，扶植哥特瓦爾德上台時，捷共有大量下層黨員退黨抗議，黨員人數在幾個月內下降了四分之一，剩下二萬四千人。四五至四八年，捷共發展成過百萬人的羣衆黨，它在奪權後，爲推行蘇聯模式和清洗在本國有根基的黨員，實行了大整肅。

一九六二年捷共黨內開始出現爭取平反建國初期政治冤案的要求，這要求得到黨內頗大支持，蘇共才暫時中止對捷共黨內事務的干預。六八年初杜布切克領導的「改革」派上台，是六二年改革運動的延續。捷共中委會在六八年四月一致通過《行動綱領》，主張一系列改革，但蘇軍在八月將杜布切克等領導人綁架到莫斯科後，杜氏等人向蘇共壓力屈服；六九年三月取代杜氏成爲黨領導人的胡薩克，本身也是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的領袖。捷共領導層對蘇共壓力的屈服，顯示了它的軟弱，而要將蘇共路線在全黨推行，則又要進行大清洗。布拉格之春之後，五十萬黨員被開除出黨。

布拉格之春的失敗，最後一次宣告了捷共的矛盾和無能。人民的自主運動則在捷共領導權威嚴重受挫和消亡的同時興起。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工人運動短暫再生

在布拉格之春時期，工會運動開始復甦，但工會運動較重要的發展，則是蘇軍入侵之後，持續到翌年年中。捷共改革派企圖引導工會運動向它屬意的方向發展。

六八年三月，「中央工會會議」主席和兩名書記辭職，這個做法是由「中央工會會議」內的捷共黨組提出的，目的是表明讓工會發展成保衛會員權益（尤其是向國家提出要求）的組織。這個概念的轉變，本身是一個進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中央工會會議」主席團兩次與政府內閣開會，討論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在議程上的問題涉及廣泛的社會問題，包括工資、薪級制度、工

作安全、婦女勞工、住屋、勞法、健康保健、退休等等問題。第一次會議成立了聯合委員會，要在一周內提出建議！一周後，在第二次會議上，政府答應改善幾乎所有問題。顯然，工會的新領導層所能夠做，而捷共改革派又願意接受的，是令工會變成民衆爭取較好生活水平的組織。

然而，當束縛放鬆，民間的運動就會發展自己的動力，不會受上層訂下的範圍所限制。當在杜布切克新領導層仍在辯論新經濟改革會否不利於工人時，工人已經在三月中展開連串自發性罷工，提出的要求主要是改善工資，但也有關注全國企業的發展路向，要求撤換企業領導層。在工業行動的過程中，工人開始組織罷工委員會，同時，組織自主工會的行動也開始了。一個例子是，鐵路機車工人在六八年四月廿九日進行自由選舉，成立了「鐵路機車工人同盟」，並選出十二人的中委會（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各六人）。同盟自稱有二萬三千名成員，而三分之一是捷共黨員，全都以個人身分加入了「革命工會運動」。官方的「鐵路工人工會」多次提出讓鐵路機車工人在該工會內組成自主的分部，但遭拒絕。「鐵路機車工人同盟」成立後，「鐵路工人工會」和「中央工會會議」指摘它違反團結的原則，拒絕承認它。蘇軍入侵後，同盟申請正式註冊被拒。

另一值得重視的發展，是在華約軍隊入侵後，許多工會在改選時，捷共黨員難以進入新的委員會。政府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成新選出的工會委員會裏，（特別在大工廠）沒有一個捷共黨員。

華約軍隊入侵後，工人的行動變得更加政治化，如協助捷共第十四次黨特別大會在布拉格的CKD機械工廠內秘密召開，由工人民兵保護會場（儘管杜布切克領導層從莫斯科回來後宣布這次大會無效）。此外，工廠工人、工會、罷工委員會等發表譴責軍隊佔領的聲明，工人也有一些零星工業行動，抗議軍隊佔領。一九六九年三月工會全國大會召開時，仍然通過《捷克工會憲章》，主張工會的任務是保衛會員的權益，並通過決議支持企業代表會，呼籲在法律上保障人權和公民權。不過，一個月後，

「中央工會會議」接受了捷共主席團向蘇共路線的全面服膺。之後一年內，五萬名捷共和一萬三千名斯洛伐克工會幹部被整肅，大批工人退黨。

在布拉格之春時期，黨內改革派主張通過企業代表會讓工人對工廠管理有較多發言權。代表會不取代工廠管理階層的權力，倒是可以協助改革派轉換一些技術官僚上台。按照改革派藍圖成立的企業代表會，佔多數的是專家和技術人員。華約軍隊入侵後，企業代表會繼續發展，到六九年六月底，全國共有三百多個，另有三百多個籌備成立。這類代表會在一些國營農場也出現。公衆對企業代表會是支持的，六八年七月和六九年三月進行了兩次民意調查，支持企業代表會的分別是53%和59%，反對的是分別是10%和3%。在六九年下半年，工業部發出命令，取締所有企業代表會。

地下活動堅持不懈

全社會來說，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帶來熱烈的討論，但並沒有廣泛的動員，因爲改革派的經濟主張會導致通貨膨脹和失業，這引起社會普遍的觀望和質疑。華約軍隊入侵後，有大規模的羣衆性行動，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二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之後一周一直有和平示威。然而，隨着捷共改革派轉向，並協助抑制羣衆行動，羣衆行動趨於沉寂，只有兩次較觸目的事件：六九年一月學生巴勒自焚抗議和三月捷國冰上曲棍球隊戰勝蘇聯隊而觸發暴動。但這沉寂，卻是對蘇軍的憎恨、對捷共的唾棄。人民知道，要前進，就要靠自己建立自主的力量。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短短十天內，工人的力量突然崛起，成爲全社會前進的中心力量——這其實是多年經驗累積的結果。在全社會處於消極壓抑的時期，捷克的知識分子反對力量起了高舉社會前進旗幟的重要作用——一九七七年「七七憲章運動」的簽署受到各種打擊迫害，卻堅持不屈，仍有一千三百多名聯署者；「保衛被無理迫害人士委員會」在一九七八年成立，到八五年發表了超過四百五十份文告。地下刊物一直蓬勃發展，單是地下的「掛鎖出版社」到八五年已出版了二百五十多套

書。「說幾句」的組織，也收集了四萬多個簽名，要求當局釋放政治犯。青年搖擺樂運動，天主教徒爭取教會權利的運動等等，都保持了社會的異議聲音，衝擊一黨專政。

知識分子、異議者和學生運動在捷國有較顯著的發展，不僅由於參與者有道德勇氣，而且由於人民有深厚的鬥爭傳統，及現實力量，支持着先行者的行動。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市民的兩大股力量的匯合，產生了八九年底轟烈的政治變動，迫使捷共讓出一些政治權力。

新局面隱含新危機

當前，捷國人民面對兩大問題：

(一) 如何將權力徹底從捷共手中取過來，掌握在人民手上。

捷共在八九年底作出了不少權力上的讓步，但是，三十萬的黨幹部，二十五萬的秘察警察，一百七十萬的官僚這個龐大的國家統治機器，仍大致上完整，未受嚴重衝擊。要解除捷共的武裝，剝奪它對物資的控制，打破舊國家機器，仍要進行艱苦的鬥爭。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一日，捷克全國進行十分鐘的罷工示威，要求捷共交出四十二年統治所累積的財富。這只是鬥爭的一部分。

(二) 如何進行經濟和社會變革，使人民真正獨立自主。

結束一黨專政是全社會認同的政治目標，但如何進行經濟及社會變革，則出現分歧。這分歧首先出現在「公民論壇」的架構內。而在八九年底開始恢復或新組成的四十多個政黨，則提出各種主張，從右到左都有。「捷克孩子黨」主張復辟王朝，「基督民主黨」、「自由民主黨」主張實行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捷共內的「民主論壇」派，主張復興捷共，「綠黨」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左派出路」則提出民主、自管的社會主義前景等。

經過捷共的統治經驗，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社會主義即是現存共黨的理論和實踐，因此，眼前的可能出路，似乎是實行市場經濟，重新走入西歐資本主義「大家庭」之內。這也是「公民論壇」為六月的選舉提出的競選政綱要點。這份政綱表現了一個矛盾：既想儘快擺脫捷國的長期孤立，追上西歐先進

國家的水平，又理解到捷國目前的落後，令它可能被外國資本「買」下，一般人民生活面對嚴重的威協。面對這個矛盾，它含糊地提出要維持社會福利制度和本國的自主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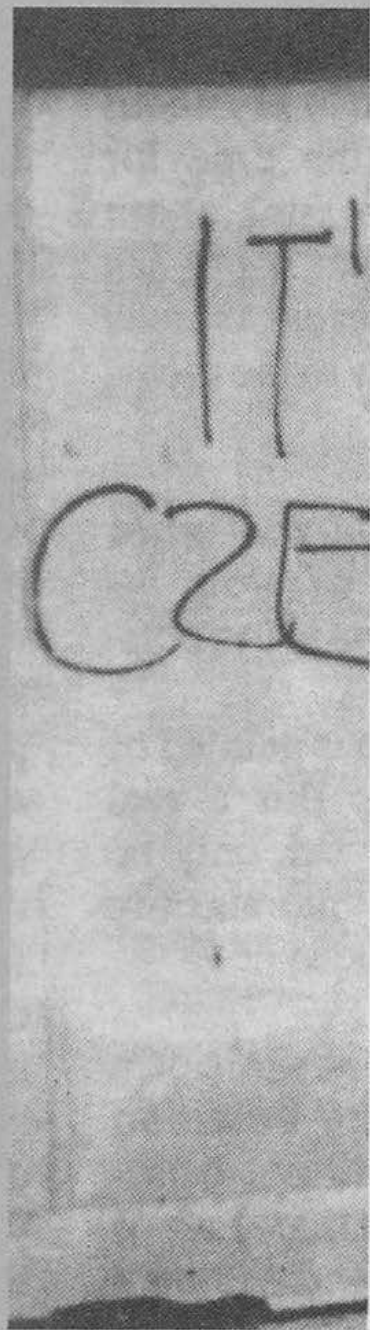
這個矛盾困局，不僅捷克面對，多個東歐國家也面對。能否走出困局，關鍵在於人民能否自主地作出抉擇。人民若能掌握決定權，則即使走了歪路，也能及時糾正。

回顧捷克歷史，它在一九一八至三八年雖然是歐洲中部唯一實行民主制度和快速工業化的國家，但它終於難以避免成爲列強瓜分利益時的犧牲品——在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英、法、德、意四強決定劃分捷國大幅土地給德國，捷國根本無發言權。之後，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實質是德國資本的附庸。正因這個歷史經驗，捷國人民才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選擇實行國有化、土地政策，才會大量加入捷共或捷共控制下的工會及羣衆組織。當年，捷克要擺脫西歐強國的支配，便倒向蘇聯。今天，捷克人民推翻共產黨統治，只是克服了眼前的障礙。右派力量和帝國主義在捷國內外掀起反共的宣傳攻勢，在意識形態上佔了上風，但它們給捷國人民提供的出路，只有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外國借貸，加入歐洲共同市場，這些意味着通脹、失業、緊縮政策、經濟依賴和附庸……

捷國人民要自主掌握社會資源和社會發展路向，除了在本國加強民衆的自我組織及動員外，還要選擇與什麼國外力量聯繫。謀求帝國主義跨國財團「援助」，「協助」捷國發展，是目前不少政治家（包括「公民論壇」部分領袖）所鼓吹的。這個做法的危險是重新成爲西歐強國的附庸。有沒有第三條路？如果說人民的利益惟有人民自己才會保衛，那麼，捷國工人和民衆要聯結的對象，則只能是蘇聯集團、西歐各國及其他國家的工人和民衆。

這條路其實並不漫長。

★





要建立民主多元化制度

哈維爾訪問記

〔捷克總統哈維爾未就任以前，曾於八九年十二月二日接受捷克共產黨黨報《紅色權利報》記者尼柏斯基訪問，以下是報導全文〕

□訪問者

■哈維爾

真正的對話必須要互相明白對方。以「公民論壇」代表哈維爾為例，雖然《紅色權利報》曾經多次報導過有關他的事，但他却從後沒有機會在報上為自己說話。這星期本報希望通過以下的對話，來修補過去互不了解的裂痕。哈維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生於布拉格，在演藝學院戲劇系畢業，而成爲劇作家。他曾經是《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亦曾被數次監禁。

「公民論壇」主張民主多元化

□：雖然我知道你並不喜歡這份代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紙，但畢竟你今次亦同意接受我的訪問。

■：黨的報紙從來沒有說過我的好話，但現在並非我要反控訴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是將來。很高興你的報紙決定訪問我，因為我早有些說話希望與共產黨人談一談。

□：那很好，但首先告訴我，你認爲，本報所呈現的你的圖像，不準確嗎？

■：關於我的圖像？嘿，有點陰暗。但實在只有了解我及我的工作，同時對我沒有偏見的人，才能對我的性格作出真正評價。

□：你認爲，在這國家內，不同的政治意見——像你顯然不會跟隨馬克思的做法，而我則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樣的不同政治意見，會有真正對話的可能嗎？到底你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還是一個沒有肯定的政治思想的反共產主義者？

■：我並不依附任何思想、教條，或者一些已經被別人定義的世界觀；同時我又不屬於任何明確界定、思想狹義

的政治行動。我只是站在對抗謊言的真相那一邊；以意義對抗無價值，以公正對抗不公平，以秩序對抗混亂。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正如你們「公民論壇」的綱領所倡議的一樣，你提出民主多元化，及組織聯合政府，這豈不就是你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及政治意見？在上次你與黨總書記會談的時候，你知否是什麼使我意外及驚奇？原諒我要這樣說，你吵嚷地要政府實現你所有要求的做法。這並不是平等雙方應有的對話態度，似乎你已經把你的原則拋棄了。

■：這樣談判是爲了國家的利益。我們幾次告訴總書記，現在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們傳達的是大多數公眾的要求；同時我們又數次提及，我們國家的問題，如果能夠避免無法控制的罷工、流血、混亂及對抗，將對所有人有利。如果我們意圖以民主、和平、有秩序以及和睦的模式來組織社會、避免衝突，政府就不能只單純地宣布事情，而必須要實際行動。任何形式的拖延，不僅會傷害到「公民論壇」，同時亦傷害到政府及整個社會。我們沒有一人再能夠控制局面。

「公民論壇」集思廣益

□：你會否拒絕考慮友善的方法？

■：這是我一生的行動綱領。

□：我們且拭目以待。現在，告訴我「公民論壇」這個組織到底是甚麼。你曾在星期日電視廣播上解釋過，但你的說話頗令我困擾。除了你個人色彩外，你真的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理論作依據？「公民論壇」是否真正屬於人民自願聯結或是社會的自我組織，還是如我所見的，是一個未曾清楚定義其意識形態的政治黨派的核心組織？

■：我個人，以及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同意「公民論壇」只是一個論壇而已。論壇原本的意思，是指一處地方，在那裏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出

席及講出他們想講的說話。爲了保證每一個人不會同時發言而錯失聽到其他人說話的機會，一定形式的協調是必須的。我們意圖做的，是一種即興而戲劇性的嘗試，協調公眾及社會運動，同時亦反映一些現存組織及社會組織欠缺自信的現象。

□：讀者或會指摘你爲一個自封的領袖。

■：如果這是事實，就不會有這許多人參與。若沒有「公民論壇」及它協調的各中心，整個社會的處境將會變得異常危險，危險是來自不同的對抗及衝突，「公民論壇」在充滿危機的情況下，起碼給予某些聯合行動的可能……

□：團結一致，積極罷工……

■：準備好隨時可以罷工，較之如何籌備罷工，更顯出這方面的意義。罷工同樣是民間自我組織。罷工委員會正在互相接觸，有的支持「公民論壇」，有的成立自己形式的民衆論壇。委員會之間依靠溝通及消息傳遞進行接觸，當中並沒有一個中央領導。

□：我仍然不能全盤肯定你並不是中心，但這不要緊。如果我對你的了解是正確的話，你們的行動應有一個明確的時限？

■：只要是需要的話，「公民論壇」會繼續存在。它的目的及理想是真正的多元化。如果它的存在變成多元化的障礙，它便不會繼續。我想說的是：讓我們越過極權形式的政府，達至真正的民主。到時各自獨立的政治組織及社會組織便會很快冒升，結果就成爲我們希望的真正民主多元化的基礎。

□：「公民論壇」會否是多元化的體現？

■：它一定不會變成第二個「民族陣綫」①。我們不希望製造另一個巨人去對抗現存的一個。我們不要把多元主義的各個大門關閉，而是把各大門完全開放。

□：我們再進一步談吧。你知道甚

麼令我感到驚訝？那是在公眾生活當中，不同的會議及聚會裏，包括列拿廣場上發生的在內，所有我們聽到的都只是獨白。或者是我的耳朵騙了我。你不害怕歷史重演嗎？

■：我並不以為事情如你說的那樣。就好像我們坐在這裏的時候，「公民論壇」的代表們卻在人民會堂的東方沙龍內和共黨組織的領導層開會。「公民論壇」並不希望把任何人，包括那數約一百七十萬共產黨員，排出公眾生活之外。

要更新「社會主義」定義

□：你對共產主義者與捷共成員的看法是怎樣的？

■：他們當中有很多是聰明、有能力以及具創造力的人，這些人卻一如其他非共產主義者一樣，保持沉默了幾十年。

□：請原諒我打斷你的說話，但是他們並不一定需要保持沉默，我意思是這亦涉及他們的勇氣問題。

■：雖然他們並非絕對需要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他們要把話說出來，他們便會遇到麻煩，或者乾脆是無人聽他們的說話。我相信我們的一些市民、黨員，會和整個社會一起說話，因為他們知道現在有被聆聽的機會。對於我們的社會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看法是，目前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是盡快地改正他們的黨，使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黨組織，放棄極權統治，能夠在將來和任何其他政治勢力一起，同處在多元民主的制度。目前風起雲湧的局勢，就是向這方面發展。「公民論壇」就作為這些希望的象徵，其出現的目的並非反對共產主義，而是反對極權方式統治。

□：你到底是一怎樣的一個人？你能否容忍那些並非你自己或者並不接近你想法的意見？你又有否認識你自己以外的其他真理？

■：如果在過去二十年，我有機會在國內出版我自己的書，大家便會明白我。事實上我是一個能夠容忍的人，並且希望有一個能夠互相容忍的世界。但現在可不是我解釋這些東西的時候。

□：為甚麼在你們的綱領中，不見有社會主義這名稱出現？

■：因為在捷克，這個名詞已經失

去了它的意義；我們根本不知道它作何解釋。這個名詞必須要重新定義，因為它已變成了一個如宗教崇拜般的謎。當統治集團不高興某些事使它不安，或離開它的控制，他們便會稱之為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應由它自己來鑒定本義。

□：那你自己是否拒絕承認它的存在？

■：我們對於未來、社會公義、民主的社會秩序的看法，絕不能由時下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觀點所支配。我曾經在過去十四、五年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但現在我已經停止了使用這個名詞，因為它已經貶值。或者社會主義者的真正工作，就是給這名詞一個新的內容，然後重新成為語言。

□：即使這樣，你認為我們應否保持社會主義的制度？

■：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不知道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實際意義是甚麼；或者你所指的又是甚麼意義。我只能告訴你我的實際想法，由你自己決定我說的到底是否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我相信我們的行為應該是合乎禮節、和善、正直、自由活動、顧及他人，並且推己及人。這是政治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的基礎。

□：你怎樣設想這個制度？

■：作為一個民主而多元的制度，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部分，已經證明了，經濟單位的自主運作及多元化發展必可保證經濟繁榮，但如果沒有政治上的多元化配合，經濟繁榮便不可想像。

□：所有制並非決定性的？

■：我想不是。我們可以有國營的、合作社的、合營或是個人管理式的財產。可以肯定的是私人財產應有一席位，特別是服務行業及小生意。以經濟繁榮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具決定性的並非所有制的類型，而是各企業以及整個國家能夠蓬勃發展。繁榮的經濟才能保證每個人的社會服務。瑞典及其他地方的模式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類社會較我們現存的制度，能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只有繁榮才能實踐社會保障。

□：合理分配這個界定社會制度特點的論題，可以有許多不同看法，但這不是我們今次談話的主題。

請容許我提出最後一個問題，問題

無疑是帶有假設性的。如果你被提名或當選，你是否準備接受政府的職務？

■：我做的所有事，是以這個國家的公民身分來做的。為誰的命運而做，我並非毫不在乎。我原本的職業是寫作，以後仍希望繼續。我對政治從沒懷有野心，也自覺沒有資格。我希望回到劇場去。我肯定相信，也同時希望，公眾利益（也是我的），不會逼使我跌進你所說的境況裏。

□多謝！

註釋：

①捷克共產黨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一直用「民族陣綫」統治捷克。「民族陣綫」內的組織，都是捷共的附庸組織。★



左起：哈維爾·華里沙

「公民論壇」和反對派運動近況

訪問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歐爾

〔以下是捷克人權分子及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歐爾（Petr Uhl）的訪問，訪問地點在布拉格，日期為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四日，訪問者是《國際觀點》記者山度爾（Hubert Sandor）和韋娜（Catherine Verla）。訪問稿經刪節〕

□訪問者

■被訪者

□：為什麼你總是說自己是由於（而非儘管）信奉共產主義，才一直堅持反對斯大林主義體制？你這種說法能有多少說服力？

■：在一次前政治犯會議中，到場者大部分是五十年代的前政治犯，他們大多都是非常反對共產主義的。我聲明自己是個托洛茨基主義者，亦即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我解釋說，正是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使我投入在鬥爭之中；在我眼中，沒有人權就沒有社會主義。可是，一直以來，在斯大林主義體制下，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並不能為我減輕罪名；看我二十年的坐牢生涯就可知道。當然，你可能會說我的馬克思主義只是自我中心或錯誤思想的一種表現。不過，這種看法很難套用到我的著作、參加六十年代的青年組織、「七七憲章」運動、「保衛被不公平逼害人士委員會」（VONS）和保護政治犯及提倡思想自由等活動。類似這樣的行動，無論是出於宗教信仰抑或馬克思主義信仰，都會受到敬重。

在我們當中，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像我一樣，視「七七憲章」運動為一個邁向政治革命的步伐，其他人則視此為散布基督教義的途徑……但我們互相尊重。現實鬥爭是鍛煉容納不同觀點的真實場所；在國外的捷克移民圈裏卻不一樣。

□：難道你不怕你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會使人認為你先天性地難以跟斯大林主義制度決裂，而不像其他反共產主義者那樣和制度劃清界線？

■：但這不是真的。他們並不如你所說的劃清界線。相反，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支持極權制度的。為了推行經濟改革，他們希望平息革命起義，然後，為了爭奪部長或副部長等職位，會採用各種反民主的做法。目前，我對這些做法的批評尚算溫和，因為舊體制仍未徹底打倒。但這證明我的馬克思主義比他們的反共產主義更為激進。

從我的信念出發，有些問題是很重要的。我重視的是獨立個體的解放，人必須從客體變為主體，不單止需要從經濟上，也需要從政治上得到解放。我要討論的不是「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這些名詞，而是如何使人類的解放作為社會解放的客觀基礎。

反對「各種財產形式平等」的看法

□：在東德，較多人支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外的「第三條道路」，捷克的情況如何？

■：我認為捷克必須容許市場經濟的發展，從共產主義的無階級社會的理想來看，這似乎是項倒退，但我看，現在似乎無可避免。我當然贊成由民主的方式去制訂計劃，決定大問題，但我們不能妄想可以這樣協調生產中的每項細節。只有市場容許消費者有真正的選擇自由，如購買鞋襪、領帶等方面。

你或許會問市場的規律能落實多少，或私人企業可以聘請多少職工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很難編定，不過，正因為我考慮到無可避免要容許市場有某種程度的發展，因此更需要慎重處理民主控制及工人實現自管等問題。當接受外國資金投資時，這些問題就更為重要。波蘭必定是由於接受了大量的外國援助，才負上那麼巨額的債項，但在缺乏工人（及消費者）的控制下，貸款帶來的利益並不大。

不幸，捷克近期並無出現任何關於經濟及政治自管的稍為完整的構思。其

他構思如全面私有化的計劃已有好幾次的閉門討論，但從未有過公開透露。關於這方面的討論會伴隨着下次立法院選舉而開始，以後仍會繼續下去。現在成立的所有政黨，都需要對此確定立場。至於在企業內的工人，我相信他們會反對私有化，以及由西方經濟來控制捷克，假若這意味他們的生活水平、工作條件將受到影響，以及會導致社會分化的話。到時候，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會終於開始。

對我來說，關於所有權、支配權和生產資料等問題十分重要。在我出獄後①第二天，布拉格「公民論壇」協調中心開會，這是在評議會組成之前舉行的，會議接納了協調中心起草的綱領。我和另外三人投了反對票，此外是五票棄權，六十票贊成。我投反對票的基本原因在於綱領內有一句（當然還有其他有需要討論的問題）：各種財產的形式應該平等。我當時問，假若財產的形式是由政治局——或政黨和國家領導——決定一切，剝奪勞動人民的所有權力，而這又是等同於一個集體，如由二十人來決定生產什麼、工作條件等等。如果這兩者能等同，那麼，就等如說偷竊犯罪與誠實工作無異。這點我絕對不能同意。當然，用我所舉的譬喻，沒有捷克人會接受說各種財產的形式都是平等的說話；而其實綱領那個句子的公式是用來令私有財產合法化的。

□：儘管你不同意，你仍是「民主論壇」議會的成員。

■：錯了，我是「公民論壇」協調議會的，而我並不是唯一的異議者，在這個有一百人的集體裏有一小撮左派。

□：最近有什麼新派別組成？「公民論壇」將如何處理即將來臨的選舉？

各種黨派紛紛湧現

■：「左派出路」〔見另文——編者〕在十一月十七日成立，我們的提綱在這之前起草，之後便編輯成草案。

「左派出路」如同「捷克的孩子」（他們是君主制度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協會」等，是近期新成立的數十個組織之一，這些組織還很邊緣。其中有幾個較大的團體，擁有數百至數千會員，較多人的有「社會民主黨」，它有三個支流。在斯洛伐克也有一個。此外，還有綠黨（有好幾個綠黨）、「基督民主黨」及一個「自由民主黨」，後者名為「民主主動」（Democratic Initiative）是最危險的，他們一心要進入「公民論壇」，並想拿得一個評議會席位。現在他們已得到一席。有人向我這樣提及他們：大家都穿毛衣，用大家熟悉的方式說話，但這些「民主主動」結領帶，說話客套。他們實在有點奇怪，但人人都尊重他們。

競選宣傳期間，重要鬥爭便會開始。我為「公民論壇」擔憂的是另一個危險，即重現波蘭的選舉程序。在波蘭當時的局面下，是必須的，但我們則無必要照辦：即「公民論壇」在每個選區中只推出一個候選人。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當選。「公民論壇」其實可以不推舉候選人，而支持其他凡是贊同民主制度的候選人；又或者可以有三至四個代表不同黨或意見的「公民論壇」候選人。當然，在這形勢下，不受「公民論壇」承認的黨派便只得很少機會。

□：你是指那些與舊制度有緊密聯繫的政黨，和極端右翼政黨？

■：當我們要淘汰一切與舊制度有關的東西之前，必須小心。就如「社會黨」及「人民黨」，他們都是舊制度內的一部分，但要逐走他們卻沒有道理，因為他們一開始便與我們一起——「社會黨」在十一月前便幫助我們；再者，這些黨在不同時候都曾進行清黨。甚至連共黨內部亦產生了「民主論壇」派（雖然我並不知道他們得到什麼支持）；他們雖然仍然留在共黨內，但其口號與主張都十分正確，而且是真正民主的，我相信他們能夠在選舉中造成衝擊，尤其如果他們與共黨保持距離。而到時候，老共產黨將會剩下些什麼？

能理解「公民論壇」與捷共的關係，十分重要。「公民論壇」在布拉格的協調中心，已經沒有任何共產黨成員。最初是有過的，但他們都做了部

長，如哥馬力克（Komarek）；另一方面，在首都以外的地方，經常有共產黨成員是「公民論壇」領導層的一員，並建議由共黨成員參與政府。

「公民論壇」必須是將來民主選舉的保證，並須參與所有初選程序及投票監察委員會。它必須容許來自下層的民衆控制監察，並且不應該把不是一個政黨的自己表現成是一個政黨，否則，它便犯了大錯誤，這錯誤牽涉到許多人企求進入體制的欲望。就如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口號已經從「內政部長不應是共黨成員」轉而為「我們要求內閣由甲先生領導」。而假若甲先生不是一開始就是「公民論壇」人士，那麼就會變了乙先生。我們已經提出國會部長的候選人，以作一個短時期限如六個月的部長。這實在是反民主的；因為沒有人選舉他們，也無人能撤換他們；反而那些舊部長尚可以由選民撤銷他們的資格！

罷工委員會的狀況

□：「公民論壇」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什麼人可以參加？它與企業內部發生的事有什麼聯繫？

■：現在沒有已定好的結構。在布拉格的「公民論壇」協調中心，有差不多三十一位評議會成員，另外運作的部分是一百至二百位義務工作人員。義工中心遍佈首都的十個地區，布拉格的協調中心則與我們分隔。在布拉格以外的地方，情況相當不齊。譬如有些地方及企業，有三分之一人口報稱是「公民論壇」成員，而也有些地區，「公民論壇」只有幾個人，但卻有大量人來開會。在軍隊中也有「公民論壇」成員。

捷克大概有一萬個罷工委員會，它們有些就是企業中所設的「公民論壇」，有些則和「公民論壇」並存。這裏亦有一個罷工委員會的聯會，它的功能和「公民論壇」不一樣。他們成立了一個工會陣綫，但並不是要推動罷工，而是維持一個警覺的狀態。罷工委員會的一個目標便是清洗工會。工會的中央議會已經瓦解，並且被一個希望改革工會的「行動委員會」所取代。但是工人並不接受，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新的工會架構，繼續利用原有的建築物和基本建設。他們要重拾屬於自己的東西，不僅是「行動委員會」所要做改變工會人

事，而是要改變工會的地位。這是一種近似要求自管的工團主義路線。

在一年或半年之前，所有企業變成了「國家企業」，不再是國有制企業，它們卻被賦予更多的自主權。以前是直接隸屬於有關部門，現在是同時隸屬於國家部門的管理和工人。過去，官方建立了一套控制工人的系統，卻說成是自管，如果工人真的相信它，這種控制會是有用的。但整體而言，工人把它視為官方的宣傳技倆，當他們選出一些人時，工人經常是充滿猜疑的。不過，在一些例外的情況（大概有百分之五至十），工人的議會是民主地產生的，這類議會的人事也和後來的罷工委員會相一致。但在其餘的情況中，罷工委員會都希望清洗原來的「自管」架構，並想取代整個制度。

不過，現在最受注意的是整個政治藍圖——總統和立法院等等的選舉。上述問題一般很少受到關注。

□：這些罷工委員會有沒有代表在「公民論壇」中呢？

■：有的。首先，布拉格的「公民論壇」協調議會，設有一個「工人聯絡委員會」，裏面的職員在評議會中也有席位。另外，評議會中亦有一個工人的代表。學生和文化工作者，同樣有代表在評議會中。

不過，公民和政治派別現時仍然沒有分支，也沒有直接聯繫工人的派別。我們都一起工作。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波蘭是有這種分支的。

「公民論壇」對捷共黨員態度不明朗

■：但現時工廠裏的工人專注於哈維爾的選舉等事情，多於純粹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雖然經濟形勢並不是十分理想，但並不像波蘭那樣主導了人們的關注點。

□：回到政治問題。你說過「社會黨」在十一月之前已曾給你們直接的援手，可否告訴我們更多這個黨的事情？

■：這個「社會黨」並不那麼完全是社會主義，它是一個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的黨。它演變自班尼斯的「民族社會主義黨」，那個組織自稱是繼承於馬沙力（捷克獨立的首任總統）的。馬氏

是支持社會民主主義的。「民族社會主義黨」是一個介乎自由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政黨，其成員是技術工人中的知識分子及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派專業人士。可以說，他們是「瑞典模式」的支持者。十一月十七日之前，「社會黨」擁有一萬八千名黨員及十六名國會代表，目前其黨員人數已增加兩至三倍。

「社會民主黨」的情況可能更有趣，這個黨正在重組實力，它比「社會

黨」更傾向採取左翼立場，與西方的「社會民主黨」相反！

□：你曾提到「公民論壇」對共黨的「民主論壇」採取一種相對開放的態度，你是怎樣得此結論？這到底是一種妥協，抑或為了區別官僚主義者或斯大林主義者和共黨中的誠實之士？

■：我不大確定。在布拉格，妥協的精神最強，在別的地方，則有其他問題。很少人夠資格擔任需負責任的位置，因此共黨的成員便自薦。但這方面

是有磨擦的，那些較反共的人認為共黨成員無權擔任「公民論壇」的領導位置……但類似的意見在布拉格沒有出現。

註釋：

①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布拉格示威中，一名青年示威者被警察毆打喪生。官方在十一月十九日拘捕了歐爾，指他涉嫌捏造關於這宗死亡事件的消息。歐爾在十二月中旬獲釋。★

我們要爭取甚麼？ 「公民論壇」綱領

〔「公民論壇」由多個團體組成，包括「七七憲章」、「捷克—赫爾辛基委員會」、「革新」、「獨立學生」、「捷克民主動力」、「獨立和平委員會」、捷克兩個合法的非共黨政黨的成員、教會及一些爭取民主的個別人士。以下是公民論壇的綱領〕

我國已深深陷入一個道德、精神、環境、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危機之中；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已不能再有效運作的政治及經濟體系，社會回應國內及國外變化所必需的機制，差不多全部失效。過去數十年來，當權者必須承擔責任這理所當然的原則，一直沒有受到尊重。國家三大權力——立法、行政及司法，全部由一少撮以共產黨員為主的人所操縱。上述種種，摧毀了一個法治國家的基礎。

共產黨壟斷了全部重要職位，造成一個不公義的封建制度，使國家陷於癱瘓。一般人淪為上級命令的執行者，被剝奪了人權，剝奪了公民及政治權利。

中央指令式的經濟模式明顯已經失敗，政府承諾重整經濟體系則進展緩慢，而且並沒有在政治方面同步改革。

社會進行全面改革

上述問題，單靠革除個人的職位，或數名政客主動辭職，並不足以解

決。

公民論壇爭取的目標是：

1—法律：

捷克共和國必須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建基於捷克國民傳統以及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公民權利及義務守則的精神。

一部全新的憲法，需在此基礎上重新制訂，清晰界定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新憲法必須由新選舉的立憲會議通過，而且必須由一個完整的法治體系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權利及自由。司法獨立不能缺少憲法及行政法庭。

捷克的法律制度，應逐步朝上述原則發展，並應保證，對公民、國家官員及機構有相同約束力。

我們堅持，過去因政治動機引發的逼害，必須平反。

2—政治體制：

我們要求對國家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及永久的改革。我們應該設立及重組民主組織及機制，保證大眾能真正參與公眾事務，同時亦可形成有效屏障，阻止濫用政治及經濟權力的情況出現。所有現存及新組成的政黨、政治及社會團體，都有參與各級政府選舉的平等權利；要體現這個要求，是假設捷克共產黨放棄憲法賦予它的領導國家的權力，以及傳播媒介不再為共黨所壟斷。目前

並無什麼能阻止共黨明天便放棄它的壟斷權力。

應維持聯邦制

捷克應繼續維持聯邦制，同時應使捷克與其他民族結成有平等權利的聯盟。

3—外交政策：

我們希望國家能在歐洲及世界舞台，回復過去的享譽。我們是中歐一部分，希望與鄰國維持良好關係。

我們期望加入歐洲一體化的行列；我們對華沙公約國及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的政策，將以達成歐洲大家庭的理想為依歸。我們會承擔國際間的法律義務，同時保持主權不受干預。

4—國家經濟：

我們打算計劃放棄過往沿用的經濟政策，它妨礙了人民勞動的動力，耗費了人民的勞動成果，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使捷克與其他國家的隔膜愈來愈大。我們深信，現經濟體系不能透過小規模的改革而有所改善，我們希望發展一個成熟的市場體系，不為官僚制度干預所歪曲。新體系的成功，有賴打破現有大型企業所享有的壟斷地位，締造真正的競爭，而這又需要各類所有制同時平等存在，及將經濟逐步向外開放。

國家必須提供平等機會

國家當然仍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要擔當。她要在經濟體系內，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推行宏觀經濟政策，控制通脹，限制外債增長及對抗失業威脅。只有國家才能就公共及社會服務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務，及執行環保政策。

5—社會公義：

提供機會，讓個人能力得以發展及發揮，是急不容緩的事。

捷克必須建立社會公義，使老弱傷殘獲得照顧。但建立社會公義的先決條件，是富裕的國民經濟。

屬於教會、社區、企業、以及國家和其他志願團體的組織，將聯成一個社會服務網絡，這有助擴大人類間的團結、責任感及愛人如己的原則。這些人道主義的原則，對團結我們國家是有需要的。

6—環境問題：

我們要尋求一個與自然界保持和諧

的方法。我們要修復過去數十年對環境做成的破壞。我們會嘗試使郊外及城市回復本來美麗的面目，改善保護環境及天然資源的措施。我們會盡快全力改善基本居住環境，保證有合乎標準的食水供應、改善空氣質素及食物不受污染。我們會努力不懈，改善保護環境的措施，不只掃除現存的污染來源，最重要的是制止環境繼續受到破壞。

同時，我們需調整國家經濟的取向及結構，從而減少對能源及原料的需求。我們清楚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因此要作出犧牲，在價值取捨及生活方式上，都要有所改變。

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

7—文化：

文化不應只屬藝術家、科學家及教師關心的事情，而應成為國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跳出有各種意識形態的局限，打破我們與國外文化現有的人

為分隔；藝術及文學作品不應受到限制，應獲得出版及與大眾接觸的機會。

確立科學應有的地位。唯有這樣，才能掃除人們對科學所存的過分期望，及避免科學淪為執政黨控制的工具。

一個民主的教育制度，需建基於人道主義原則，不受國家壟斷。教師的地位必須受尊重，並應有空間讓教師個人的獨特性得以發揮。專上學院的歷史權利應獲重新確定，保證老師及學生有獨立和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我們認為教育是國家最寶貴的財產，目的是培育獨立思想及高尚的道德責任感。

上述就是我們的要求。我們現有的綱領很簡短概括，不過我們正預備將計劃具體化。「公民論壇」是一個向全公民公開的團體，我們呼籲有志之士加入，貢獻力量。★

「左派出路」的呼籲

「左派出路」(爭取民主自管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在當前時期的目標

我們爭取：

選舉不會造成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制度，讓少數的政治家（政黨、政治運動及其機構的領袖）支配全社會。

新建立的政治架構能真正民主地運作。「公民論壇」運動是社會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一般民主形式。如果這個運動旨在使全社會有民主，那麼它自己也必須是真正民主的。

直到目前為止，「公民論壇」適於成為危機時期的（臨時性）組織結構，因而它的運作是不民主的。現在有必要確保「公民論壇」所有架構都由下而上民主選舉。我們反對這個運動內任何寡頭政治傾向。我們支持「公民論壇」運動並在其架構內工作。

地區性的自管架構能有力地運作。運用直接民主的做法，以便直接影響人

民生活的問題能由人民直接處理。

工廠的自管架構要民主地運作。龐大的「國營企業」必須分成合理運作的經濟單位。自管架構必須不僅在企業管理層面運作，也要在工廠及車間平面運作。

必須反對官僚架構。有必要尋求一個組織規劃工作和法律權威的形式，以能不僅保證生產效率，而且保證僱員能真正影響管理、產品和利潤分配。

不官僚和活躍的獨立自管工會。工會所有權力應歸於基層成員！我們完全支持罷工委員會相互聯繫，我們也會在罷工委員會和工會組織內工作。

運用社會的自我管理及自我組織的正在發展中的形式，讓公眾廣泛參與環境問題。我們不能僅僅支持新設立的處理環境問題的國家架構，而是要真正控

制它們，而且在有需要時果斷地批評它們。我們正在獨立的環境保護架構內工作。

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是非官方的運動，爭取成立一個新的、真正的政治左派；在所有發達國家都存在這樣的左派。我們希望成為社會有良知的、徹底民主的良心。

我們的原則是寬容的忍讓、對話、探索真理、保衛真理。

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於布拉格

聯絡方法：

Sekretariat LA
Martin Hekrdla
Liliová 5
11000 Prague 1
Czechoslovakia★

爭取民主、自管的社會主義

「左派出路」綱領



Hey guys, we've killed the dragon (from the Ukrainian satirical weekly "Starchel")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捷克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變革，完全是在斯大林主義旗幟下進行的。當時基於議會民主原則的政治制度被取締後，並沒有代入以新的民主機制。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鎮壓下去，但工人則不僅沒有被免除剝削，反而在經濟上更受奴役，自由權利被剝奪。

(二) 政治上的左派也不能倖免。社會民主黨被共產黨強行吞併，而共產黨則變得完全官僚化，從工人階級的政黨轉變成為支配整個社會的命令式的權力架構的基礎。這個權力有系統地迫害和遏制所有獨立於它的左翼活動。

(三) 今日，共產黨的性質是雙重的。黨架構與國家架構融合在一起，形成官僚權力機制。黨員是它的主要社會基礎。黨籍成為攫取各種類型和層次的特權的途徑。在一段長時期以來，共產黨已不再是左派的政治力量，反而是一個保守力量，反對所有基本社會改變，只有在被迫時才接受改革。

(四) 反民主、反社會主義的制度，束縛和制約着政治、經濟生活和生活的每個層面。它已證明它既沒效率也沒有能力容許（更不必說刺激）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了。它也證明了它沒有能力創造條件，讓個人自由得以全面發展。

除了經濟停滯之外，它也導致公民權利和一般的人權被壓抑，工作上極大的異化，及社會出現道德危機。這個備受質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不管它被稱為斯大林主義，還是新斯大林主義，還是「現實存在

的社會主義」，都關係不大——並不能辯解它的存在；現在無可避免地有需要超越這個制度。但是，這個制度適合黨和國家官僚層，它們從一開始就根據自己的形象和需要塑造這個制度。這個制度也適合其他寄生性的社會集團，它們能很好地利用制度的缺點來牟取利益。

(五) 我們支持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

(六) 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必須建基於一貫的、有憲法維護的政治多元化，亦即是基於多個不同的政黨（包括非社會主義政黨）、社會團體、組織、主動性等的存在。我們基於捷克社會的歷史傳統和目前意願的角度，相信代表性民主將會成為未來的民主制度的基礎。這個代表性民主將會是議會式的，但同時有經濟上的自管。但由於這是議會制度，因此有必要防止社會被政黨支配，亦即防止被政黨的領導層支配。在一個代表性制度內，代表們以市民和工人的名義作出決定，而工人和市民通過民主選舉選舉他們，可以控制他們和隨時撤換他們。有必要逐步實行的，是愈來愈多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引入直接的民衆參與。顯然這需要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在現代社會，有必要運用資訊技術及其他先進技術。到時，由於沒有資產階級、官僚層或其他壓制性的社會集團存在，因此，政治體制可以從一個古典的代議制進化成為社會自管。民主必須同時是對少數民族、邊緣團體和個人的保衛，以便保證他們得以全面自我發展。因此，我們認為也有必要積極地抗擊任何民族上、宗教上或其他類型的歧視，抗擊所有形式的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

(七) 對於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只能基於公義和社會平等的原則。因此，我們反對以下的經濟制度——資本的所有者及有權運用者將經濟權力集中在他們手上，將工人排拒於決定經濟活動及經濟成果的決策過程之外。政治權力是從經濟權力生長出來的。即使在一些享有真正獨立的民主的國家（意思是大多數人民接納該政治——經濟制度），權力却是基於對資本的擁有和運用，權力運轉的方式是很要手段的。

金錢的統治，只片面地講求個人的效率和伴以剝削的社會的私有制運作，對於某些人來說可能比捷克現時的情況更具吸引力。但是我們反對這個取向，因為它不是真正的出路。這種制度可以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但代價是製造巨大的社會不平等。這個「新」的消費社會將會受到在西方司空見慣的危機所震撼。我們建議大、中型企業的經濟自管模式，核心就是經濟計劃能民主地共同制訂，個別工人能更多地參與關乎

他們的工作、工作成果、工作條件等問題的決策過程。我們認為發展市場，即恢復金融關係和市場關係，在經濟上是必需的。但市場必須受到控制。勢力大的集團和個人（例如外國集團和壟斷企業）不應成為經濟主體，加入市場的競爭。這個作用應該由實際的企業扮演，而企業則應愈來愈多由工人管理。

同樣地，中央的經濟決策，必須逐步從中央手裏交到社會自管的層面。我們認為，只局限在企業平面的經濟自管是不足的。關於小型企業（不僅是服務行業或小型工廠），我們支持它們以合作社形式存在。我們認為合作社是人類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之間較高層次的、較民主的、較人性的關係形式。但是，這些合作社必須是真正的合作社，有內部民主、自管運作，獨立於國家官僚層。

我們也支持個人擁有生產資料，條件是這些企業（包括家庭式企業）是那些個人自己的勞動的結果。在一段時期內，經濟中有多個部門同時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認為如果私有部門如果太大，是不符合社會的真正利益的。因此，我們不僅反對鼓勵大型的私有企業，也反對鼓勵中、小型的私有企業。另一方面，我們絕不反對那些用自己的勞動來協助滿足市民需要和令經濟更有動力的個體戶。不過，社會不可以容許剝削性關係發展。

（八）在初期，在建立上面描述的政治制度和推行新的金融關係和市場關係的制度時，國家當然會扮演必要的角色。國家必須首先盡量減少（即使未能阻遏）社會不平等的增長和社會關係的緊張。我們將會令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干預減到最低限度。國家的干預程度，應該減至令人民作為市民和作為工人能在一個自由的、和諧的自管社會裏向自管的道路邁進。以上所談有關國家的主張，也適用於法制。法制的重要性將逐步消亡這個前景，絕不能等同於過早地否定或低估它。法制的消亡，也不應與任意妄為混為一談。

（九）從工人的利益來說，存在自由的、自管的、戰鬥性的、非官僚化的工會，是首要的。尤其是在經濟改革時期，這些工會的存在是決定性的。不用說，這些工會組織不能服從經濟機構、國家機構或是自管機構。工會運動必須恢復它的自然功能，即是必須將其活動擺脫官僚架構，走向基層會員。今日，將工會運動由下向上地更新，已成為必需的了。工人自己將要決定是利用現存的工會結構，將之轉變為保衛權益的鬥爭工具，還是相反，要創立新的組織。

（十）生態問題需要快速地解決。我們認為，解決的基礎，是1. 社會自我調節，具備有效的「反饋」的民主機制；2. 有效的國家監察和調節；3. 最重要的是所有有關的資訊能為人民取得。目前這個危機也導致國民健康急速和危險地惡化，因為危機令醫療系統

的質素不斷下降，並且有些社會層份受到特別歧視。要真正地解決生態危機，條件是政治制度有所改變，手段是建立民主。

（十一）東歐各國人民已到達十字路口。現存的社會秩序正在崩解中。世界這個地區發現它自己明顯地遠遠落後於西歐和北美的發達國家。東歐國家滑入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依賴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這樣，它們會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提供廉價勞動力、原料，以致東歐會成為發達國家出口過時的、生態上有害的技術、危險的廢料等的地區。

東歐各國的領導層（包括捷克的領導層）繼續個別地、沒有協調地，與西方加強經濟聯繫，好像上述危險並不存在似的。

東歐人民進行的擺脫官僚支配的革命變革，必須帶來一方面是實行市場和自管經濟的經濟改革，另一方面是東歐各國間更密切的經濟和政治結合。這個自願的結合，要基於民主原則和相互的經濟得益，並以聯邦聯盟的形式進行。我們也必須學習西歐進步的結合過程中取得的經驗。

歐洲和全世界的發展，是走向國界逐步失去其重要性的形勢。

（十二）世界發展的不平等，反映在一方面高度發展的人類的一小部份，和另一方面苦難的低發展世界之間不斷增加的鴻溝；這是地球上無論是經濟、政治、道德還是生態上最嚴重的問題。要忍受這個狀況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經常在世界的背景下看本國的問題，因為人類和人的權利是分不開的。我們在捷克會尋求途徑達致與第三世界人民有效地團結，我們也會推動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改變。

（十三）「左派出路」希望能獻出力量，使強大的政治活動和一般的社會活動能由下而上發展，參與的不僅是正式的組織、政黨、團體，而且是非正式的社會團體、運動、主動性。

這個活動將提供反饋，成為支配繼續由上而下領導的社會架構和權力中心的手段。它們也會保證社會生活不會重新官僚化。

（十四）我們自視為捷克一個日增的政治傾向的一部份。我們願意與所有認真推進民主革命的人合作，以便從黨國官僚架構重新奪回民主，並徹底推行政治、經濟改善。所有同意本文主要觀點（這些論點仍可繼續討論）的人，可以共同在「左派出路」中工作，參與「左派出路」工作的人，同時可以參與其他獨立的活動、社會運動、組織，包括官方組織。但是，對我國政治鎮壓、社會壓迫和經濟停滯負責任的人，我們運動的大門是關閉的。

布拉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全民享有民主！

「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

〔一九八八年八月在布拉格的示威，標誌着一個年代——恐懼的年代——的終結，為反對派開闢了政治討論的新舞台。為數一百左右的知名人士（包括現總統哈維爾）簽署的《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亦隨之在同年十月公布。以下是宣言的節錄〕

真正的政治工作的時機來臨了。讓我們在這領域上大胆進行嘗試吧。在過去，政治討論領域被獨裁統治及其無能壟斷了一段長時間，以致人們普遍對政治抱着懷疑態度。

我們必須恢復這一領域的本來面目。政治必須再度成為表達和實踐社會的真正利益的場地。

捷克立國七十年，得與失的總結，叫人不能滿意。我們正經歷着社會整體道德敗壞的年代，在不民主的境況中生活，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受到限制；經濟和科技每下愈況；在中央的操縱下，社會的創造力不斷受到扼殺；生活環境使人產生的厭惡感與日俱增；較年青的一代中很多有代表性的人對社會反感，情願離開祖國；我們的國家在過去是歐洲其中一個最發達的國家，但今天已倒退為最落後的國家之一。

今天的政府在某程度上也知道問題嚴重，並已宣稱或在籌備着局部的改革。但她不能超越自身的限制，不能和構成困局的根本原因——極權統治——決裂。

有鑒於此，社會——即我們全體——應趁着現在的時機投身政治。正是從這一迫切需要出發，我們這個運動在《七七憲章》多年來努力不懈評述國家處境的成果，及在捷克和蘇聯集團其他國家出現的獨立主動精神的活動所鼓舞下，決定成立「公民自由權運動」。

我們的理解是，「公民自由權運動」是不從屬於任何中央權力的團體及政治組織的自由組合，這些團體是在捷克不同地區自由地成立起來的，把關心

國家前途的人團結起來。他們尊重多元化，願意公開討論一切政治問題，並決意直接參與政治奮鬥，在工廠或地區組織論壇，為本地或整體的要求効力，力求在選舉中推舉獨立候選人，或以其他途徑獻身。

「公民自由權運動」必須是一個確保公民能夠真真正正自由表達政治意志的場所；因此，它要把多種多樣的利益及政治傾向集合起來。

我們在這裏提出一些到現在大家選認同的基本意見和目標，作為反省及詳盡闡釋的起點。這些思想是向市民同胞提出的，因此亦是向所有可能參加「公民自由權運動」的朋友提出的。

（一）民主是我們的傳統

在發生了近代那些痛苦的歷史事件後，若干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禁質疑當年推翻奧地利帝國而建立獨立的捷克國，是否明智的做法。作為一個小國，並處於歐洲的中心，捷克要抵抗強大鄰國的壓力是很吃力的事。他們忘了馬沙力^①（Thomas Masaryk）及其不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盟友，視建立捷克共和國為民主革命年代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其目的是在歐洲創立一個民主國家聯成的共同體，朝着整體結合的目標發展。

他們的構思是以其理解的現代世界的需要為出發點。在這樣的世界裏，所有社會力量都要求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參政，人與人之間和國與國之間的界限也必然失去了意義。因此，他們的構思，絕不是狹隘和沙文主義的。儘管數十年來的歐洲歷史充滿辛酸，但馬沙力的長遠的構思已證實是有道理的。例如，在西歐不同的國家之間已進行了好一段時間的深刻的結合過程。

如果民主統一的理想只能在歐洲的一部分實現，面對着世界及歐洲的最大的威脅——軍事或生態的威脅——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因此，在西歐

及東歐，愈來愈多人了解到，在整個歐洲實現完全的民主，才是大家唯一的前途。我們深信這也是捷克唯一的前途。究竟如何發展國家的民主政治，或將來的民主政體會是怎樣，我們仍未知道，但回頭路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認為捷克立國的理想和價值標準，及立國之初二十年不論正負的經驗，構成一個富啟示性的寶貴傳統，可以將其發揚光大。

我們尤其關心的是真正的民主，即全民享有的民主，亦即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多元化的基礎上，在互相容納的基礎上建構的民主體制。

社會不來一次全面的道德更新，其創造力不重新發展，單靠官僚政治的命令是不能建立任何民主體制的。但另一方面，不設立民主架構，社會的道德及創造活力又不能發展及生根。因此，培養個人的公民精神，和創造新條件或新的社會組織，必須携手並肩前進。

（二）政治多元化

我們堅決支持獨立思考，我們願意効力的國家是不會以某種意識形態凌駕於其他思想之上，我們也反對當局仗恃基本法或其他法令實行這樣的操縱統治。任何主張及其表達，均應得到同等地位；唯一的約束，只適用在那些不承認這種平等地位並企圖將之限制的人。作為民主的堅決支持者，我們反對在憲法中保證捷共或任何以全民代表之名說話的黨派或組織聯盟的領導地位。

管治國家的人，必須得到人民的信任；誰失卻人民的信任，便必須把權力交給獲得人民信任的人。基於原則性的理由，我們不接受社會上有任何團體凌駕於其他團體，市民是不應該分成高級和低級組別。委任幹部及制約幹部的制度必須取締；不應以任何意識形態為衡量是否勝任某公職的標準。

（三）爭取新的民主憲法

爲了能夠毫不含糊地保證所有公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保證集會、結社及表達政治意願和參與政治活動等不可缺少的公民權利，捷克的新憲法必須以上述原則爲精神，並且不可以使捷克國家的主權受到侵犯。

憲法還必須保證所有公民的自由旅行權利，包括自由出入本國的權利；因此，流放的現象亦應消失。假如因爲一些特別情況而有需要限制這種權利，憲法須清楚界定這些情況，同時更須制訂典章制度，防止濫施限制，因爲濫權是有可能通過頒布法令、制訂法律或對基本法任意詮釋而出現的。沒有得到公民的同意，不能剝奪他或她的公民身分。

憲法必須容許就一些關係社會整體的重要問題進行全民投票。憲法必須加強共和國總統的權力，制訂總統普選的原則及創立民事法庭。必須設立憲法會，作爲監察憲制事務的最高機關。

未來的憲法中的基本原則必須清晰，毫不含糊，同時也要簡潔，避免過於詳盡而排除繼續發展演化的空間（例如涉及國家行政組織的規定）。

必須和新憲法同時頒布新的選舉法和政治組織法；新法例要按照新憲法的民主精神，容許政治活動自由，並提供具體方法，以便各類公民代表能夠接受選民的審核，和參與公共事務管理。

有文化生命的社會，結社是其自然的活動，而結社也是政治生活的天然土壤。因此，在頒布新憲法的同時，亦必須宣布新結社法，摒棄以往對抑制結社的做法，讓社團復甦。

我們當然知道，最好的憲法也不會僅由於它的存在而自動保證真正民主得到實現。但在我們現時的狀況，單是通過一部民主憲法，也將是真實地朝民主邁出了一大步。

（四）根據維護權利的精神重建國家

法律修養、法律意識和守法精神日益敗壞。要復興這些領域，第一步必須逐步重建整個法律體系，使其簡化、清晰，及把所有極權統治的成分消除。

要達到這一目的，整個法律體系首先必須毫無保留地遵照《國際人權宣言》的精神制訂，不留下空隙給任何托詞的技術得逞。我們的法律必須遵守人權條

約及其他我國已正式採納的國際標準。

我們需要一部刑法，把所有容許妄用政治手段違反民主憲法的因素排除。公民、經濟、行政等權利必須作出恰當的修改，以使個人的權利和社會的權利之間能取得平衡。

法庭必須絕對獨立，被告和檢察官應該享有同等權利。律師業必須是獨立的組織。在法庭上，律師必須享有和檢察官同等的權利。成立民事法庭，以便將檢察官的職權限制在刑事案件的公開起訴方面。

有必要制訂和現代知識及經驗相符的新的拘留條例，拘留中心交由行政部門管理，並合乎人道主義。不能假借再教育的名義屈辱市民的身心，也不能剝削他們的勞動。只有在證明是必需時才能選用臨時拘留，並且必須尊重無罪假設的原則。

修訂國家安全局（SNB）法例，提供足夠的訓練，使國家安全局全體成員視己爲市民的一分子，其職責是要保護而不是控制市民。保安機關必須由有代表性的機構及公衆所監督。在獨裁統治下，國家安全機關是操縱市民的工具，不但組織龐大，權力至高無上，無所不在；在多次事例中，更顯出其實權大大超越了目前明文界定的範圍。必須把國家安全機關變爲反間諜及反恐怖主義的不可或缺的組織；這樣做，就會大大減少其成員數目。

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就要徹底修改經濟權利。糾纏不清和莫名其妙的法律、修訂法案、法令條例等，必須儘可能以最簡單，最易理解和穩定的法典代替，讓企業及個人對各種形式的經濟有法可依，獲得信心。

社會權利必須簡化、更合乎人情，這首先從行政權開始。官員在市民的心中一如現代的封建領主，這種恐懼必須解除，官員必須接受有代表性的公共機構的監督；國民委員會（它已取代市議會，在區和地方也同樣存在）的代表只是其所屬機關人員的附屬物或裝飾品，這是多荒謬！要國民委員會不致成爲一個諷刺的名稱，她的部屬機關就不可以擺出比舊時的地方政府更獨裁的架勢。

（五）拯救環境

〔這一節談論國家面對的生態威

脅，提出有需要設計一套兼顧到這些問題的發展計劃〕

（六）導向經濟繁榮之路

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政治多元化，經濟多元化是不可能的；而沒有經濟多元化，國家的經濟亦會落後並衰退。因此，唯有依照類似我們構思的設想來變革政治體制，才能打開徹底改革經濟體制的局面，解除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對企業的束縛。利用財政手段、有眼光地，支持那些大有可爲的行業，是可以恢復企業的創造力的；至於恢復供求關係、市場關係、競爭和實際價格的原則，就更爲重要，並且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我們認爲，找尋企業新的社會所有制形式，包括自管的形式，是徹底改革經濟的理所當然的一部分。我們贊成大力支持合作社、實行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及決策方法、開創環境讓不同經濟領域和企業自行尋找對其最適合的組織形式，如此能讓企業精神得到最好的發揮，爲它們帶來繁榮。

我們認爲，在商業、家庭手工業、小型及中型企業、一部分農業及在文化領域等方面，全面重建民營企業是在所難免的。農民應該能夠選擇擁有家庭農場或長期向合作社租用土地。爲自己而工作的前景將會爲整個社會帶來好處。沒有私人身分的個人參與，沒有小型合作社及小型獨立企業的參與，就不能保證人民能獲得滿意的服務，也不能保證獨創力的發展。這一切必須有賴長期信貸、減稅及對創業者予以物資援助等的慷慨支持；由此而帶來的就業機會，正好吸納重整墮落行政機構及關閉虧損企業所造成的失業者。法律必須保障企業家能夠享受其工作的成果。

對於大型的工業而言，必須進行重整，以保證不會爲了人爲地製造就業機會、或讓扭曲的國際經濟關係支配優先投資的選擇等政治考慮蓋過賺錢的考慮。捷克的經濟應該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自然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際分工一般都能產生激勵的作用。

（七）自由的精神生活

如果不能自由地公開談論或撰文論述捷克面對的問題，什麼問題也不會得

到解決。精神生活、文化及傳媒，代表了社會的腦袋和神經，代表了其意識的工具。它們把社會的知識和思考集中起來，並為社會發掘、鍛煉其道德的一貫性和本體提供了場所。因此，最廣義的文化自由是一切改進的先決條件。因此，取締一切明顯或隱蔽的審查制度、中央對文化的任何形式的操縱，便是首先要實行的事情了。獨立的大眾傳媒、出版社和新聞社，不論是國營、合作社或私營的，必須能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下發展和作業。中央政府或任何為其創立者所支配的工會，無權限制任何形式的思考、評斷其素質——只有公眾才有權作出判斷。政府只可以做一件事情：為文化創造物質及有助於組織的條件。工會只在有關就業問題、工作狀況及社會利益等方面代表其會員的利益。任何工會也不能自封地壟斷始創活動，阻止別的工會成立。

必須徹底改變教學方法，教學素質目前已達可驚的程度。學校不是為了國民經濟的需要而培訓專業青年人的唯一地方；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學校也不能作為向青年灌輸意識形態的工具，使學校成為教育無獨立思考的人的地方。教學必須提供真正全面的學識，栽培自由思想、開闊眼界及助人決定其生存世上的價值取向。因此，教學也必須實踐意識形態和建制多元化的原則。必須保證學術自由的權利。取締用政治準則選擇教師、學生、分配大學學位和學術學位，只能根據才能、專業能力和人文價值作出評選。

在研究領域方面，必須容許各種各樣的自主的工作單位發展（研究所，實用研究的實驗室），由國家或企業、組織或基金會予以補助。長期以來，在科學和大學的領域，人和思想必須有自由交流和活動，已是無可置疑而必要的了；如果不能恢復此種狀況，我們將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八）宗教自由

信仰多元化不獨是以平等及互相尊重的態度互待對方，同時還尊重對方在公開及適當的場所內實踐宗教的權利。由是，我們全力支持國家和教會分離，這樣，信徒能像所有文明國家的信徒那樣擁有相同的自由。

必須保證修道院有奉行其古老傳統的自由。宗教自由是我們全體的利益，並非只是社會某部分羣體的利益。

當基督徒不能真正過其基督徒的生活時，其他人也不可能完全如其所願地生活了。國家對教會的控制是不道德的，因為她使社會附設了一種不平等的狀況：有信仰的公民較其他公民須受額外的法律限制。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特別看重以下的事實，就是在不久前，正正是那些天主教徒大規模地站出來，爭取信徒的權利及公民的權利。

（九）獨立工會

工人必須有由下而上建立工會，按照他們的心意組織工會、利用工會表達他們真正的職業和社會利益的權利。過去的經驗清楚顯示，工會生活享有多元化權利是很重要的。

受國家指揮並享有壟斷地位的工會，就算是盡力行好，按其本質也免不了成為極權統治的又一手段。如果國家不應該是工人的唯一僱主，也不應該是工人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表，則她更不可能兩者兼備。工會必須獨立於國家和僱主。這是工會能實現其真正功能，使經濟制度能健康地運作，潛在的社會問題不致繼續惡化的唯一途徑。

（十）反對社會軍事化

〔這一節要求有權以其他方法代替兵役，並為紓解「歐洲出現常規軍力不平衡」，展開「蘇軍撤離捷克的談判」〕

（十一）民族本體

〔這一節重申捷克是聯邦制國家，必須特別注意少數民族的權利〕

（十二）捷克是歐洲的一部分

我們認為，在捷克民主運動的進展，是一個以不同強度、不同勢態，席捲整個蘇維埃集團的更大過程的一部分。人民開始要求自由，政府亦開始認識到極權統治制度的前路是絕境。

當然，我們不會以暴力的手段粉碎歷史在我們國家之間形成的聯繫。但我們希望在平等、及所有成員互相充分尊

重對方的意願及利益的基礎上，把既有的聯繫轉化為民主的的聯繫；所以我們的目的不是要造成不穩定、不確定和爭執，而是要克服所有還殘存的斯大林主義的帝國政策。我們還希望結束冷戰的傳統，打破您來按照兩個超級大國的利益在歐洲營造力量平衡的政策。我們同時亦要衝破以往有關唯有鞏固現狀才能維持和平的曖昧觀念。

唯有在民主的國家之間，自由享有權利的人民之間建立起互信的基礎，才能有真正和長久的和平。這種信任當然不是在外交談判代表的辦公室中繙造出來的，只有當它在歐洲整體萌芽並茁壯，才能開花結果……。

我們並非烏托邦主義者，也不是急躁。我們清楚知道捷克不會在一夜間成為繁榮及民主的國家。仍有很多事情、困難的事情，等着我們去做。

但我們不能再拖延了。在今天，籠罩着文明的暴雨烏雲已越來越稠密了；而捷克深陷的困境，其嚴重程度已不容我們再延誤。

因此，我們邀請所有持共同志願的公民，各以其所認為是最有效的方法為實現我們的理想而努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可以做的事情不單是在這宣言上簽字，還要為在我國實現民主而進行任何實際工作。

〔約有一百名聯署人，名單從略——編按〕

註譯：

①馬沙力（Thomas Masaryk）（1850-1937）：是推翻奧匈帝國統治，爭取獨立的鬥爭的領袖，是捷克的創立人，第一任總統。馬沙力的思想深受孔德的實證哲學及基督教的人文主義所影響，相信某種理想民主的藍圖。由於他的道德力量深為人所敬重，至今仍深受推崇。

部分人的民主

評「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

歐爾

〔歐爾在本文解釋為什麼不簽署《宣言》。以下是文章節錄〕

在「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的導言裏，我讀到這運動「把關心國家的人團結起來。尊重多元化，願意公開討論一切政治問題，並決意直接參與政治奮鬥的人……」。無可置疑，這一切都適用於我。讓我們來看看宣言的作者怎樣尊重多元化。

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在所有反對及批評斯大林主義、官僚中央集權制的人，都能夠比較自由地表達意見的當時，可謂百花齊放，對於社會應如何從教條主義及官僚控制的局面解放出來，各有各的看法。

在這種百花齊放的氣候一端，有鼓吹技術官僚觀念的一翼（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本質上是不民主的），爭取一個以生產、責任、紀律為最高目標的社會。他們認為前線生產者最有能力，鼓吹專家管理或至少要有較多的影響力。他們的口號是「反對平均化」，並將之寫入規章。

在氣候的另一端，是主張全社會自管。他們要求，生產者對生產資料和工作條件，有權作出決定或參與決定。這陣營裏發展了幾股反權威的勢力。他們批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產階級民主，而且嘗試理解第三世界的種種問題。

兩個不同的陣營多少都同意必須重建市場關係，對於技術官僚來說，這是個極清晰的使命。但對於支持自我管理的陣營來說，這是一種使人懷疑的前景，他們建議在社會層面發展一套有效的補償機制。

技術官僚主張間接民主

技術官僚在討論到政制或政府架構時，支持間接民主的代議制。以他們的政治經驗或簡單是出於戰術考慮，他們擁護多黨制，或主張捷克共黨內至少也要有幾個流派。這就是一九六八年四月

捷克共產黨有名的黨內「反對」陣錢。

組織可以單獨或聯合統治，但必須對國會負責（而不直接對工人負責），此外必須有出版自由這類公眾監管。技術官僚認為，企業自管反映工人意願有時是有用或需要的，但企業的生產管理或行政管理卻必須由專家出任。

反對議會多黨制及經濟管理的人，則希望將經濟權力下放給工人，而不單下放至管理階層，並且下放至能表達工人利益的組織。

在政治層面上，他們不反對代議民主，但要求一開始就須設立直接民主的機制，而且不限於生產領域，還須廣及社會生活每一個部分。這種方法開始時不會很有成效，但會扶植代議民主政制，不過，數以十年甚至數代之後，這種方法會慢慢強化，逐步減少了人對人的支配。

這個逐步演化至共產主義理想的想法，並非出於「信者得救」的教義，而是依照社會現況及經濟和文化的動力（消滅需求、閒暇增加），（教育、價值取向，尤其對於年輕人）而得出的展望。

此外還有很多討論。我仍然聽到很多人對烏托邦有所保留。保留，是因為缺乏勇氣，低估人類的本性及潛能。事實上，這是斯大林主義及其他獨裁傾向、技術官僚觀念的普遍特色。

不過，在波希米亞，極端想法通常都不會發生。我們從來沒有無政府主義者鼓吹平等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社會（這裏還沒有，而波蘭早已有了）；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技術官僚想阻擋或暫停僅有的民主自由。前面提到的兩類觀點也沒有清晰界定。大多數反官僚壟斷的人在這兩類我為了方便說明而劃分的觀點之間，採取一個中間位置。

在當時流傳的文件，如對企業法的建議、工會立場等，都可以反映這情況。

無論如何，我所討論的兩種傾向

：自我管治、強調發展直接民主；不會走向直接民主的技術官僚確實存在於六十年代的捷克。《宣言》的作者及簽名者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其中幾名簽名者當年甚至是社會自管的大力支持者。

《宣言》和社會主義無關

如果今日他們仍認為間接民主是唯一的選擇，不是因為他們一時失憶，而是出於他們自覺的選擇。波希米亞的兒女需要一個國王^①。《宣言》可以爭取間接民主，這對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這樣做，必須先掃除一九六八年在學生運動、青年組織、部分工會運動和生產線上萌芽的直接民主的實踐。直接民主在當時已不只限於理論，尤其在文化界，直接民主的傾向已經很普遍。到處成立了壓力團體，部分還非常有力；活躍少數分子的權利和冷漠大多數的關係這類問題，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在《宣言》裏，直接民主的原則只出現過一次，即宣言呼籲以全民投票決定影響整個社會的問題那部分。《宣言》作者顯然從來沒有想過在議會多黨制以外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模式（見第三節第六段）；雖然《宣言》開首就說「我們不知道國家如何步向民主，及以何種形式實現民主。」

最壞的顯然是，他們一則漠視社會自管或其他直接民主的發展模式，一則又在導言說向尊重多元化的人士留有開放空間。

捷克的思潮在過去二十年，自覺地從民主轉至支配模式，從生產民主的觀念轉至技術官僚觀念，從細緻探討尊重個人權利在社會中的關係轉至恰如捷克文藝復興時期的民粹主義，並且相信可以有一個凌駕社會的公正國家。在《宣言》裏也可以找到以偏概全的論點。

令人難過的是，很多有文化修養及有社會主義經驗的優秀簽名者，這麼快便放棄他們的見解，支持這份與社會主義無關的文件（「社會主義」對我和

《宣言》的簽名者來說，是指建基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現行」的那類社會主義）。

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否因為社會輿論一致轉右？他們是否寧願向那些只能夠接受文件上單獨出現代議民主制的新保守派的簽名者低頭？我不知道。原因無論屬於前者或後者，都不見得是一個好的選擇。

他們放棄左派立場有它的遙遠原因，基本上，人們為社會主義奮鬥多年之後，已不再相信人類會有更好的將來。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蘇聯「集團」令人震驚的落後，西歐相對的繁榮（沒有人深入探索原因），以及現在的戈爾巴喬夫的「西化」路線，成了政治老兵的唯一希望——人們藉着否定過去的信念，試圖從所有令人沮喪的事中走出來……

濫用「多元主義」名詞

「多元主義」一詞在此處顯然被誤用。《宣言》當然可以提出這麼一種多元主義，如「懲罰多元主義」即包括體罰，「教育多元主義」則提倡為有能力支付學費者而設的私立學校。

但反對體罰、反對教會學校或反對剝削他人勞力的人並不能被指為缺乏民主精神，只要他們不反對在這些問題上繼續辯論。同樣，也不能靠爭論解決現行惡劣的刑罰、教育和經濟制度狀況。

所以總有其他方法解決問題。我想說服我的同胞，所有制的「多元主義」應該比言論的「多元主義」受到更多限制（對鼓吹種族主義、仇外主義、鼓勵恐怖及殘酷這類意見都要受到一定管制）。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是選擇問題，例如成員包括非社會主義分子的匈牙利「民主論壇」就有這種看法：「我們反對建基在壟斷、人民消極被動、壓迫及剝削人民的社會編制和組織，不論它們稱之為私人資本或極權國家」。

其實不單是社會主義者，就是在今日到處宣揚的人權觀念也反對立足於剝削別人勞力的企業（即工人不能參與決定有關工作、產品、條件，只賣勞力給僱主。現時大部分工人都處於這種境況）。

如果國際人權協議沒有直接賦予自由企業的權利，《國際人權宣言》第十七條也可以作如是引申。不過，有必要用法律約束個人行使的權利不能夠妨礙他人的權利，這是不可或缺的。

當然，在建基於貨幣及市場關係的匱乏經濟裏，由經濟戰爭、利益衝突引出的經濟競爭的原則，經濟活動都必須踐踏他人。社會主義者早已經摒棄了跳過這階段而達至平均主義社會的不實際想法。他們現時會考慮，在變相地重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裏的經濟機制，出現的侵犯他人權利的狀況。他們並且嘗試建立能夠配合聯合生產者（企業）經濟利益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機關，使他們的衝突能夠調解，並合乎社會整體利益。這是每一個人都可參與的經濟及社會自管的使命。

《宣言》和真正民主有別

我總不能抹走這種印象：「公民自由權運動」的出現，是一場騙局。《宣言》聲稱是一份供民主討論的基本文件，除了他們本身的民主思想外，也願意討論他們認為較不民主的意見。

《宣言》的基本理念，顯示他們與真正民主劃了界綫。開創物質及道德條件，以給個人及整個社會能夠全面發展，才能達致真正民主。真正民主會朝向生產的民主原則，目的是結束剝削，減少人對人的支配，使經濟的客體變為主體；它強調生產者的自由組合，是人類社會民主經濟發展的前提；它致力爭取人類的最終解放，爭取以人的力量戰勝物質力量來代替人征服人的現象。但《宣言》並沒有提出這些，它提供了容易的出路，而且令人易於接受——這條

出路從資本主義社會借來，甚至沒有經過修正或批判。

《宣言》宣稱要協調所有獨立的政治的活動，這項宣稱卻有獨裁性質。我希望捷克的獨立民主思想也會在《宣言》之外產生。不少迹象顯示，情況已經是這樣。

註釋：

①指超現實主義及和平主義青年運動中其中一個組織。該次示威在一九八八年八月間出現。★

捷克人民爭取民主權利的宣言

《七七憲章》全文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權保衛者企圖向布拉格政府遞交一份請願書，要求尊重捷克憲法所保障的民主權利。據報，請願團遭警察驅逐，成員遭受恐嚇。不過，這份請願書——稱爲《七七憲章》在初期有242位人士簽署，後來增至300多人。以下是《七七憲章》全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捷克第一百二十條法例，載有《關於民權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協定》。我們的共和國曾於一九六八年簽署這兩個協定，在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會議確認，並從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開始，在我國實施。從這日起，我國人民應享受這些權利，政府也有義務遵守這些協定。

這兩份協定對人民所保障的自由權利，乃是文明的重要財產。它們是過去很多進步人士發動的運動所爭取的目標。而頒布這些法律，是可以對我們社會的人道發展有重大幫助。因此，我們歡迎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簽署這些協定。

但是，不幸地，它們的頒布却立即提醒我們，很多基本的人權，在我國只是紙上文章。例如，第一個協定第十九條所保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是頗爲渺茫的。數以萬計的公民，僅因看法與官方不同，就被禁止從事自己的行業，他們經常遭受形形色色歧視並受政府或公共機構的排斥。他們被剝奪了任何自辯的機會，並且實際上是隔離與歧視制度的受害者。數以十萬計公民，則被剝奪了第一個協定序言中所述的「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們一旦發表意見，就有可能失去職業或其他福利，因此他們恒常處於恐懼中。

與第二個協定第十三章——保障教育的權利——相反，很多青年人僅僅是由於他們的觀點，甚至是由於他們父母的觀點，而被阻止接受較高的教育。無數公民害怕一旦說出真心話，就會使自己或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權利。

「不受國界限制、不論口頭、書寫或印發」、「或利用藝術形式」去「表達、接受和傳播意見」的權利——第一個協定第十三章第二節——人民一旦運用這權利，就會不僅在法庭外受到打擊，還會在法庭內遭刑罰，通常是刑事處分（例如最近一批青年音樂家的審訊案可以證明這一點）。

政府控制所有公衆傳播媒介——包括出版和文化機構——以此壓制言論自由。任何稍稍偏離官方所訂的意識形態或美術的觀點框框，不論是政治、哲學、科學或藝術的，都被禁制。對社會現狀中危機癡兆的公開批評被禁止。雖然，對於個人名譽受到攻擊這問題，第一個協定第十七條毫不含糊地規定有合法申辯的權利，但實際上它並不存在。針對官方宣傳機器所作的虛假宣傳和造謠誣蔑也無法公開反駁。當局的虛假的指控不容反駁，想在法律上糾正和尋求援手是徒勞無功的。對知識和文化問題的公開討論絕對不允許。很多科學和文化工作者及其他公民，只不過因他們曾經合法出版或公開地提出一些被現政權所譴責的看法，而受到歧視迫害。

第一個協定第十八條所強調保證的宗教自由，正被一種獨裁的強橫加以有系統的摧殘。傳教士的活動受到種種限制，經常受到政府撤銷認可活動之威脅；在行動上或言論中發表其宗教信仰的人，會失去職業，或受到其他壓迫；學校的宗教課程被壓制等等。

國家機構和組織屈從於執政黨的政治指示及少數攬權者的個人意願，使到全部民權遭受嚴厲限制或完全被取消。不論捷克憲法或其他法律都無法約束這類黨指示的內容、形式或執行。這類指示經常用口頭發出，普通老百姓無法知曉，無法控制。雖然這類指示對立法、行政、法庭、工會、社會組織、其他政黨、商業、工廠、學校和類似機構都具有決定作用，但發指示的人只須向自己或其所屬的上層負責，而他們的指示却

高於法律。

任何社團或公民對他們的權利和義務的理解與這些指示衝突時，他們不能夠求助於一個中立的機構，因爲根本沒有這種機構存在。從而，由第一個協定第二十一條和第二十二條引申的集會自由和防止對集會自由權利的限制，由第二十五條引申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和由第二十六條引申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權利——所有這些權利都被嚴厲地剝奪了。這種狀況阻止了勞動人民自由地建立工人或其他的組織，來保衛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利益，也阻止了他們自由地運用第二個協定第八條第一節所提供的罷工權利。

其他的民權，包括在第一個協定第十七條中明白禁止「對私人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訊之故意干擾」，都在事實上被嚴重地限制了——內政部用各種方法控制公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偷聽電話、監視私人住宅、檢查信件、人身恐嚇、搜查住所、在各階層公民中佈置情報網（通常用非法恐嚇，有時用利誘公民互相檢舉告密等等）。內政部還常常干涉僱主的決定、鼓勵各級機關和組織用歧見去排斥他人、影響司法機關，甚至指揮傳播媒介的宣傳運動。內政部這些活動是秘密進行的，並不受法律約束，因此公民無法保衛自己免受侵犯。

在帶有政治動機的司法制裁中，調查機關和司法機關侵犯了被告及其辯護律師的權利，違反第一個協定第十四條以及捷克本身的法律。人民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入獄，失去人的尊嚴、肉體健康受損並在精神上被摧殘。

第一個協定第十二條第二節保證自由出入國境的權利，被普遍違反了。在第三節「保衛國家安全」的藉口下，離開國境的自由被各種非法的條件所限制。外國人入境簽證同樣遭受專橫對待，很多人由於與我們國家內受歧視的人有職務上或社交接觸，而被禁止在捷克旅行。

有些公民——私下在他們的工作場所，或通過國外的傳播媒介（這是他們能找到的唯一公眾講壇）——曾呼籲注意這類對人權和民主自由的有系統侵犯，並曾要求糾正某些具體情況。但他們的申訴毫無反應，甚至自己竟變成受調查的對象。

政權和國家天然有責任保障民權。但並不單由它去做。每一公民對國內的公共狀況都應負有一份責任，因此對已生效的協定也應負有責任；這些協定是既約束政府也約束人民的。

由於這種共同的責任感，由於堅信公民應參與社會事務和準備投身干預，再加上急需一種新的更有效的表達方式，才促使我們提出《七七憲章》的想法，而我們現在公開宣布它的產生。

《七七憲章》是各種不同信念、宗教和職業的人士之自由、非正式、公開的組織，在捷克和全世界為尊重人權和民權而以個人或共同工作的願望聯結起來——這些權利在上述已生效的兩個國際協定、在赫爾辛基會議的協議和在其他許多反戰、反暴力、反社會壓迫、反精神迫害的國際文件中都提出過。總體來說，它在《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中表達。

《七七憲章》是以人們的團結和友誼為基礎——這些人把同一理想視為生活和工作的的一部分。

《七七憲章》並非一個組織；它沒有章程、沒有常設機關，也沒有正式登記的會員。每一個同意它的理想、參與它的工作和支持它的人，都是《七七憲章》的成員。

《七七憲章》並不打算變成政治反對派活動的基礎。它的願望是為人類共同的利益服務，如東西方很多類似的民權組織一樣，它並不打算提出自己的政治或社會改良或社會變革的綱領，但它企圖在活動範圍內與政權和國家進行建設性的對話——特別是促請當局注意對某些顯然違反人權和人權事件，提交事件真相的文字報告，提出解決方法，提出擴大這些權利及保障這些權利的一般性建議，在可能衝突的場合中擔任調解人角色。

在踏進被稱為保衛政治犯人權年的一九七七年時候，在審查赫爾辛基宣言執行實效的貝爾格萊德會議進行的時

候，《七七憲章》這一名詞，標誌着成立這組織的意義。

我們作為這份宣言的簽名人，公推簡·佩頓克博士（Dr. Jan Patočka），哈維爾博士（Dr. Vaclav Havel）和海耶克教授（Professor Jiri Hajek）作為《七七憲章》的發言人。我們授權上述發言人代表《七七憲章》向政府和其他組織，並向國內和全世界公眾發言，他們可以代表我們簽名，以證明文件的真確性。他們可在我們及日後參加《七七憲章》的簽名者中挑選人員參加必要的交涉行動，以分擔特殊的工作並承擔全盤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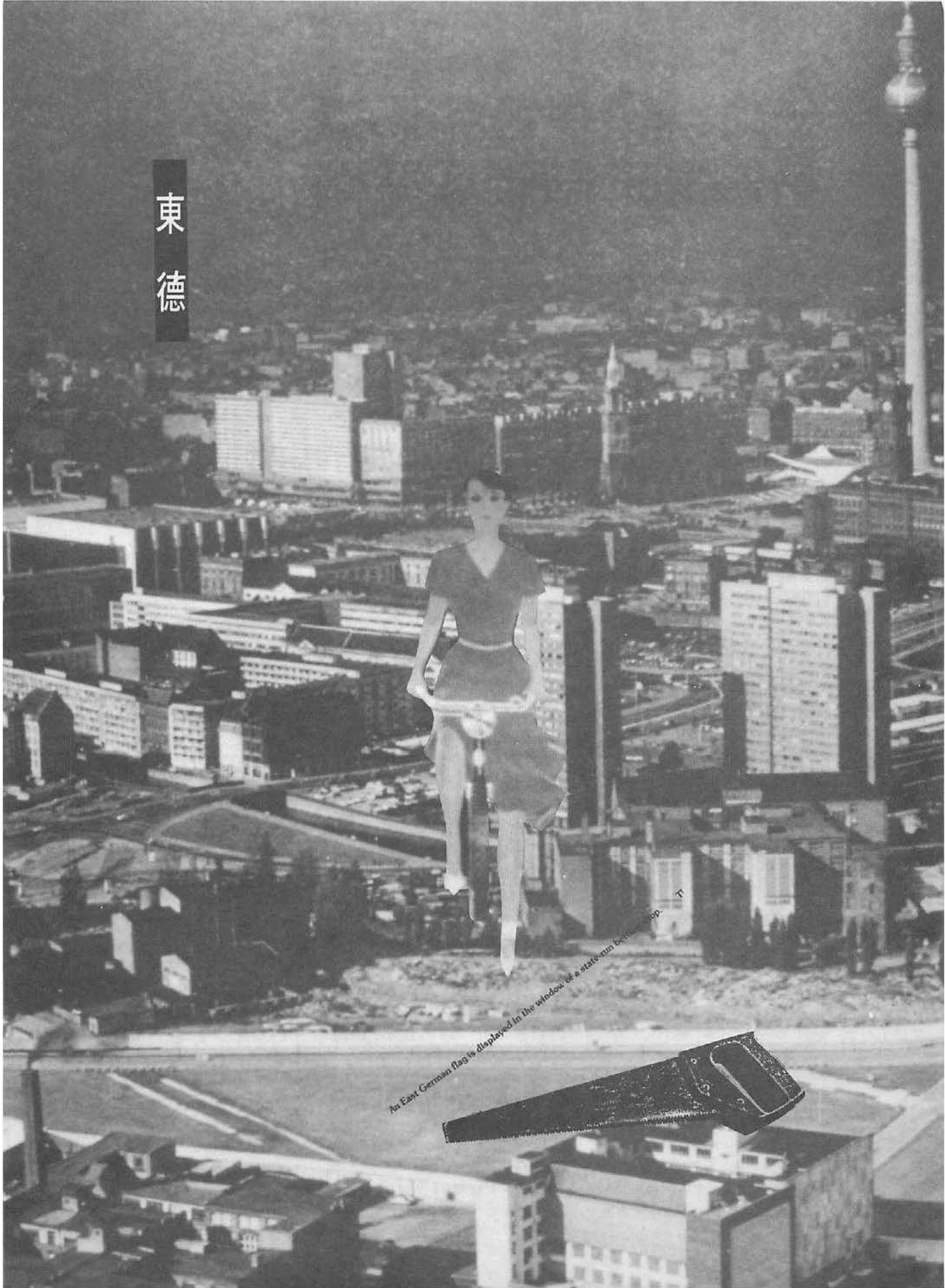
我們堅信，《七七憲章》將有助於全體捷克公民作為自由人而生活、工作。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



東德

An East German flag is displayed in the window of a state-run business.



名統一實併吞陰影下 東德民主前路滿風險

葉新

東西德統一的問題，成爲東歐巨變浪潮中一個特別受注目的焦點。在這問題的背後，包含了歷史上東歐和西歐分隔，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破產，被官僚統治的人民的迷惘、西德資產階級乘虛而入等多個複雜因素。

東西德分立的歷史起源

東、西德的產生是二次大戰後人爲的產物。納粹德國投降後，德國被英、美、蘇三國分區佔領，其後法國也加入佔領一部分。位於蘇聯佔領區之內的前德國首都柏林亦由四國分別佔領。

在冷戰趨於緊張的一九四八年，英、美、法政府將他們佔領下的德國合而爲一，包括現時的西德和西柏林，並在四九年宣布成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俗稱西德。幾星期後，蘇聯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俗稱東德。

德國的分裂，既反映了戰後各國害怕強大的德國帝國主義的重現，也反映了美蘇陣營對抗的結果，而長期以來更成了兩大陣營對峙的重點，雙方分別在兩德駐重兵和部署戰略武器。另一方面，東西德的分割也標誌了東西方承認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兩大勢力範圍劃分，和雙方同意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和平共存的現狀。

一九五三年大起義

戰後初期，蘇聯以戰爭賠償之名，大量拆除了東德境內的機器設備運回蘇聯。蘇軍扶植下的東德共黨建立了斯大林式統治和經濟模式：在軍隊、秘密警察和官僚統治下，進行國有化、土地集體化，建立官僚指令式計劃經濟，發展重工業，輕視農業和消費品生產。在工業產值大幅增加的同時，人民生活水準在戰後復原得很慢，工作強度則不斷增加，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都被剝奪。

終於，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的權力爭奪期間，東柏林在六月十六日爆發工人示威，要求自由、民主、自由選

舉和麵包等。示威在十七日發展爲全國多個城市共三十萬人的罷工和遊行。蘇軍出動軍隊和坦克鎮壓，死傷數以百計。政府拘捕了數以千計的工人，又整肅共黨，特別是從前反抗納粹時期的黨員。

工人的反抗逼使東德和蘇聯政權稍爲放寬壓榨，作了一些經濟讓步。但整個斯大林主義高壓統治模式仍沒有改變。人民對生活和政治壓制的不滿，逐漸以更多人經西柏林逃亡西德的形式表達出來，特別是由於西德在戰後得到美國的馬歇爾援助計劃，經濟迅速復原和發展。

爲了遏止洶湧的逃亡潮，東德政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築建長達五十里的柏林圍牆，將西柏林分隔。估計直到六一年八月，共有三百萬東德人逃了去西德，他們主要是年青人，技術工人和強烈不滿東德政權的人。

柏林圍牆時代的統治

大量技術工人的流失和經濟封閉，逼使東德官僚在一九六三年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在維持官僚計劃經濟的模式下，減少了中央計劃的極度集中，改善了效率、管理和供求關係，同時亦爭取了技術官僚和逐漸出現的中間階層對政權的認同。另一方面，政府對社會作出更多經濟讓步，逐漸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福利，爭取到大多數人民的被動合作，進行經濟建設。

六十年代，東德的經濟穩步發展，社會出現一定的繁榮。但東德政權對社會的不滿仍是採取一貫的鎮壓，估計政治犯人數達到一萬。

七十年代初期，已成爲重要經濟力量的西德，在社會民主黨領袖布蘭特的東方政策下，與蘇聯和東歐緩和關係。抗拒緩和的東德領袖歐彼得下台，由昂納克繼任。昂納克上台後，推行兩德關係正常化，互相承認和開展貿易，西德人也獲准入東德旅遊。柏林圍牆的孤立

時代逐漸結束。

但與此同時，特別是經過六八年捷克和七〇年波蘭事件後，東德人民反而受到更嚴厲的警察統治，六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更早在七〇年已重新被指令經濟取代，農業在七六年全面集體化。在收緊政治控制的同時，政權容許生活水準進一步提高。

七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和資本主義世界衰退，令大部分東歐國家外債大增，東德也不例外。東德是東歐國家第三大負債國，而按人口平均計算，更是排第二。但東德得到西德提供貸款，所以能夠度過難關，沒有出現像波蘭七六年和八〇年的情況。

一九八一年，東德實施經濟改革，強調生產效益和勞動生產率、科技進展和現代化，並在工業進行改組，將主要企業聯合爲約130個聯合大企業，每個聯合的員工達二萬人以上，以加強企業運作和優化企業結構。這些改革初期取得一些成果，國民經濟幾年來也有較穩定的增長，儘管效益仍然很低，浪費、污染情況嚴重。

政府對社會也轉而採取較大容忍政策。公然的鎮壓減少，社會和文化生活比較自由化，可以隨便接收西德的電視，旅遊、移民的政策也放寬。儘管這樣，政府仍不時以放逐出國外的政策對付國內異議者，以打擊國內的反對聲音。

風起雲湧八九年

最近幾年來，東德經濟改革的效益下降，經濟基本上陷入停滯局面，外債高達210億美元，內債更達到1300億東德馬克。基本建設長期受忽略，設備落後，殘破，環境嚴重污染，經濟前景暗淡。

在政治方面，昂納克政府轉趨保守，並拒絕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自由化改革。人民的不滿日增，並利用東歐其他國家的自由化現象，經過這些國家

逃亡到西德。

一九八九年五月，東德共黨在地方選舉公然作弊，令人民更對政治前景感悲觀。六·四中國北京大屠殺後，昂納克表示支持中共政權，更令斯大林主義在東德人民眼中徹底破產。大規模的逃亡潮再次出現，逼使匈牙利在九月開放邊界，容許東德人前往西方。

十月十日以來，東德多個大城市出現數十萬計的人示威，特別是以工人為主的第二大城萊比錫。十月十八日，昂納克倒台。人民繼續進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辭職，自由選舉，示威人數過百萬。反對派政治和政黨紛紛湧現，其中最大的是「新論壇」。

十一月十日，東德政府宣布拆卸柏林圍牆，容許東德人自由出入東西德。十三日，改革派莫德羅擔任總理，並在十六日與多個反對派組織聯合政府。

但共黨政權的危機並未稍減。十二月下旬羅馬尼亞人民革命推翻齊奧塞古及其秘密警察之後，東德人民同樣要求解散秘密警察，並在發覺政府只是敷衍之後，在一月初有示威羣衆衝擊秘密警察總部。人民普遍對共產黨更失去任何希望，目睹經濟和政治前景灰暗，第二次逃亡潮又再出現。

一九八九年逃亡潮有約34萬人去了西德。在九〇年一月份，已再有近六萬人去了西德。

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不斷衝擊政府和地方架構。不少社區的地區架構自行解體，據報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機關不再運行。東德共黨黨員人數亦從270萬劇減到不夠100萬。黨的名稱從德國統一社會黨改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其後改為「民主社會黨」，但也不能挽救共黨的崩潰和斯大林主義的破產。

西德乘機提出統一

東德官僚統治的破產，立即被西德執政黨、在野黨和資產階級利用機會乘虛而入，推動統一。而統一的實質意義，是由西德資產階級吞併東德的國有財產經濟，納入資本主義世界之內。

早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西德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領袖科爾已提出十點統一方案〔見另文〕，透過援助、合作，將東德逐步納入西德聯邦和歐洲共

同體之內。在野的社會民主黨和其他不少黨派都表示原則上贊成這建議。

其後，西德統治階級和政黨一方面發動巨大宣傳攻勢，鼓吹統一和運用西德資本挽救東德，另一方面積極介入東德，資助和幫助建立東德的「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等政黨，並透過它們在東德擴大宣傳影響。西德總理科爾和西德「社會民主黨」前領袖布蘭特更親自到東德出席兄弟黨的競選運動和代表大會。西德的資本財團也搶先到東德洽談以至進行合作、設廠、收購擴大投資等。

隨着西德的龐大宣傳統一和經濟援助，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多年帶來的負面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德國戰後的分裂原本是人為施加的因素，令不少東德人傾向急於接受統一，而沒有考慮由此所可能帶來的複雜影響。東德人熱衷統一的態度，反映在各主要政黨都紛紛傾向接納，甚至積極鼓吹與西德短期內統一的前景。而東德政府和蘇聯在形勢壓力下也轉為原則上支持統一的立場，兩德政府並且展開了就統一問題的談判。特別是討論第一階段的貨幣統一，即全部用西德馬克的問題。

東德人民實際上會是這個基礎統一的最大直接受害者。東德長期以來實行低工資、低物價制度。即使是以官價的一東德馬克兌換一西德馬克來計算，西德的工資和物價都比東德高好幾倍。在統一之後，東德的物價會趨向經濟力量比它強得多的西德的物價水平，因此東德人的工資儲蓄、退休金等會大幅貶值。而一直以低工資來計算的東德人民數十年的社會建設和資產積累，也會在東德經濟向西德開放，相對於西德而大幅貶值，很容易被西德資本以極廉的價錢收購。假如貨幣統一的條件是以一西德馬克兌換三東德馬克或更多的話，情況會更為惡劣。

此外，由於不少企業會被關閉或在西方競爭下倒閉，不少工人失業；而隨着國有財產的變賣、解體，工人目前享有的社會和工作保障會喪失。在資本主義競爭之下，工人的工作強度更會大幅增加。

西德的工人也會是統一的受害者。除了即時出現因消費品需求增加而引起通貨膨脹外，長遠來說，東德工人的低

工資將會壓抑甚至拉低西德工人的工資，不少工人更會因為西德資本家轉到東德投資而失業或半失業。

在統一過程之中獲利的，主要會是西德的資本家。他們一方面可以選擇買東德最廉價和最好的資產，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東德的低工資以壓抑西德工資而間接獲得巨利，更可以因此而大大加強西德資本家在歐洲以至全球的競爭地位。這亦部分解釋了西方各國特別是英國對兩德統一的保留態度。

此外，兩德統一會大大改變歐洲以至全球軍事戰略和政治形勢。二次大戰後的兩大陣營和平共存的秩序會受嚴重影響，美國在經濟衰落中仍能藉軍事威脅而保持霸權的條件會大為削弱，人民反戰運動會得到重大鼓舞。更重要的，是戰後分隔着德國以至歐洲工人階級的障礙會因此消除，資本主義其中一個最有組織和最有鬥爭傳統的德國工人階級將會有更多機會交流鬥爭經驗、組織方法、不同制度下的工作和社會保障等，並且一同鬥爭。

德國民主前途滿荆棘

東德人民一九八九年十月以來大規模的動員，衝破了斯大林主義官僚多年來的壓制。社會迅速在多方面積極組織起來。「新論壇」是當前最大規模的一個廣泛包容性組織，在爭取民主的大前提下，包含了不同流派的意見，其中不少是保持了德國社會主義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左派，主張由人民民主自治。其他具有較明確政治傾向的組織亦紛紛出現，例如右傾的「民主突破」、左傾的「聯合左派陣綫」、「立即民主」，以及受西德大政黨支持和協助發展的「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等。此外，也有關注環境問題的綠色聯盟、和平反戰運動和獨立婦女運動等。其他例如青年工人小團體等小組織，亦廣泛出現。

在工人運動方面，以往由共黨控制的官方工會舉行了特別大會，代表真正由工人民主產生，而舊領導全部被撤換，通過「獨立於政權和政黨」的決定，財政獨立。工會並向政府提出罷工權利，否決企業經理權力和一系列民主和民生要求。此外，一些工人亦發動成立獨立工會。另一方面，一個工人委員

會運動正在出現，以保衛工人權益和監察企業經理與西德資本家進行的談判。但這個運動仍是在初步階段。更普遍的，是工人對生活和經濟情況的不滿而爆發怠工和罷工潮。

社會由於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崩解而出現巨大的政治空間，但西德資產階級和政黨迅速乘虛而入，令東德大部分人轉而傾向與西德統一和接受市場經濟，原來的社會主義價值被忽視，「新論壇」也因此分裂。

以西德資產階級的力量和東德人民目前的混亂來看，西德吞併東德而達致統一是一定可能的，這會短期內代表東德工人階級的重大挫折。但即使這樣，東德工人透過反抗西德資本家侵蝕工人的權利和生活的行動，會有可能凝聚和動員工人階級的力量，並結合西德工人的覺醒，爭取獨立於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出路。德國勞動人民覺醒起來的力量，會帶來什麼變化，在這個急速轉變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之中，是沒有人能估計的。 ★



「新論壇」政治綱領

在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溝通已經破裂。證明這點的是一些人退縮入私人生活，另一些人集體離開國土。在其他地方，如此大規模地移居外地是由匱乏、飢餓、暴亂等引致的。但東德的情況不是如此。溝通的破裂，不但癱瘓了我們社會的創造力量，而且阻止了全國性和地方性問題的解決。我們本可以為我們的生活、為國家為全人類做些事情，但我們什麼也沒有做。

社會的不同部份互相隔離

在國家和經濟方面，不同的社會團體和社會層份之間的利益不能適當地保持平衡。社會的不同部份之間已經不再互相溝通。只有在私人圈子裏，人們還很容易提出自己的觀點，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全國各地，有不同的慾望和渴求，而我們却很少有機會去比較、證實它們的有效性。一方面，我們要改進服務和增加消費品，另一方面，我們認識到有可能引致社會和生態方面種種後果，因而要求對經濟的發展有所規限。

我們要經濟方面有更多的主動，但我們不要朝向邊緣社會的退化。我們要使社會成果在不傷害自然環境的情況下，走上社會重建的道路。

我們要合理的社會關係，不要被指名支配的社會。我們要創造自由的人、使男女都有覺悟的社會。我們要使自己從暴力解脫出來，不要生活在一個受娼嫖者和等級制度所控制的社會。懶漢和無能者必須走開，但我們不要處罰社會中的弱者和貧民。我們要一個沒有人利用人、人剝削人的正義社會。我們要鼓勵輸出，而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份，但我們不要成為一些最工業化國家的負債者和附屬，我們也不要成為一些經濟最弱的國家的債權人和剝削者。

需要民主對話

爲了要重視所有這些矛盾，爲了要聽取、討論不同的意見和論點，爲了要區別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我們需要進行民主的對話，討論有法制的國家應負的任務，討論經濟和文化等等問題。我們必須在全國公開地討論和反思所有這些問題。這是找出解決目前危機方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今天，社會發展的主要特徵在於：大量的人參加了社會改革過程，同時團體和個人的多樣化活動導致工會採取共同的主動。

因此，我們正爲整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寫出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這樣就可以讓全體公民（不論職業、團體或政黨）參加辯論，討論國家的主要問題。爲了發展這個工作，我們取名爲「新論壇」（NEW FORUM）。

「新論壇」的活動建立於社會基礎上。我們是根據憲法第29條，行使保衛我們政治利益的權利。我們根據1975年11月6日所通過的關於《社團的基礎和活動》的法律，要求成爲合法的組織。「新論壇」所提出的要求，都是根據人民對正義、民主、自由的渴求，和對保護、保持大自然的慾望。

這些渴求和慾望，感召我們去採取社會行動。我們呼籲所有希望改造社會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公民成爲「新論壇」的會員。時機已經成熟。

（譯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國際觀點》）★

我們反對匆促的統一

訪問「新論壇」職員

〔卡迪（Andre Sachadae）為「新論壇」的職員，以萊比錫為基地。下文主要代表沙卡迪的個人意見，因為以「新論壇」名義發表的評論，都要先進行集體討論。訪問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一日進行。訪問者為菲林明（R.Flemming）〕

□訪問者

■被訪者

□：首先請你談談「新論壇」如何成立？

■：八月時，我們約五十人聚在一起，首次擬出一份較為具體的文件——《八九年新方針》。我們把文件廣泛派發，目的是建立一個組織，對現政權發出反對的聲音，同時揭露存在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各種問題。這個組合的主要目標及基本信念，是發出反對黨的聲音，以及把人們組織起來。

「新論壇」背景

□：「新論壇」內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但你們卻有辦法彼此合作。

■：是，但合作只限於某些領域。經過最近的事件及政治開放之後，我們正嘗試創立自己的風格，並將自己與其他組織區分出來。特別是，最近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帶有共和主義色彩（右翼民族主義）；另一種是支持德國重新統一，但這並不健康。在最近的示威中，我感覺到某種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令我非常擔憂，因我一直在研究及思考法西斯主義的問題。我相信問題在於一些在學校讀過反法西斯主義課程的人，將這意識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混在一起；當他們排拒共產黨時，連反法西斯主義也排拒了。雖然這個問題還沒有清楚顯露出來，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這並不表示現在已有法西斯主義的流派出現，但我認為它們已在萌芽。

□：「新論壇」的結構是怎樣的？有沒有舉行定期會議？

■：這個組織只有三個月大，當然

它的結構還在發展中。我們目前正忙於建立結構及草擬政綱。我們嘗試做一些務實工作，並對時局作出即時回應，但要向公眾宣傳我們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所有抄寫及印刷工作都是要私下地進行。當然，很多人家中有電腦，每人可以每次為「新論壇」印二百份文件，然後交來這裏的資料中心。「新論壇」在每個城市、地區都建立核心組織。此外，各組織會在工廠內開會，與「新論壇」的聯絡處保持聯繫。

□：「新論壇」是否一個全國性組織？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建立一個組織，但萊比錫的「新論壇」卻獨立地工作。當然，「新論壇」與柏林有聯絡，而我們也接收那裏的資料等等。基本上我們嘗試建立自己的政綱，將人民的意願作系統性闡釋，對萊比錫最近的洶湧形勢作出回應，當然，這是全國性的。

□：你們與東歐（如捷克）的反對派組織有否聯絡？

■：暫時捷克的形勢相當緊張，在過去數年間，我們已經與他們建立起一些私人聯絡，而現在是可以公開的時候。

「新論壇」主要主張

□：「新論壇」的主要要求是什麼？

■：我們在三星期前制訂了一些主要的要求，它們是：

- 法制與政制分開；
- 恢復公民投票權，如一九四九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所保證的；
- 立即釋放及平反所有政治犯；
- 正式承認「新論壇」的地位，包括為「新論壇」提供足夠地方用作資料中心；
- 支持「新論壇」的活動，或起碼不干涉其活動；
- 新聞自由；即在所有現存的傳媒中，

對「新論壇」的要求，不作任何檢查，不作歪曲的報導；在萊比錫的《萊比錫人民報》（此報名不符實）曾發生上述事例。他們曾對我們在某一次記者招待會中的言論作片面的報導，刻意隱瞞部分事實，使「新論壇」的名譽受損；

自由選舉；要求有選舉法例，以確保有自由及不記名的選舉。人們可以在選舉中給個人、黨派或組織投票，而且，我們要求承認「新論壇」為競選候選黨派。以上是我們的一些基本要求。

不主張立即統一

□：西方常談及德國統一的問題，「新論壇」對這問題有什麼立場？

■：現在「新論壇」的領導人認為「新論壇」應公開反對統一德國，即起碼在最近的將來不贊成統一德國。目前的領導層主要由創辦「新論壇」的人組成，不久我們便會進行選舉，但我相信他們反映「新論壇」大多數人的意見；我們不希望成為西德的廉價勞工市場。

□：是否有很多婦女參與「新論壇」？「新論壇」是否接納女權主義者的要求？

■：很可惜，負責草擬政綱的小組由八位男士組成，這是非常不好的。但「新論壇」的婦女組織正在發展，並正在出版印有她們的要求的資料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女權運動規模不大，但卻十分重要。

□：萊比錫的反對勢力似乎最強，為什麼？

■：萊比錫是所有示威的發源地，這是有組織上的理由的。早在數月或數年前，萊比錫一直逢星期一在一教會中有定期性的集會。這是人民於「平安禱告」運動之後嘗試成立的組織。這組織多年來受到壓制。三個月前因局勢的變化，人們不滿的情緒高漲，到處出現自

發性的示威。

與此同時，「新論壇」在柏林、萊比錫及其他地區同時發展，整整有一個月時間，「新論壇」成爲廣大群眾的發言人，而這亦將繼續是「新論壇」的任務。但據我所見，廣大群眾現在循着一條危險的道路走——他們要求德國統一，但並不明白這條路會帶他們往那裏去。在這方面，「新論壇」並不支持廣大群眾的意見，但我們肯定不讓那些要爲目前可悲的局勢負責的人逃避責任。當然，我們支持一個新的民主架構，亦致力建立一個嶄新及更美好的生活，這是非常理想主義的。能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目前的形勢下都不能作爲我們政制的模式，也是非常理想主義的。我認爲應該有第三個可能性、或另一個模式，這個不同的模式是值得我們致力去建立的。

社會主義不能太早言敗

□：東德的前途將會如何？你認爲目前的形勢會如何發展？

■：德共的領導角色是用不着再爭論的了，根本就要取締它的領導角色。當然，選舉將會進行，而德共明顯地會

失去其領導地位，而領導責任將會落在數個反對黨派聯盟手中，這些反對黨會各自成爲參加競選的黨派。

□：「新論壇」會參加競選嗎？會根據什麼政綱參選？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至於政綱，還在初步階段，我們現正忙於擬訂政綱，而初稿將於十一月廿二日印備。

□：你認爲經過選舉之後，反對派聯盟會將東德帶往什麼方向？

■：一直以來，人們都談及一個複雜的市場經濟政策，所以我們也不太清楚。當然，也有讓西德的公司投資的可能性，……但一切還需拭目以待。

□：「新論壇」是否贊成市場經濟政策？

■：我們所贊成的自由市場，並不是那種可以讓西方國家全買下我們的那一種，我們不想賣自己或者被賣，因爲我們極重視少數黨派及較貧困的人民。我們一定不會學匈牙利那樣，匈牙利從不照顧少數黨派及人民。

□：對西方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東德會否走向資本主義，你對此有何看法？

■：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感到非常擔憂，因爲在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有些要點是我們必須堅持的。

□：在西歐，一些爭取社會主義的黨派，認爲東德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你對此看法有什麼意見？

■：我要說的是：資本主義有三百年的時間發展，而社會主義只有八十年的歷史，但却要受到審裁，這是不公平的。我認爲社會主義定會恢復它的名譽，這是必需、也是必然會發生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稱爲社會主義的思想一度受到損害，而社會主義也正在重新發展。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立一個嶄新、光輝的社會主義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爲那裏正存在着巨大的經濟問題。

□：最後，你認爲西方的社會主義者應做什麼，以支援東德的運動？

■：我們嘗試做的工作，是建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秩序，把它導向正確的方向。你們也應在你們的國家這樣做，並努力反對保守的模式。★

呼籲成立社會民主黨

局勢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很多人希望目前形勢能夠改變，但這並不足夠！你不能單盼望事情改變，你必須設法使事情改變！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需要民主化，要民主化就必須向當權政黨的獨裁及虛偽作出挑戰！我們需要思想上的交戰，對我們國家目前的形勢及其將來作公開的辯論。

這一切需要擬訂一個政綱，讓所有市民參與其中，並貢獻他們的專業技能。我們簽署這份請願書的一群人，認爲成立一個社會民主黨，對我們將來的社會非常重要。

我們的目標，是成立一個有環境生態取向的社會民主黨。要達到這個目標，唯一方法是使國家與社會徹底地分離。我們希望實行、維護、加強市民在社會、文化、政治上的基本權利。我們希望保護自然環境，保存自然資源，讓以後的世世代代可以繼續生存。我們呼籲所有認同這個理想的人士，在當地地區組織起來，爭取以下要求：

- 一個有法制的社會，對政府權力有嚴格管制；
- 議會民主政制及多黨政制；
- 在財政、經濟、文化的領域中，給予地區、部門、城鎮和農村相對的自主

- 權；
- 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嚴格管制壟斷，以防止產生違反民主精神的經濟勢力過分集中；
- 經濟生活架構的民主化；
- 有成立獨立工會組織及罷工的自由。

我們盼望與所有認同以上基本原則的人士聯絡。任何人士若對以上原則有任何批評，請提出你們對民主的看法，我們會盡力與所有願意參與促進我國民主化的人士，建立共同的陣綫。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

組織綠黨的呼籲

我們已被摧毀的環境的轉型，對重建我們社會有決定性的意義。不單只環境，在某個程度而言，我們的意識亦已明顯地被烏托邦所聲稱的繁榮及其出發點——永遠的經濟增長——必須是社會發展的目標所污染了。這個烏托邦是基於人類可以任意而為，以及專橫地改變地球的生命規律這一意念而建成。由此而深信人類可以置大自然於全然控制之中，並在此蘊含了生產和收入是人類進步的最重要標誌的意念。這個概念，由於其妄自尊大，把最弱小的拋至社會的邊緣，以及否定可以改善他們的命運的所有可能性。

那些認同了此一社會意念的人，漠視了應否知道那些住在療養院，孤獨並被剝奪了尊嚴的弱小是否應該代表他們自己，是否應被縫進第三世界的公墓去，或被放在博物館稀有動物或植物的展示中去。

我們那被污染了的意識創造了有史以來首次足以摧毀任何生命形態的可能性。假若我們公開指斥造成這一意識及讓它發展的共同責任，那是來自我們自衛的本能。基於這個出發點，我們打算在東德建立綠黨，使綠黨能根據其原則及作為一種政治力量而鬥爭。

綠黨的特定目標

一、透過迅速中斷破壞環境的原料廢料增長，以及看待人民、經濟及環境的斯大林式態度，切實推行我們國家的生態重組。

對於一些生態嚴重危害的地區如萊比錫、比特輝、賀爾·馬克思斯達及哥特巴，必須迅速採取挽救行動，並且要保留大量古老的歷史性城鎮、文化中心及堡壘，例如麥祁根堡。

二、通過全面及徹底的裁減軍備，獲致和平的最終保證。軍事同盟的瓦解、裁減軍隊數量至防衛的必需水平、除去軍事禁區，均是支持和平與保護環境所迫切需要採取的措施。

三、我們反對武裝力量、國家性軍事狂熱及種族主義，因此，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

四、所有女性和男性，在所有經濟和政治階層，以及在仍擔當監督性社會機構角色的本地及全國行政機構中，享有絕對的平等權利。在這些範疇中，婦女作為母親應該有積極的參與行動。

五、大自然必須受到保護，免受毫無限制的發展所破壞。只有這樣，大自然才能成為人類社會和文化的基

礎。每一項經濟活動均須加以辨明：它將會導致什麼後果？誰會從中得益？為何它會在着手進行中？

綠黨決心作長期發展

我們最希望能防止目前追求更新的運動，由於受到填補短期性物質需求的壓力，而導致社會走向殘酷無情、疏離和浪費。

我們認為急需將生態觀列入所有教育課程中去，當中包括生態及和平研究簡介。

我們支持東德政治制度改革。因此，我們反對國家阻礙綠黨的任何活動。

我們將會與任何公民、本國或世界各地的組織或團體合作，即使他們只支持我們部分的觀念。

作為歐洲綠色運動的一部分，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合理的分配秩序，保證第三世界的人民亦可享有長期的經濟發展，以及協助防止生態規律的崩潰。

我們呼吁各國共同為一些出現生態危機的地區的全面生態轉變而努力。

基於我們國家的基本變化，我們呼吁所有持有不同觀念、宗教信仰及國籍的居民：

一、基於對我們環境的災難性景況的關心，以及對我們子女和未來的孩子負責任，團結起來，以地方及地區為基礎組成綠黨團體。

二、選出代表為我們的工作計劃及基本的組織架構提出建議。豐富些另一類的概念，並以你們的社區、城鎮、地區及整個東德的問題和需要為基礎，提出對我們社會的生態重建具創意和實際的建議。

着手行動吧！

首個將會決定東德境內綠黨的工作計劃、架構及人事問題的常會，將於一九九〇年初，在東德其中一處環境遭受最嚴重破壞的地方舉行。

[譯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國際觀點》]★

獨立婦女運動宣言

婦女獨立聯盟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日，東德柏林境內舉行了一次歷史性的全國婦女團體協商會議，共有一千名女性出席，參加者年齡從二十四歲到四十五歲。會議決定成立「自治婦女運動」（又名「婦女獨立聯盟」），並推舉了兩名代表出席反對派和政府舉行的圓桌會議，會議並通過《獨立婦女運動宣言》，宣言全文有八點，現節譯如下〕

有人說，「婦女問題」已經解決了。也有人說，婦女問題不是我們今天面對的主要問題。不過，我們有些人說，現在是把這個問題提上議程的時候了。可是，「婦女問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婦女說：東德的社會轉變是由羣衆走上街頭而開展的；婦女在事變的每一個階段都在現場，走在最前線，參與了鬥爭。她們受洶湧的出國潮波及，也是權力篡奪者的犧牲品。可是，當大家着手為復興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景而致力的時機一旦來到，婦女發現她們又一次被排拒於外。

「國家需要新男人」的口號最近數周不斷掛在人們嘴邊，可是，我們就不需要新的女人嗎？連莫德羅新政府裏也有女性部長，這是新的開始嗎？

社會正經歷深刻的危機。今天，成千上萬的公民離開國家，領導黨已經失去威信，社會主義似乎瀕臨消失；在國家的另一邊，有人垂涎三尺。

我們必須用另一種社會模式來抗衡這種似乎已不可避免的演變。但是，今天當我們說到革新社會主義時，有誰會傾聽我們呢？儘管這樣，這個國家必須給予我們機會去建立一個容許個人發展潛質的社會，否則，這個國家勢必滅亡。社會應該由自決的主體自行制訂工作與消費、政治與生活形態的模式。這就意味着經濟要有相宜的發展，不再支配人的需要和熱望，而為個人的發展締造有利的社會空間、閒暇和客觀條件。

政治權力不會因此而排除，但個人

則毋須再受這種權力任意擺佈。這就需要有徹底而嶄新的政治機制和結構，以保證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得以介入社會發展的進程，不斷更新、校正它的步伐。

經濟和政治制度改革無疑是需要的，可是，再不可以用各種因果相循的藉口，推遲改變生活方式、需要和社會環境。我們必須有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就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求各個政黨派和運動申明他們提出的特定策略所採取的立場和觀點。我們婦女的希望和問題，也必須是另一種社會方案的構成部分。

我們必須堅持「婦女問題」是重要而基本的問題，絕不是次要問題。「婦女問題」關乎社會怎樣生活、生產、發展的多樣可能性和目標；正因為這樣，我們婦女從自身的特殊處境和經驗出發，知道要保證新社會的企圖會顧及我們的特殊利益需要，我們自己就得對社會有一個宏觀的取向。

這種概念的主題會是什麼？哪些是一般性問題而哪些是特定的婦女問題？

婦女承擔社會失敗的代價

（一）社會近年來邁向窮途。我們目擊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急速萎敗，這個發展由男女關係惡化、離婚率升高和出生率下降清楚顯現；也由獨身母親的生活水準下降、老年婦女被可鄙地漠視所反映——正是她們，從一九四五年以來肩負了重建國家的重擔。

然而大家顯然也不願意正視這一類倒退；女性和男性的工資下降、女性和男性能夠影響其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可能性愈來愈窄，他們的政治權力愈來愈少。正是由婦女用額外勞動來抵償社會服務的不足。婦女受男性侵略行為的威脅愈來愈頻繁；女性身體變成性對象已經成為社會實況。

我們的兒女最終將成為我們無能進化的犧牲品，正是他們要繼承短視經濟

和罔顧生態的後果；他們因父母長期壓力的關係緊張、感情麻木而備受痛苦。他們是落伍的教育制度下的犧牲品。

上面所說的，是國家和官僚社會主義制度中最嚴重的社會文化後果。男性精英的專橫權力已經把國家引向災難邊緣。須對過去數十年來的政策負主要責任的是男性，尤其是那些以政治領袖、主管和企業經理身分支持政策的人。婦女對這種環境也要負上政治責任，不過，她們在每個領域裏都處於從屬地位。

統一等如倒退

（二）在今天，東德人民，男的女的，很多已對任何認同社會主義的社會或文化失去信心。現在已經有人提出恢復「先輩的國土」了。但我們必須問自己是否有能力反對統一的打算，或者統一是否真正的社會主義出路，我們甘願留下來也是值得的？在目前動輒會發生突變的社會處境中，我們對未來能有什麼憧憬呢？怎樣的前途才值得我們留下來呢？

或者，你們想我們和波恩的男士們聯手，用他們的總理辦公廳來取代我們的政治局獨裁嗎？

對婦女而言，統一等於倒退了三步，總括來說，就是把婦女送回家庭。我們又要再一次抗爭，以爭取工作的權利、幼稚園學位和飯堂。我們等於出賣我們艱苦取得的成果，而非踏上新的階段。我們婦女關心的問題不是國家的得失，而是全世界的未來。現在是抓緊時機的時候，通過對社會主義的革新，讓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得以發展，讓更多的個體差異得以開拓，讓更多的憧憬和抱負得以迸發。

婦女運動必須追上時代的要求，必須參與歐洲左派的力量為多元文化大聲疾呼，務求每個人可以按照他們的民族、文化和社會特點安排生活方式。我們必須時刻警覺，我們的國家不會有人因出身、殘疾或簡單只是與人不同而受排斥；讓我們共同創造條件，使男與女、父母與子女、青年和老人、健全人和傷病人……得以邁向團結的關係。

社會須有公眾權力

（五）實行徹底的配額制，是達成

真正民主化的條件；即是，要立即把社會上重要位置的一半由女性出任。配額和民主化是政治革新的不可分割的條件。「婦女問題」的確是大多數組織和政黨要面對的問題，但問題卻不是經常以公開的形式出現，因此，我們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組織，有一個廣泛聯結、共同行動的運動，以保證婦女問題受到廣泛討論，成為政治課題。只當婦女有合乎比例的代表，她們才會從邊緣性的社羣和利益中提升，像男性一樣，從宏觀

的政治課題出發關注自身的問題。正由於婦女佔了人類的一半人口，而不是少數，她必須對和人類有關的所有問題發言。婦女運動不是只專注婦女課題的運動，也沒有一套社會觀念是使這個運動偏於一隅。

（六）因此，我們保證四權分立的理想：即是，除了傳統的方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外，還必須附加第四重的權力——公眾權力才能完滿。

我們也主張設立一個廣泛的婦女媒

介網絡，除了報章、電台和電視台之外，還應有婦女文化中心、研究中心，以至要設立和日常生活、消費、教育、撫育、價格和工資政策有關的民主代表機關。

我們需要有強制生產額及自然生態的消費者組織；需要有父母自治組織來影響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我們還需要大量有主動性和自我組織的團體，俾能在國家裏直接行動——這後一種組織，大抵是我們最急需的。★

「我們希望參與所有政治決定」

訪問《獨立婦女運動宣言》作者

〔接受訪問者美凱（Ina Merkel）是《獨立婦女運動宣言》的作者、「婦女獨立聯會」代表之一，並以這個身分成為反對派和政府舉行圓桌會議的籌備委員會的成員。訪問在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六日在柏林進行，訪問者是《女性主義筆記》記者高蘭杰（A. M. Granger）〕

□：訪問者

■：美凱

□：你代表的團體名叫「婦女獨立聯會」，「獨立」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有兩層意思：一，是獨立於所有政黨。在我們看來，這是最基本的一點。一向，唯一的婦女團體「民主德國婦女」（DFD）是完全隸屬於東德共產黨的；二，聯會的所有組成團體是互相獨立的，可以自由發展自己的政策。由於我們〔國家〕的歷史，東德人一般都有強烈的傾向，期望上面有什麼指示下來，按中央化模式處事。婦女自然也有這種傾向。我們希望打破這個局面，不願意成爲一個中央集權化的組織，指示其他組織的行爲。

在我們看來，重視團體自治與投入共同工作、協調共同行動之間並無矛盾。我們正在爲「婦女獨立聯會」制訂最低綱領，適用於所有參加團體，我們也設立了由多個團體選派代表組成的統籌評議會。

評議會將定期選出婦女運動的公開發言人；我們致力保證選出的發言人能

反映評議會裏的不同政治意見。

□：你們的主要要求是什麼？

■：我們第一點要求，是參與所有政治決定；我們尤其主張，在各級政治決策環節，須有「婦女代表」，這些代表對涉及婦女的政策擁有否決權。這項權利，能夠引起公眾廣泛討論那些看來會損害婦女利益的決定。

要重新界定「同工同酬」

我們也希望爭取平等法律，使婦女有權對歧視行爲提出控訴——譬如，假如企業認爲女性會因產假曠工以至喜愛僱用男性（這種情形愈來愈普遍）。我們也有需要重新反省我們的勞工契約制度：形式上，確是保證了「同工同酬」，可是，女性的工作很少和男性相同，也沒有「同工」的定義，結果往往是女性的收入少得可憐。我們要求立即調升婦女的工資，和男性看齊。

我們另一項主要要求是縮減工時。我們還沒有四十小時工作制，一般工時是四十二小時又四十五分鐘，只有十八天有薪年假！我們認爲，這項要求一點也不脫離現實；德國社會學家的研究顯示，有30%的工作時間是浪費掉的。人們由於沒有工作動機，所以無心工作；因此，何不把這種散漫態度轉而爲削減工時？這樣會對大家有利，會提高大家的工作動機。

政府當然不願聽到這種意見。我們

時常聽說，在獲得分配勞動創造的剩餘之前，首先是勒緊褲頭，刻苦工作吧！我們這樣一等就等了四十年，得到的結果，卻是生活水準下降！大家對這種局面厭惡極了，政府假如不着手提高生活水準、改善生活素質，只怕跑向西德的潮流會更趨激烈。

為下一代建立可以自由呼吸的生態環境

往西德跑的情況如果不停止，東德將會變成母系社會了——因爲跑到西方的主要都是男性。女性在西德很難找到工作，不過，女性留在東德，也由於這裏的社會設施如托兒中心、房租等比西德廉宜許多，而這些對她們不是無關痛癢的。

□：在社會服務方面，東德是毋須羨慕他國的。

■：有充裕的托兒中心、幼稚園、小學，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不過，假如你有兒女，也不是只爲了把他們放到某處，交給某人照顧呀！所以我們的運動很支持爲我們、兒女和男性爭取增加空閒時間，男性也該用多些時間照顧兒女。我們這個團體裏，差不多所有婦女，包括知識分子，都有兒女。身爲女性主義者，我們不僅基於我們的處境來考慮問題，同時也顧及爲兒女建立未來。

生態問題是我們關注的另一焦點。

東德所有居民對這個問題都很敏感，我們國家的污染已達無可忍受的程度了，有些地區根本應該劃為不宜人居的禁區；在比特爾和萊比錫，污染令大家經常咳嗽不已；嬰兒根本就不應該飲用自來水！因此，我們認為必須有一套徹底重造生態的綱領，以遏阻生態瀕臨毀滅。我們不願意我們的孩子為那些數十年來罔顧這個問題的決策者承擔代價，我們要為後代建立一個再沒恆常威脅的環境，令他們可以在海洋和河流游泳、呼吸空氣，而毋負大自然的名分！

要突破男性支配的組織傳統

□：你以婦女運動代表的身分，和反對派組織一道參加了圓桌會議籌備委員會；你和他們的關係怎樣？

■：在近月冒起的所有反對派組織現在都知道要把我們算作一分子；他們都意識到，不能夠再對「婦女問題」揮手了事。再沒有人會公開攻擊我們，說這些問題不重要。不過，這些團體卻不是自動處理我們提出的問題！事實上，我們經常面臨這個老問題：這些組織的結構都由男性支配。投入政治等於是接受男性模式，而這正是我們再不願意去做的！

在我看來，改變這種局面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在各級（組織結構）設立配額。我想，評估各式各樣的反對派組織必須要設立這個重要的基本標準。不過，問題是婦女通常都反對配額制，她們擔心，根據這個標準，她們只由於女性而當選，而不是由於她們的能力（我相信你也會有這種質疑）。不過，也不能故步自封，即使你因婦女身分而當選，也意味你有機會發展所長，這會是投入政治獲得承認的起步點。

不過，我感到我們還未至強制推行配額制的條件，譬如「新論壇」宣布，反對其組織使用配額制。我恐怕，在下次議會選舉中，女性的比例會劇降，比現在還少；目前國會有三分之一是女性。

□：你有沒有打算參加選舉？如果有，會透過什麼方式？

■：圓桌會議對新選舉法的內容有爭議，爭議的結果會解決什麼人有權競選的問題：只有政黨才能參選呢，還是公民運動也可以參選？①我們贊成後一

種解決辦法。我們視我們的運動超越政黨，把不同政見、不同政治團體的女性集結在一起。我們相信，這個運動應該能夠有代表身國會，並且發揮重要作用。不過，圓桌會議有好一部分參與者認為參選權應限於政黨，排拒廣泛的運動。

這樣一來，一場論爭勢必在我們的運動裏捲土重來；直至今日，這場爭論還只在全國統籌評議會的會議裏出現。爭論會是：應該組織一個婦女或女性主義政黨嗎？

來自耶拿的一個婦女團體一直主張這個論點。我個人認為這種主張不會有好處，至終將影響我們的組織方式，逼迫我們接受一個中央化結構。在目前，我們大多數人是反對這種結構的。毫無疑問，我們將決定作為一個議會外的反對派，提出批評、推動公眾討論和推廣我們的要求。

東德已預備讓西德併吞

再者，多個反對派政黨向我們兜售，在他們的提名名單內佔一席位，以作為他們的「婦女標誌」。在我看來，我們只有兩種選擇：或是當議會外的反對派，或是在議會內組織婦女派別。我們或許會和「新論壇」或「聯合左派陣綫」組成聯綫，不過，即使是這樣，我們也會堅持必須有自己的綱領、有自己的提名名單和在國會有自己的派別。②

□：你怎樣估計將來的事態？

■：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由所有婦女團體同意的《獨立婦女運動宣言》，文內有一個句子清楚表明我們的意願——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句子沒有掀起特別討論；這是當時的民主運動普遍贊同的立場。不過，國家的氣候已經很不同，關於這點的討論很多，我們的爭論如果不界定何謂「社會主義」已經無法開展；必須給這個名詞恢復內容。

今天，「大德國」這主張已經愈來愈風行，理由很簡單，只有一點：人們看着西德的財富和消費者機會，希望像西方人一樣享受和生活；他們以為那邊萬事如意，單純地問：為什麼不學他們那樣做？愈來愈多的個人和團體按西方模式照辦煮碗，用複製西德的方法草擬法律。假如他們更深入去看，會知道西德不是事事都好。

在這個意義來說，令人饒有興味的，是所有反對流派都缺乏想象力、缺乏理念，沒有能力提出另一種發展模式。我們婦女運動雖然提出了另一種出路提議（尤其在生態問題方面），但是我們沒有公信力，因為我們沒有實行我們的理念的手段。結果，眼前是東德要致力和西德制度分庭抗禮的景象，我們的國家因而已經準備好被西德「併吞」。東德人民將蒙受損害，因為聯邦共和國不準備向社會不平等付出對等的補償。

需要激進的另一條出路

如果我們的智慧多一點，我們會說：「好的，就讓我們立即統一，不過西德不能只說不做，要承擔平等化步驟的代價。」西德會拒絕這個要求，屆時就可以引發一連串的行動。但是我們太愚鈍了，說：「看啊，科爾會把我們從災難中拯救出來。」迄今為止，發生了什麼事呢？是他擺出條件而不是我們，他一星期復一星期地開出新的條件，我們則不斷作出調整來適應他的要求，而他實際上不須付出一仙一毫！

似乎，這個演變趨勢無可避免地會一逕走下去，我們的國家要經歷資本主義的演變。我們要親身經歷「消費恐怖主義」的社會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以為我們可以從經濟匱乏跨越到另一種制度，似乎絕對是脫離現實的想法了。

事實上，我對我們以至全人類的未來，是頗為悲觀的，因為我看不到任何可行、徹底的出路，而這一種出路是必需的，尤其是對被剝削的第三世界和行將毀滅的生態而言。所有科學家似乎都同意，如此下去，世界的壽命只有三十五年。這是我們，包括你，面對的前景。

註釋：

①東德國會一向保留若干席位給予官方的羣眾組織（婦女、青年）。在國會470席中，其中有60席歸於「東德婦女組織」。

②在這次訪問之後，東德新選舉法通過了准許「廣泛運動」如政黨一樣參選。「婦女獨立聯盟」決定和「聯合左派陣綫」和「綠黨」聯綫競選，並且推出本身的候選人。★

「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前景奮鬥」

東德左派團體九月會議文件

【編按：斯大林主義危機被混淆為社會主義危機的時候，東德國內一些反對官僚政權的團體和人士，在89年9月初在波林（Bohlen）開會，制訂一份綱領，尋求基於民主社會主義的出路而團結各種力量。

會議之後的新聞公佈說：「面對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經濟停滯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機，這個會議的參與者認為所有站在社會主義立場的政治流派及人士，有必要共同合作，有必要基於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來提出左派的社會主義前景。」

以下文件是這個會議通過的綱領摘要。】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例子，顯示了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下，毫不批判地向市場調節機制的庫房借取經驗來推行經濟改革，只會產生更多危機和社會分化。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積壓着，亟需進行改革，但如果任由這些改革導致「向黑淵一躍」，就會發生兩類真實的危險——或是出賣給資本主義，或是發生新斯大林主義模式的軍事獨裁。

然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捷克，都具備最好的經濟和政治前提條件，容許成功地、徹底地發生社會變革，走向社會主義——假如能重新掌握推向這個前景的、無疑是很強大的社會主義潛力的話。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面對歷史契機

我們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特殊地面對一個歷史契機，可以更新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如果錯失這個歷史契機，後果將會（不僅是在我國）阻礙以下前景的建立——保證社會每一名成員有全面發展而運行的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

有利於徹底更新的國外條件是很複雜的。在現代化的國際資本主義，勞動人民對無效率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模式感到失望，這導致新保守傾向持續。

工會處於被動守勢。西歐共產黨影響力的下降和走向社會民主化的速度，簡直可以稱得上是「急劇」的。各羣眾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實際上已蕩然無存，它們也盡能躲藏在仍然運作但畢竟是可憐的社會民主黨的國際主義後面。

建立獨立社會主義左派

左派會議協調小組

東德：【編按：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東德的獨立左派組織、工人團體及社會主義者，以「聯合左派陣綫」（Initiative of United Left）的名義，舉行了一次全國會議，決定於十一月召集一

蘇聯共產黨走出停滯、斯大林主義和權力的驕跋，引起的驚嘆已日益變成憂戚；憂戚的是現在增長的離心傾向，毀滅的有可能不僅是阻礙這些國家走向真正社會主義發展的當前障礙。在進行改革的國家裏的經濟巨變，並沒有帶來成功。面對着各種挑戰，如果沒有一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徹底更新，後果會是災難性的。

但契機也在此。今日轉向社會主義，不會再面對來自「動機良好的兄弟國」的軍事干預。在經濟情況惡劣的基礎上，西方通過「經濟合作」的政治干預會更大。

關鍵問題仍然在於國內認真地在綱領上支持社會主義的力量有怎樣的社會基礎、政治成熟性和社會力量。

對於我們來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目前情況下，這意味重新掌握這個基礎。我們的前提條件無疑比其他「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更為有利，儘管繼續進行的政治壓迫仍在打擊（而且首先打擊）我國的左派力量。

我國的左派不可以陷入任何教派主義之中。「理性的聯盟」必須成為推動力，基礎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有支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有多樣性，特別是能提供前景的所有社會組合和政治組合有多樣性。

更新的過程不會排斥任何人

所有願意為這個更新過程獻一分力的人，包括共產黨的成員，都不會被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近來的經濟顯示，不提供任何社會哲學的、沒有原則的相對主義，會把我們帶領到不知何方。我們堅決反對用資本主義剝削來「取代」政治—官僚的壓迫。

左派必須在下列基礎上團結：

- 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應佔主導，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化的基礎。
- 發展生產者的自決，以達到所有活動都真正社會化。
- 一貫地實行社會所有成員享有社會保障和社會公義的原則。
- 實現政治民主、法治，一貫地令社會所有成員的個性能自由發展、人權得到保障。
- 重建工業社會，以適應保護環境的需要。★

次全東德工作會議，並且成立一個協調小組以籌備該會議。這裏刊出有關小組的各項聲明，但略去有關會議中的專題討論會詳情。

這個會議文件所建議的五點綱領內容，和前面刊出的《東德左派團體九月會議文件》的最後部分，內容基本相同，因此，估計這次會議是九月會議的進一步發展。

此外，據最新資料顯示，東德獨立社會主義左派已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在東柏林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有約三百人參加，其中半數人來自東德，出席者有獨立馬克思主義者，東德共黨內左派一翼、教會基層活躍分子、新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會議一致接納本文件建議的五點綱領，並附加第六點：「上述原則在全世界適用」。會議討論過市場功能、所有制和限制使用核能等問題，但未能達成共同意見。最後，十一月底的會議建議成立「圓桌會議」作專題討論，及籌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遇害的德國著名共產主義者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紀念活動。

工作會議希望盡量聚集不同的左派趨勢和傾向，廣泛討論各種問題。會議將提供機會，為東德的社會主義未來作些基本澄清和確立取向，並就一些特定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提出概念性的建議以作討論。

這將會是一個為東德的變化，而提供具體的社會主義出路選擇的機會。我們將會舉辦一次與很多爭議性問題相關的討論，無論是實際派還是理論派，以及只對普遍問題有興趣的人士或專家都可以參與其中。

參與者不單只要表達他們不同的意見，還須嘗試帶出普遍的意見，以求就建立一個聯合的左派計劃達成一致的意見。因此，在議程上亦將會有一次就如何在會議後，繼續推行一個聯合的左派計劃的討論。

不論是獨立的團體成員還是個別人士，不論是屬於共產黨組織與否的人士，我們呼籲全體左派都在這次會議中作出貢獻，或是組織類似的會議，互相交流經驗。為「聯合左派」及為東德社會主義的出路鬥爭，作出你的支持吧！

通過郵遞，或是直接與柏林「Unweltbibliothek」聯絡。均可與十一月會議的協調小組聯繫。

有關組織上及理論上的準備情況、其他日期、工作小組的其他地址或會議舉行的最終日期和地點等消息，將刊登於Unweltbibliothek的《電訊報》新聞通訊，或其他的獨立新聞單張上，而協調小組亦會刊出他們的公衆聲明。

協調小組就「聯合左派」計劃工作會議所作籌備的一號聲明。

協調小組為籌備工作會議，將就會議的日期及內容，定期發出聲明。

小組負責以不同的初步文本及已公佈參與者的稿件為基礎，製訂出會議的主旨架構，以及作組織性的籌備。

小組亦已準備協助參與會議中共同計劃的不同參與者，安排各類聯繫，希望藉此建立同類型工作會議的長期合作關係。同樣地，協調小組視本身為推進「聯合左派」得以發展的倡導者。協調小組就着東德的社會主義重組及經濟變化的討論內容，建議以下的綱領：

1-以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作為推行社會主義社會進化的主要領導基礎。

2-在實踐集體經濟活動真正社會主義化時，建立

所有者的自決精神。

3-切實履行社會各階層成員享有社會保障及公平對待的原則。

4-政治上民主、法治、不可分割的人權獲切實履行、每一個社會成員個性的自由發展。

5-工業社會以符合生態方式重建。

工作會議暫訂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有關舉行地點將盡快公告。

為各特定問題而工作的小組的堅定目標就是，為東德的社會主義重組提供一個具體、政治上徹底及完全的轉變計劃，這包括了為涉及這個重組的大部份問題，左派必須為達成長久的一致而作出努力。

協調小組正通過兩個題旨式小組來籌備討論。題旨式小組「民主及人民的自治」的統籌組建議以下的討論綱領：

主要標題一

政治形式必須建立人民的治權及發展大眾輿論。

主要標題二

邦的角色及人民自治組織的困難

主要標題三

社會上不同利益的調和，以及在組成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解決矛盾衝突的政治架構。

主旨集中的專題討論會

①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

②社會主義東德的全德國政策

③社會主義的防衛政策

④大眾教育

⑤文化

⑥共產主義運動史

「形成社會主義經濟關係底基」的討論會統籌組暫時建議以下的綱領：

主要標題一

在社會主義社會進化過程中，生產及財產關係的形成。發展自治及私有財產的可能性及限制。

主要標題二

調和自治工廠及社會集體經濟與環境利益的形式和方法。

主要標題三

東德的特定結構政策的大綱。

觀乎我們國家的危急情況，可預料所有題旨式及主旨集中的專題討論會，將會無可避免地要將各項主題從部份非常基本的討論，提昇至具體的結論及對即時和緊急的轉變作出建議。在會議期間，將由所有討論會的代表組成一個委員會，把所有小組的工作簡撮，並在全體出席的會期中介紹。

所有如想參與或介紹他們的報告或建議，又或希望協助或參與資料或報告展示，以及支持「聯合左派」的所有左派人士均可透過提供的聯絡地址作書面或直接聯繫。我們要求他們提供他們願意有所貢獻的工作範疇或主旨的具體詳情。就此而論，以上提及的架構不應被視作限制。統籌組織感到透過不斷擴闊綱領，而對所有建議作出回應是義不容辭的。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柏林 ★ 36

成立獨立工會的呼籲

獨立工會倡議小組

四十年來，FDGB（東德官方工會）究竟替我們做過什麼事情？它可否將縮減工作週的要求作為一種恆常性的要求向工廠管理層提出？它為何不發動我們起來爭取一周工作四十小時？

它曾否行動起來爭取我們的工資指數達至隱蔽通脹的水平？它如何不就工資增加作恆久性的談判？當工廠要加強工作強度時，FDGB官員究竟去了哪裏？他們是否站在我們這一邊？在未能保證有關工資增加之前，他們會否停止實施新的工作規條？

平均來說，我們比西方工人少十天有薪假期，FDGB怎麼可以忍受這個事實？

FDGB曾否要求將退休年齡降低？

我們何曾見過工廠的工會領導人顧及我們的利益，拒絕接受國家的計劃？

總括來說，我們可曾見過工會反對國家及黨而替我們爭取到任何東西？

已足夠了，四十年來，我們的利益並沒有真正受到保衛！

我們不能再任由別人擺佈，即使這些人是「理智」的。我們應掌握自己的命運。

從自己的職級當中選出自己的代言人！

要求自己的代表將你自己的要求向工廠管理階層提出！

保衛那些代表——假如他們面對困難！

將結果公佈，這是防止報復的保護手段。

尋求與其他工廠接觸聯絡！

成立獨立工會！

（譯自法國《紅色週報》★

在這個環境下，我所知的就只有勇氣

工會活動分子談組織自由工會

問：你對FDGB（東德的官方工會）的角色有什麼看法？是黨的工具還是保衛工人階級權益的組織呢？

答：FDGB只扮演了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它的工作包括處理社會保險、退休金、疾病津貼、家庭津貼，管理工人公共房屋及組織暑期旅遊等。這是眾所周知的。但關係到我們的權益、工資、工作條件等等，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工會」絕對不能做到這點。

工資水平由國家一般性地訂定，但每個工廠則具體地釐定。那即是由黨及FDGB互相協議。但我從來沒聽聞工會向當局施加任何壓力。我工作的地方工作環境非常之差，噪音、有毒氣體瀰漫、酷熱等。工會從沒有關注這些問題。

至於我們要求支付做厭惡性工作的工人津貼的事，

我聽到一位工會幹部埋怨我們經常要求賺取更多。發現廠方從未付給我們法定工資的卻是一名管工，而並非是工會。

問：FDGB如何組織？你可否投票選出你信任的人擔任工會職務呢？

答：車間代表由各單位及工作部門選出。理論上，我們可以選出我們信任的、肯替我們說話的代表。但實際上，很少人願意出來競選，大多數是推推讓讓後無可奈何出來競選的。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當選後也只不過是有發牢騷的權利而已。

工會的全職人員由上層指派，工會委員會則基於預先編好的名單而選出。我們工廠的全職工會人員是來自黨校的。

問：但看來東德工人參與工會的比率是很高的。

答：對，約98%工人參加工會，不是爲了要爭取什麼權益，而是基於前述原因。工人不能避開工會，而且，工人不加入的話可能招致麻煩。通常當工人新入廠工作時，他就會被迫加入工會。可以說，左手簽工作合約，右手填工會會員表格。

問：除了退休金及疾病津貼基金外，其他福利服務的財政來源是怎樣的呢？

答：是政府資助及工會會費。

問：東德一周工時大約多少？

答：一般是43至45小時，12年前，政府曾建議及通過法案將工時減至40小時，先從輪值制的工人及有孩子的女工開始。但之後就沒有了下文。至於有薪假期，11年前，當政府訂定全國一年內的假期時，取銷了我們在工廠中爭取到的額外假期，工會卻沒有任何反應。

今天，正當大量東德人移往西德時，當局就辯稱「你們還會認爲在這勞動力缺乏的時候還可削減工時嗎？」

工人並沒有就削減工時而施加什麼大壓力。最近一項調查顯示，一日8小時45分鐘的工時中，實際工作時間只是5小時，工資方面也同樣出現問題。整體來說，所賺取的工資可維持基本上的需要，但超乎這方面的，例如並非絕對需要的消費品，由於太貴，則不能負擔得來。

問：今天，整個制度受到挑戰，FDGB怎樣應付呢？

答：我們沒有連接各工廠的信息網，因此我不能了解整體情況。但我知道工會出現集體辭職，而工人則聲言假如工會不放棄追隨政府的路線的話，他們則拒交會費。

領導層已放棄工會前總書記迪殊（Tisch）；而各地不同的工會已免去原來的領導人而改由新面孔擔當。FDGB並沒有延遲大會，而是如常舉行。這些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完全是由於工會內外的壓力所致。

問：你提出的要求成立獨立工會的呼聲並非是第一個，對於別人所提出的你有什麼看法？你是否感覺到有大部份工人明白到組織獨立工會的重要性呢？

答：通過《電報》通訊（由「環境圖書館」出版）及與別人交談，我們只聽聞過一些：黨對資訊手段絕對控制，我們根本不能知道詳情。我曾試圖到《電報》要求見提供消息的人。他原來是工人，已迅速被調派到保加利亞。這就明顯顯示我們已擊中了制度的要害。

我們會作爲一個發起組織，討論關於工會是否需要獨立的問題，並與那些希望脫離FDGB的工人組織聯絡。挑戰目前工廠內的制度的組織遠遠落後於政治的發展。我們要迎頭趕上。

問：你是否認爲至少有規模較小的工人組織是支持你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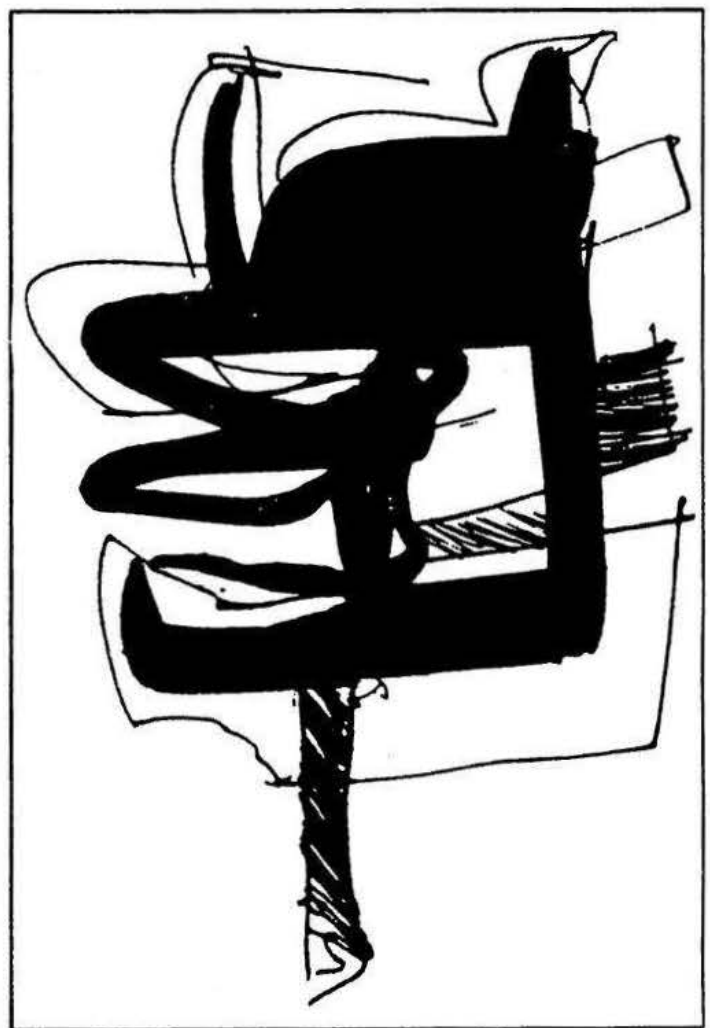
答：當然，目前只是接觸的問題，因爲在各車間之間還

沒有任何可使我們互相聯絡的渠道。我們整個社會都籠罩着恐懼。在街頭，我們已能擺脫那些秘密警察，對自己的力量已充滿信心。目前，工廠的情況有點不同。工人可以被個別認出，隨時受解僱的威脅。很多人現正集待突破。

問：談到恐懼，有時你對於被跟踪採取毫不顧忌的態度，使我感到驚奇。

答：在這些環境下，我所知的就只有勇氣。在東歐，我們正創造歷史。這個歷史性的機會我們定要抓緊，不管什麼代價，假如錯過了這個機會的話，我永遠都不會饒恕自己。我已等了二十年了。

（譯自法國《紅色週報》）★



應該建立工人代表會議

訪問「民主社會主義者小組」

〔密斯列 (Herbert Misslitz) 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小組」的成員。一九八八年九月，他們在東柏林協助組織了反對世界銀行的示威，約有一千人參加；同一時間，西柏林正舉行大規模的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示威。密斯列是泥水技工，也是「聯合左翼陣綫」倡議計劃的發言人小組成員。「第四國際」成員組成的「聯合社會主義黨」(VSP) 所出版的《社會報》，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刊登了這篇訪問。訪問者是歌恩 (Angela Klein) 〕

□ 訪問者

■ 密斯列

□：你對近日的事件有甚麼看法？是否正如保利 (Barbel Bohley) 所說，柏林圍牆開放得太早？

■：我得先指出現時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這些不同意見對整個發展是必需的。所以，我會時而說「我們」，時而說「我」。

可是，在這問題上，我們全都持相同意見：圍牆開放得太遲，不是太早。十萬百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民藉此機會前往西方旅行，這情況是可以理解的。開放圍牆的方法造成一點混亂，但卻不是甚麼大問題。不過，我們一致認為，這次開放圍牆、旅行自由，以至這些改變的方式，都說明了一個現實：我們的權利是由上層施予的，而政府這樣做不過是利用這些自由作為安全活門而已。

開放邊境使重要問題擱置

再者，衆人皆知這個領導層沒有前途。從一個落得這田地的領導層處取得權利，是不同於由人民發揮其意志爭取到這些權利的。諸如旅遊的自由，人民可自行安排。

□：這是什麼意思？有什麼不同處？

■：我們嘗試在這個國家建立某種直接民主機制，包括由本國居民選出代

表組成人民委員會；這樣便可真正體現人民自主性。

邊境開放後，很多緊逼問題都被擱置了。例如目前還不清楚，東德共黨能否維持憲法第一條賦予其領導地位的條文。這個問題會隨着選舉而產生。

□：現時的主要要求是自由選舉。在西德，自由選舉指人民議院的選舉；在東德，是否有相同的理解？至於你們的另一種主張，有沒有支持者？

■：現在，各種另類出路的主張的宣傳途徑非常雜亂，很多想法都是由西方傳媒散播的，而左翼思想又得不到電台和電視台注意。人們大都依西方的分類標準去理解事情，所以資產階級議會制最得人心。此外，到目前為止，「聯合左翼陣綫」尚未有機會透過自己的報刊直接表明立場，介入討論。我們僅有薄弱的印刷資源。我們嘗試在諸如廠房會議、小組討論等場合提出主張。然而，這是不足夠的；我們明白到我們想改變現況。人們目前正在商量如何出版一份獨立的左翼報章，及一份理論討論刊物，讓所有組織能闡釋立場。要實行這個想法，當然會碰上很多官僚問題。

西方傳媒影響人民觀點

我們打算用更多時間在工廠刊物上，這是首次嘗試；我們會參與編務工作。

目前，宣傳最多的最被討論。東德較開放的電視節目「時事攝影機」及西方傳媒佔了漁利。

□：我們注意到，反對派有兩個建議：必須舉行全民投票決定籌備中的新選舉法；其次，因為八九年五月的地方選舉結果，所以應重新舉行投票。這樣能令反對派有機會加強基礎，藉此壯大。你是否支持這些建議？

■：我們當然支持舉行圓桌會議，讓各團體、政府內的黨派、東德共黨及民眾組織透過傳媒公開討論不同的選舉概念。這樣，就無可迴避極需要澄清的

問題，即是給「自由選舉」的概念賦予生命，澄清分歧點。

我們對自由選舉的概念，有異於那些贊成資產階級議會制、多黨制等模式的西德支持者。我們要求在舉行圓桌會議的同時，也要舉行一個全國性的工人代表會議。

我們與別的團體已在工廠裏幫助工人籌備這類會議。要實現這計劃仍需一段時間，因為人們仍不習慣作政治決定，儘管廣泛的政治化過程已開展。

這個工人代表會議亦可討論真正參與的形式、工廠自管的形式，以及獨立工廠代表會議的權利與義務。選舉這類工人代表會議，可以說是第二步。政黨與工會應通過這種方式闡明工人的要求。

工人開始學習民主

□：工廠裏的情況怎樣？

■：工廠裏的討論很熱烈。人們到處貼出反對派的建議。討論中心圍繞增加消費能力的可能性，亦有部分涉及工廠的前途問題。由於很多工廠與生產單位沒有效率，又嚴重缺乏新科技，所以，如果一貫地按生產力水平為標準，則這些企業的存留便成了問題。

我與諒那 (Leuna) 工廠的工友談過，他們說：「我們沒興趣再在這汚物裏工作（諒那是全國排出最多污染物的工廠），但又不想失業。」他們呼籲現正急需的專家、經濟學家及科技官僚解答這些問題，呼籲技術官僚代表工人的利益。

□：全國性「左翼聯盟」的創建會議將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舉行^①；你期望從外國的左翼黨派得到甚麼幫助？

■：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提倡社會主義，作為解決當前問題的方法。官僚層強調國家已有完善的社會主義，這種說話使不同階層人士普遍排斥社會主義。我們要制訂一個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過渡要求。

基於這點，我們考慮與國際上其他左翼黨派聯繫起來。我們看到，不與歐洲經濟共同體融合，而另行組織「共產國家經濟共同體」也不是有效的方法。我們也看到富裕的西歐可能駕馭東歐。即是說，我們有必要與東歐及西德的左翼黨派共同制訂實在的政治概念，以對抗圖利商家的野心。另外，我們認為也

必須與西德的左翼黨派建立有說服力的論點，以抗衡右翼分子倡議的統一要求。另一個問題是西方的左翼人士能有多少機會影響政府的經援形式。東德不能靠本國的資源去解決科技落後的問題，而需要從西方取得經濟援助、貸款，甚至把債務勾銷；不過，我們已多次指出，這些援助不得帶有條件，其經

濟機構不得藉貸款干預東德。這些現況說明，我們與國外的左翼黨派有共同行動的基礎。不過，與東方的左派合作，也是同樣重要的。

註釋：

①見《建立獨立社會主義左派》 ★

我們支持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統一

訪問「革命自治青年組織」

〔以下訪問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東柏林進行，訪問者是《十月評論》記者，接受訪問的是「革命自治青年組織」成員一編者〕

□訪問者 ■被訪者

□：請介紹你們這個團體。

■：從六月開始一些朋友想舉行活動改革社會，但由於東德共黨的控制，沒機會公開進行，只能個別接觸。到十月中，一羣有興趣的朋友有意成立一個青年組織，建基於兩點：一個左傾的青年組織及一個民主的向所有年青人開放的青年組織。經過很多討論之後，結果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成立這個德國民主共和國革命自治青年組織（RAJV）。現時在柏林有幾個工作小組在不同問題上工作，包括青年問題、新的青年法律、委員會民主、研究出版報紙等。很多左傾青年組織已經出現。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與其他左傾青年組織成立左傾青年聯盟，不能獨自戰鬥，必須反對改良主義和議會主義。

□：中國民運在東德有什麼影響？

■：中國的事變在東德有強大的影響，特別是在年青人之中。但在中國民主運動上升時期，我們沒有機會上街示威，害怕被囚；但有很多同情者。中國留學生其後被強迫中止學業送回中國，所以現在這裏已沒有中國留學生了。

□：東德年青人面對什麼問題？

■：很多青年組織成立，但也有很多分裂。而且四十多年來青年人不想和獨立行動。很多人不知道怎樣做。必須有實際建議讓人們活躍起來，在自己的活動小組內活動，而不是告訴青年人做什麼。

□：你們組織的結構是怎樣的？

■：結構是基於委員會制度，每個加入來的小組必須有自己的構思，做自己的工作，只要接受我們總的想法便可以了。委員會制度不單在我們之中，還應該擴展到東德之內：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基於這些委員會，我們嘗試組成左翼的團結。

我們的目的也包括走進工廠內與工人討論由他們成立自己的工作小組和委員會，以實現自己的利益。這些委員會不能由舊領導層控制，反而應該成為工廠的領導。目前很難運用委員會民主這個名詞，因為統治階級的謊言。

□：東德現在的領導有什麼改變？

■：國內仍是同一個強盜領導集團。我們沒有選出這些領導，我們的要求之一是自由選舉。

□：關於東西德統一的問題，你們的看法如何？

■：我們是支持統一的，但只有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目前並不可能，而我們支持改革這個計劃經濟，由工人透過工人委員會領導工廠。開放邊界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很多人見到黃

金，走了去西方，而他們同時想要市場經濟和現時的社會保障。

□：走到西方的人的年紀多大？

■：很多走到西方的人是很年青的，約七成是四十歲以下，二成二十一歲以下。

□：你們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如何？

■：戈爾巴喬夫是官僚的一員。你只要看他對伏柯達礦工罷工的反應便知道。那裏的工人要求成立委員會，他說不可以，因為工人委員會能摧毀官僚層的統治。

□：東德新總理莫德羅呢？

■：莫德羅只是舊形式的政府的一個新面孔。他與德里斯頓很多市民交談，他是那裏的領袖，他也摧毀當地的自發活動，例如自治青年反抗法西斯主義組織等。

□：你們怎樣看改革？

■：改革？不，從來沒有那裏的官僚改革自己的。只能由委員會和基層民主摧毀他們。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權利現在到街上爭取，東德領導層不會不戰而降的。

□：你們是否佔少數？

■：是的。我們現在仍然佔少數。絕大部分青年、工人和人們仍是被動的。但我們相信如果我們能作出有吸引力的行動，是可以爭取到很多青年人的。 ★

「革命青年自治組織」 成立宣言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革命自治青年組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我們有具體的政治要求。左派青年必須能夠作出行動。

我們希望與其他青年團體共同合作，對抗民族主義、官僚、斯大林主義、性別主義和反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增長中的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影響。我們必須找出這些法西斯主義影響的原因和對抗它。

我們爭取委員會民主，以對抗一黨專權，無論是什麼黨。這種委員會民主的架構，只能在真正人民權力之下形成，包括：生產資料由社會擁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作為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基礎；社會保障；建立工業要考慮到生態影響。我們爭取人民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活動。

我們的青年組織並不只是一個政治組織，青年的社會問題也是重要的工作。我們要建立我們自己的青年中心，以實現我們的利益。我們的組織是基於委員會民主。委員會民主必須在全國實行。我們必須要有全國性的資訊交流和全國性的青年合作。這是我們組織會籍的基礎。會籍不論民族、工作，不論是否是其他組織的成員，也不論在社會的角色。

我們要求所有遵從法律的組織享有結社自由。

我們反對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統一，反對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賤賣。

我們的目標是出版一份左傾刊物。

我們必須成立左派行動聯盟，因為我們必須成立政治資料和討論小組，特別是有關每日的新聞。

我們工作的基地是自治的青年中心，會議室、咖啡室等。

我們代表年青一代，要求將每種思想和活動帶進我們青年組織之內，和成立委員會爭取我們的權利。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知識分子反對科爾統一方案

基勒(M. Kellner)

屬基督民主黨的西德總理科爾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下旬，向西德國會呈交他著名的十項建議。該項計劃名為統一兩個德國，實際上卻是由西德的帝國主義吞併東德的領土和經濟。右翼同盟政府的「自由民主黨」及「社會民主黨」均立即表示同意該項方案的原則。

只有「綠黨」提出了批評，認為東德人有自決的權利。「社會民主黨」人則在敵天之後始提出承認德國與波蘭的邊界，並對裁軍作出相應的結論。但「社會民主黨」人對十項建議的原則是認同的，雖然布蘭特摒棄「恢復統一」這些字眼，用上了「新的統一」的名詞，目的只不過是避免人們想起第三帝國而已。

科爾計劃的十點方案歸納如下：

(一) 立即提供財政援助，以作醫療及人道主義的用途。在短期內取消「歡迎金」。東德人探訪西德時將由東德合力向彼等提供所需之貨幣。

(二) 加強經濟及科技上之合作，首先由公共交通開始，並在生態問題上加強合作。

(三) 推行自由選舉、進行不會倒退的政治及經濟改革及放棄官僚式的計劃都是大規模援助的先決條件，因為「很清晰地人民要求經濟民主」。將東德開放任由西方投資，並創造「市場運作的條件」。

(四) 東西德成為「一個由合約連在一起的社會」(像東德政府新領導人莫德羅建議的一樣)，建基於一連串的協議、聯合公署(有關事務包括經濟事務、交通、科學、醫療、生態等...)。

(五) 先成立一個邦聯的結構，再發展成東西德聯邦，最後演變成一個具有聯邦特色的非聯邦國家(一如現在的西德)。先決的條件當然是東德推行自由選舉。德國的統一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六) 德國之「重新統一」必須納

入整個歐洲在經濟、政治及文化上重新統一的軌道上，亦必須兼顧東西整體之關係。

(七) 透過一個貿易及合作的條約，使東德與資本主義的歐洲共同體得以發生聯繫，並參與「一九九二年一體化計劃」。

(八) 加緊進行赫爾辛基會議決議建立東西歐國家協作的機構，以組織有關經濟、生態及文化領域內的相互關係。

(九) 在符合世界環境的情況下，透過與東德的談判，來「支持」裁軍的談判(這並不落實有關任何西德裁軍的建議)。

(十) 建立一套全面的政策，在清晰明瞭每一階段將可能出現的問題的情況下，使德國人民民族自決的權利得以完全落實。

東德知識分子反對科爾方案

一羣左翼的東德知識分子在十一月廿六日作出回應。他們的基本態度是要保衛東德的主權以及建立一個可信的社會主義。他們說：「我們可以強調東德是獨立的國家，然後盡最大的努力去建立一個擁有和平、社會公義、個人自由、可以到處旅行及保護環境不受破壞的團結的國家。否則我們就是向那些擁有龐大影響的經濟和政治小圈子的殘暴和不能接受的經濟壓力投降，以令東德取得援助……那麼東德遲早就會讓西德鯨吞。」

「讓我們選擇第一條路吧。在西德之外，我們還有機會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另途，與歐洲的其他國家保持平等互相尊重的關係。我們的起點是反法西斯和人文主義的理想，我們還可以以這些為依歸……」

我們不應對東德人民的醒覺或情緒有所幻想。不錯那些反對組織都反對「恢復統一」，東德共黨的態度亦如此(克倫茨丟去總書記職位前幾天也簽

了上述的聲明，他其實只把聲明蒙上了污名)。不過，東德的人民能夠分辨克倫茨一類的「社會主義者」和海因(Stefan Heym)、沃爾夫(Christa Wolf)這些社會主義者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分別的！海因和沃爾夫都聯名發表了十一月廿六日的呼籲。

「然而，大部分的反對組織和東德共黨的成員，其實都贊成成立德國邦聯，甚至統一，他們不稱之為『恢復統一』而已。在許多龐大的示威中，特別是在萊比錫的，『一個統一的德國家園』是非常受羣眾歡迎的口號。當有講者指出西德資本和國家機器鯨吞的危險性的時候，羣眾甚至向他們喝倒采。」

「在近日的大規模示威中，不同的立場是十分明顯的。有人高呼統一德國，另外則高舉標語，聲言東德不要做椰菜[科爾]的種植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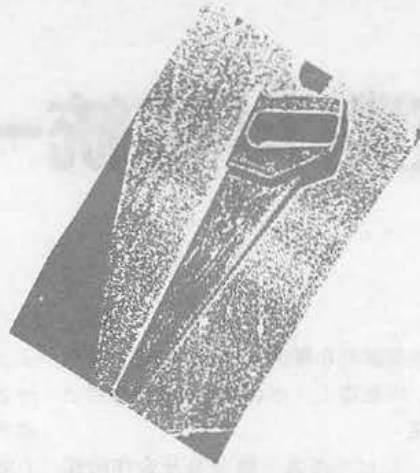
不過東德在今天已不像羣眾運動初轉澎湃的時刻，反動的復辟主義者和復仇主義者都有機可乘，利用部分羣眾的情緒進行使資本主義復辟的計劃——讓西德托勒斯操縱，這將使任何非資本主義的正面事物，和社會福利及工作節奏，都消失殆盡。

如果資本主義復辟的計劃實際得逞，工人們會更具體地見到，他們將受到損害。

[本文轉載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際觀點》。西德總理在一九九〇年初再進一步提出統一的談判細節，兩德政府也展開了談判接觸。本資料冊主要是收載民間民主運動的文件和訪問內容，所以不予補充科爾的進一步建議，請讀者留意——編按] ★

第一集 匈牙利之亂

(匈牙利之亂)



匈牙利之亂，自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在布達佩斯爆發。當時匈牙利人民要求改革，並宣佈獨立。蘇聯軍隊隨即進駐布達佩斯，鎮壓了這場運動。這場運動被稱為「匈牙利十月事件」或「匈牙利之亂」。



匈牙利

匈牙利：革命與改革

葉新

一九八九年二月，匈牙利共黨在東歐共黨中脫穎而出，率先同意多黨制。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已率先爆發反官僚和反蘇的革命，雖然結果被蘇聯軍隊撲滅了。兩個事實之中，有沒有因果關係，其中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有什麼變化呢？匈牙利現時變革的前景又是如何？

五六年革命的背景

遠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但在五個月後已被資產階級和地主推翻，大批共產黨人和猶太人被霍爾第政權屠殺。霍爾第的獨裁統治，直到一九四五年被蘇聯紅軍推翻為止。

戰後，匈牙利成立了由農民黨、小有產者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在人民的努力下，國民經濟迅速復原。

共黨藉着控制內政部和秘密警察，逐漸將其他黨派剷除。到四八年將社會民主黨合併為統一工人黨，由拉可西掌權，變本加厲地推行斯大林模式統治：擴大秘密警察，殺害黨內外異己和正直人士，控制人民一舉一動；推行官僚指令式計劃經濟，發展重工業，壓抑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強迫農業集體化；對斯大林唯命是從，聽任蘇聯掠奪匈牙利的資源等等。獨裁統治和日常用品缺乏，令人民不滿增加。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去世，拉可西退到後台，由納吉任總理，較多注意糧食和消費品生產，政治上也自由了一些。但到了五五年，隨着蘇聯赫魯曉夫上台，納吉再被拉可西取代，「新路線」被中斷。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抨擊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東歐造成重大震動。六月，波蘭波茲南發生工人起義，被政府派軍隊鎮壓下去。但兩件事都激發匈牙利國內人民討論，特別是年青

人和知識分子組成彼多斐俱樂部舉行半公開會議，有時多達六千人參加，討論民主、自由等問題。在人民的壓力下，拉可西下台，由他的副手吉羅接任。十月，波蘭戈慕卡上台，抵擋了赫魯曉夫要鎮壓波蘭人民的壓力。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學生在首都舉行和平示威，聲援波蘭人民，但受到秘密警察開槍鎮壓。學生和市民走到軍營，取得一些軍隊的支持，反攻秘密警察，開始了革命。

匈牙利革命的真相

革命羣衆提出兩個主要要求：取消秘密警察和撤走蘇聯軍隊。吉羅卻召蘇軍進城鎮壓，同時將總理職位讓給納吉。蘇軍的鎮壓受到人民的奮勇抵抗，並激發匈牙利軍隊起來對抗蘇軍。革命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並出現工人大罷工。

在全國，由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士兵等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和工廠內的工人委員會廣泛出現，承擔了作戰、分配糧食、通訊、運輸、維持秩序等功能。社會上實際出現了雙重政權的情況：一方面是極力希望爭取人民支持的納吉政府，另一方面是武裝動員和組織起來的人民。

納吉政府與蘇軍談判撤軍，而同時，人民繼續抵抗蘇軍，一些蘇軍則被中立。到十月底，蘇軍基本上已退回軍營內。

戰鬥停止後，匈牙利人民繼續清除秘密警察，又將數千名政治犯從監獄中釋放出來。整個社會瀰漫着自由的氣氛，人民熱烈地從事民主建設。在熱烈的討論和組織工作之中，多個政黨出現或重組，包括以往被匈共禁制的政黨。新的工會聯盟產生了。數十份報紙創刊了，報導新聞、批評、爭論、小說、詩……很多是青年人的創作和意見。

在這個政治形勢下，納吉政府進行改組，新政府包括了多個政黨的代表。

蘇聯指摘這個政府是反動、反社會主義的。但事實上，這些政黨的領袖都清楚表示不是要求資本主義或地主復辟。社會民主黨領袖說：「工廠、礦山與土地一定要繼續保留在人民手裏」；小有產者黨領袖說：「誰都不應夢想回到貴族、銀行家與資本家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去不復返的了。」人民普遍的意志是不肯回到資本主義；他們要求的，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見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歷史文獻部分——編者〕

正是這個由武裝人民和工人組織起來的革命秩序，驅使蘇聯增兵再度進攻匈牙利。十一月四日，二十萬蘇聯軍隊和三千架坦克進攻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飛機更不停大規模轟炸。

英勇的匈牙利人民雖然力量懸殊，仍然奮勇與蘇軍血戰六天之久，最頑強的抵抗是在工人區。在這個反革命鎮壓之中，至少有二萬匈牙利人死亡，傷者不計其數；蘇聯軍隊也死了3500人以上。布達佩斯龐大地區被毀，饑饉出現，經濟破產。

匈牙利人民反蘇和反斯大林主義官僚的革命被血腥壓下去了。但人民的抵抗仍然持續了一段時間。大罷工斷斷續續地持續到五七年一月，由各工人委員會代表組成的大布達佩斯中央工人委員會仍能領導工人作出抵抗和向政府談判，直到五六年十二月全體成員被捕為止。各地的工人委員會仍能發揮一些作用；政府要到五七年十一月才敢立法將它們解散。

卡達爾的匈式改革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被鎮壓，納吉被捕和其後被殺。在蘇聯支持下，卡達爾上台。但新政府在人民眼中毫無合法性，只是由於蘇軍的壓力而被迫接受；社會的反抗仍然很強。因此，卡達爾要尋求與人民達成某種妥協，以維持統治。

在作出妥協讓步之前，卡達爾政府

44

首先要重建被人民革命嚴重震撼的官僚架構，以官僚委任過程，逐步重建各層面的官僚控制，同時迫使工人委員會解散。農業方面，在五九年再次推行集體化，以加強官僚對農業的控制。

另一方面，官僚控制的方法也作出改變，以原來的官僚指令式計劃，逐步變為間接的官僚控制，將權力較大幅度地下放給企業官僚，給予企業較大自主權去決定工人獎金、利潤分配，以至原料和製成品的供應和出售。價格制度也逐步改變，各種物品分別採用固定價、市場價或有上下限的價格三種來定價。

與此同時，透過資金信貸、繁複多變的稅制和津貼，官僚和中央計劃部門對各企業實行多方面的干預和控制；最重要的，是透過由上而下委任的各級和企業官僚，以達到最終的控制。

儘管如此，官僚的行政式經濟的粗暴程度是減少了；發展趨向是使用更多的物質刺激和更大的經濟發展自由給企業和個人。農業方面，也使用更多物質刺激和相對上較大的生產自由；價格也比較合理。因此，在相當一段時期之內，人民的物質生活有較大的改善。

私營經濟迅速發展

卡達爾政府與人民作出這種妥協：政府和共黨官僚壟斷了政治權力和各方面主要的決定權，而在經濟上給予人民較大的自由和活動空間，追求個人的物質生活。在蘇聯的威脅和官僚的統治下，人民也大致上接受了這個妥協，從經濟方面爭取政府重大的讓步。

到六十年代後期，政府對私人經濟活動作出更大容忍。一個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私營經濟開始較大規模地出現。這些經濟活動包括在自留地和後園種植經濟作物、建築、餐室、修理及其他服務性行業等。到最近幾年，這個被稱為「第二經濟」的經濟活動，佔了約三分一的全國工作時間和提供超過四分一的國民收入。全國有四分三勞動人口參與「第二經濟」，一些人更從中取得一半或以上的收入。大部分從事「第二經濟」活動的人，都在國營或集體企業（包括農業）有正職，在工餘、假期甚至在工作時間偷出來兼第二份職；因此，每天工作時間往往長達十二至十四小時。而人民物質生活改善的秘密，也

主要因為這個原因。而透過第二經濟提供的日用消費品和服務，人民的物質生活也得到較大滿足，補充了第一經濟消費品生產的不足。

在八十年代初期，為了減少技術工人和技師對緊縮政策的不滿，發揮更大工作潛能以改善第一經濟的低效益情況，政府推行了企業工作隊的計劃，容許企業內的工人自由成立工作隊，競投企業內一些工作，在正式工作時間之外，利用企業的設備進行生產。這些工作的報酬往往比正常工資多二、三倍。這些活動在企業內形成一種特殊的第二經濟，穩定了經濟中最重要的一個層分，減少了技術工人的流失，也由於工作隊內部關係不受官僚操縱，可以更有效地發揮生產力、合作和技能。但另一方面，由於不是所有工人都有條件成立這些工作隊，所以在廠內也造成一定的分化，令不少只能靠普通第二經濟增加收入的非技術工人不滿。工作隊計劃取得一些成績，所以得到擴大。近年來，約有十分一的工人參與工作隊。但不少工人開始投訴工作時間太長，有時長達十四到十六小時一天，一星期七天地工作。

此外，為了滿足人民物質生活，作為政府與人民妥協的主要支柱，政府在六、七十年代不惜大量向西方借錢以進口消費品。同時，政府並向西方借錢來從事經濟建設，希望在未來以出口償還外債。

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上，卡達爾也作了一些改革，希望擴大社會支持基礎和適應轉變了的官僚控制模式。他宣布：「凡是不反對我們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在匈共領導下的自由化也有一定進展，黨內的反對意見也容許一定的表達。在政治架構上，也作出一些改變：加強國會權力；容許差額選舉（但提名人要得到匈共操縱的「愛國人民陣綫」同意和進行記名投票）等。

在社會生活上也容許更大自由，包括引進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對黨內的幹部也採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政策；政治官僚逐漸被技術官僚取代，特別是在企業層面。卡達爾對知識分子也作出較多讓步，容許較多學術和言論自由。對人民出國旅遊的限制也大大減少。

經濟危機深化

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出現停滯，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爆發，更引發資本主義全球衰退。但卡達爾政府仍繼續向西方借錢在國內投資，尋求高速增長。到了七八年，由於外債達到危險程度，政府才改變政策，限制入口。

經過七年緊縮之後，匈共黨大會在八四年決定再向西方借錢推動國內發展。結果是兩年之內，外債差不多加倍，超過160億美元，約等於全年國民總產值的三分二，成為東歐平均每人負債最多的國家，令匈牙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

匈牙利的經濟危機反映了多方面的問題。卡達爾政府的改革給予企業和私人經濟較大自由和自主權，官僚計劃也從指令式改為間接的官僚控制，但黨和政府仍然對經濟擁有很大決定權，特別是在整體發展方向方面；錯誤的向外借債的決定，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也顯示了它們不受約束的情況。

政府與人民妥協下的改革，事實上也沒有帶來高的效益和較好的科技進展，加上官僚的無能和浪費，令生產依然是低效率，在國外不夠競爭性；國內經濟的增長率則進一步減慢，以至停滯。

另一方面，像普遍東歐和第三世界國家情況一樣，國際環境也不利於匈牙利。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走向停滯，西方保護主義抬頭，利率高漲，各國貨幣匯率大幅波動，以及進出口貨價比率愈來愈不利，特別是石油價格大增，都加劇了匈牙利以出口償還外債的困難。

經濟困境和危機，從一九八七年起，觸發黨內和知識分子更活躍的討論和對漠視危機的卡達爾的批評。不同的改革方案被提了出來，包括將黨特權合法化，以便控制它和換取政府部門更大的自主權。政治討論變得很熱烈，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透過市場經濟、更大的政治自由和議會式民主，尋求解決經濟和政治危機。

一九八八年五月，面對着黨內外的強大反對聲音，卡達爾被迫退休，改由格羅斯任總書記。而黨內外的政治自由化過程，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報章傳媒上充滿各種辯論。反對黨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政治自由化浪潮

在湧現的政治流派和政黨之中，可大致分為新興黨派和復古黨派兩大類。新興黨派以知識分子和年青人為主；復古黨派則以老人為骨幹，並在老人與年青人之中存有很大分歧，所以普遍影響力都不大。

在新興黨派之中，最大的是「匈牙利民主論壇」；在八九年中，約有一萬五千名會員。它界定自己是一個獨立知識界的政治運動，支持自由選舉，獨立政黨，獨立司法和軍隊，言論自由，參與世界市場、自由工會，工資和社會保障、政治中立、社會公義等。在經濟上，它只是泛泛提出支持市場經濟和財產制改革，缺乏具體內容。

第二個主要新政治組織是「自由民主派同盟」。它比較強調其城市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性質，堅決支持政治和經濟改革，提出了較詳盡的綱領，包括支持市場經濟、多黨制、自由報刊、自由工會、更緊密與西方聯繫、基本社會保障和保護環境等。

「年青民主派聯盟」是一個要求改革的獨立青年組織，主要關注個別事件，包括生態和少數民族權利、青年人問題等，沒有一個全國性綱領，但傾向市場經濟和自由政治。它的婦女組織較具婦女運動的規模。

其他的新興政治流派還有指摘一九五六年是反革命事件的「匈牙利共產黨（列寧主義）」；要求恢復一九八八年前政治制度的死硬的「慕尼黑社團」，「匈牙利激進黨」和「獨立生態黨」等。

「左翼出路協會」則同時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和斯大林主義，以推動自我管理作為目前的任務，最終希望達到自由勞動者結合的目標。它反對新官僚，不反對多黨制，但認為匈共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仍有可能變成為真正的列寧主義黨。它原則上也不反對混合經濟，但認為社會公有制應有較大的比例。這個組織由知識分子發起，聲稱有一些工人支持，但覺得在目前政治氣候之中，它的提議較難被普遍接受。

在復古政黨之中，有「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它的綱領是一個福利國家，基於議會民主、法制、強大的自由工會和混合經濟。由於內部的老年人與年青

人分裂，所以力量不大。其他復古政黨包括「小有產者黨」和「匈牙利人民黨」，後者是戰後「全國農民黨」的延續。它們都同樣有輩代的問題。至於其他的復古政黨，例如「獨立匈牙利民主黨」、「基督民主人民黨」等，則更為弱小。

此外，還有一些獨立社會組織形成，包括一九八八年五月開始相繼有多個白領工人工會成立，例如科技工人民主工會、教師民主工會，以及較後成立的藍領工人的運輸工人民主工會等。此外，也出現團結工會工人聯盟和獨立工會民主同盟等組織，支持獨立的工會運動。但目前它們都比較細小。

其他社會組織還有「天主教基層團體」、「匈牙利吉卜賽人民民主聯盟」、「歷史正義委員會」和多個生態組織。

八九年急劇的轉變

一九八九年二月，匈共被迫承認黨外的組織和接受多黨制，宣布放棄民主集中制，以避免黨內的分歧立即導致分裂。但黨內要求民主化的壓力仍不斷增加，黨內改革派更提出了改革綱領。

四月，政府答應與由多個反對派組成的反對派圓桌會議舉行談判。六月十六日，納吉獲得平反和重葬，一九五六年事件也被平反為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人民起義。

十月七日，匈共黨代表大會壓倒性多數通過自我解散，「脫離一切形式的斯大林主義」，並隨即成立「匈牙利社會黨」，通過新黨章，支持建立「以混合的經濟所有制，社會市場經濟和自治體制為基礎的多黨議會民主」。黨領袖聲言要與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決裂。

新黨希望舊黨的七十多萬黨員之中會有一半加入新黨，但到十二月，仍只有約二萬人加入，其他黨員則仍在觀望。

舊黨也有一些黨員拒絕解散，繼續維持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存在，由前黨總書記格羅斯領導，但實際黨員人數很少，不到一萬人。

十月中，國會通過多項憲法修訂案，奠定多黨制基礎，保障人身權利和罷工權，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設總統職位，宣布九〇年進行自由

選舉，另外又正式平反納吉和發表聲明譴責蘇聯於一九五六年侵略匈牙利。

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即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三十三周年紀念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名為匈牙利共和國。

急劇的變化，證實了斯大林主義的徹底破產，其中不乏中國六四屠殺的影響。政治上急劇的轉變，為解決嚴重經濟危機提出了什麼辦法？這些辦法的前途和對社會、人民的影響又如何？

毫無疑問，大部分知識分子和不少人民都寄望東歐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和經濟上更大的自由化，透過市場機制和混合經濟形式，藉着擴大與西方的聯繫和外來的援助，解決經濟危機。連匈共改革派也是追隨着這條道路。然而，最大的疑問是：西方的援助能否解決經濟危機？龐大的外債如何處理？而在危機已極尖銳的時候，匈牙利有沒有條件作出轉變？

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重整後的匈共的新政策，根本在於以較大的政治自由來換取社會大部分人民接受經濟危機和經濟調整的代價；至於為人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生活、工作和社會保障的國有和集體所有財產，則正在受到更大的侵蝕；在私有化和引進外資的名義下，廉售甚至送給官僚，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同時藉此摧毀社會保障的基礎，消除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障礙。

人民早在一九七八年已開始為經濟危機付出代價。生活水準明顯下降。一九八二年匈牙利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後，奉行經濟調整計劃，限制工資、消費和國家投資，逐步放開價格管制，令人民生活百上加斤。一九八七年格羅斯上台後，實行銷售稅，令價格即時提高二成，此外又引進個人入息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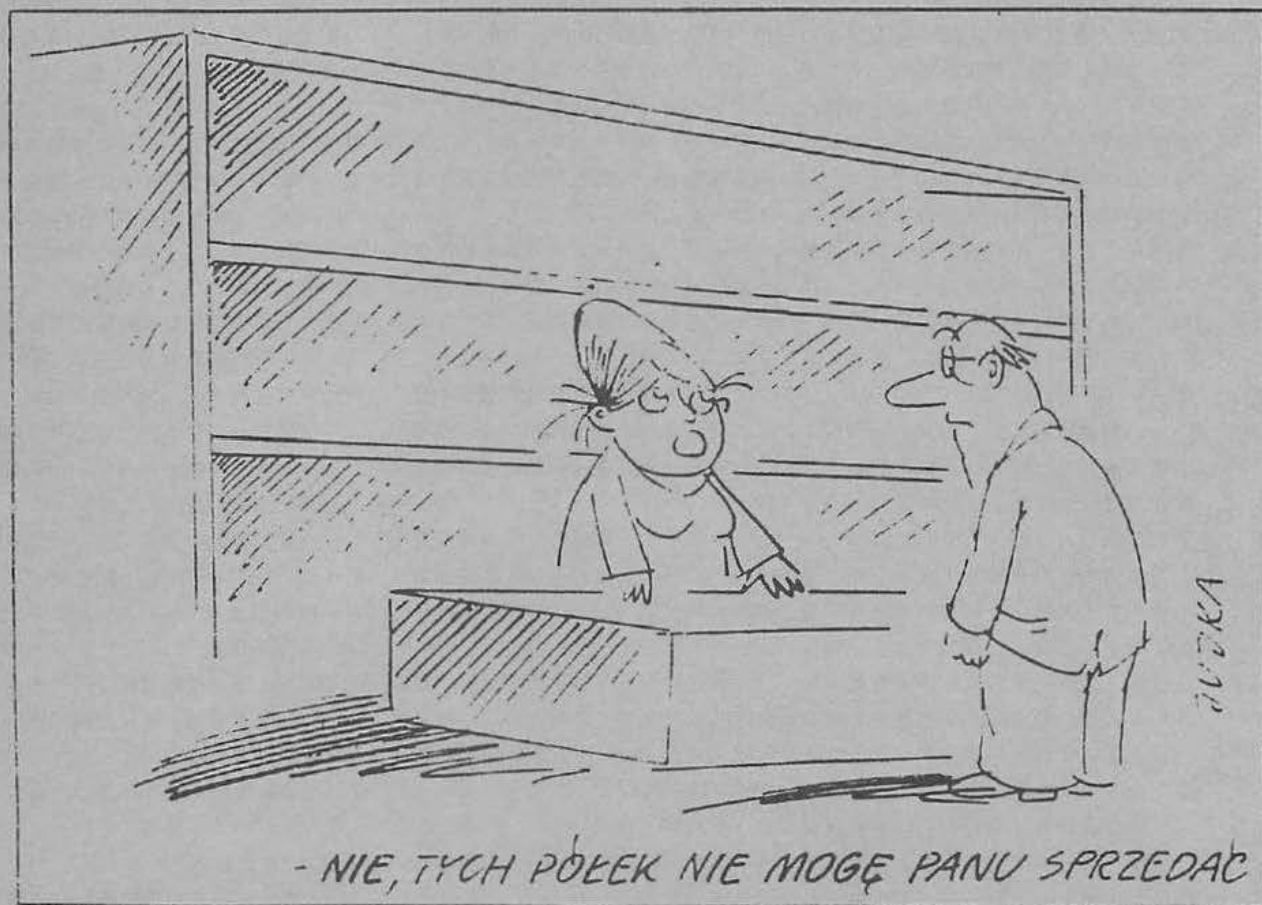
通貨膨脹近年來都高達二位數字，現在接近20%。在五百萬受薪工人之中，約四百萬要靠第二份工作幫助生計，工作時間每日長達十二至十四小時，嚴重影響健康和家庭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已降至七十年代初期的水平。失業也開始大規模出現。一九八九年，官方的臨時性失業數字高達二十萬人。估計在全國一千一百萬人之中，有一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過去，在一九五六年革命被鎮壓，蘇軍威脅和官僚統治的壓力下，匈牙利

人民被迫接受社會妥協，追求個人的經濟出路，因此亦形成工人缺乏集體意識和集體力量的分化局面。

現在，五六年革命被平反，斯大林主義和卡達爾式改革徹底破產，社會妥協不再存在，蘇聯又因本身問題而不能像以往地支配和鎮壓東歐；更重要的，是在官僚統治、整體經濟危機和龐大外債的壓力下，已令更多工人醒覺到尋求個人經濟出路並不能解決問題。

近年來，工會運動已有復甦的跡象，白領工人和藍領工人工會開始出現，並有傾向結成工會聯盟。五六年革命時湧現的工人委員會也得到更多人認同和推廣，以應付國有財產私有化和廉售給外國資本的情況。尤有意義的，是八九年八月二十日，據報有二百萬匈牙利工人舉行一次大罷工，抗議政府調高肉類售價計劃。迹象顯示，工人正從分化、零散的狀態逐漸走向凝聚集體力量，從工人的利益角度解決問題的道路。★



「對不起，貨架不賣！」

匈牙利政治向右急轉

訪問「左派出路」談匈國政治氣候

〔被訪者告魯茲(Tamas Krausz)是「左派出路」的創始人，這個團體支持自管；他也是「匈牙利社會主義黨」內的「人民民主派」的創始人之一。「左派出路」目前參與在匈牙利成立工人委員會的活動，和領導爭取一項自管法律。這個組織形容匈牙利政府是一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及自由民主協會的政府」，呼籲民眾與這個政府決裂。它呼籲羣眾組織脫離三方（黨、反對派、羣眾組織）圓桌會議，成立一個建基於工人委員會的永久性左派論壇。

訪問由《國際觀點》記者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在布達佩斯進行，譯文有刪節)

□記者

■告魯茲

□：請解釋「左派出路」的性質和作用，及這個名稱的意指？

■：簡單而言，這個組織團聚有興趣於社會自管、從下而上地組織（如工人委員會）的人。我們從法制、道德、政治和智識的角度支持這些委員會。「左派出路」又是一個理論傾向，但不是政黨，它甚至是一個反對政黨的組織。它的會員來自不同政黨，或是無黨身分的。

團結我們的，是我們相信社會基層有可能自發地發展自我組織，我們為此作理論準備。除非必要，否則我們不準備介入政黨的事務。

□：你怎樣看匈牙利目前的經濟狀況，特別是債務問題及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關係？

斯大林主義者以反共為榮

■：舊的卡達爾制度已到盡頭。正如所有斯大林主義根源的政府一樣，它將民主化與自由企業混為一談，它並不向左派或工人階級的派系開放，結果是制度的完全解體。各架構在崩解，外國資本則乘虛而入。目前的政府由恢復一個基督民主制度作為掩護，是復辟資本

主義的工具。一個討伐共產主義的運動出現了。政府的領袖、老斯大林主義者格羅茲（Grosz），和包括波茲基（Poszgay）的所有老斯大林主義者，現在都以反共產主義為榮。

□：你談到匈牙利在復辟資本主義，目前的情況如何？大企業和經濟的重要部門已賣給外資嗎？

■：外資正在揀出運作最好的企業，留下那些低效益的企業給我們。同時，在債務陷阱方面，匈牙利的經濟正在國際貨幣基金會和國際銀行的掌握之中。目前，左派處於分歧和癱瘓的狀態。

□：你怎樣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十月大會？它怎樣演變成「匈牙利社會主義黨」？原匈共與舊架構的延續又怎樣？

■：必須與舊執政黨決裂，即是說我們要與保守的斯大林主義力量決裂——這正是大會發生的事。我們的目標也是要與自由企業論者分離開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左派不想加入黨，同時，右派也不想加入新黨，因為「人民民主派」（我是代表之一）的綱領在大會中取得大多數，壓倒了「改革者聯盟」。我們在大會中有很大影響。我們只是在大會前五天才組織起來，而改革派已存在了一年。「改革者聯盟」的左翼與我們接近；我相信在不久將來，右翼會聯同政府領袖〔波茲基〕離開「匈牙利社會主義黨」。

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團聚了老的保守斯大林主義力量，雖然也有些懷舊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覺得很難與舊體制決裂。

而且，新的「匈牙利社會主義黨」由於下層壓力和策略理由而放棄了舊的標記。紅旗被保留，但紅星被放棄，以紅色康乃馨取代。我個人不同意這點，但你要明白，卡達爾制度已在公眾的眼中完全敗壞了這些傳統共產主義的標記。

匈牙利政治向右急轉

□：你能否分析各種力量？你提及有左派、保守力量和支持復辟資本主義的新自由派。

■：在匈牙利，這些不同的力量並不以政黨形式出現。「匈牙利社會主義黨」也有一個極端右傾派系，是徹底的資產階級復辟論者。復辟要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推行。另一方面，「基督民主派」裏有工人部，這部分和我們密切；至於它的左翼，保留了最保守的傳統。所有政黨都是反共產主義者，他們希望由此取得權力。「自由民主協會」有六千人，包括前馬克思主義者——當然，這些馬克思主義叛徒以新皈依者的狂熱來吹捧新自由主義理論。還有一個左翼少數，是法國密特朗式的社會主義者。

「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有一個斯大林主義派，也有一個進步左派，後者由於「匈牙利社會主義黨」右翼佔的力量而沒有參加進去。

細小的「十月黨」則很混亂，在左派和右派意義上都很激進。他們暴氣戾戾地反對共產主義，但也要工人委員會。勒斯（S. Racs，一九五六年的工人委員會領袖，現為總統候選人之一）是一個極右的民族主義者，對天主教非常虔誠。很多這些經歷過一九五六年的人由於被囚禁等經驗，已成為狂暴的反共產主義者，他們現在很難代表工人委員會的利益，因為年青人不了解他們。年青人不了解仇恨的語言。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國會門前的事件反映得很清楚；年青人不了解基督民族主義的語言。

國際貨幣基金會瓦解東歐

□：你說過，在企業內成立自管模式會改變政治局勢。今天這些組織的發展狀況是怎樣？據我理解，你曾設想在不久將來舉行工人委員會大會的。

■：我們不久將籌備一個會議，將所有政黨組織的工人委員會聚在一起。

當然，「人民民主派」在推動這個計劃中會佔最大主力。我們的構想，是團聚起舊黨的最進步分子，即受「左派出路」影響的「匈牙利社會主義黨」的反斯大林主義核心。到來參與的力量將會支持最廣泛地團聚工人委員會。

□：工人委員會今天的實況如何？是不是到處都有工人委員會，或只是最初階段？

■：它們遍佈各地。我認爲它們是當今社會主義出路的最後機會。

□：一個一般性問題。匈牙利是華沙公約和經濟互助會成員，你有否密切注視東歐其他國家的發展情況？

■：當然有的。我在《覺醒》創刊號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談到蘇聯的發展、戈爾巴喬夫現象等……。在今天的蘇聯，以至它的共和國，有民族內戰的

巨大危險，又或許會出現保守獨裁者重新掌權的局面。「經濟改革」與「開放」的最後機會，是戈爾巴喬夫與體制內的革命力量聯合，支持礦工等罷工來打擊保守派。

在波蘭，我看不到波共與團結工會之間有什麼基本分別，因爲後者現在也害怕工人自管。我看到，由於國際貨幣基金會將會摧毀整個東歐，我看到東歐在逐步瓦解，東歐正步入拉丁美洲化的過程，東德正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舊斯大林主義政權已經全面妥協，再沒有合法性；它們愈來愈鼓勵自由企業，以褫奪工人運動活動的空間。因此，我們將會在所有這些國家看到舊共產黨的崩潰，而左派興起，反對自由企業和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左派將誕生。所有共產黨已失去它們與工人階級的舊有聯繫，而

沒有其他政黨與工人階級有緊密的聯繫。斯大林主義獨裁在東歐沒有前途。只有資本主義復辟，即只有毫無社會基礎的軍事獨裁政權才能阻止左轉。

□：最後，一個較私人的問題。你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選集在匈牙利的反應如何？

■：在這個基督民族主義復辟的時間，馬克思主義文獻正被逐步擠到一邊。馬克思主義者都喜歡這本書，但這本書沒有激起辯論。有一些正面的評價，但反對派（「自由民主協會」、「年青民主聯盟」）憎恨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托洛茨基。我形容我們的新時代是「舉着白旗的新斯大林主義」，一個由國際資本主義資助的民主斯大林主義。★

五一勞動節呼籲 「左派出路」

有關轉手的法律不久將會實施！這是最後的機會，因爲如果你們將你們的企業交給本國或外國的資本，目前的國家剝削將會發展爲資本主義剝削。將你的命運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你的手中！

工人在工廠內渡過一半生命，有能力按他們的技能和直接利益，一直致力於和有能力接管企業的管理。應記着工人自管政府的歷史例子！

沒有任何資本主義或國家管理制度，能像工人的集體及其直接物質利益的創造性力量那樣取得效率和成果！只有這才能將你從被奴役的狀態和國家的危機中挽救出來。

選擇和僱用向你負責的領袖，他們要對你的事業友善和有益。

真正的、非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由自我組織、社區自管，在團結和互助合作的發展上達致。

體制的獨裁：是斯大林主義；工人的自我管理：是社會主義！

經濟民主是社會發展的道路，任何其他道路只會倒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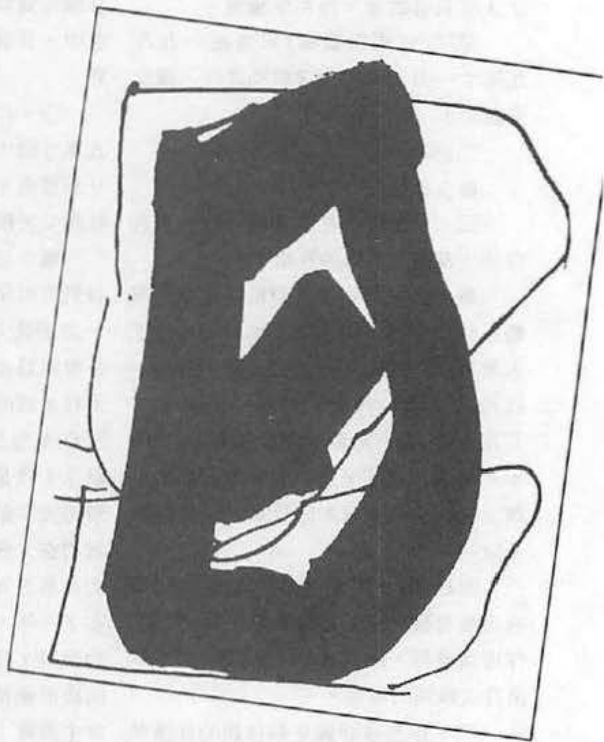
組織起來！

團結一致！

所有經濟權力歸於工人！

「左派出路協會」經濟政策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於布達佩斯★



建築工科學大著名十六點要求

「請抄錄，並向匈牙利工人散發

建築工科學大會所通過一決議案中關於政治、經濟和思想的十六點。

布達佩斯的同學們：

下列決議案是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匈牙利歷史上新時代的開端，在建築工科學大禮堂商定，這是繼幾千愛護祖國匈牙利青年的自發運動而產生的：

(一) 我們要求，依照和約的規定，立即撤退所有蘇聯軍隊。

(二) 我們要求自下而上的以秘密投票方式，選舉匈牙利工人黨的低級、中級和高級領袖們。這些領袖們應盡速召開黨大會，並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三) 政府應在納吉同志領導下改組；所有斯大林派拉可西時代的有罪首領應立即免職。

(四) 我們要求對法克斯及其徒從的犯罪案舉行公審，拉可西對最近過去期內的一切罪行和破壞本國負有主要責任，應勒令回國，提付人民審判法院審訊。

(五) 我們要求本國在全民投票、秘密投票和各黨參加下舉行總選，以期選出一個新國民會議。我們要求工人們應有權罷工。

(六) 我們要求本充分政治經濟平等，和互不干預內政的基礎，來重新檢討重新調整匈牙利和蘇聯間、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

(七) 我們要求在專家協助下，改造匈牙利的整個經濟生活。我們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整個經濟制度，應予重行檢討，而注意及匈牙利的情況以及匈牙利人民的重要利益。

(八) 我們的對外貿易協定，以及永難償付的賠款真實數字，應予公開。我們要求關於本國鈾藏、鈾產開採，及蘇聯特許開採權的真實資料。我們要求匈牙利應有按照世界市場價格自

由售鈾，以換取硬通貨的權利。

(九) 我們要求工業生產標準的徹底改訂，緊急而大刀闊斧地調整工資，以適應工人和知識分子的要求。我們要求工人們的最低生活工資應予確定。

(十) 我們要求繳糧制度應置於一新基礎上，且產品應合理使用。我們要求應對個別耕作的農民予以平等待遇。

(十一) 我們要求由各獨立法庭重行檢討一切政治及經濟案件，釋放無辜，並恢復其名譽。我們要求立即把解往蘇聯的戰俘及平民遣返，其中包括在匈牙利國境以外被指為犯罪而予監禁的人。

(十二) 我們要求充分的意見表達自由，新聞自由，和由匈牙利大專學生團體聯合會主辦一個自由電台和銷數廣大的新報紙。我們要求現有一切「檢查工具」應予公布並予銷毀。

(十三) 我們要求作為斯大林派暴政和政治壓迫象徵的斯大林像應予盡速撤除，而在原址改建一八四八年至四九年間自由鬥士和殉難者的紀念物，而無負先烈。

(十四) 我們希望重新使用舊日匈牙利柯蘇斯軍徽，以代替現有為匈牙利人民深感陌生的軍徽，我們要求匈牙利陸軍改穿足以代表我們國家傳統的新制服。我們要求以三月十五日為國家假日，停止工作一日，並以十月六日為國殤日，各校停課一日。

(十五) 布達佩斯工科學的青年們，一致表示他們對波蘭民族獨立運動一事，與波蘭及華沙的工人和青年徹底團結一致。

(十六) 建築工科學的學生們，將從速組織匈牙利大專學生團體聯合會的分支單位，並決定於本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在布達佩斯召開一個青年議會，會中將由全國青年推派代表參加。工科學及其他各大學的學生們將

於明天（本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半，在作家聯盟會址前集合，從那裏再到拜姆像前獻花圈，以表示他們對波蘭自由運動的同情。各工廠工人均經邀請參加這個遊行行列。」★

匈牙利作家聯盟宣言

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歷史性轉捩點，除非整個匈牙利勞動人民結合在一個有紀律的陣營裏，我們就不能在這個革命性的局勢中善盡本分。黨和國家的領袖們一直未能提出一件行得通的計劃，應對此負責者乃是那些不去擴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頑固的自求鞏固的人，他們是以在匈牙利恢復斯大林和拉可西的恐怖政權為目的。我們匈牙利的作家們已在下列七點中擬訂匈牙利國家的要求：

(一) 我們要有一個以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的獨立國家政策。我們和各國的關係，尤其和蘇聯與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關係，應以平等原則為基礎指導進行。我們要以權利平等精神來檢討各國國際條約和經濟協定。

(二) 破壞民族間友誼的少數派政策須予放棄，我們希望和我們的盟邦——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保

有真誠友誼。這唯有根據列寧主義的原則才能實現。

(三) 國家的經濟立場須予明白的說明，除非一切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能在本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管理上盡其適當的任務，在這次危機之後我們就難能恢復。

(四) 工廠必須由工人和專家經營，目前工資、工作標準，和社會安全情況等的可恥制度必須予以修正。工會應真正代表匈牙利工人的利益。

(五) 我們的農民政策必須置於一新基礎之上。農民們必須予以自由決定其前途的權利。使自由參加合作社能以實現的政治及經濟條件必須終於建立。目前向國家徵糧和稅捐制度必須逐漸以確保自由的社會主義生產和易貨的制度來取代。

(六) 倘要達成這些改革，黨和國

家的領導結構和人事就必須加以變更。正謀捲土重來的拉可西集團必須自我們政治生活中除去。贏得匈牙利人民信任的純潔而英勇的共產黨人納吉，和那些在近年來一貫地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戰鬥的人們，須昇于他們理應擔當的位置。同時，對一切反革命企圖和野心，必須採取一個堅定的立場。

(七) 局勢的演變要求人民愛國陣綫應擔當起匈牙利社會中勞動階層政治代表的責任。我們的選舉制度必須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各項要求。人民必須自由選舉，並以秘密投票方式選舉他們在國會、地方議會，以及一切自治行政機構中的代表。

我們相信國家的赤心已躍現於我們的宣言之中。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知識分子革命委員會決議

匈牙利知識分子革命委員會（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發表）
匈牙利同胞們！

我們中間容或意見分歧，不過我們對主要要求是一致的，我們向政府建議，應採下列各點作其方案：

(一) 政府應盡速並根據平等基礎，釐定我們和蘇聯的關係。蘇聯部隊應即開始自我國整個領土撤退。

(二) 政府應即廢除對我國不利的一切對外貿易協定，並應公布過去締訂的一切對外貿易協定，包括那些涉及鈾鍍和鐵礬土的。

(三) 我們要求秘密投票的總選，人民應能自由提出他們的候選人。

(四) 各廠礦應真實成為工人們的財產。我們不把工廠和土地交還資本家和地主們。我們的工廠應由自由選舉

的工人委員會來管理。政府應保障小規模私人工商業的經營。

(五) 政府應廢除含有剝削性的「生產標準」計劃。政府應在經濟的可能範圍內提高工資及補助金。

(六) 工會應成為真實的工人組織，代表工人的利益，自由選舉其領袖。勞動農民應組織他們自己的團體，確保他們的利益。

(七) 政府支持個別農民和自動組織的農業合作社，來確保農業生產的自由與安全。遭人忌恨的徵糧制度使農民遭受搶劫，此應予以廢除。

(八) 對因改併小塊土地及其非法措施而受害的農民，應予公正處理及物資賠償。

(九) 我們要求充分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

(十) 政府應宣布十月二十三日，我們民族解放戰鬥開始的一天，為國家假日。

聯署人：

學生革命委員會

波沙

莫納

瓦加

匈牙利作家聯盟

艾迪（秘書長）

匈牙利記者全國聯合會

哈拉茲蒂

瓦沙里伊

鮑迪沙

費克特

匈牙利藝術家聯合會

本齊

索莫伊

匈牙利音樂家聯合會

齊萬斯基

耶丹伊

大學教授代表

納冀

梅傑

加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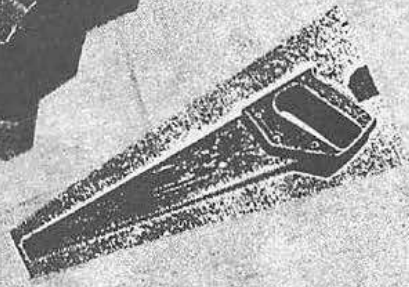
馬可斯

各人民大學

加杜斯★



I ASK YOUR HELP



團結工會從工運的興盛 走向調和主義的低谷

葉新

波蘭戰後歷史的最主要特點，是波蘭人民，特別是工人反抗官僚獨裁統治的鬥爭歷史。最令全世界矚目的，無疑是一九八〇年團結工會的誕生及它直到八一年底的蓬勃發展。但這個發展與八〇年之前的鬥爭經驗是不能分割的。

一九八〇年之前的工運經驗

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波蘭波茲南市已爆發工人起義。工人從罷工要求麵包、增加工資，迅速變為成千上萬人的示威遊行，要求自由、打倒虛假共產主義、打倒俄國人等，並進攻監獄、電台。政府調入軍隊，將起義鎮壓下來。較早前受政治整肅而入獄的哥穆爾卡再被捧上台，並與蘇聯赫魯曉夫協議，對冒升中的工人運動採取懷柔政策。在這段時期廣泛出現的工人委員會，逐漸被官僚架空和取代。政府也逐漸回復鎮壓統治。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捷克事件影響下，華沙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學生示威，要求自由，並得到一些年青工人的支持，但未得到工人的普遍支援。示威被軍警鎮壓，大批學生和年青工人被捕。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政府增加食物價格兩成，觸發格但斯克港口區和什切青工人示威。防暴警察開槍鎮壓，殺死了百多名工人。政府暴行激起多個城市的罷工浪潮。哥穆爾卡被迫下台，由礦工出身的蓋萊克取代，平息了工潮。

一九七六年六月，政府宣布食品加價，再次觸發各地的罷工和示威，政府被迫讓步。

其後，政府加緊迫害罷工工人領袖。知識分子連同工人成立「社會自衛委員會」和「工人自衛委員會」，教會也幫助和庇護，援助受迫害的工人及其家屬。從七七年起，工人更出版《工人報》，報導工人狀況和鬥爭消息。

一九七九年，波蘭活動分子制訂了《工人權利憲章》〔見另文〕，強調要保障工人的工作條件，反對官僚特權，

爭取罷工權利，並要求成立獨立工會。該文件得到廣泛支持，對團結工人的鬥爭，指出運動的方向和手段，起了重要作用。

波蘭工人運動多年來反抗共黨政權的迫害鎮壓，豐富了鬥爭經驗和教訓，為八〇年代的工運打好基礎。而波蘭政府除了政治上鎮壓工人外，在經濟上不斷陷入困境。七〇年代向西方借貸求援，反而因為西方經濟不景和官僚管理不善而導致外債劇增，只有將經濟困難轉嫁到工人身上。八〇年七月，政府提高內價，觸發廣泛罷工抗議浪潮，終於導致波蘭團結工會的誕生。

團結工會誕生

一九八〇年七月的罷工浪潮由首都的工廠開始，迅速蔓延到各省；盧布連市更發展成為全市總罷工。罷工工人提出取消加價、增加工資、保證罷工權利、不得對罷工工人報復等要求。政府答允作出經濟讓步及其他大部分要求，工潮漸告平息。但在罷工期間廣泛成立的罷工委員會並未解散。

到八月初，政府的承諾普遍仍未實現，並且對工人活動分子迫害，觸發新一輪的罷工。八月十四日，格但斯克列寧船廠工人抗議廠方解僱華里沙等三位工人活動分子，發動罷工，成立罷工委員會。幾天之內，罷工擴展至格但斯克港口三市，並成立廠際罷工委員會，聯繫和統籌各工廠的罷工，提出共同的要求。

罷工潮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什切青、羅茲、弗羅茨瓦夫等城市相繼出現罷工和罷工委員會。到八月底，南部煤礦區也出現罷工潮。

政府成立談判團，到格但斯克與廠際罷工委員會談判工人的二十一點要求。

工人的要求顯示了他們的政治覺醒，而整個罷工期間和談判過程，顯示了工人的政治成熟性。罷工委員會由每

間廠選出代表參加。所有談判即時由揚聲器廣播到會場外。工人在罷工期間表現了巨大的組織能力和自信，取得社會廣泛的支持。罷工潮不斷蔓延到全國，更對政府施加重大壓力。終於，政府在八月三十一日與罷工委員會簽訂《格但斯克協議》〔即二十一點要求。見另文〕，答應了大部分的要求，特別讓團結工會成立。

團結工會的誕生，標誌着工人運動的重大勝利。然而，在落實《格但斯克協議》方面，團結工會仍不斷要用談判、採取警告式大罷工和示威抗議等，與政府力爭。政府在工會章程、縮短工作時間、新聞自由以至成立團結農會等問題上，都不斷阻撓、悔約，與團結工會不斷角力。

雖然如此，團結工會仍然取得重大發展，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到八一年底被鎮壓前，全國一千三百萬工人中，有九百六十萬是團結工會會員。此外，其他社會階層也成立獨立組織，例如團結學生會、各專業工會、團結農會等，其中團結農會在三百五十萬農民之中有一百萬會員。所有這些組織都團聚在團結工會周圍，形成一個龐大、有組織、以工人為核心的社會運動。

波蘭共黨也受到團結工會運動的重大衝擊。在三百萬黨員之中，有一百萬加入了團結工會，四十萬黨員退了黨。黨內基層更出現一個更新運動，要求黨自我改革和民主化。但八一年七月的黨代表大會粉碎了黨內更新運動的幻想，黨基層基本上爭取不到任何成果，黨內改革證明是不可能的。

團結工會第一屆全國大會

從一九八〇到八一年，以團結工會為軸心的波蘭工人運動經歷了迅速增長和深化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一九八一年九月至十月的團結工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通過了團結工會的綱領〔見另文〕。

綱領界定團結工會是一個聯合了工人和社會運動的組織，指出了一個自治的政治制度的前景。綱領要求實行一個統一計劃、自治和市場的經濟和社會制度，進行民主及自治的改革，廢除指令式經濟和阻止市場運轉的官僚障礙，令計劃社會化，由社會控制整個經濟生活。

綱領並勾畫了一個自治共和國的模式，爭取改變國家架構和在社會生活所有平面建立獨立自治的組織，包括建立工人自治委員會、恢復合作社自治，以真正的地區自治組織代表地方居民利益，並研究在國家權力最高層建立自治組織。

綱領更對工會的民主運行原則和方式提出指引和規範。

工會代表大會上對綱領，特別是經濟改革，存在不同意見。較主要的，是一批知識分子和團結工會專家提倡加價、減少投資、發展私人部門和擴大市場，另外，不少工人和部分知識分子則提出，要由社會控制經濟改革，令特權者承擔代價；此外，對於建議在國家議會之外另設一個全國自治議院，以決定經濟和社會重大抉擇，也被改為只研究其必需性。

大會也評價了過去一年的工作，特別對於全國委員會兩次超越權力和自作決定表示不滿，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作用和壟斷發言的情況，也作出比較負面的評價。這些情況反映了民主的氣氛，工會基層可以表達意見和作出決定。

大會選出了全國委員會107名委員領導工會。工會主席的職位有四位候選人，結果由華里沙以55%選票當選，反映了不少代表對他有不滿情緒。

軍管前社會處於革命局勢

一九八一年夏天以來，波蘭的經濟危機、政府怠工和破壞、羣衆自發鬥爭等，都要求工會作出積極反應。工人接管整個社會管理的問題日益尖銳。在這期間，曾出現反飢餓、反加價、反對新聞檢查等遊行、罷工。

從八月開始發展的工人自治運動，在委任廠長、令生產配合社會需要等問題上與政府衝突；政府在十一月取消改革方案，更令不少工會地區領導接受和推動積極罷工（即工人繼續開工，但控

制生產和分配），和加強工人代表委員會的意見；成立緊急計劃和工人自衛隊的問題也提了出來，以能在積極罷工之中保衛工廠和分配網。

從八一年十一月起，工會內部意見分化的過程加速出現。更多的工人，工會基層和地方領袖主張更廣泛的地區性工人委員會聯繫和實行積極罷工。到十二月初，多個地區的工會領袖號召為積極罷工作出具體準備，和在全國及地區之間建立籌備聯繫。羅茲區更計劃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動積極罷工和在工廠內成立工人自衛隊。

事實上，羣衆的激進化迅速加深，整個社會已有革命局勢的性質，工會領導層不再可以逃避政權的問題。十二月十二日，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的會議也討論了積極罷工，多個地區的立場有統一的趨勢，一些代表提交了積極總罷工的行動綱領。但會議並沒有作出具體決定。

不少團結工會領導層和專家相信自我克制的戰略，極力避免與政府對抗，迴避政權問題，只爭取漸進式的協議成果。他們一方面高估工會的主觀力量，一方面期望政權的改良、市場改革和議會民主；此外，他們強調蘇聯軍事入侵的威脅。教會也起了重要的緩和作用。因此，他們或忽視了形勢的激化，或在政府加強的壓力面前退卻，對積極罷工和武裝自衛的建議排拒或有保留。

在波共政權方面，雖然一九八〇年八月在罷工壓力下被迫簽訂協議，但一直以來都盡力阻撓協議的實施。對於團結工會運動造成整個社會出現雙重政權的情況，它是很了解和一直準備反擊的。但團結工會運動令波共有限的社會基礎更爲削弱，波共黨內也出現癱瘓和崩解的情況，波共對國會的控制也大爲減弱。因此，軍隊成爲波共官僚層的最後手段。

一九八一年九月，士兵已被調派到一些礦場「協助生產」；十月底，近千個軍事小組被派到全國解決「地方性衝突」，爲軍隊直接接管作準備。十二月二日，民兵襲擊佔領了學院的見習消防員。在團結工會領導層沒有明確反應之後，兼任波共、政府和軍隊領導的雅魯澤斯基將軍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宣布成立「救國軍事委員會」，實施軍

法統治。

軍管下的社會演變

軍政府出動軍隊大規模逮捕工會領袖和活躍分子、知識分子、學生和其他階層的人士，截斷通訊，禁止非法出版，接管主要經濟部門和大工廠、電台、電視和各政府機關。士兵用鎗迫使工人開工，大批解僱工人，然後有選擇性地重新僱用他們。大規模的審訊在各地進行。

雖然團結工會大部分領袖被捕，事前又未有反抗的準備，但各地工人廣泛抗拒軍隊的接管，並爆發一場半自發的罷工浪潮，有報導說有二成的工人進行了罷工。西里西亞礦工更進行了半個月的佔領礦場罷工，至少七名礦工被軍隊殺害。幾個主要工廠委員會和五名未被捕的團結工會領袖並曾發出總罷工的呼籲。

在軍隊嚴厲鎮壓之下，罷工浪潮漸漸平息。但代之而起的是整個社會的消極抵抗運動，工人拖慢生產，孤立與政權合作者，支援被捕者的家屬。運動逐漸在地下發展，建立地下社會、工廠內的地下組織等，盡力維持最低限度的聯繫和工會組織，出版地下刊物、傳單等。地下團結工會並成立全國臨時協調委員會，在困難的條件下嘗試提供領導。

另一方面，這些聯繫、組織，討論以至各種活動都受很大限制，加上活動分子被捕的打擊等，都阻礙着地下運動的發展，同時，軍政府施行緊縮經濟政策、限制工資，放開物價管制，迫使人民普遍要爲生活而加班、輪購食物等，令人民疲倦和消沉，間接減弱了對地下運動和工會的積極支持。

團結工會地下領導在一九八二年以來，曾經數次號召警告式大罷工，但都由於準備不足和社會疲倦的原因，所以都不太成功。而軍政府在每次罷工後大舉搜捕，令工人對這類沒有清晰目標和堅決鬥爭前景的象徵式罷工行動更爲保留，避免付出無謂的代價。再者，當工人自發地爆發罷工（如一九八二年十月團結工會正式被取締後的罷工），工會領袖卻未能即時作出領導。因此，反抗軍政府的罷工行動，遇到多方面的困難。

但社會抵抗軍政府的鬥爭，仍不斷在進行。例如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國的二十五萬人大示威，八五年五月一日的示威、杯葛官方新工會、杯葛八五年國會和地方選舉，不斷的怠工、維持地下刊物的出版、團結和支援受迫害者、抵抗政權的分化等等。

團結工會漸脫離工人基層

另一方面，原來的團結工會領導層在孤立的地下工作條件下，逐漸與基層脫節，加上號召罷工受到挫折等，令一部分領袖逐漸失去鬥爭前景，並且在知識分子和教會的影響下，更傾向尋求與政權對話、和解、妥協，並同時發展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策略，希望以這些力量對抗官僚壟斷和控制。

以華里沙為首的一小批領袖和專家，更在西方工會的資助下，開始建立一個由上而下的工會架構，工會上層逐漸官僚化，而不少工會刊物並被領導層和知識分子壟斷，鼓吹市場經濟、私有化、與政權對話等；基層的聲音則逐漸被排斥出去，團結工會作為工會的角色也被忽略。這個情況在工會其他領袖和基層之中漸漸引起不滿。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二位工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華里沙，批評團結工會與工廠和基層割離，不再自視為一個工會，忽略傳統工會任務的傾向。

面對着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和軍管鎮壓，年青工人開始在工廠內獨立地進行保衛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等經濟性鬥爭，進行抗議、罷工等。一些自發的組織開始出現，例如一些地區出現「戰鬥團結工會」等，代表了新一代的年青工人組織起來的努力。

一些團結工會基層則在工廠內成立「團結工會組織委員會」，以工廠內的實際經濟鬥爭來組織工人，重建團結工會的基層組織。

部分基層團結工會和獨立工會組織的活動分子和一些知識分子，更開始在政治上組織起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波蘭社會主義黨」宣告成立，提出要代表受壓迫者保衛生活水平和工人權益。到八八年二月，該黨分裂；主張和在實際上推動工人罷工保衛生活水準的一派，成立了「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他們在一些工廠內進行組織工

作並與其他基層組織聯合行動代表了社會上一支細小但明確的左翼政治力量。

圓桌會議前的局勢

軍政府上台以來，由於共黨組織的癱瘓，因此被迫由軍官和擴大的秘密警察進行國家行政和經濟架構各級官員的重新委任，整頓，以獨立於崩解中的黨，改變以往由黨委任的制度。據政府自己透露，這個改組到一九八八年已基本上完成。

在經濟方面，軍政府嘗試推行壓抑工人工資和消費的緊縮政策，及走向市場化、私有化和向外更大開放的改革。軍管以來，波蘭人民的實際工資普遍下跌接近二成，但經濟危機並未因為社會緊縮消費而有好轉。通貨膨脹加劇，生產下降。外債從一九八〇年的240億美元增加到390億。

隨着經濟危機加劇和生活水準進一步下降，社會的反抗也逐漸加強。從八七年開始，經濟性的罷工急劇增加。人民對軍政府和波共的鄙棄也更為明顯。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軍政府舉行全民投票，就人民是否贊成經濟重整和因此忍受兩、三年苦，及是否贊成波蘭式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問題進行投票。結果兩個提案都得不到半數支持，政府承認失敗。這次投票清楚顯示了軍政府沒有合法性，它多年來的「正常化」努力已明顯破產。至於團結工會領導層，由於他們的改革方案與政府所提的方案很相似，所以並沒有號召杯葛或投反對票，但對投票的結果則表示驚奇。

一九八八年四、五月，波蘭各地出現廣泛的自發性罷工浪潮；有些取得勝利，有些則受鎮壓而失敗。到了八月，出現另一輪罷工浪潮，而團結工會則有介入，嘗試取得這些罷工的領導權，與政府談判。八月三十日，華里沙與內政部長會談，同意日後舉行圓桌會議。第二天華里沙號召工人結束罷工，並到全國各地平息罷工潮。

一九八九年二月，團結工會與軍政府、官方工會等開始舉行圓桌會議。團結工會的代表主要由「公民委員會」成員擔任。這委員會是由一批團結工會專家和知識分子組成，獨立於團結工會之外，是較早前由華里沙成立的。

經過兩個月的談判，團結工會與軍

政府在四月簽署圓桌協議，內容包括團結工會合法化、設立參議院、增加總統權力和進行總統選舉、開放35%的國會議席，在六月進行國會選舉，以及一整套經濟改革計劃。

協議的經濟改革計劃包括：撤除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國營企業局部或全部私有化、發展股份公司，成立股票市場、限制中央計劃的功能、削減對國營企業的津貼、由供求規律決定價格和容許財產正式轉給私人等。這套計劃事實上與軍政府的改革很相似，政府過去只是由於恐怕會激起社會巨大反抗而緩慢地施行。

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選舉中，團結工會推出的候選人取得了所有開放的35%議席和參議院100席中的99席。

在八九年七月，國會選舉總統，雅魯澤斯基得到一些團結工會議員的棄權票（而非反對票）而順利當選。

八月二十四日，雅魯澤斯基委任團結工會周刊總編馬佐維斯基為總理，到九月十二日成立聯合政府，包括團結工會、波共兩個波共以前的附庸黨。團結工會的專家出任了多個部門部長，波共則保持了內政部、國防部、通訊運輸和國家銀行等職位。擁有否決法案、解散國會和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和戰爭狀態等權力的總統雅魯澤斯基將軍，則在上監視着政府和整個由軍政府改組委任的龐大行政和經濟官僚架構。

團結工會上台後的矛盾

對於波蘭人民來說，團結工會合法化和以團結工會專家為主的聯合政府上台，顯示了八年對抗軍政府的重要勝利。但是實施軍管的雅魯澤斯基仍然掌握大權，而且八年軍管令社會普遍疲憊、消沉，不少人更對團結工會領導層與基層的割離、它與軍政府的妥協和它鼓吹的經濟改革方向有疑慮，所以社會並未出現狂歡慶祝或很興奮的情緒。社會普遍對新政府有很大的期望，但多數只是限於較被動的同情和支持。

新政府上台後，推行了一連串政治民主化措施，包括修改刑法，改革法庭，修改集會法，取消報刊要官方批准才能刊印的限制，容許成立政黨、警察受法庭和社會監察等等。雖然這些措施沒有超越圓桌協議的規限，但仍然反映

了社會的民主期望，容許了人民政治生活自由化和組織起來。

在經濟政策方面，新政府基本上繼續了軍政府的政策，只是推行得更急激和徹底。它表明希望用團結工會在人民中的合法性，要求社會接受經濟改革的代價。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工人罷工數字劇增，特別是在七月一日軍政府放開食物價格管制之後。在新政府和華里沙的呼籲下，罷工浪潮在九月平息，雖然新政府並未撤銷上述措施。

在一九九〇年一月，新政府宣布實施一連串經濟措施：撤銷絕大部分物價管制，仍然受管制的幾種物品則大幅加價，例如煤加六倍、電費四倍、火車費兩倍半、房租四倍等；撤銷大部分外資管制；波幣再次貶值，以走向波幣自由兌換西方貨幣；嚴格限制工資增加，取消大部分企業和生活必需品的津貼等等。國有財產私有化和對外資更大開放的措施包括：撤銷買賣土地的限制、簡化破產手續、容許私營銀行成立、籌備成立股票市場和準備將一批國營企業私有化等等。

在憲法方面，國會提出一些修改：刪除有關「保衛社會主義成果」、「加強社會所有制」、「實行社會正義原則」、與蘇聯的友誼和波共黨的領導作用等字句；更具重要性的，是刪除有關人民有工作權利的一節。

新政府上台以來的措施，令物價成倍地飛躍，工資增長遠遠落後於物價的漲幅，人民生活水準劇降，並會因為新措施而進一步下降；波幣在一連串貶值之後，兌外幣已下跌了85%；企業官僚利用私有化的合法化，大批地將國營企業變相據為己有，而整個行政、經濟等架構的官僚體制仍然存在。

失業數字開始大幅增加，從八九年十二月的九千人，到九〇年二月中已增加到十萬人以上；政府更估計在未來幾年會有數百萬人失去工作！

新政府推行這些措施，一方面是明顯受到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壓力，要推行嚴峻的緊縮政策以償還接近400億美元的龐大外債，因此要用各種方法逼迫人民削減消費，取消對國營企業的津貼，強迫所謂虧本的企業關門；另一方面，是要締造市場環境，吸引外國資本進來投資，所以要出售國有企業或將之私有

化，以形成生產資料市場，同時又可以撤除對工人就業、生活和社會保障的基礎。一如企業破產製造了失業，形成勞動力市場，逼工人為生活而出賣勞動力和加強工作強度。

但在另一方面，新政府所期望的西方援助卻只是雷聲大，雨點小。西方資本家一方面是在等待波蘭政府還債和開拓市場環境的成績，另一方面是害怕波蘭社會局勢的不穩定，特別是有強大鬥爭傳統的工人階級。格但斯克列寧船廠出售計劃失敗，便是因為工人反對新的工資和五年不得罷工的協議。

團結工會現時處於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它覺得應該支持由團結工會專家領導的新政府及他們推行的政策；另一方面，作為工會運動，它有責任保衛工人的權益和生活水準不受政府的措施侵蝕。工會基層和人民對聯合政府這些措施不滿的壓力，正逐漸反映到廠內和地方的團結工會組織之中。此外，團結工會合法化後的發展並不理想；會員人數至今不到三百萬，比八一年的九百六十萬相差很遠。九〇年一月底，波共宣告解散和以社會民主黨的面貌重組；一部分官僚則分裂而另組新黨，不少黨員則乾脆退了黨。另一方面，波共控制的工會卻利用團結工會的困境，大事宜稱要保衛工人權益，企圖騙取工人的信任，重整它的工會架構。

人民對新政府上台以來的局勢普遍感到困惑。新政府的誕生代表了社會反抗軍政府的勝利；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很好的證明。但同時，大部分人民感受到，新政府並沒有帶來物質改善，反而是生活水準的劇降，工作、生活和社會保障受到愈來愈大的衝擊，同時，團結工會也不能表現為一個能保衛他們權益的工會運動。

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已變得不能忍受，例如：麪包的價錢從一九八九年中的四十元波幣狂漲到二千六百元，等於一個普通工人每日收入的三分之一！社會已達到爆炸的邊緣。生活的壓力，令更多工人開始起來反抗。罷工再度出現。九〇年一月中，數萬名煤礦工人罷工，是明顯的社會不滿增加的跡象；二月中，華沙等城市已出現抗議遊行示威。

在實際生活的壓力下，波蘭人民開

始從目前的困惑、思想混亂和冷漠之中走出來，希望找尋一條可行的出路。官僚計劃經濟已經破產，向西方資本主義開放的市場經濟行了一段短時期，已身受其害，覺得此路不通。什麼才是出路呢？

八〇至八一年的團結工會運動，其實已指出了一個結合着計劃、自管和市場，由工人和勞動人民自治的共和國前景，只是被軍管和團結工會專家將這個前景掩蔽了。

這個前景現在正由一個仍然細小的民主社會主義力量重新提出來。「波蘭社會民主黨—民主革命」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舉行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綱領和選出領導，清晰提出這個自治共和國的前景。

隨着社會危機的深化，更多勞動人民會被迫尋求出路。代表着波蘭工人運動進一步政治深化的這股力量，會更有可能取得人民的認同，共同發揚波蘭工運和社會運動的傳統，衝破波蘭社會目前的危機和困境。★

「這是用對話來建設的時代」

華里沙談圓桌會議

〔以下訪問原文刊載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的意大利日報《每日快訊》(Corriere della Sera)〕

□訪問者

■華里沙

□：你在來意大利之前，會見過在一九八一年宣布團結工會為非法的雅魯澤斯基將軍。你和他握手的時候，有什麼感想？

■：自從我成為政治家——這違反我的意願——我個人的感受已經不再重要。我持着十分明確的念頭和雅魯澤斯基見面：波蘭已經掀開新一頁，我們之間的鬥爭和衝突已經完結，新時期——無疑是更艱巨的——將要開始。這是用對話建立社會未來的時代。

團結工會取得了偉大的政治勝利，但我們要是安頂桂冠，則是不負責任的。工會和政府正面對一條艱苦的路。我不知道，我改變了方法是對抑或錯，但未來會告訴我。

□：假如沒有教會的緩和角色，「圓桌會議」會不會成功？教會的作用足以確保民主化程序的繼續進行嗎？

■：在波蘭，天主教會和社會是一個完美的共生體，在全球獨一無二。所以，在困難時期，主教和團結工會的關係更緊密，但工會保持獨立，不左不右，不和教會太密切，也不會不聽它的忠告。得不到教會支持，我們無法與政府對抗這麼多年。假如波蘭沒有教宗和主教的指引，整個社會將會屈服。「圓桌會議」像個擂台，教會扮演拳證角色，用事實證明了它有能力保證每方面有勝出的機會。

□：最近勾勒出來的偉大的政治改革，是否不可逆轉？

■：這正是我們最關心的一點。然而，必須說，這端視乎我們兩方面，波蘭及西方的態度。我們不可以失敗，不能夠違背我們共同簽署的社會協議的精神，否則，會有災難性後果。按目前情形，這種狀況不會發生。這是你們——

西方民主國家要明白的：波蘭已經出現了無與倫比的歷史性機會。

我會致力向意大利政黨領袖和工會解釋，保證最後勝利，不由我們自己左右。在萬難之下，我們已經贏了，然而，從一個已經由自己承認破產的制度順利過渡向一個更自由、更接近歐洲的公義的波蘭，所走的路要縮短、減少障礙，我們需要經濟、政治，以至怎樣民主運作的諮詢的援助，來達致我們的目標。

□：假如沒有戈爾巴喬夫其人及其主義，波蘭會不會出現轉機？假如你現在會見克里姆林宮的首腦，你會說什麼？

■：在東歐陣營急切自求改革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戈氏是這個形勢的產品或相反？現在也不太清楚。可以肯定是，保守派假如在蘇聯得勢，波蘭的鬥爭會更難。不過，我從來都確信，在歷史的遠觀來看，最後的結果是無可避免的。

我會對戈爾巴喬夫轉述雅魯澤斯基對我說的：人民遲早會取得諒解。我也會說，他來得太遲，假如是他，而不是勃涅日列夫在一九八〇年至八一年得勢，波蘭的發展會不同。

□：按社會協議，人民會有經濟犧牲；人民是否準備不吭一聲地忍受？

■：犧牲無可避免。社會可以採取兩種方法回應：或是認為制度不可以改變，只有訴諸革命；或是，像我一樣，不用革命，可以演進，因此同意為改革付出代價。要說服人民、克服冷感、恢復熱情是困難的。但是，假如得到西方各國幫助，並且和我們攜手提供必需的保證，我有信心成功。

□：你對米度維茲(Miodowicz)及官方工會的行為，有什麼意見？波共內的保守派是否嚴重威脅「圓桌會議」協議的實施？

■：我不相信有真正威脅。在共黨內有煽情者，團結工會也有。煽情者在

你們或我們的國家不會有什麼發展。我們採取的做法，必須不能夠讓改革的敵人有所依恃，不會令我們失敗，使演化的希望幻滅，只留革命一途。

□：在「圓桌會議」上，有什麼民主要求爭取不到，須在日後繼續爭取的？

■：有很多，遍佈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我們無可避免地只能夠邁出第一步。我們的目標，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波蘭，像意大利。

這是我們期望已久的夢；在地下活動的時候如此，現在有了新角色也一樣。其間的差別，只是夢目前已變得具體，成為真實的希望。★

團結工會和政府 應該對物價問題表態

工會活躍分子評價馬佐維斯基政府

〔團結工會基層活躍分子對新政府的取態是怎樣的？對馬佐維斯基有何期望？有何即時的建議？〕

《國際觀點》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新政府上台後，訪問了在弗羅茨瓦夫的寶勒企業團結工會地方主席團委員會三位成員，他們都是工會全職人員——加連斯卡（Calinska）、卡拉卡（Klatka）及察施城（Chaszczewicz）。

「有些人批評華里沙集團，但除了他們，還有誰能夠利用社會壓力，達致一個開放的局面，讓大家可以自由表達意見，連批評者也有這自由呢？是誰打開了團結工會合法重生的道路？誰使我們取得今天的權力？是華里沙。另一方面，批評他的人，引起了相互間的不信任，從而損害了本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對比。想一聲令下，一下子改變一切，是不可能的，這需要時間。」他們這樣說。

寶勒是全國重點企業之一，亦是冰箱、冷藏櫃和洗衣機的主要企業。它有8,000工人，其中4,900人在弗市，四成工人參加了團結工會，8%參加了官方工聯會（OPZZ）。

由團結工會活躍分子佔主導的自管委員會，最近委任了一名非共黨人士為廠長。前任廠長企圖運用其地位，謀取企業附屬有限公司的主席職位，結果失敗，被撤職。

寶勒像波蘭很多企業一樣，也是狀況惡劣，六成機器殘破過時。工廠結構是典型的官僚管理結構。如在弗市的4900名受薪者中，3150名為工人，其中1700人負責直接生產，按件計酬。擔任各種監管工作的約有900人，另有930人在辦公室內工作。八九年八月的平均工資為17萬3千波幣。另有5萬波幣花紅和1萬5千至1萬7千的通脹補償。

寶勒一個普通工人，九月初合共約有24萬波幣，這工資不足維持一家生活至月底。根據《團結工會周刊》八九年九月八日第十五期報導，以八月二十日的

價格計算，一個四口之家，單是食物每月至少也要28.112萬波幣。自此之後，價格持續攀升。因此，人們聽了卡拉卡的話不會感覺驚奇；卡拉卡說：「今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寶勒企業有600工人離職，尋找工資較高的工作去了。」

寶勒跟赫曼和凱德洛一樣，是弗市團結工會最強的支部之一。當地的工會會員人數，遠較地區性平均數字為高。寶勒團結工會主席加連斯卡認為，這是由於「地下工會自一九八一年以來一直進行有效工作」，以及「自管委員會進行的工作結果。寶勒自管委員會為全國最活躍的自管委員會之一，大部分成員來自地下團結工會。」

「給基層較好的服務」

企業裏的團結工會領袖，首要關注的是鞏固工會；他們說：「在這裏我們強大，他們須考慮我們的意見。但一些小企業，卻出現由管理層自己人組成的工會。假如這類工會到處出現，使會日益坐大。為了這個緣故，我們幾天前發出聲明，號召地區及全國性組織，迅速回應工人的日常困難，並善用它們的報刊，去告訴工人他們的權利。我們從政府刊物中知道一個事例：法例容許擁有150名會員的工會聘請全職人員，但這個法例通過一個月之後我們才獲悉。這事例正好證明協調架構的弱點。這架構原應給予基層較好的服務。」

八九年六月大選之後，反對派採取的立場引起了批評：「基什查克（Kiszczak）當選總理後，我們曾向『公民委員會』（OKP）抗議。雅魯澤斯基獲得總統位置已經不對勁，我們感覺妥協有些過分，再不能不發言了，必須提醒他們誰選他們出來。工人們全都有此要求，他們的反應至為清晰。他們找到我們頭上來，而不去找部長，因為是我們建議選誰。部分團結工會會員更退回會員證。還幸這並非普遍的態

度」。

失控的通脹是工人最大的憂慮。企業裏的工會分子不理解領導層對此的怯懦態度。卡拉卡說：「地區及全國領導機關應就物價上揚作出反應，或至少在報刊上講明形勢。自從圓桌會議後，華里沙一直未就這件事表態。可是在另一方面，官方工會的馬蒂尼沃（Martyniuk），每天接受電視訪問，都毫不遲疑地要求調高現行的一萬五千生活指數補償至四萬五千波幣。這無疑產生一定的衝擊。」

加連斯卡說：「現時食物價格每周兩次調高數十個百分點，一萬五千波幣實在不足以解決任何問題。」

卡拉卡說：「馬佐維斯基政府是我們的政府，是個『過渡政府』，從它的成分也反映出來。他們說：『人們不擔心哪個議員行哪一套，最重要是他們都由馬佐維斯基領導』。有些人在知道他當選後喜極而泣。馬佐維斯基已經成為強烈寄望的焦點，儘管大家都知道他接下了了一個甚為棘手的局面。」

要求自動調升生活津貼

「大家最先期望他就標升的物價和每日增加的食物價格，迅速採取決定。我們交給團結工會地區及全國領導機關的決議，要求政府須誠懇及嚴肅地，就物價上升提供生活費自動補償金。在官方工會提出四萬波幣之後決不應再是一萬七千；而實際上，明天恰當的數額或者是七萬、甚或十二萬波幣。」

「假如這個政府決定生活津貼應該是多少，而這數額又能按物價變動而調節，那麼，提高工資的壓力便會自動消失。再者，政府需要採取措施平抑物價，例如除去中間人。假如不這樣做，大家便會以為，我們的政府在這種瘋狂的物價漲潮中，必有多少私利，好待物價漲到相當水平時，當他們輕易攫取了利益後，才去遏止它。人們已經開始作

出這種暗示。」

取締官僚作風

寶勒工會分子一方面希望新政府很快能遏抑物價，並以生活自動津貼補償工人，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白，改善經濟局面的真正關鍵在於重整生產，使產量增加，成本下降：「首先，須在全國理清稅務問題，讓企業得以運轉。工會組織和自管委員會須安排把受薪者移到生產綫上去。這須增加調任者的工資，好讓他們從辦公室調到生產綫而即享其利。

此舉可消除官僚作風。」

「舉例說，在生產綫上，目前所有工人須就每項工作取得工作證。如此，開工前便須待督察判斷每項工作所需的工時，之後又須填妥由技術人員提供的工作證，填妥後交由會計轉主管。有時一天便要填上50份這類證件。到月

底時，便需一整旅文員去計算工資。」

「假如能夠消除這套層層督導程序，則每個工人都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生產。如此，數以百計從事這類無用的檢查工作的人力，便可轉移到缺乏人手的生產綫上。這只是一個例子，其他更不勝枚舉。這樣改變生產安排，全國上下，當可藉取消官僚耗費而釋放龐大的生產力。在全國的範圍內，存在着太多無用的階梯、部門和架構。就在這裏，地方的自管組織可以進行這項精簡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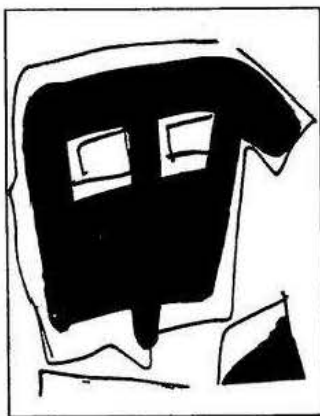
寶勒廠的領導人說，生產的缺乏組織性，並不能夠解釋日常消費品尤其是香烟的短缺。他們轉述店舖門前輪候的人龍的想法，而他們亦有同感：「恐怕很多產品藏在店舖內，正如一九八五年，那辭職兩個月後還當權的拉科夫斯基（Rakowski）政府，蓄意囤積貨物來令形勢惡化。」

「要重新團結團結工會」

我問他們是否可能發展一九八一開始的，由工會和社會來監察分配的制度，他們卻懷疑其可能性。卡拉卡說：「我們今天處在另一個轉變階段。今天這樣的監察，應由我們的政府、官員和議員負責。人們的意識提高了。大家了解到已授權某些人去做這些工作。另一方面，我們在基層的任務，則是重整工會架構，吸納至少五至六成工人。」

「進行這些工作時，我們需要工會內的團結，結束激進派與溫和派、新舊領導之間的紛爭。因為，這樣的分歧，使工會內繼續存在互不信任，令工人怕了入會。」

「今天，我們需要重新團結團結工會和即將舉行的工會大會，而我們肯定可以辦得到。」★



呼籲杯葛選舉

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

自從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架構成立以來，國會和國民議會被用來確認共產黨獨攬大權的合法性。至於其他非共黨組織，只不過是粉飾民主的工具。

按「圓桌會議」的結果，某些反對派會參與將舉行的選舉。選舉的功能和以前沒有分別；反對派的角色是幫助共產黨的政權獲得新合法性。只佔35%少數席位的新國會成員，由於人數有限，兼且意見紛紜，面對着重大問題上採取集體投票的所謂聯盟（共黨及其附

庸），作用將非常有限。

「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號召杯葛國會及參議院的選舉，理由如下：

（一）民主不可以經由百分率來獲得。是有民主的話，我們選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若沒有民主，唯有就是杯葛。只佔35%議席的反對派，足以令這齣選舉鬧劇有合法性，但不足以左右國家的命運；

（二）設立權力有限而範圍不明確的參議院，不能夠改變國會的力量關

係。這種落伍的制度，和現代憲制不可相提並論。我們要求廢除參議院，恢復「自管共和國」和設立「自管議院」直接代表工人的利益；

（三）「圓桌會議」決定設立「總統辦工室」，以保證現有制度的延續性。這個總統不會由選民選出，而是由被「波蘭統一工人黨」（波共）控制的國會所選。新設的機構有解散國會、實施軍法統治及更改法律的彈性權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於華沙★

團結工會維持反對派位置更有利

訪地區交通工人團結工會領導

八九年十二月下旬，《十月評論》記者在波蘭弗羅茨瓦夫市訪問該地區交通工人團結工會主席及書記，了解波蘭現在的社會和工會狀況。雖然透過繙譯，但訪問氣氛活潑友好，兩個幹事的不同意見也不時表現出來。這個工會是該地區的最重要的工會之一，而整個弗羅茨瓦夫地區又是佔團結工會最多會員比例的地區。因此，他們的意見，對局勢的評價和反應，應該能反映不少基層工會的情況，特別是團結工會政府上台後，工人和工會對政治和社會發展的矛盾反應。

□記者 ■主席 ○書記

□：波蘭今天的狀況如何？

■：現在有更大民主，工人能夠自己決定。經濟方面是困難的，沒有很多物品供應。四十五年的共黨統治摧毀了工業。對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有強大的支持。

○：軍法統治分裂了我們社會，現在對怎樣做，有不同的意見。社會已很疲倦和哀傷，希望立刻有大的改變。

團結工會維持反對派位置更有利

□：團結工會政府之下的生活水準如何？

■：不是有太大的改變。我們希望照顧社會公義，我們希望控制工資，與管理當局合作，希望在廠內就工資達成協議，並向政府揭發貪污等。

○：我們希望積極保衛工資。

□：聽說一些物價近月來升了五倍，人們沒能力買？

■：這是真的，但食物價格現已比較穩定。國家的壟斷對價格有很大影響，出現巨大通貨膨脹，狂脹。我們明白要承擔危機的後果，所以我們工會處境很困難，我們要接受社會的困苦。

□：工人是否接受這個情況呢？

○：不太接受，要看是什麼工人。

■：人們見不到其他選擇。

□：聽說共黨官方工會口口聲聲保衛工人，對抗政府，擺出很高的姿態？

■：這是真的，他們在反對派的位置更為有利。

○：今天我們有過討論，開始覺得團結工會犯了大錯。作為工會，還是在反對派的位置更好。

■：團結工會是一個工會。作為團結工會政府並不妙，因為我們不能保衛工人，而要與政府合作。有時候我們不能支持工人的要求。團結工會夾在社會需要與政府的要求之間。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有罷工和社會更積極地活動，出現街壘的情況，到時團結工會將會被迫選擇站在那一邊，可能要站在與政府對立的一方。我會站在人民的一邊。

■：我們嘗試向人民解釋要等待。但即使在地區團結工會內，也有兩種意見。

工人感到迷惘

□：工人對這個政府的感覺如何？對政府的改革呢？

■：對政府是支持的，但感覺是矛盾、混亂的。

○：團結工會的人對馬佐維斯基政府仍有信任，但反對政府高層官員，例如總統雅魯澤斯基將軍；他們憎恨軍法統治和危機。

□：全國一千三百多萬工人之中，團結工會會員人數只有二百七十萬，很多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為什麼呢？波共工會聲稱擁有數百萬會員，是真的嗎？

■：我們不同意波共工會自稱的數字。在我們單位內，約有二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其他都加入團結工會。他們大概在等待和觀察團結工會，但我相信他們是同情的。我覺得整個社會同意需要立刻改革，我們覺醒到改革會帶來一些影響。那些要為生活掙扎的人發覺改革很可怕，這種人大概佔很大比例，特別是老人和單身母親。社會上大約30%

人生活困苦，另外30%人很窮，6%富有，其他則在中間。

□：社會有沒有開始反抗或出現工業行動？

■：目前沒有罷工或抗議。但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在一些工廠會出現，而政府可能會派國會議員去勸止罷工。我覺得政府應該運用社會對它的支持和信任，但這段社會信任時期可能很快便完結。

□：工會怎樣幫助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幫助那些被工廠解僱的人，提供轉業援助、食物、醫療等。工廠將收入的2%撥為援助基金。

□：聽說今天的報章刊登了政府的計劃，未來幾年會造成40%的失業率；你們有什麼反應？

■：我們嘗試解決這個問題，計劃提早退休和退休金等。較早時候，華里沙要求政府有特別權力推行改革〔按：即不需受國會限制〕，我們地區委員會反對，並作出公開聲明，反對華里沙的聲明，指出他沒有諮詢工會運動。我們是第一個這樣發聲的，而我們的地區是全波蘭團結工會會員方面最強大的；弗羅茨瓦夫；然後是卡托維茲；華沙是很弱的。

□：團結工會是從罷工運動中誕生的，今天它對罷工的態度怎樣？

○：罷工是最有力的工具，但如果取不到效果，便不好。

■：即使在今天，仍有罷工反對官僚。它要長時間來改變；現在仍有數以噸計的文件，政府仍是很複雜、很難改變。

團結工會須從頭做起

□：在八一年時，積極罷工（即是繼續生產，但由工人控制生產和產品處理等）的意見曾廣泛提了出來，現在的情況如何？

■：積極罷工的構想仍然存在。工業是這樣破落，必須要改變。在我們的

單位，設備的情況可怕，沒有新技術；人們的社會活動並不大。

○：我們很需要新的想法。到目前為止，只是進行消極或佔領廠房式罷工。

□：團結工會內部民主的情況怎樣？

■：今天，沒可能有徹底民主，情

況與八〇年很不同，我們今天有一個民主國家，但我們要上很多課，社會才明白民主。

□：團結工會會在最近將來召開全國大會嗎？

■：不會。因為首先我們要選舉代表，然後才舉行全國大會。現在的困難在於活動分子，有些曾被捕，有些加入

了政府。也許明年秋天才會開大會。在地區內的基層組織工作很忙。在工會合法化後，工會從下面開始組織。在地下時期，團結工會領導層不是被選的，不是民主的。因此，需要長時間來重組工會。

○：我們必須學習從頭做起，情況與以往不同。 ★



向中國民主戰士致意 法西紐克

團結工會弗羅茨瓦夫地區委員會領袖法西紐克向爭取中國民主的戰士，特別是學生和工人致意！

〔《十月評論》特約記者在參觀弗羅茨瓦夫團結工會地區總部時，遇到著名工會領袖法西紐克。他雖然沒有時間接受訪問，但仍作出上述致意聲明〕 ★

新政府應該保衛工人利益

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

馬佐維斯基被委任為波蘭人民共和國總理，這事本身反映了統治的官僚制度陷入更深危機。

今日出現這個社會經濟現象，根源是1980年8月團結工會建立，獨立於工人運動的官僚架構。雅魯澤斯基政權8年來力圖窒息社會的自我組織，但結果以失敗告終。

但馬佐維斯基政府雖獲委任，却不表示社會整體來說取得了政權。新政府建立的基礎，是32%的民主，而且它保證了不會擾亂一直以來存在的制度的根基。權力的根本架構——總統職位、內政部和國防部、波蘭國家銀行——都不僅不由社會控制，而且不由總理控制。新總理所代表的反對派領袖們，同意了上述條件；他們並沒有充份利用因罷工和波共破產而造成的大好機會。

不過，新政府的成立，却也提供了一些可能性，讓社會的期望得以滿足。這些期望可列舉如下：

(一) 摧毀專制政府的所有殘餘部份；解散國家支配社會的機制，特別是解散保安警察、防暴警察、秘密警察，同時改革刑法，目標是保障各種民主自由。

這就意味同時摧毀波共的特權地位，包括所有與它有關聯的組織（民主黨、農民黨、社會主義青年聯盟，等）的特權地位。所有在政府或經濟上執行領導功能的人都應由選舉產生。所有地方政府應該由自由的、平等的、按人口比例的秘密投票直接選舉產生。

政治和社會活動的自由應受保障。這就是說，不應限制罷工自由或成立工會的自由。包括警察和軍隊也應享有這種自由。這是1980年格但斯克的廠際罷工委員會提出的廿一點要求的第二點所規定的：「保障罷工權利和罷工者及協助罷工者的安全。」

根據第七點要求，「所有罷工者在罷工期間能取得工資，相等於病假工資。」

政黨的活動，是現代民主的基礎，也是社會客觀性的條件，不應在法律上加以限制。

要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應消除新聞檢查，並摧毀這個方面壟斷權力的物質和法律基礎。特別是新聞散發系統應讓所有政治、社會、文化組織可以使用。電台和電視應在適當平面由有代表性的組織主管，並保證所有政治組織能使用它們。

(二) 經濟應從屬於社會需要，目標是建立一個現代的、廿一世紀的經濟，保證社會所有成員享有滿意的

生活條件，亦即最低限度有權享有有營養的食物、舒適的居所、全面的健康醫療服務、全民享有的社會服務（例如托兒所、教育、文化）。

要能實現這些目標，不可或缺的條件是令經濟掌握在生產者手上。只有這個社會生活的模式，才能保證每個人有可能實現自我，才能保證社會有可能解救。華哥夫斯基政府到最後一刻為止，仍只是追隨前任者的步履，其政策將波蘭經濟導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華哥夫斯基政府之下，官僚架構掠奪資源的機會更為增加，投機性的、腐敗的資本有機會發展，也製造了機會讓國有的生產資料賣給外國資本。更甚的是，它容許了在嚴重食物短缺的情形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令食品價格大幅上升。它繼續將官僚化的經濟聯系於市場機制，於是令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處境更壞。馬佐維斯基政府應徹底脫離以往政府的策略。

(三) 關於實行計劃、自管和市場的問題。應該意識到，經濟如何發展，首先要由工人自己決定。只有通過工人自我組織起來，由他們自己採取主動，才有可能克服舊的黨、國機器的反抗。也只有這樣，新政府才有可能推行有利於工人的改革。

根據團結工會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綱領第一點：「我們要求在管理的每個平面都實行自管的、民主的改革，我們要求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將計劃、自管和市場結合起來……社會企業應該是經濟中的基本組織單位，應由工人代表會議控制，作為工人力量的代表。廠長應負責行政性工作，應由代表會議在多個候選人競爭下委任，代表會議也有權罷免他……改革應令計劃得以社會化。」

要進行這樣的改革，需要工人、農民、手工藝者的自管組織能對生產施以社會控制。這些組織應在地區平面和全國平面的自管議會內集中起來。這些控制需要以下幾個條件：

• 保證所有自管組織、工會及其他代表不同所有制下的工人的機構，能夠在活動上享有同等的機會；同時，應有一個統一的法律制度，規定有關生產、僱聘、貿易、工作條件、工資等問題。

• 企業內的工作關係應該變革，朝向勞動的解放，尤其是要限制監管人員的數目，並保證他們由選舉產生。

• 經濟資料應該讓公眾可以取得。社會如要走向

完全負責對經濟的管理，不可或缺的就是工人能控制生產的手段和生產的目的。這包括要監管生產，要有監管自管機構和自管議會之間的合作性聯繫（包括要有關於企業狀況和經濟狀況的報告）。這樣，才可能讓全國進行民主討論，制訂經濟剩餘如何由中央分配的原則，及如何不斷地滿足社會所表達的需要。

如果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未達到某一充裕的程度，未可以滿足對某些指定產品的需求，那麼，是不可能消滅分配平面的市場機制的運用的。但是，在匱乏的情況下，關於使用自由市場機制這個問題，應該讓全社會在意識到本身需求的情況下根據其意願作出決定。

四關於工人如何保衛自己不受危機的後果所影響的問題。當前經濟危機的痛苦，令到工人要採取自衛行動：

- 工人控制物價。團結工會的地區性組織，應聯同產業及服務工會的有關委員會及其他組織，向公眾提交每周生活指數上漲的報告，並在這個基礎上要求實行每周生活費用津貼。政府應決議採取措施，堅決遏止物價上漲。

- 社會控制食品的分配。根據團結工會1981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第七條，當食品出現嚴重短缺時，團結工會的基層組織應該「成立全國性的網絡，統籌工會的市場及食品委員會，以便集中地與團結農會的組織聯絡和合作。」

馬佐維斯基政府應承認這些委員會，不管各類庫存的消費品控制在誰的手上，這些委員會也應該有權處理由內政部和國防部控制的消費品庫存。

- 賦與工作真正的價值。以往的政府已開始將國內市場的價格與世界市場的價格聯繫起來。勞動在全部生產成本中所佔的部分，被減至最低限度。馬佐維斯基政府應與團結工會協議，實行工資制度的徹底改革，首先是將勞動成本在全部生產成本中所佔的比重，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

- 就業權利。根據團結工會1981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第九條：「我們支持全民有就業權，反對失業……在預計會有裁員的企業內，工廠委員會應該審議能否將企業內的僱員調職，安排他們有其他職業，又或在不減工資的情況下減少工時。」

正如西歐的工會所要求的一樣，我們要求每週工作35小時。

- 取銷債務。正如總理向國會演說時所正確指出的：「經濟陷於嚴重外債中。」

自1971年以來，外債總共借了490億美元，其中390億美元有待償還。我們社會不應對歷次官僚政府的浪費措施引致的債務負責。

- 完全的經濟和政治自主權。我們應該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條件，這些條件如果實行，必然導致波蘭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同時令波蘭的經濟政策從屬於外國資本之下。此外，波蘭作為華沙公約國和經互會成員而簽訂的軍事和經濟協議，有限制自主權的，都應加以修改。

四關於自管共和國。根據團結工會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我們要求管理制度和經濟能真正社會化，因此我們目的是建立一個自管的波蘭。」

- 代表機構須自由選舉。憲法必須能表達社會的自覺的自由意願。新政府應該宣布立法議會由自由選舉產生。這些選舉應該是自由的、平等的、秘密投票的、直接的、全民普選的。尤其要注意的是要保證所有候選人能取得同等的物質條件，以進行競選活動。

- 關於政府。要走向自管共和國，就需要完全解散官僚當局。只有一個自我組織的工人運動才能完成這個任務。這個運動由軍事戒嚴和地下活動的經驗所豐富，它應該鬥爭，在工廠和地區及全國平面爭取掌管權力。

（英譯本由「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在英國的國際辦公處提供，載於《社會主義前景》1989年10月號）

★

官僚仍然控制政權

訪問「社義黨—民主革命」領袖平里奧

〈十月評論〉記者朗月

平里奧是團結工會運動之中一位傳奇領袖，在八一年軍管前夕及時提取大量工會存款，為其後的地下運動提供必需的經費。他是地下工會主要領袖之一，曾多次被捕入獄。現時為「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PPS-RD)的主要領袖之一。在目前團結工會基層普遍出現混亂和尋求出路的時候，一些基層工會開始向這個明晰提出保衛工人權益、建立工人自治和恢復團結工會八〇—八一年優良民主傳統及綱領的「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接觸，交換意見。在十二月下旬這次訪問中，平里奧提出簡單精闢的分析，對了解波蘭團結工會的發展、新政府的政策、波共官僚的主觀企圖和波蘭社會前景很有幫助。

□訪問者 ■被訪者

□：團結工會的發展特點是什麼？

■：八〇至八一年的團結工會是一個工人的運動，從總罷工之中誕生，很具革命性，與官僚完全決裂，從官僚的控制之中掙脫出來。革命發展的動力，在軍管前夕，達到雙重政權的情況。軍管鎮壓了工廠內大部分的工人委員會，令工會領導層從基層孤立起來，逐漸割斷了它在工人階級中的根基。八八年的罷工運動爭取工會多元化和成功組織了新的政治覺醒，例如我們組織的成立，但未足以掙脫團結工會領導層的控制。在八〇年，團結工會是一個很純粹的工人運動，例如華里沙。但其後出現新的因素，團結工會演變成一個傳統的工人運動，有一個傳統的改良主義領導層，成功地重新由上而下地建立團結工會架構。他們對自由市場改革和一個「有人性面貌的資本主義」抱有很大的幻想。西方的意識形態影響和主要來自西方工會的物質援助起了很大影響。

華里沙領導層現在組織工人，這是好的，但他們灌輸虛假的意識形態，造成很大的幻想。團結工會現在比八一年弱了很多，在一千三百多萬工人之中，只有二百五十萬會員，而八一年則接近

一千萬會員。

□：圓桌協議和新政府的政策是什麼？有什麼影響？

■：八九年四月的圓桌協議，是官僚、團結工會領導層和教會的歷史性妥協，同意推行市場改革和某種形式的專制國家，有某程度的自由化，但不會推翻官僚層。馬佐維斯基取得政府但沒取得政權。政府的經濟政策想推行一種私有化，向世界開放出售企業，引進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後果會不利於社會大部分人的利益。我們認為工人將會保衛自己，反抗這個計劃，反抗失業和貧困。

也許可以說，現在企圖實施新的剝削技巧，某種市場斯大林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復辟，整個制度的性質會照舊，官僚仍會控制國家機器、軍隊；而最根本的，是控制工業和整個經濟命脈。新的剝削技巧，例如包括：將企業組織由官僚組成的公司，表面上改為工廠的私人擁有者；斯大林主義官僚控制下的市場；等等。西方資本家要透過官僚購買波蘭工業或成立合資企業。官僚的面貌也有些改變，成為股東、私人企業等。由於接近西歐，私有化的過程在波蘭可能更為明顯。

蘇聯戈爾巴喬夫官僚層向資本主義式改革開放，應該會對改革的計劃和限度心中有數，更有第三世界的發展教訓作參考。官僚對恢復資本主義不會有興趣，也只有赤裸裸的權力問題，不談意識形態。帝國主義則對東歐沒有一個戰略性的計劃，只能照搬它們在第三世界施行的模式。

□：官僚的戰略計劃是什麼？

■：官僚的計劃是令反對派和團結工會聲譽掃地，工人沮喪消極，然後重新控制。這個情況現在已很清楚，在這樣短的期間內，政權能夠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實行這樣大的攻擊。一些人民已在說「斯大林主義時期比現在更好！」工人以前憎恨雅魯澤斯基，現在憎恨勞工部長庫倫[他是著名的反對

派知識分子，團結工會誕生前已在「社會自衛委員會」內活躍。此外，記者在街頭的牆上也見到「殺死雅魯澤斯基和華里沙」的標語。據說，法西斯主義和反猶太種族主義的言論也開始流行)。

波共工會官僚現在仍然存在和很活躍宣傳，號召罷工，聲言要保衛工人的權益，利用工人對政府政策的反抗為自己增加政治利益。波蘭農村更會成為官僚反革命的基地。波蘭農村的官僚權力很大，包括在農民組織內的官僚，構成一個巨大的官僚層，控制了農產品和生產資料買賣、機器維修等。團結農會的政治力量也很弱。

□：前景是怎樣？

■：從九〇年一月開始，政府會實施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第一期計劃，包括加價、壓抑工資、將大工廠賤賣給西方等。在很短的期間內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失業；政府的計劃談到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會失業。新一輪罷工浪潮不會是太遠的事，工人會起來反抗。馬佐維斯基的經濟政策沒有前途。

我們是工人階級的一股新力量，提供一個新出路。我們提出的過渡綱領包括：

1. 反對政府擁有超越國會的特殊權力以推行經濟改革；
2. 反對修改法律限制工會發動罷工和舉行支援性罷工的權利；
3. 在所有工廠籌備積極罷工；
4. 爭取開放民主、政治自由；
5. 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計劃。

我們的綱領很有機會得到工人認同和發展成爲一個羣眾政黨。

後記：九〇年一月開始，波蘭政府實施了新一輪緊縮政策，管制工資，大幅增加物價，例如家用煤加六倍，電費加五倍，交通費加二倍半，麪包和肉類加接近一倍。一月中，南部煤礦的三萬五千名礦工進行了幾天的罷工，卡托維茲附近兩個煤礦的六千名礦工也罷工。另外，政府和西方媒介大力宣傳的美國波蘭裔富人購買格但斯克列寧船廠一事，因為船廠工人反對低工資和五年不准罷工的限制而告失敗。波蘭政府和工會領導層渴求的大量西方援助，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離要求的一百億美元差很遠。★

波蘭新左派的分裂和重組

「社義黨—民主革命」誕生的經過

平里奧

〔《國際觀點》記者於一九八九年年初訪問了「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的平里奧（J. Pinior），他就該黨的發展作了以下談話〕

「波蘭社會主義黨」是因應波蘭社會發展的特別時刻，以及波蘭社會內在矛盾的激化而產生。

斯大林主義者在戰爭爆發之初奪取政權，是有革命進步的一面，主要表現在它消除了資產階級特權及封建殘餘，並且帶來了大規模的社會動員。但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卻被一羣以政治及軍事力量為支柱的官僚階層所操縱。

反資本主義的變革並非單純為上層策動的產物。它反映了波蘭羣眾的渴求，這種渴求在反法西斯鬥爭中表現得很明顯。因此，社會上一部分人認同新的制度。但是，由於政權破壞了這個市民社會，傳統上對進步的左派及保守的右派的劃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在各個個體被孤立的社會裏，唯一辨別的方法就是看他們對現政權抱着怎樣的立場。

通過一九五六、七〇、七六、八〇年工人階級的鬥爭，反官僚的覺醒也形成了。市民社會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存在是與國家分離的。

覺醒形成過程的高潮是八〇年團結工會出現的時候。團結工會是一個工會，但同時也是全國性反極權主義的社會運動。當時，波共喪失了所有的合法性，被視為弄權的政黨。

官僚政權企圖藉八一年的軍事政變武力解決問題。但很快它就發覺需要用政治手段來控制社會。波蘭社會在爭取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兩次歷史性的勝利；它不會輕易讓成果被掠奪去，除非政權不惜重施故技，採取斯大林的大規模的鎮壓手段。

典型的權威主義機制

那兩次的勝利打破了官僚階層對資

訊及組織的壟斷。一種新的公眾生活開始形成。在社會走向解放的過程中，不同利益階層的存在也顯而易見。這樣，在波蘭的政治上，左、右派之分也重新出現，儘管新的內容還未公布出來。

官僚領導層也意識到它必須進行改革使經濟運行得更有效，從而保存其權力。我們認為，政權試圖利用古典的資本主義機制，加強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政治控制。因此，我們看到了官僚階層的資產階級化的過程。

他們希望利用古典形態的資本來鞏固權力。在這個範疇下，波蘭的官僚政權推銷一個社會發展的權威模式。為了要取得成功，它絕對需要某些合法性。而推行自由化就反映了它要取得合法性的企圖。從這個角度來看，波共中央委員會最近採取的立場是有其特性的。它涉及工會及政治的多元化但卻非政治民主，做法是並不開明的君主被迫向人民作出讓步。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主要分歧的地方是，一方面的人要求摒棄極權制度，走向社會權威模式；另一方面的人要求徹底的政治民主。

除了天主教教會之外，反對派內一個通常被稱為「影子內閣」的部分，主張這個權威性模式。他們包括團結工會中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顧問，以及一些負有名望的工會領導人，諸如華里沙、保澤克（Bujak）及法西紐克。

這些人認為由於地緣政治的限制，再沒有什麼比權威性模式還好的了，因此人們必須接受可行的選擇。此外，他們相信自由企業是最有效的經濟模式，因此準備接受它的社會邏輯結果。他們完全忘記了當團結工會仍合法時曾經清楚提出了自管的出路。在他們眼中，自管是烏托邦。

反對派力量的每一部分則拒絕接受權威性模式，建議由下而上直接民

主的社會解放模式。這正是目前在很多工廠內團結工會組織所持的立場。他們主張合法的工會組織，但並不能以從屬於政權為代價。基本的自發性的自管意識正是在這層面產生。

各種左派再次在波蘭出現

在這個流派之中，包括有新左派，他們主要團聚在我們的「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之內。其中也有無政府主義（他們曾經在八八年十月示威抗議中美洲受干預），以及激進的和平主義者。

在反對派力量當中，也有一些不自稱為左派的組織，但他們要求徹底的政治民主，這與左派所提出的要求相類似。例如有「戰鬥團結工會」，它的意識形態並非是右派也並非是左派，而他們也不想自我界定。但當與他們討論到假如官僚政權把工廠關閉時我們應怎麼辦，他們的答案是：「進行積極罷工。」

這顯示他們是我們的同道人。

「波蘭社會主義黨」之所以誕生，是因為人們對官僚政權推行的計劃所帶來的後果有所警覺。這個覺醒在各波蘭反對派內獨立地出現。一九八七年夏天，弗羅茨瓦夫的團結工會及「自由及和平運動」接觸在華沙出版《工人報》的組織，大家對當時形勢作了相似的評估，並且得出一個共同結論，就是要為波蘭反對力量的年青一代提供左派的選擇。

我們可以作出選擇：或是在團結工會內建立一個左派，或是在團結工會以外建立一個左派政治組織。我們選擇了後者，因為沒有人可以在團結工會內實行意識壟斷。這種左派的出路不能夠在工會架構內自我界定，不過，我們並沒有放棄工會鬥爭。

我們在團結工會內的工作，是要為真正的工會鬥爭而努力，是要為建立真正保衛工人的工會組織而努力。

「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並非要組織一個反對華里沙的陣營。這是團結工會本身發展的一個過程，在過程當中，我們的成員及他們提出的主張能夠發揮影響力。重要的是，不是由黨員推動鬥爭，而是由工會推動鬥爭。

因此，我們的意念是很清晰的，我們需要在團結工會以外提供一個明晰的政治選擇，而在工會內則努力在企業架構內建立真正能衛護工人的工會組織。直至當時為止，在波蘭並沒有一種力量清晰地自我界定為左派，我們希望這個政治舞台能夠兼容並包，團聚左派、社會民主派、革命左派、無政府主義者。

左派的廣泛重組

從一開始，我們的目的是使左派廣泛地再次組合起來。有人認為這種模糊不清的政治組合是表面的，很容易會在內部不同利益的壓力下趨於分裂。我們認為這個看法不對。

我們曾經對我們稱之為「舊左派」的人抱有希望——後來我們的希望幻滅。這些舊左派包括有庫倫(Kuron)、麥堅力(Michnik)、列斯基(Lipski)。有一段長時間，我與庫倫的立場非常接近。我仍認為他是《給波共的一封公開信》的作者（是左派從五〇年代的經驗寫成的批評斯大林主義的信件）。至於列斯基對「波蘭社會主義黨」方案的支持，我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們之間很快便出現基本的分歧。

分歧出現於八七年十一月「波蘭社會主義黨」創立時發表的第一次政治聲明當中（見另文）。文件某些部分不為弗市組織及華沙的《工人報》組織所接受。文件性質含糊，而且不幸地，它說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的教義比起馬克思主義更為民所接受；它又過於空泛，沒有界定黨活動的範圍。不過，我們並沒有堅持反對，因為我們從開始時就認為左派的團結較堅持這些不同點更為重要。我們認為我們的實踐會決定我們的綱領。但很快，我們就發現列斯基的實踐與我們是背道而馳的，明顯的例子就是八八年二月一日的物價大幅上揚事件。

我們就該政策立即作出反應，發表聲明，指出工人在這情況下有權發動罷

工。但其他的反對力量，包括列斯基，卻認為罷工並非對我們有利。

我們並不僅是言論上呼籲罷工，我們更付諸行動。就因為這樣，我們就與工會正式架構公開衝突，而列斯基這時則辭職，並對我們大加指摘。

激進流派活躍於罷工行動

八八年二月「波蘭社會主義黨」的分裂，幾乎令企圖在波蘭建立政治左派的努力付諸東流。不僅列斯基及他的朋友脫離我們，就是相當一部分地區性的社會主義組織也出現混亂情況而採取觀望的態度。他們不明白辯論的焦點和意義，也拒絕參加任何一方。

情況本來無望，但五月到來，連串罷工爆發了。明顯地，「波蘭社會主義黨」的激進流派在工廠內、在罷工中。工廠及街頭行動再一次決定了波蘭的形勢。於是，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在波蘭存在兩個社會主義組織，是較為健康的，而我們也希望列斯基的組織所選擇的鬥爭場所能夠取得成功。對我們來說，在一個社會主義名詞完全被斯大林主義者破壞的社會裏，列斯基他們選擇社會主義方向是重要的。

我們的意識形態及我們的綱領是從我們的工會、自管、反軍事化、反主流文化活動等散發出來。我們認為，在一些西方流行的政治流派，例如社會民主派、托洛茨基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在某程度上不能套用在波蘭。

假如真正的左派的出路出現於東歐，它還將有新的內容；而西方的左派思想也肯定會注入其中。不過，它將會是本國反官僚政權鬥爭經驗的成果。

一九八八年「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站在工人鬥爭的前列。罷工之後，我們並沒有坐在圓桌會議上；我們在弗市及華沙組織街頭示威。在過程中，我們當然尋求與其他組織團結，在弗市，我們與「戰鬥團結工會」一起鬥爭；在華沙，我們與「團結工會國際工人委員會」一起，我們採取主動，其他組織則參與我們。

「我們的呼籲獲得群眾反應」

十二月十三日的示威顯示我們向社會作出的呼籲獲得群眾的反應。約一萬五千名市民走上弗市街頭。這是一個壯

會力量。

我們的實踐使我們能夠制訂出我們稱之為「民主革命」（見另文）的政治綱領，但我們也清楚知道其不足之處。不過，我們認為這綱領應是開放的，使我們在日後所取得的經驗能融匯其中。這正是為何我們的黨內有不同部分，例如「革命左派」（NLR）是認同古典托洛茨基主義；另一派是我們黨內佔主導地位的「新左派」，它的基地是弗市。

還有另一派（我不知道如何稱他們），稱自己承繼戰前「波蘭社會主義黨」的歷史；戰前這個黨經常表現得很左，在工人階級運動歷史上譜寫了一些重要篇章。

這個流派的歷史領導人是保什克(Puzak)，他死於斯大林主義者的監獄內，而舊的「波蘭社會主義黨」從不屈服於斯大林主義。新一代追隨着這個傳統，堅持要保存這個象徵，不過，他們並非是社會民主派，因為他們不想去理解官僚政權。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列斯基就沒有共同的地方。此外，黨還包容了各方面的流派，例如有以反主流文化為出發點的，也有無政府主義流派，等等。

目前，「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是在全國範圍各社會主義組織中實力最強的。我們活躍於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卡托維茲、盧布林、普沃茨克、普熱梅希爾、什切青、華沙、弗羅茨瓦夫等。

假如「影子內閣」繼續協助官僚政權的資產階級化取得合法性，不久將來，波蘭社會將會在反對力量當中尋求出路。那麼，左派反對派將自然成為可選擇的出路，因為那些不願再被愚弄的人民將會起來反對官僚政權及替官僚政權取得合法性的「影子內閣」。

我們正努力於創建這個出路。當前，我們力量仍然很小。社會上有很多人仍寄望於華里沙及教廷。但在我們的陣營內，主力是年青工人、大學生及中學生。★

波蘭社會主義黨政治聲明

(節錄)

波蘭社會主義黨於九十五年前成立。此黨以組織波蘭人爭取獨立及社會公義為目的，在波蘭人受盡勞役之時，積極參與了爭取波蘭獨立的武裝行動。第一次大戰結束初期，工人藉着波蘭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爭取到對進步的社會權利之法律。另外，此黨又協同農民運動反對各種極權傾向。二次大戰時，波蘭社會主義黨反對德俄兩國侵略，爭取自由、平等、獨立。

共產黨在四十年前摧毀社會主義民

主運動；很多社會主義黨領袖死於波蘭及蘇聯獄中，或長期囚在監獄。但是，波蘭社會主義黨仍努力避免從歷史上和社會意識中消失……。今天值巴黎會議建會周年紀念，我們全心秉承波蘭社會主義黨的傳統，更新聯繫，重建本黨。我們正在建立按憲法所容 公開和合法的黨。此黨的合法存在權利，也來自得到〔波蘭〕人民共和國官方認可的國際司法原則。

我們的綱領，亦是據現實情況，為

能適應局勢變化而更訂。我們不願有硬性教條，也不要宥於任何哲學思想；然而我們不掩飾我們更接近天主教教會的社會教導，特別是約翰保祿二世的教導，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必只是個人興趣及專業團體的領域，而不是政治黨派的領域。宗教信仰是個人的事，波蘭社會主義黨不會在這方面干涉會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政治宣言

波蘭社會主義黨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這個詞被共產黨人亂用，在波蘭社會並不受歡迎，人們把它與政權等同起來。我們尋求通過我們的努力、鬥爭和創造性的思考，重新賦予這個詞本來的意義和與它有關的價值取向。波蘭社會在幾個場合已表示支持這些價值取向——令人類成為社會的主體而非客體，令勞動者享有尊嚴，令國家享有獨立。波蘭工人在一九八〇年八月的鐵起鬥爭中也是這樣做。一九八〇年八月至八一年十二月獨立力量的活動中也有這些價值取向，並且表現在團結工會第一次全國大會通過的《自管共和國綱領》中，波蘭的社會主義

者在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反對力量組織內為自由、民主、社會公義而戰。

我們現在成立波蘭社會主義黨的時候，統治者剛宣布決心重整經濟，令社會民主化。可是，儘管當局提出的經濟綱領包括了反對力量和一批獨立知識分子早一段時期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但它的整體結構是不穩的，特別是，它威脅大多數工人的權益。在這個情況下，關鍵問題是獨立運動要爭取在本國政治生活中發揮真正的影響力。我們認為現在有可能進行真正的政治活動，反對政權。……

我們不會忽略政治現實（這個政治

現實可以而且必須改變），我們打算影響波蘭權力運轉的方式。我們的方法是推動和發展民主變革，組織社會對政府部門行為的監察，支持復興的工會運動並與它緊密合作。我們會為尊重人權而鬥爭，尤其是尊重人們有權生活在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裏，可自由結社，政治上是多元化的……

我們呼籲所有認同民主左派理想的波蘭人，加入波蘭社會主義黨的行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通過★

行動綱領

波蘭社會主義黨

波蘭社會主義黨的總評議會邀請黨的所有架構開始討論綱領。爲了這個目的，總評議會提交以下草案，供黨員和同情者討論，呼籲他們作出評價、修改和對案，希望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討論。

1—波蘭社會主義黨成立的目的，是要從事保衛社會上受壓迫的人民，導致工人的經濟和政治解放，結束勞動力的被剝削。要達到這個目的，只能是從黨官僚手上取回工人勞動的成果和生產物品的物質資料工具，交回工人手上。

波蘭社會主義黨認爲，要令波蘭經濟恢復正常，工人必須重新支配這些物料，並建立制度性的、政治性的保障。爲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現組成一個按國際規範來說是公開的、合法的政黨，因爲在波蘭人民共和國並無這類法律規範。

這個黨將尋求改變波蘭的憲法和司法秩序，取消與民主社會主義傳統相悖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支配權或任何黨的領導角色。我們知道，要達到上述目標，有可能要與波蘭現時的權力架構和司法制度發生公開的衝突，因爲它們是專爲保障現政權的利益而設的。共產黨人對波蘭的管治權力，不是來自社會的願望，而是由一個外國政權強加的。由於社會應有自由選擇它認爲合適的思想制度，因此它可以採取抗法行動的方法。

2—有鑑於經濟危機惡化，而統治者的政策愈來愈違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利益，工人的自衛權因而是工人的自然權利。抗議形式的力量和暴力，與工人權益所受的侵犯成正比。波蘭社會主義黨不會只限於道義上支持社會要求。本黨的任務是圍繞具體要求參與行動、激勵和組織行動。在目前緊張的社會局勢中，本黨黨員投身在罷工工人行列、在團結工會的組織委員會內、在工人的自管機構內、在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身旁。

3—波蘭社會主義黨認爲一個尤其重要的任務，是支持團結工會的工廠組織。團結工會是爭取工人權益鬥爭中的主要武器。事實上，工會的力量依靠絕大多數波蘭人（他們不是靠利潤或在權力架構中做官來維生，而是靠付出勞動力謀生）能幸福和富裕。所以，我們認爲，如果淡化團結工會的工會性質，將它轉爲一個社會運動或政黨，將會是災難性的。

4—要廢除波蘭的共產黨政權，只有所有東歐陣營國家的民主運動合作才行。在中歐、東歐國家的黨官制度，是靠華沙公約和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內部合作支撐着的。要有效爭取到自由、獨立、公義，就必須協調各國受壓迫人民的鬥爭。各國人民及其獨立組織，是波蘭社會主義黨及其盟友的討論伙伴。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以及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領導層，都試圖用資本主義原始階段的暴戾剝削手段來自救。他們廉價傾銷自然資源，不惜任何代價用廉價勞動力來吸引外資。

5—經過長期的流放後，波蘭社會主義黨已在本國重建。在流放中的波蘭社會主義黨曾是「中、東歐社會主義黨聯盟」的成員。我們希望社會主義政黨能像波蘭社會主義黨一樣，在其他國家重建。波蘭社會主義黨會盡全力支持朝向這個目標的活動。

資本主義世界和共產黨國家之間有巨大的技術差距，相同情況也出現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狀況上。因此，西歐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民主黨所面對的一系列問題，也是波蘭社會主義黨未來要面對的。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能很快理解的，而波蘭社會主義黨以前經常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工作上扮演積極的角色。我們認爲，我們目前可以在社會主義政黨的世界大家庭中找到一席之地。波蘭社會主義黨認爲它可以參與歐洲社會主義政黨對綱領性問題的討論，正如

以往波蘭的社會主義者如列斯高夫斯基 (Niedzialkowski)、徐可斯 (Ciolkosz)、高樂斯 (Gross) 等人對社會主義國際會作出的貢獻一樣。

波蘭社會主義黨總評議會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於華沙★

民主革命

波蘭社會主義黨綱領

當前的意識形態危機，反映了傳統的政治選擇方案在面對一個不人道的、不合理的發展模式時，是多麼無能。現代資本主義爲了克服一連串阻止擴張的障礙，已將經濟發展本身變成目的。

經過了多次技術改革後，人類不是變成主人，而是成爲奴僕。愈來愈多青年人爲此付出代價，要忍受失業和貧困。加上社會受到資訊和文化的控制，使得異化情況、沙文主義、種族主義盛行。

在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即依賴性資本主義國家，上述發展模式帶來的社會代價更無比巨大。經濟上的依賴性帶來政治上的依賴性，出路似乎只有獨裁，或斯大林化。

斯大林主義政權的結果，是人性被戕害、羣衆冷漠、經濟崩潰的罪行。後斯大林主義的獨裁政權爲求存在而尋求新的形式。自由市場的運作結合着黨官權力的維持，使剝削和操縱的機制更鞏固、深化。一方是統治層和它庇護下的致富的層分；另一方是勞動的大多數人民，兩者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無所不在的國家，扮演着所有社會關係的中間協調者角色，試圖在變革過程中掌握主動權。儘管有些思想界人士抱有希望，但是，由上而下的改革不會改變獨裁主義的社會後果。社會大眾要求獨立地進行變革，而不是被人改造。

全球的社會主義者都在爭取勞動者從貧窮、受支配、異化中解放出來。工人運動的經驗顯示，控制工廠和選舉社會政治代表，將引領我們走向一個多部門的經濟制度和建基在國民收入重新分配的社會保障制度。

由於波蘭的國家部門被共產黨的黨官制度支配，因此，有必要令這個部門非政治化，做法是將波共排除出經濟政策和人事政策之外。工廠應該由有關的工人和專業人員經營，由此而發展的另一個制度，將打開文化的新紀元，建立自管和民主的新形式。它將使一個正在

自我解放的社會成爲文化及資訊系統的主人；它將使社會有機會從軍事—工業的複雜架構的控制中解脫出來，重新建立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平衡。

要克服社會主義運動今日存在的危機，就要爲處於各種支配和依賴的社會制度提出一個共同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出路前景。這需要想像力和政治勇氣。

波蘭工人已打破國家對資訊和組織的壟斷。現在已是轉捩點。在佔領工廠的罷工中，工人正自覺成爲工廠的真正主人。在工會意識發展的同時，對政治行動的需要也提出來了。這個運動的衝擊力遭遇後斯大林主義獨裁政權的反抗。由於這個制度無法改良，工人唯一的選擇是提出另一套政府模式。這個模式的目的是使國家得以社會化，在工廠由工人奪取經濟權力，全社會（即生產者和市民的社羣）成立民主代表制。

一九八〇年八月〔團結工會崛起時〕、巴拉索夫〔羅馬尼亞礦工起義〕、卡拉巴克和雅索比的羣衆動員，都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表現——一場民主革命正在我們眼前開展，走出獨裁制度，走向政治民主，走向經濟的社會化，走向獨立。廢除獨裁政權，由工人的意願來廢除，由組織在工廠內、爲了進行有意識的行動的工人獨立運動來廢除。

波蘭社會主義黨在建立這樣的政府模式中扮演積極的角色，目的是解放全社會。爲了這個目的，我們相信有必要採取以下行動：

- 在工廠、地區和全國強化和建立獨立的團結工會；
- 爭取工人代表會在管理中採取主動，爲自管的新的形式而鬥爭；
- 建立縱向和橫向的自管系統；
- 建立工人自管的全國代表機構，形式是國會的「自管議會」；
- 進行宣傳運動，爭取民主選舉國會和地區性議會；
- 爲本國的非軍事化而鬥爭。

上述是使社會成爲自己歷史的主人，導向自由、獨立的波蘭的過程的一部分。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波蘭社會主義黨第一次大會通過★



重建團結工會架構

波蘭社會主義黨

波蘭社會主義黨認為，在目前危機局勢中，當工人生活水平正下降之時，中心的任務應該是重建獨立工會的工廠架構。

為此，我們呼籲波蘭社會主義黨所有黨員和同情者，支持及參加正重建中的團結工會工廠架構。特別是在還未有

工會的企業內建立團結工會籌組委員會。

波蘭社會主義黨認為，凍結團結工會的架構，以等待圓桌會議討論的結果這個做法，是嚴重的錯誤。我們只會取得我們所爭取的東西！

原因是波蘭社會主義黨不承認波蘭

人民共和國由後斯大林主義政府模式的法制根據寫成的憲法，因此波蘭社會主義黨及其黨員不能參與圓桌會議的討論。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革命左派流派」綱領

〔編按：以下文件是「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內部的「革命左派流派」的綱領性文件，在該流派出版的《鼯鼠》（Kret）一九八九年第六一七期刊登〕

《鼯鼠》是「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內部「革命左派流派」出版的刊物。「革命左派流派」的目標是：

□ 通過工人革命，達致工人階級解放，並成為社會的主人。

我們不相信可以由上向下地改革目前的奴役人的制度。

□ 保持工人階級的獨立，不受所有敵對力量的干擾。

我們反對任何人將波蘭工人的利益從屬於統治官僚層、國際資本或是教會架構之下。

□ 通過自管的制度，令生產資料社會化；在自管制度中，橫向及縱向地民主組織起來的工人委員會，既組織本工

廠，也由下而上地計劃全面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

我們反對建基於私有化經濟的改革，它們將波蘭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開放，增加對波蘭勞工的剝削。

□ 實行直接的、人人參與的民主，政治多元化不受限制，以自管的架構為基礎。

我們反對「有限度民主」這個虛假的主張，它只把一個精英層分放在國會內。

□ 建立真正的國際團結，聯繫所有力量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各種模式的斯大林主義（包括戈爾巴喬夫的「開放」的斯大林主義）。

我們反對波蘭反對派內有一部分人主張的狹隘民族愛國主義。

□ 建立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使目前保衛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鬥爭，能與建立勞動人民自我組織和提升自我意識的努力結合起來。

今天，勞動人民的自我組織，是我們的鬥爭形式和力量泉源；明天，這就會是我們利益的保障；後天，這就會是全社會民主地控制國家及經濟的基礎。

工人要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是一個階級的利益，就要重建民主社會主義傳統的延續性；這個延續性被波共和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主義者粗暴地打斷了。

我們的流派要繼承民主社會主義的傳統，我們的基礎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〇年代領導左派反對派抗擊畸形的斯大林主義架構的經驗和綱領，以及第四國際的傳統；第四國際是國際左派力量中唯一，始終一貫地保衛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墮落，反對社會民主派。

所有「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的成員都可以成為「革命左派流派」的成員，只要她或他同意服從黨的紀律並聯署本流派的綱領。★

基層會員致力恢復民主傳統

團結工會基層左派活躍分子

談圓桌會議前夕工會的內部生活

〔保羅域基 (C. Borowczyk) 是波蘭弗羅茨瓦夫的度梅 (Dolmel) 機械廠的工人。他因參與工會活動而被解僱。他是「波蘭社會主義黨—民主革命」(「社一革命」) 的全國委員會領袖，也是度梅團結工會組織委員會的發言人。

舒齊羅斯基 (J. Suchorowski) 是弗市的克文 (Hutman) 鑄造廠的工人，他領導廠內的團結工會委員會，也是「社一革命」在弗市的領導人。

謝基維斯 (M. Tyszkiewicz) 是反主流文化超現實主義運動「橙色出路」的一位領導人。她是「社一革命」的全國委員會領導人，並負責編輯該黨在弗市的刊物《新左派》。訪問在八九年春進行)

□ 訪問者 ■ 被訪者

□：「社一革命」對團結工會採取怎樣的態度？

■保：我們盡全力在企業內建立團結工會的架構。我們在廠門口派發工會刊物，參與他們的出版工作。例如在弗市，我們參與了度梅、克文、賈勒、恆美得、菲密及希度等企業內建立團結工會的工作。

■舒：目前，地區性工會領導層、全國性工會領導層、以及工廠內架構之間的衝突正在擴大。事實上，領導層已停止運作，他們正等待圓桌會議。但車間的工友已等得不耐煩。他們一方面要勒索補頭，另一方面卻看到大量浪費。年青工人對這種情況是非常敏感的，他們渴望其他出路，其他投資決定，例如削減軍費開支、增建住屋。

他們對經濟改革極之反感，因為看到改革將會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削減，使生產停滯（工人甚至缺乏工作所需的工具！）。只要這個使工人及工廠貧困化的過程一日存在，罷工看來便是唯一出路。要改變這些情況，必須通過罷工行動，而不是冷靜的談判。

最近在我們廠內，所有秘密、公開

的組織都聯合起來，就工資問題向自治管理委員會及管理層提出抗議。假如管理階層不接納我們的要求，我們將採取行動，首先是拒絕超時工作，繼而是罷工。

我們知道自治管理委員會將支持我們，因為衝突是經理層與所有工人之間的衝突。但不幸的是，團結工會地區領導層（以法西紐克 Frasnyniuk 為首的）將不支持我們。

□：假如團結工會領導層接受工會自我約束以換取工會的合法化，廠房工會組織將採取怎樣的態度？

■保：公開的工會組織肯定會利用這個合法化（儘管這範圍很狹窄），但它們不會遵守規限，特別是關於罷工權利的限制。同時，幾乎在每一處都存在雙重的工會組織，即公開和地下的。地下工會將如舊運作，因為人們知道不能一下子向敵人攤出所有底牌。

■謝：自治管理委員會是建基於一九八一年訂定的法律而運作的合法組織，代表了當時羣衆與政權之間妥協的產物。就目前情況來看，它仍是一個較好的法例。八九年初，第二屆自治管理委員會會議在弗市召開，有215名代表參加，議題完全集中在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上面。他們有管理工廠的經驗，從這經驗，他們得出結論，認為有需要改變政治制度。假如團結工會接受這個約束，尊重他們的合法性，它也將被置於同樣的處境，那麼對於基層活躍分子的覺醒將會起很大作用。

■舒：華里沙與政府簽訂協約時，團結工會內部將會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那些已經疲倦、希望穩定的人；另一部分，主要是年青人，則不接受這樣的合模。我認為廠房工會不會接受有損自己利益的東西。

□：為何你們與以往的鬥爭伙伴，例如法西紐克，會產生衝突？

■保：有一段頗長時間我是與法西紐克非常接近的，直至一九八七年，當

公開的地區領導層 (RKW) 組成時，我們開始走不同的路。當時我被邀參加該領導層，但我認為領導層成員不應由上而下地委派，而應由工廠代表組成。當度梅廠房工會組織對華里沙的克服危機協議採取不同態度時，團結工會地區領導層竟然禁制該廠組織的出版物。他們將地下工會委員會的決議擅自改為完全支持華里沙的決議。因此，廠房工會委員會決定獨立；而愈來愈多的基層團結工會活躍分子要求重新選舉工會領導人。這是維持團結的唯一途徑。他們嘗試用各種藉口拒絕舉行投票，但結果一些地區領導被迫同意了。

但在華沙及弗市，工會組織已準備了一份內定的候選人名單，定出了誰應被選出，誰應被阻止選出！這正是過去四十多年來波蘭政治生活常見的手法，現在又再重新出現了。

■謝：在華沙，工會組織已制訂出一套選舉工會領導人的組織計劃，建議將工廠架構內的工人代表限制在50%，其餘則分配給中央架構（如報刊、資料室、上層領導層等）、教會、甚至工業聯合會；後者是前反對派人士的組合，他們尋求創立企業及積累資本，與工會主義毫無共同點。 ★

波蘭工人權利憲章

〔波蘭工人活動分子在一九七九年發出的《工人權利憲章》，是當年波蘭工人反對運動中一份極重要的文件。〕

到一九七九年底，這份憲章已有超過一百名工人活躍分子簽署，流傳超過二十個城市。簽署者包括安鄒·華倫天娜維茲和華里沙。華倫天娜維茲被格但斯克列寧船塢開除，是引發船塢工人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四日罷工的其中一個原因。她和華里沙都是格但斯克罷工委員會的領袖〕

由於：

- 市民被剝奪參與決定與他們有關的事務的權利；
 - 僱員的基本權利（例如從事安全和有退休金的工作、領取合理的工資、休息）受到種種限制；
 - 社會不平等和不合理日益昭彰；
 - 僱員沒有機構保衛他們——官方的「波蘭工會」並非保衛僱員的機構；
 - 工人被拒基本的自衛權利，即罷工權利；
 - 社會需要肩負當權者每一個錯誤引致的代價，包括現今危機的代價。
- 因此，我們投入了一個行動路線，長遠的目標是建立僱員的自衛制度，首先就是建立獨立的工會。

我們希望從我們看來在現時可得到解決（或局部解決）的問題開始：

（一）工資

- 工資應該起碼隨着生活費用上升而上升；生活費補助是必須的；
- 應確保每人獲最低生活工資；專門小組應計算這個最低額，並隨物價上升幅度加以修改；生活低於這個水平的家庭應該獲取適當的補助；
- 應該致力消滅薪酬上昭彰的、無理的差別；
- 不應容許停工、分配額的改變等導致工資下降；

- 在同等條件下做同等工作的工人，應按級別支薪，不論該工人受僱於那個部門。

（二）工作時間

- 超時工作、額外工作和社區工作絕不應是強迫性的；曠工必須在星期日和假期放假；
- 現制度下的星期六放假，必須在法律上賦予每個人；
- 必須努力推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不減工資。

（三）職業安全

- 要毫無例外地遵守安全標準和規則；應設立特別委員會監督，委員會有廣泛權力，包括有權封閉工廠；監察職業和安全的委員會、意外委員會和工廠醫生，必須在制度上獨立於工廠管理層；
- 任何人因有害的工作條件而導致健康受損，都不能被追棄，並繼續發給應有的工資或入息；
- 必須保持工業疾病表的最新消息；
- 必須取消婦女開夜班；不能容許婦女做繁重工作。

（四）特權

- 一個僱員的薪酬及提升，不應根據其對黨的忠誠、政治意見或觀點；
- 津貼（例如獎金、房屋或大假）必須以公開形式調配；分配手段和受惠者的名字必須公布；
- 必須終止對與政府有關的機構（警察、黨幹部）的特權：特別津貼需求極低的貨品，例如房屋、土地、建築材料、汽車，特別醫療護理、豪華渡假屋、特別退休權利等等。

（五）強迫人們違背良心的行動

- 不應強迫任何人做不道德的事，向黨或保安機關告密、或參與襲擊不受歡迎人物；

- 不應強迫人們生產劣貨，進行危害他們自己或別人安全的工作，隱瞞意外、作假報告等。

（六）勞動法則

自一九七五年實行至今的「勞動法則」，必須徹底改變；它建立了不利於工人的規則，條文模稜兩可，以至在任何情況都被解釋成有利於廠方，尤其：

- 第五十二條必須改變，它被用作為反罷工法例（七六年六月之後無數解僱就是以之為根據的）；罷工權利必須得到法律保證；
- 如果有人被解僱，廠方必須以書面解釋理由；當工人的個案正循各項法律程序處理時，應該繼續其工作；
- 在整個過程中，工人有權獲得律師的協助；
- 由工人選舉的工會工作人員，必須在卸任後一段時期也受免於被解僱的法律保障。

我們認為，這些主張能否實現，視乎我們自己的態度。工人可以迫使當局和廠方讓步，這點已經由一九五六年、七〇年和七六年大罷工以及其他個別罷工所證明。

幾個月來我們切實感受到危機對我們的影響。貨物供應和交通日益走下坡，工資不斷下降，物價不斷增加，大工廠的工作時間愈來愈長，佔用星期六的假期、停工也愈來愈多。如果我們現在不開始保衛自己的利益，我們的情況將每下愈況。

可是，要爭取到勝利，就必須排除任何無能的感覺，停止消極忍受對我們權利的限制、忍受生活條件的惡化；我們必須尋求最有效的行動形式。很多可能性是存在的：

- (1) 最有效的行動形式無疑是罷工，即使是小規模罷工。可是，一般來說，它只是短期有效。為了不要浪費罷工的成

果，罷工參與者必須選舉代表來監督他們的要求是否兌現。如果工人知道怎樣團結行動，不害怕，他們就能以罷工的威脅、遞交請願書或派遣代表團，迫使廠方作出讓步。

- (2) 簡單地通過散布消息，已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果。當有人受到冤屈、當我們看到不合理事情，必須挺身而出和抗議；必須公開揭露陰謀集團的行動、特權、疏忽、浪費、職業健康和安全規例的違紀行為、隱瞞意外事件等等。必須告訴同事，在開會時說出來要求當局表態。要讓獨立的社會機構和獨立的報刊知道。
- (3) 許多勞工關係問題可以利用官方工會解決。這些工會假如不是像現在那樣癱瘓，對我們肯定會有利。必須要求工廠代表會保衛工人的權利，我們必須利用工會會議來進行討論，提出要求，並且必須把實幹的工人選上工廠代表會。
- (4) 我們要避免臨時行動和雜亂無章，因此要有一羣工人經常處於警覺的狀態。這羣人即使最初是隱蔽的，也可以草擬一個

行動綱領，組織一連串行動，製造輿論，當時機到來，就走出來以獨立的工人委員會公開活動。

- (5) 一俟有強大的工人和組織性的團體存在，能夠保衛他們的代表免於被解僱和監禁，那麼就應該成立自由工會委員會。西方民主國家僱員的經驗，顯示這是保衛工人利益最有效的方法。

只有得到工人支持的獨立的工會，才有機會對抗當權者。只有它們才是當權者必須認真對付的力量，而且能與當權者對等地周旋。

我們——這份憲章的簽署者，誓言我們將努力於爭取《工人權利憲章》所列的主張。

我們同時也成立一個「援助基金」，保證經常捐款給這基金。基金籌得的財資，將會用來幫助因參與獨立工會活動而被解僱的人。

(附錄)

我們的活動是符合法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認可《國際勞工條約》和《國際勞工組織協約》，承認：

甲：工人有權成立組織

《國際勞工組織》第八十七項協定第二條規定：

「工人和僱員不分彼此地均有權（毋須預先獲得批准）隨意成立組織和參加這類組織，而只須服從於這些組織的章程規定。」

《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條件》第八條第1A項規定：「參與本條例的國家誓言她們將保證人人有權隨自己的選擇成立和參加工會，以便能支持和保衛他們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利益；他們只須服從該組織的章程規定。任何人享用這個權利，將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非是一個民主社會為了國家安全和公眾秩序的利益，或為了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在法律和法例裏加以限制規定。」

乙：罷工的權利

《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條約》第八條第1D項規定：

「參與本條約的國家誓言她們將保證罷工的權利，條件是罷工乃遵從該國憲法的規定進行。」 ★

格但斯克(二十一點)協議

政府代表團與工廠罷工聯合委員會（罷工委員會），經研究罷工工人的二十一點要求後，達致下列結論。

工人有權組織工會

第一點：「根據波蘭為簽署國的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憲章有關工會權利的第八十七條，承認工會享有自由及獨立於黨的權利。」據此有下列決議：

1—波蘭現有工會沒有順從工人的期望，我們因而認為，組織真正由工人負責、能夠真正反映工人意願的新工會

組織，會更為有利。工人仍然有權選擇加入舊工會；我們希望，兩個工會有機會合作。

2—罷工委員會在成立獨立自管的工會時，會尊重國家憲法的原則。新工會的目的是保衛工人在社會及物質上的利益，不會扮演政黨角色；新工會根據波蘭現今的社會主義制度、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原則組成，承認波蘭共產黨（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國家的角色，不會反對波蘭和國際的聯盟的現存制度。新工會成立目的是為保證工人有決定、表

達及保衛自己權益的必需手段。政府代表團保證，會充分尊重新工會的組織結構和各層面上運作的獨立及自管性。政府亦保證，新工會在保衛工人權益，爭取工人在物質、社會及文化上的需要時，不會受任何限制。同樣，政府保證不會歧視新工會。

3—自由獨立工會的成立及運作，完全符合國際勞工組織憲章有關工會權利的第八十七條，及有關自由組合和集體談判的第九十八條規定。波蘭均有簽署認可這兩項條款。由於波蘭將出現多

過一個的工會組織，政府將修訂有關工會、工人議會等法律。

4—無論是以工人議會或新工會籌組委員會的形式出現，罷工委員會最終必須在企業層面上發展成爲能夠代表工人的機構。而作爲籌組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可以選擇組成工會或海岸地區組織。直至新組成的工會選舉產生領導機關之前，籌組委員會將不會解散。政府負責締造必需條件，使不屬於「工會總會」(CRZZ)的工會得到認可地位。

5—新組成的工會有權參與決定影響工人生活條件的事宜，如有關國家財產的消耗和累積之分配；各項社會經費(健康、衛生、教育、文化)的分配；工資政策——特別是有關通貨膨脹而自動調整工資的政策；經濟計劃、投資方向和價格政策等問題。政府需締造讓工會參與決定的條件。

6—企業委員會將設立研究中心，客觀分析工人及僱員的狀況，尋求正確反映他們利益的途徑；研究中心並會就有關物價指數、工資指數和應付物價上漲的賠償方法等問題，提供資料及專家意見。新工會須擁有自己出版的刊物。

7—政府會全力執行一九四九年制訂的工合法第一條，保證工人有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新組成的工會不會加入現有的中央「工會總會」；新工會法會尊重這項原則。罷工委員會及工會籌組委員會的成員均有權參與解釋新法例的權利。

工人有權罷工

第二點：「保證罷工權利，及保證罷工工人和支持罷工者的人身安全。」雙方同意：

新工會法將保障罷工權利，以及清楚訂明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號召和組織罷工、解決矛盾的方法和違反法例的刑罰。勞動守則第五十二、六十四和六十五條關於罷工違法的規定，由現在起停止生效，直至新法例生效爲止。政府需保證罷工工人及罷工支持者的人身安全，並保證他們的工作條件不會因此而惡化。

言論及出版自由

第三點：「正如波蘭憲法所賦予的，需尊重言論及出版自由；對獨立刊物不作任何限制措施，保證各宗教代表能使用

大眾傳播媒介。」此外加上：

1—政府會在三個月內，向國會提交有關管制報章、刊物及其他公開表達行爲的法案，內容會基於下列原則：檢查制度純爲保護國家利益，即保護國家機密及經濟機密，有關機密的涵義必須在新法例中清楚訂明；保護國家利益及國家在國際間的利益、保護宗教信仰、保護無神論者的權利及取締違反道德標準的刊物。

新法案中將規定，對報刊檢查及有關部門的投訴，可向一個較高級的行政機構提出。新法例將在行政守則中以修訂案列出。

2—有關傳播媒介報導宗教活動的協議，各宗教團體將按其組織性質及活動內容，與國家機關協商；政府將與天主教會，就電台轉播星期日彌撒問題，另立協議。

3—電台、電視台，報章和出版社，須讓不同觀點有機會發表。大眾傳播媒介須在全社會監督下運作。

4—報界、公民及民間組織均有權取得公眾文件，特別是那些有關行政指令及社會、經濟計劃的文件。這些文件須按政府出版或有關部門印發的原樣給予公眾。和這公開行政的原則相左的例外情況，須按協議第三點第一段所訂，在法律列明。

恢復罷工工人名譽

第四點：「(1)重新恢復在一九七〇年及一九七六年因參加罷工而遭解僱的工人的權利，及重新恢復因不同政見而被剝奪接受更高教育的學生的權利；(2)釋放所有政治犯，包括扎度辛斯基(Edmund Zadrozynski)、欣可羅斯基(Jan Kozlowski)和馬可羅斯基(Marek Kozlowski)；(3)停止逼害不同政見人士。」雙方同意：

1—立即就一九七〇及七六年罷工後遭解僱的個案展開調查，若揭發有不公正的情況，應恢復有關人士的名譽及工作，並需顧及該人其後有否取得新的專業資格。對學生亦應施以上述原則。

2—司法部應於兩周內研究第(2)點提到的政治犯的檔案；在調查期間，若檔案中人已遭監禁，應先行釋放，直至調查有結果爲止。

3—立即調查第(2)點特別提及的

三名人士被捕的原因。

4—保證市民大眾及專業人士充分享有言論自由。

傳媒報導協議內容

第五點：「透過傳播媒介，向公眾公布罷工委員會的成立及要求。」據此有下列決定：

全國媒介須公布這份協議的全文。

第六點：「開始執行解決危機的必需措施，由公布社會及經濟狀況的有關資料開始，並容許所有組織參與經濟改革的討論。」雙方同意：

我們認爲，盡快做好實行經濟改革的準備是重要的。當局應在未來數月內草擬及公布改革的基本原則。應容許公眾廣泛參與公開討論經濟改革，工會尤須參與制訂有關企業及工人自管的法例。必須在工人議會於管理上得以強化自治及參與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改革。必須另立規例，保證工會能按協議第一點所予的發揮功能。

只有當公眾能掌握現實狀況，才能主動進行經濟改革。政府須向大眾、工會以及其他社會及經濟團體，大幅開放社會及經濟方面的資料。

罷工委員會認爲，爲了讓構成波蘭農業基礎的家庭農戶有正確的發展方向，農業領域中的個體戶及集體單位，對包括土地的生產資料，應享有同等權利；而且，應該締造條件，讓自管合作社重新出現。

罷工期間工資照發

第七點：「按有薪假期的計算方法，發放工人在罷工期間的工資，款項將由工會總會支付。」據此有下列決定：

參與罷工的工人及僱員在重新返回崗位後，可先獲支付原來基本薪金的四成，其餘會以八小時工作天作基數，以有薪假期計算支付。罷工委員呼籲，罷工結束後，會員應與企業及工廠的管理階層合作，增加生產，改善物資及能源的使用效率，加強工作紀律。

全面增加工資

第八點：「每名工人每月最低薪金增加二千元波幣；補償物價上漲的影響。」決定：

會逐步增加工資，由各工廠及分廠

各自與工人協商增幅。各類工人及僱員，特別是薪金較低者，均會受惠；具體執行時，將考慮不同崗位及工作性質的特點，最終透過檢討薪酬表或改善其他薪金福利，達致加薪之目的。

企業的白領僱員，由現在至一九八〇年九月底，按與廠方所達成協議調整工資。

檢討過各單位的狀況後，政府將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卅一日前與工會達成增加薪酬的協議；在八一年一月一日從薪酬最低的工人開始實施，特別要照顧那些大家庭的工人。

按物價調整工資

第九點：「保證按物價調整工資」據此有如下決定：

透過加強管制國家及私人企業，特別是遏止可能出現的價格增長，降低通貨膨脹。

根據政府決定，工會及學術團體，將聯手就生活水平展開調查。政府將在一九八〇年底，制訂一套補償通脹的計劃，計劃的原則提交公眾討論，市民接納後就會付之實行。計劃的原則必須顧及社會最低生活水平的界限。

第十點：「保證國內市場有充足貨品供應，而只出口剩餘物品。」

第十一點：「壓抑國內市場商品價格及控制在國內市場用外幣買賣。」

第十二點：「對肉類及以肉類為主的食品施行糧票制，直至市場供應受到控制為止。」雙方協議：

由現在開始至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一日為止，透過增加農產品利潤，及除不可避免情況下，限制出口肉類，增加肉類進口，以增加國內市場的肉類供應。此外，在這段期間，制訂增加肉類供應的措施，包括考慮實施肉類糧票制。

國營市場缺乏的貨品不會在外匯精品店出售。由現在至年底這段時間之內，所有有關貨品供應的決定，均會知會公眾。

罷工委員會建議關閉所有特種商店，凍結肉類及肉類食品的價格。

廢除特權

第十三點：「設立按履歷選拔幹部的原則，改變過去以是否共產黨員為考慮的

做法。廢除警察、公安人員及共黨官員的特權，廢除為這些人特別提供物資供應，及將其家庭津貼減至與常人一樣。」雙方協議：

以能力表現為選拔幹部的原則獲得接納。幹部可來自共黨、民主黨（成員主要為小型私人企業）、農民黨（上述三個政黨合稱國民陣綫）或無黨派人士。政府將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一日前提交劃一專業人士的家庭津貼的計劃草案。政府代表團聲明，只有一如其他工作單位的僱員餐廳或食堂，可繼續經營。

改善退休長俸

第十四點：「女性工人達五十歲、男性工人達五十五歲可以退休，或女性工作滿三十年、男性工作滿三十五年，則不問年齡可以退休。」協議：

政府代表團宣布，視經濟情況及最低工資的增幅若干，每年調整退休長俸。政府會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前提交有關計劃；並以學術機構的調查研究為基礎，草擬增加年老及其他類別的長俸方案，計劃將向公眾諮詢，由工會監管執行。

罷工委員會強調，上述事項均非常急切，並會繼續要求隨生活指數上升而調整年老及其他類別的長俸。

第十五點：「將以往的長俸數額，提高至新制度水平。」據此：

政府代表團同意，現時最低數額的各類長俸將隨最低工資增幅作逐年調整；政府會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前提交有關計劃，亦會根據學術團體調查結果，制訂將最低數額的各類長俸提高至最低社會水平的計劃，計劃會向公眾諮詢，並交由工會監管。

改善健康服務

第十六點：「改善工作環境及醫療服務，讓工人獲得更佳醫療保障。」雙方同意：

有需要立即增加醫療服務的資源，進口改善醫療用品供應所需的匱乏的基本物品，提高醫務人員的薪酬。政府及有關部門急需制訂改善公眾健康衛生的計劃。其他有關措施附錄如下：

第十六點附錄：

1- 制訂「醫療服務人員的權利憲

章」。

2- 保證衛生棉衣有充足供應。

3- 員工購買工作服，應從有關基金撥款歸還。

4- 設立薪金保障基金，盡可能獎勵有出色表現的員工。

5- 設立特別基金，向工作滿十五年至三十年的工人發放特別金。

6- 在惡劣環境及有害環境下工作的醫療人員，及要輪班工作的非醫療人員，享有額外津貼。

7- 負責照顧傳染病病人及處理傳染病者物料的醫務人員，應重新發給特別津貼。夜班護士的薪酬應予調高。

8- 承認牙醫患上脊髓病為職業病。

9- 醫院及育嬰院應發給優質燃料。

10- 承認沒有中學文憑的護士服務年資，其薪金將調整至文憑護士水平。

11- 實施技術工人每天七小時工作制度。

12- 施行周末假期制，毋須額外補時作為補償。

13- 星期日及假期上班作雙工計。

14- 醫療人員可獲免費醫藥提供。

15- 房屋貸款應從社會基金中補助。

16- 增加醫療人員宿舍面積。

17- 單身護士申請宿舍應更容易。

18- 將獎金改為雙槓發放。

19- 服務年滿二十年的醫療人員可享有六星期假期，並應如教師人員每年有權享有有薪年度病假。

20- 正攻讀醫生資格的人員可獲四周假期，考讀專業資格人員可獲兩周假期。

21- 醫生當值通宵班後應有一天假期。

22- 育嬰院及幼稚園工作人員值班五小時，並有免費宿舍。

23- 出差醫療人員應獲供應汽車，以行車里數計算或以一筆總額計算撥回出差旅費。

24- 曾受較高教育的護士的待遇，應與其他同教育程度的工人的待遇看齊。

25- 訓練維修小組，為工廠醫療中心提供保養服務。

26- 每名留院病人的藥物標準津

貼，將由1138元波幣增加至實際所需的2700元波幣；提高營養津貼。

27—應為長期臥病者設立糧券制度。

28—教護車數目增加一倍，以敷當前的實際需要。

29—加強控制海陸空的污染問題，特別注意沿海的污染情況。

30—除繼續建設房屋之外，應籌建醫療中心、藥房及育嬰院。

改善在職婦女福利

第十七點：「為在職母親提供充足的托兒和幼兒園。」協議內容如下：

政府代表團完全同意這點，各省機關會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提交有關建議。

第十八點：「將產假延長至三年，讓母親有足夠時間照顧嬰孩。」決定：

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一日前，與工會協商，研究國家經濟能力是否足以負擔為不能享有有薪產假的女性，提高每月津貼。

罷工委員會建議，上述研究應考慮：產後第一年，津貼應為原薪全薪；第二年為原薪金的一半，而至少不低於每月二千元波幣。此計劃應由八一年開始，逐步推行。

第十九點：「縮短輪候住屋的時間。」協議如下：

各地區機關將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一日，提交有關縮短輪候住屋時間，及改善房屋供應的計劃書。計劃書將在地區層面廣泛討論，及諮詢有關團體，如波蘭城市規劃協會、技術人員中央協會等。計劃應包括對如何運用建築業及活動房屋工廠，及全面發展工業生產力基礎作出建議。應在全國採取相同行動。

第二十點：「將出差公幹特別津貼由四十元波幣，增加至一百元波幣；增設生活水平津貼。」雙方同意：

詳細討論增加出差津貼的建議，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實施，而計劃書將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卅一日前草擬完成。

改善工人福利

第二十一點：「在全年開工、實施四班制的工廠，星期六將定為休假日；星期六仍要開工的工人，將獲累積假期或

平日調假。」雙方同意：

星期六定為假日應予生效，否則應以其他方式補假。細節應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卅一日前草擬定。措施包括由八一年開始，逐步設立星期六休假日，至於措施其他內容在附錄如下，或在罷工委員會提交的建議論及。

第二十一點附錄：

1—改變部長議會法令現行以每月三十個工作日作為計算工人病假或補假的方法，由於四班制工人每月工作為二十二日，現行計算法，是降低了工人短期病假的平均日薪和應得假期。

2—罷工委員會要求停工期的薪水按個別考慮，惟應該用部長議會法令把計算方法規則化，現時的含糊方法經常用作對付工人。

3—四班制工人若不能享有星期六休假，應獲額外假日補償。現時，四班制工人雖然比其他工人有較多假日，但這是因應辛苦工作後要有更多休息日而設的，不是真正的假期。當局反稱，須待四班制與一般工廠的工時劃一後，才應實施上述補償制度。當局這種說法並不合理。

4—罷工委員會要求，波蘭應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看齊，將星期六定為假日。

5—罷工委員會要求，應刪除勞動守則第一四七及一四八條，這兩條容許在休息日前，可將工時延長至每周九小時。波蘭現時已是歐洲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6—勞動守則應予增訂，提升勞資雙方薪酬協議的重要性，特別需訂明，評估個別新級調整、報酬方法，或改變薪酬計算方法，（如由日薪改為件工計），僱主均需知會工人。已評定件工薪的工人，不論做任何工作，應享同一新級的工資。應根據履歷善用年青工人，免使額外件工制構成他們發展的障礙。

7—日薪工人在通宵班工作應可獲得工半津貼，件薪工人的通宵班工作可獲薪金百分之三十的津貼。

在達成上述協議後，雙方並有下列決定：

政府負責：

□保證個人安全，容許罷工工人及

支持者返回工作崗位，服務條件不變；

□罷工委員會代表各企業工人提出的各項特定要求，由部長級官員負責處理；

□通過全國傳播媒介、電視、電台及報紙，公布這份協議全文；

□由罷工委員會宣布，由一九八〇年八月卅一日下午五時開始，罷工結束。★



社會真正自治是自治共和國的保證

「團結工會」綱領 (節錄)

首屆全國代表大會(八一年)通過

這份綱領經過長期辯論後由一九八一年十月首屆工會代表大會一百名代表通過。它是一份非常特別的文件；首先，它是由整個組織經過真正民主的討論後草擬出來的，草案在八一年三月在工會周刊上刊登，之後幾個月由基層以書面意見來進行辯論；然後，在這份草案的基礎上，不同區域的工會支部在六、七月通過自己的文件。到全國大會在九月開幕時，各支部都夠能提出本支部的立場；大會成立了一個由四百名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分為十三個小組委員會，各負責一個綱領主題。委員會由格拉密(Geremek)統籌主持，在大會休會期間的十天內開會，澄清不同觀點，將不同提案容納在一份文件內；到大會第二階段，各代表手上就有了一份新的綱領草案，並附有以論題分類、有些是針鋒相對的修改提案。工會周刊和大會通訊更以報告形式澄清各分歧。不同立場的提案，就由大會辯論並投票表決。

因此，現在這份綱領，綜合了「團結工會」及波蘭社會大多數人的基本主張，指出了一個自治的政治制度的前景，並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關革命的最明確聲明。我們可以用它來與六八年捷克共黨的怯懦綱領和五六年匈牙利首都工人議會的宣言相比較，以衡量它創新了甚麼論點。而且，這份綱領並非由一個覺悟的激進小組得出，而是由幾百萬工人集體草擬的。

(一) 我們是誰？

我們往何處去？

獨立自治的工會「團結工會」，產生自八〇年的罷工運動，它是波蘭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羣眾運動。這個運動始源於我國不同地區的大工廠工人之間，在八〇年八月在波羅的海海岸達到了歷史性的轉折點。在一年之間，它就爭取了各個勞動層分的支持，包括工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手工藝者。

我們工會產生自我國人民的需要，

產生自他們的苦難、幻滅、希望和意欲。工會是波蘭社會反抗三十多年來人權和公民權被踐踏、反抗政治歧視和經濟剝削的產物。工會成為反對現今政權的抗議者。

我們全都並非只追求更佳的物質條件，儘管生活窮困、工作艱苦並時常是徒然的。歷史教導了我們，沒有自由的麵包是不存在的。我們也渴望得到公義、民主、真理、法制、人的尊嚴、思想自由、共和國的重建，而不僅是麵包、牛油、香腸。所有基本價值觀念都太腐化了，使我們認為如果不重創它們，是不可以改善局勢的。經濟抗議必須同時是社會抗議，而社會抗議必須同時是道德抗議。這個運動並非突然產生的。它承襲了五六年波茲南工人和七〇年十二月波羅的海海岸工人流的鮮血的傳統，承襲了六八年學生暴動和七六年六月雷登和烏蘇絲事件的傳統。它也容納了其他傳統，包括工人、知識分子和青年的獨立行動，教會保留價值觀的努力，以及我國所有爭取人類尊嚴的鬥爭。工會從所有這些鬥爭中生長出來，並將忠於它們。

我們這個組織，結合了工會和大規模社會運動的特點。這個結合，構成了我們的力量和我們作用的重要性。幸虧有一個強大的工會組織存在，波蘭社會才得以中止分散、混亂和失落的情況。有了「團結工會」，社會將恢復力量和希望。我國真正復興的實際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工會代表了波蘭勞動人民的大多數，工會希望成為並將成為我國復興的推動力。

獨立自治的「團結工會」，結合了許多社會流派，聯合了不同政治和宗教思想、不同國籍的人。我們抗議不公義、濫用權力和濫用全國名義來壟斷發言和行動權利，我們以此聯合起來。反對國家（它視市民如財物）的抗議，現在將我們聯合起來。我們反對勞動人民在與國家爭持時缺乏真正自衛的渠道，

反對領導者的「良好意願」，他們獨自決定為適應他們統治的民主程度。我們反對那個鴉賞絕對政治服從而不敢主動性和行動的原則。將我們聯合起來的，是我們共同反對公眾生活中的謊言，反對全國辛勤勞動成果被糟蹋。

但是，我們不僅是抗議力量；我們想重建一個公義的波蘭。

人權必須成為所有行為的基礎。國家應該服務於人而非控制人。國家機器必須成為社會的僕從，而不能為一個單一的政黨所壟斷。國家必須真正屬於全國。工作應該為人而做，它只有在適合人們需要時才有意義。

我國的復興，必須建立於推進這些目標的公正制度。「團結工會」在界定其行動時，依靠的是基督教義、民族和工人傳統、勞動人民的民主傳統等價值觀念。教宗關於人類勞動的通諭是一個新的鼓舞。

我們認為人民的權力是我們無權放棄的原則。人民的權力，不是一個自居社會之上、自賦決策權及代表社會利益權的一個小組的權力。社會必須擁有暢所欲言和發表不同社會和政治意見的權利。社會必須擁有自我組織的可能性，以便保證所有人獲得我國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公平分攤，以及容許所有創造性力量得以發揮。我們要求我們政府和行政機構真正地社會化。

我們珍重自由和完全獨立的思想。我們支持所有加強民族和國家自主、所有容許民主文化發展、我們歷史傳統流傳的東西。我們認為我們的民族主體必須獲得完全尊重。

現在已創立的工會，在困難的情況下行動，它追隨的道路從未有人走過。加入了我們的，是為波蘭重大困難尋求解決方法的人。在所有範疇，人們都等待着我們的協助，這就是我們的力量和權威。我們迫於要為我們工會的存在而鬥爭，要在所有層面組織起來，要學習如何為達到這些目標而行動和鬥爭，而

學習過程是通過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我們的綱領，反映了我們社會的意欲和期望。這是一個尋求通過解決現存問題以達到長遠目標的綱領。

(二) 工會面對國家現況

「團結工會」作為羣衆運動而存在，已明確地改變了我國情況。現在有可能建立一些新的獨立社會機構或是將以往從屬於國家的機構變得獨立。獨立於政權的組織的存在，必須視爲我國社會及政治關係改變中最重要的事實。

行使政權的情況已經改變。政權本應考慮社會的願望，接受社會的監管，按照格但斯克、什切青和澤斯比協議去做。經濟改革、國家及其機構的改革，都本應進行。我們曾有權希望國家實現這些改變。

政府現今的制度，乃基於黨和國家中央機構的無限權力，它已將國家導向崩潰。一年多以來，變更遭壓制，雖然現在已不再能夠照以往方法來統治了。而且，形勢已經更爲惡化，我們正大步走向大災難。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其他地方都沒有如此嚴重的經濟破產。在過去一年來，儘管疲倦和受騙，社會卻表現了極大的忍耐力，但同時是決斷力。然而，我們疑慮這種疲倦和不耐煩會最後轉變成一個盲目和毀滅性的力量，或是令我們跌進失望的深淵。作爲社會的代表，我們無權在危機時候失去希望。

面對這個民族悲劇，「團結工會」不能再局限於向政權施壓力以迫使它實現允諾。社會視我們爲協議的唯一保證人。因此，工會認爲它的主要責任是採取所有可能的短期和長期的行動，以挽救國家免於崩潰，社會免於苦難，不致於失去信心和自我毀滅。唯一途徑是國家和經濟在所有範圍經由社會自發的民主途徑進行革新。

我們清楚明白到波蘭社會期待我們行動，讓人們能夠和平生活。我國不會原諒任何人背叛「團結工會」據之成立的理想。我國不會原諒任何即使是最善意的導致流血和物質、精神毀滅的行動。這種認識迫使我們逐步地實現我們的目標，以使每個相連的行動能夠得到社會的支持。

我們的責任感，迫使我們要清楚明

白第二次大戰以來歐洲的力量關係。我們希望在不影響國際聯盟的情況下，實行我們的更新的偉大工作，我們願作出更確實的保證。在對我國尊嚴、愛國主義和傳統的熱愛鼓舞下，我國在可以獨自和有意識地作出承諾時，將會成爲一個有價值的伙伴。

我國現況需要一個多樣化的綱領。一方面，它必須是一個即時行動的綱領，是渡過嚴冬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它同時是一個不能延遲的經濟改革、社會政治及重建公衆生活的綱領——一個走向自治共和國道路的綱領。

(三) 工會面對危機及經濟改革

現今危機的根源，深深植根於經濟和政治制度之中，也植根於政權的統治方法——政權忽略社會的需要，堵塞了所有進行改革的方案，糟蹋了巨額的外國貸款。危機的嚴重性，從七〇年代中期開始劇化，至去年達到高峰，原因是政權無能推進重要的變革。

面對經濟災難，政府宣布了一個對抗危機、穩定經濟的方案。工會不支持這個方案，因爲它不過發揮我們經濟儲備力量的一部分，並沒有給社會帶來信心。我們認爲，要迅速走出危機，就不可避免地要令政權的決定取得信用。因此，我們要求社會監管政府的反危機決定。要這些決定可信，被提名擔任國家經濟領導職位的人必須有職業和社會的權威。

提綱一：我們要求在所有領導層面實行民主及自治的改革，容許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重新統一計劃、自主和市場。

工會要求改革。改革必須廢除官僚特權，令它們不能再出現。改革必須激發工作熱情和主動性，不能只是表面的。改革牽涉到社會代價，所以必須保護某些階層，工會將作監督。

1. 必須廢除獨裁指揮經濟的制度，它令合理的運作變得不可能。在這個制度裏，龐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在黨和官僚機構手中。爲指令制度服務的經濟組織機構必須廢除。一定要分開經濟行政機構與政治權力。企業主管從屬於政府部長，廢除黨的「委任制度」提名重要職位。只有當改革是由重

要工作隊完成，才能真正實現；「團結工會」的「企業委員會系統」是一個例子，這個系統的活動標誌了一個龐大的自治運動的開始。

2. 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機構。在經濟的組織上，基層單位是社會企業，由工作隊管理，由工人委員會代表；廠長由委員會討論之後提名，並可以由同一委員會撤換。

社會企業可以據社會和隊伍本身的利益，運用分配給它的國家財富。在它的管理下，它將運用經濟核算。國家可以以條例和價格、稅項、貸款利息、外幣匯率等經濟措施來影響企業的行動。

3. 必須廢除阻止市場運行的官僚障礙。管理經濟的中央機構不能限制企業活動或規定它的供應者和買家。除了一些必須領有牌照的範疇之外，企業可以自由地在內部市場活動。所有企業都可以進行國際貿易。工會認識到出口對國家和工人有利的重要性。

消費者組織和反壟斷法律，必須監督企業，使之不能在市場獲得特殊地位。法律應該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供求關係應該決定價格。

改革必須令計劃社會化。中央計劃必須反映社會的願望和自願選擇，因此不可缺少公衆辯論。不同性質的計劃和由社會或民間組織主動制訂的計劃，必須可以自由提出，因此必須有取得詳盡經濟資料的途徑，並對中央統計局實施社會監管。

提綱二：冬天行將來臨，必須立即積極行動；工會讓人們知道，志願者隨時候命。

在我們現今的經濟情況下，行將來臨的冬天會對人民構成威脅，但恐怕政府並沒有準備對付這個威脅。

必須組織社會援助，工會讓人們知道，志願者隨時候命。

1. 當前的經濟活動

- (1) 工會領導層要求政府宣布應付冬天的政府計劃。
- (2) 工會要求政府保證城鄉有足夠的暖氣和照明供應，市場上有足夠生活必需品（禦寒

衣服、食物)供應。

(3)工人組織及其企業委員會必須：

- 監管在本應休假的星期六生產出來的工業品(特別是食品)，因為它們是補助性生產；
- 協調這些產品的分配，將它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 將生產適應節省能源的方法，就此事與工會的省組織聯絡。

2. 社會互助

工會必須組織省層面的冬季救援服務，任務是：

- 監督對特別貧苦者的食物和煤炭供應；
- 組織工作隊為他們修好房屋禦寒；
- 利用企業的交通工具以運送學童及運載藥品等；
- 幫助城市人民取得薯仔和蔬果的供應；
- 組織分配外國援助。

提綱三：要保衛工人的生活水準，必須共同行動對抗生產下降。

製造業生產下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要克服這點，必須改善供應和運用內部儲備，增加輸入原料和零件的渠道，這依賴我們對抗危機的鬥爭和進行改革計劃的效率，加強出口和獲得東西方貸款的可能性。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研究我國重新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和國際發展銀行的條件，讓公衆討論。

同時，我們必須盡量運用我國現有的儲備來達致最高生產。

1. 必須限制投資，將由此節省下來的物資運用在現有的企業上。
2. 必須善用多餘的物資、機器和設備的存貨，促進它們售於外國和本國的私營企業。一定要廢除現有對這些企業活動的限制。
3. 由於煤炭和其他原料的特別重要性，必須優先保證盡速提高礦產，因而必須締造保證將來提高礦產的條件。雖然許多省都有特殊困難情況，但仍必須優先保證礦區的食品供應，同時必須提倡

節約煤炭，首先在企業，同時也要在家庭提倡。

4. 原則上必須提高生產資料(特別是農業機械、工具、肥料等)分配給小農經濟的比例，這將提高食品的生產，因為小農經濟比社會主義化經濟效率更高。
5. 由於極度缺乏原料和能源，在未來幾個月，將需要關閉一連串企業；決定必須根據經濟效率原則，並盡可能規限在沒有辦法改善生產的情況下。
6. 在許多地方，工作時間實際上對產量沒有關鍵作用，但鑒於情況危急，我們可以取消在八二年有關增加星期六休假的要求。在假期加班與否，視乎工人的意願。
7. 在危機期間，軍備支出必須減至最低限度，將節省下來的軍費用以提高生產。

提綱四：工會認識到在對抗危機的有效計劃之中，必須重建市場平衡，配合合理的改革和保障人口中最貧弱的部分。

重建市場平衡的主要辦法，是提高生產和將產品供應市場，降低對貨品的需求。這可以經由下列方法達到：

1. 逐步提高價格，而在整個過渡時期，保存主要消費品的配給證；
2. 一次過提高物價，同時廢除配給制度；
3. 伴隨價格改革的貨幣改革。

在這些一般方法及其組合中，存在幾個解決方案。部分實際建議在附件中列出(編按：附件從略)。不排除其他提議。

同時提高生產是配合這些方法的可行性的因素。如果它們無一被採納，必須重新對所有貨品實施配給制度。這會破壞市場平衡，無可避免地帶來浪費，製造人為的短缺，加強官僚層的膨脹和黑市買賣，挫傷工作的主動性，而並不真正保護人民的購買力。

須經過公衆討論，全民投票來決定上述方法。工會堅持這樣做。愈快作出決定，愈會減少社會為市場平衡付出的代價。

提綱五：須由社會監管對抗危機的鬥爭和經濟改革。

由人民選擇計劃，尤其是由社會監

管它的實施，決定了對抗危機的鬥爭是否有力。工會期望由新國會、全國代表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實行監管。

同時，實行社會監管的機構應該由現在開始設立。六十和七十年代以及去年(八〇年)的經驗，教訓我們缺乏社會監管會帶來錯誤的決定，助長空談，也助長私人利益。因此，工會提議設立全國經濟的社會議院，以助議員明白政府的經濟政策、經濟情況、有關的法律和作出相應建議。議院必須有權動議法律方案，其仲裁必須公諸大眾，議員可以經由傳播媒介與社會溝通。

提綱六：工會保護每一個人，特別照顧最窮的人。

我們優先保護那些被危機弄至生活最艱苦的人。在格但斯克協議的精神下，我們要求在八二年起設立生活津貼，將教育津貼普遍化，提高家庭津貼和承認最低生活標準作為稅收政策的基礎。

工會認為這些津貼應該保障最窮苦階層的購買力。必須：

- 給予工人(和退休者)及其家屬生活津貼；
 - 加價必須顧及社會津貼的比例；
 - 撥作津貼的稅收必須達到最大訂額；托兒所、療養院和醫院的預算必須提高；
 - 工會支持將稅收撥作津貼的原則。必須設立價格獲得補助的貨品和服務的帳目。加價和分配權，必須得到工會的同意。
- 我們要求大幅提高社會援助。
- 工會承擔調節必須提高價格後對日常生活費用的影響：
- 通過控制主要必需品的價格指數，鼓勵社會積極監管商品品質；
 - 要求成立特別基金以限制某些物品和服務的加價(奶、書本、兒童衣物等等)。

提綱七：今天最重要的問題是食品供應；配給證必須兌現；社會監管食品分配。

由於缺乏最必需的食品，工會不得要求設立制度去嚴格控制它，以保證每一個市民獲得最起碼的供應。

現在經由配給證分配的貨品，特別

是肉類，並沒有足夠的營養，而且又缺乏副食品（魚、乳酪品）。

工會要求政府積極行動，令市場足夠供應配額上的物品，特別是鼓勵農民增加畜牧，提供更多牛肉。

在增加生產和畜牧的同時，物品的質素應該改善。我們要求更佳的貿易組織和控制制度，以便不需排隊便可買到貨品。

國家的食品供應是最重要的問題。

工會不會坐視不理目前的供應情況。必須在全國設立工會委員會網絡，有中央協調組織，專責市場和供應的問題。這些委員會會與團結農會合作。它們必須對抗大企業破壞我們團結的詭計。

提綱八：工會反對在企業和各省出現的社會不平等。

經濟改革包含了在各企業和省區之間的薪金和社會不平等的危機。我們必須創造條件，抑制這些不平等。

我們會致力以下各點：

1. 經由省委員會努力令企業實行社會行動和社會管理。
2. 設立全國社會基金，在社會監管下將資金從一區轉到另一區，以抑制不平等。

實際上，工會採取行動以圖：

1. 改變企業內社會性活動的資金來源。在改革後的企業，社會資金的比重決定於工人的數目而非他們的總工資。
2. 使當地人民可以處理企業的社會管理事務（托兒所、文化中心、交通等）。
3. 設立由地方居民參與的混合委員會，以成立地方委員會，決定社會基層建設和開發。

工會活動的主要重心，是保衛工人的權利、僱主實際上如何對待他們、工作條件、健康、安全、和工人應得的公平薪酬。

提綱九：必須保證工作權利和改革工資制度。

我們要求人人有工作權，失業不可以存在。恢復全民就業的政策是可行的。

因此，在計劃減低活動的企業之

中，應該改革工作條件以維持就業，或是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薪〔下略〕。

改革工資制度，我們有幾個目標：

- 統一獎金；
- 最低工資應該等於平均工資的一半，要高於最低生活所需；
- 實行高工資政策（我們對此點有不同的提議）；
- 對從事低下或是對健康有害的工作的人，在低薪之上加上巨額獎金，但並不因此而停止改善工作條件的鬥爭；
- 廢除計件工資；
- 在集體協議的前提下，實現部門之間的協調，但需要人力的部門享有優先權。

工會建設在全國委員會作出決定之前不再談判新的集體協議，但不排除與僱主進行突發性的談判的可能性。

我們將會盡力達致統一的工資制度，但會保持企業的自主。如果某一行業就工資進行談判，它必須參考這個平均工資制度。

一個薪金委員會將會成立，以監察工資制度的改革計劃和集體協議。

提綱十：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必須獲得保證。

必須由工會監管機器的安裝和運行、組織工作。必須在新的原則基礎上取得工作督察制度〔下略〕。

提綱十一：工作權必須基於保衛工人的共同利益。

工會認為必須大幅改革工作權和就業保障。特別要包括下列各點：

- 廢除選擇工作的所有限制；
- 在工作合約上，權利與義務要平等；
- 工會在有關工作關係和保障方面的法律仲裁採取主動；
- 工會必須獲法律保障有干預權，以獲得合理的工作條件和保障；
- 必須可以得到有關行業、部門、或特殊工作地點的集體協議；
- 由獨立和分立的法庭解決工作糾紛；
- 廢止威脅工資、假期或職業保障的紀律制裁；
- 為懷孕婦女安排工作和立例保障囚犯的工作。

工會因而作出關於工作權、職業保障和有關條例的改革建議。

（四）一個團結的社會， 一個共同的政策

提綱十二：工會採取所有包括在會章內的積極行動，以滿足最迫切的需要。

中央制度已證明缺乏效率和靈活性。人民抗拒它，但同時也消極地等待政府發給津貼。

社會政策必須服從真正的社會化，應該依循的原則如下：

工會行動的目標，要有明確界定，即支部或省區的範圍內。

1. 由工會自己決定其行動的主要方向，訂立先後次序。所以我們拒絕現在的方案，特別是由於工會不能將特別的工作委托工廠委員會去做。

2. 在企業內，工廠委員會主要監察工作條件、工資和就業。住宅區的任务由工會負責。

工廠委員會應該與街坊組織合作，而在影響所及的範圍內，鼓吹地方自治。

3. 城市居民自治組織、地方組織及所有為集體利益採取主動的委員會，在全國自治之中，發揮補充性的角色；全國自治將在更廣泛的層面作出決定，調解個別利益之間的衝突。

4. 關於社區的所有決定，對省和部門的不同利益的調解，應該在所有人的監管下進行，因此必須檢討監管委員會的角色，重新研究企業內的安全問題等等。

5. 工會通過設立服務以保證社會勞動者有更佳的組織，俾為互助精神帶來新意義。

提綱十三：工會保衛家庭有滿足需要權，發展社會責任感。

家庭政策必須容許年青一代發展，在物質水平、衛生、教育方面改善家庭生活狀況。

企業委員會和其他工會組織的工作目標如下：

1. 廢除婦女晚間工作。
2. 實行自由選擇工作時間和讓懷孕婦女可以半日工作。
3. 豁免婦女擔任任何粗重工作；除了現在的九十八天分娩假期之外，還保證懷孕七個月的婦女有

職業保障和休假。

4. 建立強迫性的和由工會控制的不受市場影響的保護性部門，以銷售傷殘者製造的貨品。

工會贊同以下各點：

- 推行地方互助和家庭保障，類似「團結家庭會」；
- 婚前家庭計劃指導；
- 為未婚媽媽提供合理的生活條件，鼓勵放棄墮胎；
- 發展保護家庭的組織。

此外，工會要達致以下各點：

1. 在二十一點協議〔格克斯克協議〕安排下，統一所有社會行業（包括農業工人）的家庭津貼的計算基礎。在未來幾年，家庭津貼應該是限制不平等的方法之一，因此必須根據家庭收入計算，以逐步承擔兒童教育的費用；
2. 令所有母親（不但是工作婦女）知道有兩年至三年的分娩津貼的權利；
3. 擴大未入學兒童服務，更好地保護在托兒所和育嬰院的幼童。開辦幼稚園和讓教會復辦托兒所和育嬰院。
改善購物信貸制度。
改變有關婦女在工業部門晚間工作的條例。

提綱十四：工會保衛老人、傷殘者和重病者的權利。〔下略〕

提綱十五：面對大自然受威脅的危險，工會的主要關注是保護健康。

推行有效的有關健康的政策，會遇到幾種障礙：

缺乏藥品、醫療人員和運輸工具，令公眾的衛生服務日趨惡劣。要彌補這個情況，消除對人民的威脅，必須重視衛生服務。

提綱十六：工會保護環境的鬥爭。

要保護環境，必須：

1. 認識到社會目標優於生產。
2. 提出並公布達到這些目標的方法。
3. 認識到破壞自然環境對經濟計劃的影響；引進無污染的、沒有危險的技術。
4. 以恢復自然環境、善用地方和自然公園，來真正保衛自然。

因此，我們要求：

1. 在策劃和實行經濟改革中，保證保護自然環境佔有真正的位置。
2. 設立保護環境的基金。這基金大部分由自治公社處理。
3. 容許工會干預保護環境的新立條例。
4. 無論任何組織都要保護自然。
5. 列出威脅環境的企業名單。
6. 威脅自然和大眾衛生的危險的資料，和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術報告必須公布。

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

1. 鼓勵活躍分子參加保護環境委員會；監管工業行為的合法性；提倡不威脅自然的新技術；工廠現代化。
2. 推廣保護環境的省層面的經驗，鼓勵企業努力改善環境。
3. 工會就這些問題的國家計劃發表意見。

提綱十七：工會要求國家尊重人民居住的基本權利和改善居所的努力。〔下略〕

提綱十八：工會進行監督，要求每個勞動者有空閒時間進修。

1. 工會致力於妥善安排工作時間，以助進修和休息。
2. 工會致力於令所有人逐步達到每周工作五天；隨着改善經濟運作，這是可能的。

明顯地，要顧及社會的限制，工會考慮到公眾服務、商業和文化機構的勞動者在星期六、日工作的問題；工會向他們提供其他時間的體育活動等。

3. 要令假日真正是鬆弛的日子，工會採取行動以致：

在企業的社會性支出中撥出財政援助，讓所有人得到娛樂；

增加假期。

在假期中創造教育性和文化活動的條件。

在專業部門，工會必須令會員能從工作時間中抽時間學習管理問題。

工會鼓勵成立廠際和地方性的體育、文化會所，目標是令工人從娛樂和體育活動得到真正的鬆弛。

（五）自治的共和國

提綱十九：自治共和國的民主的基礎是思想、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

1. 波蘭的公共生活必須進行深刻的改革，以確立自治、民主和多元化。因此，我們爭取改變國家的架構，同時，在社會生活所有層面，建立和發展獨立和自治的組織。只有這條路才能保證公眾生活的機構符合人類的需要，和波蘭的社會和民族理想。要令國家脫離經濟危機，這些改變是不可缺少的。我們認為，多元化、民主和充分行使憲法的自由，是令到工人的犧牲和努力不致再次白費的保證。
2. 我們工會，隨時準備開放地與不同的社會運動合作，特別是在八〇年八月以後成立和支持團結工會運動的其他工會，如個體農民工會、手工藝者工會、私營運輸司機工會，及其他被現行法律禁止與我們運動聯繫的獨立自治的工會。有關法律一定要改變。現時在波蘭，參加工會和選擇工會的自由對工人是最重要的。為此，我們認為關於工會的法律有最重大價值。這條法律必須保證上述的自由。
3. 我們工會特別珍惜與學生的獨立協會和其他獨立的青年運動的聯繫。這些組織和協會遭遇到多重困難，包括在活動和註冊問題上。我們認為必須投票通過有關這些協會的新法律，以保證市民有完全的結社自由。
4. 我們確信，必須在政治生活上實施多元化的原則。我們工會將會幫助和保護公民旨在向社會提出不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計劃的努力；但我們反對我們工會的領袖

成立政黨的任何企圖。

5. 我們工會忠於多元化的原則，接納與其他工會共存的可能性。
6. 如果不全面改革法律（特別是那些可以用來壓制公民權利的法律），多元化的原則是永遠受到威脅的。

提綱二十：真正的自治是一個自治共和國的保證

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聯繫，黨介入企業的運作的現制度基礎，是我們經濟目前實際危機的主因，也是升職不平等的原因。「提名委任」制度的原則，令合理提升幹部成為不可能，令黨外的千萬工人成為二等公民。

改變這種情況的唯一解決方法，是建立工人的自治委員會，給予企業人員真正的決定權力。我們工會要求恢復合作社的自治原則。必須投票通過新法律保護合作社免受國家行政干預。

提綱二十一：在法律和財政上獨立的地區自治組織必須真正代表地方居民的利益。

自由選擇的原則是地區自治組織的真正基礎。候選名單必須向所有人公開。所有候選人平等。必須組織大規模的競選活動，讓不同的候選人提出自己的觀點。全國議會選舉必須在同樣條件下進行。

團結工會堅持這一點。為了這個目標，工會會在八一年十二月底擬好一個選舉制度的計劃，在諮詢會員之後，向國會提出。

地區自治組織必須有權決定當地所有事務；國家行政機關可以依法進行監管，監管限於考察該組織的活動是否合法。如果自治組織與國家行政機關意見分歧，則由有效的仲裁庭決定。地區自治組織必須有權進行經濟活動，亦必須有權與其他自治組織合作。為了可以實行這些任務，自治組織必須獨立自主，並有權實行財政措施（地方稅收等）。

團結工會首屆大會訓令全國委員會依據上述所論原則，擬訂有關地區自治法律的方案。方案將提交會員諮詢和向國會提出。團結工會鼓勵所有自治組織致力解決有關經濟危機的問題。

提綱二十二：自治組織和機構必須在國

家最高機關佔一席位。

1. 給予工會必須有立法提案權是不可缺少的。
2. 我們爭取重新給予國會最高的權力。新的選舉制度必須予它真正的代表性。
3. 我們認為研究必須在國家權力最高層建立自治組織是有用的；自治組織的任務，會是監察推行經濟改革計劃和地區自治組織的活動。

提綱二十三：制度必須保證公民的自由，尊重公民及所有公眾生活機構的平等原則。

這需要：

1. 尊重波蘭承認的國際條約及人權憲章的原則和義務。實際執行波蘭承認的人權憲章中關於國際監察憲章的條文，是必須的保證。
2. 憲章明確宣布所有公民平等的原則，不分信仰、思想和政治黨派。
3. 所有公眾生活部門，包括政治和社會組織，都要遵守法律。必須修正憲法之中關於這些組織的作用的條文，明確地界定它們與國會和其他政權架構的法律地位。
4. 成立獨立的憲法裁判法庭（或是在最高法院成立類似的法庭），決定法律是否符合憲法，及其他權力和規例是否合法。法庭亦要監管國內法律是否符合國際人權。
5. 修正法律關於集會、結社和護照的條文（關於護照的法律必須昭明每人有權自由選擇居留地，包括移居外國；自由往返波蘭的權利）。限制公民自由的所有決定，必須受到法律監管。
6. 廢除影響公眾生活的機密活動，公民有獲得政府文件的權利。必須由法律明確決定所有列為機密的決定。

提綱二十四：司法必須獨立，鎮壓機關必須受社會監管。

為了實現這個提綱，下列是不可或缺的：

1. 司法制度進行徹底改革，尊重司

法獨立原則……

2. 廢止國家進行經濟仲裁的制度。經濟上的爭執應由公眾法律有效地仲裁。
3. 保證司法機關正確地運作，需要：
 - (1) 重新建立法官的獨立性……
 - (2) 改革檢察院，刑法上的職務只限為公訴人，隸屬司法部門。檢察官執行職務時的獨立性是不可或缺的。
 - (3) 保證律師的完全獨立性。
 - (4) 停止警方法庭處理拘留事件，交由法院處理。司法部門必須監管這些法庭的運行。
4. 制訂關於民警職權的法律，限於維持公眾秩序和公民的安全，不得干預政治。民警很多時候濫權，把公民的政治活動與威脅公安的行為混淆不分。關於秘密警察的新法律是必需的，法律必須列明它的職權和社會監察的方法。
5. 在刑罰方面，必須訂定政治犯的條件，就所有囚犯的權利和義務制訂憲章，將刑罰制度置於社會監管之下。必須廢止社會改造中心。

提綱二十五：在法治的波蘭，不能有任何人因為信念而受迫害，也不能被迫違背良心而行動。

在格但斯克協議第四條的基礎上，我們工會隨時準備保衛所有因為發表了政治思想而受迫害的人。我們堅持要實現華沙協議中關於釋放政治犯、停止檢舉所有表示反對現政權的人的條文。如果工會戰士受到鎮壓，我們將採取所有可行的方法保衛他們。

刑法及刑事程序法，尤其是容許檢舉所有發表與政府和黨不同意見的人的條例，絕對必須修改。

拘留期必須限於二十四小時。

不能強迫人們做出違反他們信念的行為。

工會保衛所有因為工會政治和社會活動而受迫害的人。

提綱二十六：對國家災難要負責的人須受檢控。

我們要求當局解釋、公布下列迫害

及屠殺事件和負責人的名單：一九五六年波茲南工人被屠殺事件，七〇年波羅的海海岸區事件，六八年學生事件，七六年拉多姆和烏蘇絲事件，和八一年彼得哥什的挑畔行動，負責者必須受法律嚴厲制裁。

在七〇年和八〇年將國家帶進經濟災難的人，同樣要受到制裁，黨和政府最高層的人也不例外。

工會明確堅持這點，是基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正義的基本觀念，和把改革付諸實行的決心。如果從十二月一日起政府仍未採取刑事程序，工會全國委員會將會成立人民法庭，進行公訴，作出裁決。

提綱二十七：波蘭年青的一代必須得到發展體格、心態和道德的有利條件。

兒童教育必須完全倚靠我們自己。工會反對將教育制度從屬於政權的意識形態、架構和經濟利益之下的企圖。我們爭取所有青年可以自由接觸民族和全球文化，所有兒童有平等發展機會。

工會支持下列行動：

- 經濟貧困家庭的兒童的需要，照顧弱智兒童；
- 改善保護孤兒和需要特別照顧的兒童的制度；
- 反對社會病態，如酗酒、吸毒和吸煙；
- 建立青年自治運動的獨立聯會和協會；
- 建立新的組織推廣文化，保證教育質素。

對教育子女之目的、方法和意義，工會爭取父母在公共機構和輿論上有真正的影響力。要成立附屬於全國委員會的組織，專責處理青年事務。

提綱二十八：每個人都應享有文化和教育。

1. 文化和教育不能作強行灌輸一統觀念的用途，或培養服從和被動的態度。
2. 我國歷史證明，雖然數次亡國，但她仍然生存和保持民族特性：不單是實際力量，還有文化方面（教宗保祿二世）。因此，政府現在摧毀文化和教育的政策必須改變。

經濟和社會改革的目的，不只是改善生活條件，還有發展文化和教育。

3. 考慮到我國文化和教育受到的嚴重損害，經濟危機不斷加深，工會必須制訂一個行動計劃，目的是：

- (1) 制訂新的關於國民教育、高等教育、報章和出版的法例；
- (2) 取消現行的有害計劃（十年計劃、文化和教育集中化、學校作其他用途等）；
- (3) 鼓勵積極參與文化和將文化推廣到現在受忽略的地區；
- (4) 增加全國教育、文化和科技研究的預算，除了國家撥款外，更找尋其他財政資源（文化機構財政獨立）；
- (5) 設立全國文化的社會基金。

4. 上述行動計劃是復甦全國教育和文化的整體計劃的一部分；它要與地區自治組織、社會機構、藝術和科學協會等共同制訂。

工會支持地區自治組織發揮文藝贊助者的作用。

5. 在文化和教育領域中，工會的行動將由文化委員會和全國教育委員會協調（這兩個委員會由工會全國委員會成立）。

提綱二十九：工會資助和保護所有獨立推廣文化和全國教育自治的努力。

國家的壟斷，是文化和教育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社會必須成爲文化和教育的主人。國家必須提供必須的手段，以能實現社會創造和承認的目的和價值。

1. 工會支持文化領域的所有創新；
2. 必須令文化機構自治，並由社會監管它們的活動；
3. 必須提高科技文化水平，提倡研究和發明；工會支持成立獨立的科技協會；
4. 制訂文化和教育政策，相關用途的基金的分配，應該由社會自治組織擔任；政府行政機關必須爲

這些組織服務；

5. 工會將成立本身的文化和科技機構。它將利用舊工會的設備來建立自己的印刷廠，並採取行動以成立本身的大學。

提綱三十：工會支持科技研究自由，科研機構自治。

當科學從屬於政治利益，將失去對抗社會和經濟危機中的作用。

工會期望科研機構給工會提供實質、有效的幫助。

因此，工會支持所有達到下列目的之行動：

1. 保證科學自治及獨立於所有行政和政治因素；
2. 創造有利條件，以進行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的研究；
3. 進行有關工作安全和公眾衛生的研究。

必須盡力保存我們的科學潛能（人才、實驗室、書籍），它正受到危機惡果的威脅。

提綱三十一：工會與生活所有範疇內的謊言鬥爭，因爲我們社會希望並有權生活在真相中。

能夠讀和寫真實的情況，是發展社會良知和保證民族認同感所必需的。爲了建立更美好的未來，我們必須認識到現在的實況。

1. 我們認爲傳播媒介的檢查制度是罪惡的。只因爲勢所逼，我們才暫時接受它。

我們不接受對科學和藝術的檢查制度。

不能讓這制度限制人民認識過去歷史和文學的權利。我們反抗濫用檢查制度。

2. 謊言的最危險工具是傳播媒介的語言，它破壞我們表達思想和情感的方式。工會爭取淨化我們的語文，便利人民之間的交談。
3. 工會支持發展出版自由，因爲這些活動是反抗檢查制度的方法之一。
4. 檢查制度對我們文化和歷史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工會堅持爭取恢復在這領域的實況。
5. 我們擁有的推廣實況的手段之

一，是我們的工會文學，刊載在官方文學上被禁制或歪曲的資料。

6. 工會支持老戰士澄清我們的歷史，承認那些為波蘭的自由和獨立貢獻了生命的人的功績。

提綱三十二：傳播媒介是社會的財產，它們應為社會服務，受到社會監管。

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工會爭取使用傳播媒介的鬥爭。

工會要求憲法規定的報章和言論自由受到尊重。所以：

1. 工會認為，干擾外國電台，禁止發表不同於官方觀點的文章、毀爛我們的傳單等等，是不可忍受的。

2. 工會參與研究有關新聞法律的方案。

3. 工會要求尊重公民及其組織有印刷廠、自由運用電台和電視的權利。必須將分配紙張、印刷用品和廣播時間置於社會監管之下。

4. 工會反對以各種方式壟斷消息。

工會要求廢除國家機關壟斷電台和電視，認為這是違反憲法的，並要求修正一九六〇年關於設立電台和電視委員會的法律。工會要求成立包括政府代表、各政黨、工會、宗教和社會組織、知識分子、電台電視台職員的社會監管電台、電視委員會。委員會對節目有決定權。

5. 到目前為止，我們爭取廣播時間的努力仍未足夠。我們因此要求盡快實行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追認的協議，及在中央和地區的電台、電視台的機構中，成立團結工會自治編輯部。

6. 工會保衛受僱於電台、電視台和報紙的會員。它支持尊重真實消息的原則的記者。工會認同編輯人員選任主編的權利。工會支持波蘭記者協會保衛職業道德的努力。

7. 工會將成立本身的消息、圖片、放映室和報紙的機構。

8. 它將設立在全國委員會之下的資料委員會。

9. 依照憲法第三十三條所載，工會要求可以開辦本身的電台。

10. 在爭取使用傳播媒介的鬥爭中，工會將運用會章規定下的所有方式。

(六) 我們的工會

工會生活的基礎是民主，以服從大多數人的意願為原則，同時尊重少數人的思想。服從工會領導以民主方式作出的決定，保證了行動的一致。

工會會章是基本的文件，它決定了工會的民主運行。實際上，我們接受任何會章沒有禁止的行動，使新的行動形式令工會生活更多姿多彩。對各種不同意見採取容忍的態度，但同時各領袖和所有會員要堅決反對超越會章的行為。內部生活的民主、行動時的紀律和工會會員的忠誠，是工會的力量保證。

提綱三十三：我們工會會員有權自由發表意見和願望，自由地組織以實現共同的目標。

工會行動的有效性，倚賴會員之間的這些廣泛聯繫；它們加強了鬥爭的工具和方式，保證了我們運動的真實性和參與社會運行。創造這些聯繫，需要自由思想交流和共通的立場。

1. 地區上：

工會會員之間在企業部門層面建立基本聯繫；這些部門依照會章規定的原則，在地區層面上組織起來。各地區的轉變應該在全國委員會的監察下民主進行，以盡量融合行政地區的分界。必須令各地區有足夠的力量在技術上支持所有企業部門。必須避免削弱地方領導的團結，因為這會損害工會對行政當局的影響能力。

2. 中間的聯絡：

工會生活的實踐在企業部門和地區領導之間創造了廣泛的中間聯絡；工會領導層應該在組織、財政和技術上幫助這些聯絡。聯絡的主要工作，是在資料和諮詢方面幫助企業委員會，成立工會活動中心；它們必須在地方上保衛居民的利益和向當局施壓力。

3. 專業部門等：

這些部門必須盡力輔助工會領袖的行動，以保衛工人小組和工會會員的不同利益，而不影響其他小組。

部門的主要任務是：

推動和協調工作，以解決專業部門和

特別是簽訂共同協議的特別問題；

代表工會外圍組織的利益；

在行政和國家層面上的行動，與工會合作。

經驗證明，工會會員的更大代表性能幫助領袖解決困難。

4. 協議：

企業委員會、工會會員和其他個人之間的協議，在會章規定的組織形式之外訂立，會擴大積極性和給原則賦予內容。

在促進廣泛協議的同時，工會領袖不應放棄組織者的角色。

5. 言論和意見組合的方式：

主要的方法，是通過工會的傳播消息的工具，及時廣泛傳播行動的目標和方式，和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立場。

因此，工會領袖必須特別監察傳播服務的技術和物料組織、消息的資料和工作情形。必須改善我們的資料網，以抗衡「黨國」機關壟斷下的傳播工具。

這方面的最重要任務是：

1. 提高「團結工會」周報的流通量，以達到接近一百萬份；

2. 創立一份流通全國的日報；

3. 盡可能發行地區性期刊；

4. 在每個地區發行一份日報和一份周報；

5. 提供必需的條件以發展全國的資料傳送系統（報紙消息服務、新聞資料收集等），利用現有的中心和擴大地區性資料中心；

6. 改善地區性傳送系統和其他通訊系統；

7. 在地區委員會和企業委員會成立圖書館。

實際上，「團結工會」的編印和資料中心已走向自負財政。工會爭取言論自由，在本身的消息工具上也必須引用同樣原則。因此工會幹事不得干涉報刊編輯的工作，必須讓他們有絕對自由，除了在工會的絕對緊急時期（抗議行動、動員罷工）。

工會不可缺少平民大學的教育工作。這些大學的目的是忠實地傳播知識，擴大工會戰士的知識，加強他們的公民感，發展社會活動和自我教育。平民大學必須擴大行動的方式：授課、實習、研討會、演講、出版活動。

它可以擴大範圍，特別是到企業之中。在保持多樣的課程和方式的同時，各平民大學將加強聯繫，交換經驗和資料。它們的活動將由地區委員會和企業委員會資助。

資料和教育服務的主要任務，是在工會會員、領袖和組織之間建立聯繫，收集意見。這些聯繫將有利我們組織思想的多樣性，而同時維持一致行動的原則。

提綱三十四：工會幹事必須基於對工會會員的意見和願望的真正認識，而作出決定和行動。

工會會員必須能夠對領袖的行動有決定性的影響。方法是通過選舉和所有人就工會的問題發表意見。消息的自由傳播和公開工會生活，是組成意見所必需的。

1. 工會領導的決定和行動：

當工會領導作出一項決定時，他們必須依照大多數人的立場。為了保證工會生活的公開性，領袖和委員會必須向工會會員報導他們的工作、公布文件，討論與官方談判的最終內容。

全國和地區領袖，有責任與社會專業工作中心和部門共同行動。

工會領導層有責任經常與其選民會面。

2. 在綱領範圍內策劃工作：

工會領導必須尊重民主代表制的正常工作。綱領範圍內的工作應該保證意見的廣泛流通和收集。

全國委員會、地區委員會和企業委員會之下，必須成立由工會活動分子和專家組成的專題研究小組（例如研究工資、工作條件、就業等）。

同時，必須成立和發展社會專業工作中心，任務是為工會研究和制訂專論和綱領。

這些中心必須在綱領委員會監察下獨立工作，由具有權威、技術、經驗的活動分子和由工會領袖委任的活動分子組成。

就每個企業組織提出的要求和概念，和由社會專業中心提供的資料，綱領委員會必須向工會會員提出問題。在搜集了答案後，委員會必須：

向工會領導報告各種想法和工會會員對各類問題的主要見解；

資料和工會宣傳提出建議；
提出綱領計劃，讓各代表組織討論。
有關綱領的工作必須：

改善現有的計劃；
促使企業部門考慮和評論綱領。

3. 研究企業內的工會意見：

同等重要的行動，是諮詢在各企業、地區和整個工會的會員的意見。

要作出這種諮詢，必須要求社會專業工作中心的幫助。

這類諮詢對真正和細緻地清楚工會對主要問題的立場，是不可缺少的；它決定了所採取的行動是否正義和及時，加強工會在談判中的地位。

全國委員會必須主動了解工會會員的意見。

4. 直接民主：

工會內必須採取一些直接民主的形式，不單是會章所述的代表制的民主形式。直接民主辦法中，全民投票值得特別重視，不只由於它的重要性，還有由全民投票得出的決定或傾向。

全民投票可以在不同的層面進行。當它在全國層面進行時，經常有極發人深省的意義。

組織全國全民投票的決定，是由全國委員會作出。

應該在全民投票之前列出不同的立場，發動集體討論的宣傳運動。

工會領袖在作出某個決定之前，如果要徵求工會人士的意見，必須每一次指明人選和怎樣給予意見，須虛心聽取意見。

提綱三十五：

1. 談判和協議，是工會保衛工人、市民支持者的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如果這條道路行不通，便必須採取抗議的形式。

要實現工會的要求，領導層應該首先採用不影響社會安寧的行動方法。首先是向行政、經濟和國家當局提出建議和計劃。如果意見分歧，必須尋求以討論達成和解。但當實際上他們不理會工會的意見而作出影響工會的決定時，領導層將被迫改變策略。

2. 在嚴重衝突的環境中，工會領袖必須與能幹的行政、經濟和國家幹部談判。

為了進行談判，工會領袖應選派談

判團和列明他們的任務和能力。

談判團有權簽署協議，由工會有關領導幹事追認。

談判的準備工作應該包括諮詢有關工會會員，解釋談判的目的、目標、戰略和分析談判的重點。

工會必須堅持公開地進行談判。

專家可以參加討論，他們的任務將由談判團指派。

每個協議必須清楚列出雙方接受的實施條件、方式和日期。

3. 如果談判的努力失敗，工會領袖可以組織示威和抗議行動。

這些行動的性質（經濟、政治）取決於觸發的原因，而不是取決於行動的要求。每個行動必須有清楚明確的目的，要小心地組織；同時也必須預見事態會如何發展及在什麼情況下應該終止行動。

可以採取示威形式的羣衆行動以重申立場（施壓力以展開或繼續談判，或要求實現協議）；它可以有抗議的性質（抗議不當的決定或未能實現協定）。

警告和抗議行動應該給予限期，以實現要求和定出確實行動的日期。

如果警告被忽視，其他行動必須能表明人民尋求實現要求的決心和動員力量。罷工和杯葛是這種行動之一。

罷工主要是抗議的行動。由於它們會帶來經濟損失，所以應該是最後的抗議形式。每個罷工應該列明停止罷工的條件。

工會領導幹事必須小心準備談判的形式和內容，及抗議的行動。

此外，各級領袖必須準備短期和長期的行動，以應付一些危機，例如緊急狀態或入侵。

4. 決定必須在慎重考慮會員意見之後，才作出有關談判、抗議行動、妥協和最後協議的內容。

在談判抗議行動期間，必須諮詢有關會員的意見。領袖必須向工會會員報告談判者的立場，和談判的局部結果。

除了向會員發布消息和宣傳之外，還必須向全體人民發布，特別是在緊張局勢的期間。在大眾利益的前提下，工會必須保證它要求的目標被大眾理解和接受。

所有工會會員以基本的共同目標團結在一起；內部的紛爭必須走向團結的

討論解決，而不是由行政或紀律行動來解決。

提綱三十六：對工會幹事的監管和批評，是團結工會每一位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工會當權者的所有活動，都受到永久的監管。監管委員會的決定必須迅速公開和在工會內傳播。

工會所有會員可以自由批評領導。他們可以在會議和報章上作批評。被批評的人有權答辯。

代表機構的會員可以運用質問和信任投票來監管領導人的活動。如果有質問，必須在指定限期內答辯。如果質問者不滿意答辯，他可以要求作不信任投票。如果結果是不信任的話，領導人或領導機構必須提出辭職。辭職可以被拒絕，因此必須尋求解決方法，最後可要求成立特別委員會處理。

依照會章規定，監管工會領袖的活動，也由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委員會搜集資料，指出不當的措施，指示補救的辦法和為代表機構準備報告。

（七）新的社會契約

提綱三十七：團結工會要求訂定新的社會契約。

團結工會是八〇年社會協議〔格但斯克協議〕的保證者，堅持實施協議。

為了挽救國家，除了實現國家主權這個基本憲法原則之外，別無他法。

我們工會在國家受災難威脅時制訂我們的綱領。我們不能停留在危機之中，必須脫離危機。

反危機的協議：

反危機的協議必須保證社會能渡過即將來臨的嚴冬，並必須指出脫離危機的方向。

它必須是政府與社會合作的第一份文件。

經濟改革的協議：

經濟改革的協議需要政府與社會合作，邁向徹底改變實際的經濟秩序。

改革必須將工廠的領導權授予廠內人員，實行一個尋求協調市場規律和計劃的經濟制度。

政府簽署的以百計的協議仍然是紙上空談。政府對工人的承諾必須兌現。

有關自治共和國的協議：

有關自治共和國的協議，必須對公眾生活、國會、政治、地方和經濟權力機構、法庭、全國教育等民主化作出指導和提供方法。

實現這個協議，會在公民和國家之間建立一個公平的關係。

惟走上自治共和國的道路，才能令波蘭內部強大，成為一個與別國平等的伙伴。

工會認為新的社會契約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團結工會的行動綱領首先是履行工會在全國的義務。我們期望得到全社會的批准；沒有任何黨派、個人或小組的利益是高於國家的利益的。

我們不自以為代表真理。我們隨時準備誠懇和忠誠的對話，與政府交換見解，尋求更有利於國家、實現全體工人和公民利益的正義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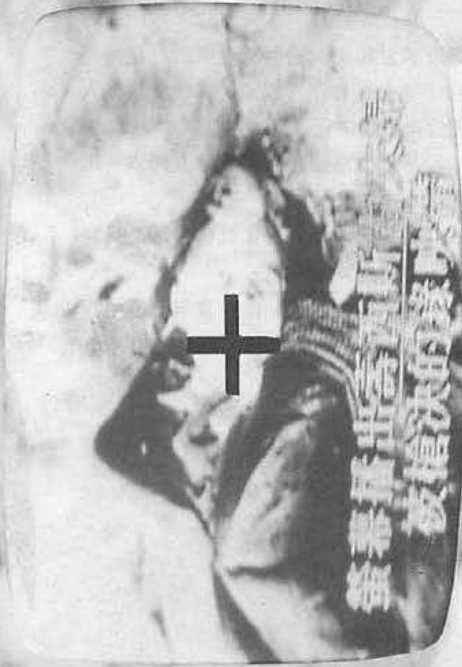
讓這個協議將我們團結在民族、民主和人道的波蘭之內。

團結工會是八〇年社會協議的保證者，它堅持實施協議。

為了挽救國家，除了實現國家主權這個基本憲法原則之外，別無他法。★



羅馬尼亞



+

+

1945年新的機械十
線拉新的機械十
線拉新的機械十

羅馬尼亞： 堅持獨立自主 代價沉重

文樂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人民起義，已對壽西斯古為首的羅共統治作了歷史裁決。這個統治的殘酷暴戾，有不爭的事實佐証，沒有人會認為壽西斯古不是大獨裁者。但是，僅僅歸咎於壽西斯古的獨夫權慾或羅共的獨裁專橫，不足夠理解羅國今日的困局及展望未來。

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一如其他弱國，都面對一個重要問題：如何在強國支配的夾縫中尋求生存。這三個國家的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都取得本國人民支持而壯大。另一方面，共產黨向人民展示的出路，是擺脫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強國的支配，捍衛民族主權，實行有利工、農的國有化和土地改革。這些主張，大體上能針對這些國家面對的迫切問題提出出路。共產黨奪取政權成功，蘇聯紅軍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國家受強國政治擺佈的情況非常明顯。阿爾巴尼亞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一直被奧匈帝國、意、法軍隊佔領，成為各國交戰的戰場。戰後雖然名義上獨立，但實際是意大利的附庸國，一九三九年更被意軍佔領，於意大利一九四三年投降後，又被德國佔領。羅馬尼亞則在第一次大戰時試圖兩面討好，第二次大戰時雖靠攏德、意，但也要求英、法、蘇的勢力平衡。一九四〇年在維也納條約中被列強將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割給匈牙利，將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那北部割給蘇聯。二次大戰後期，羅國改為靠攏英、法等國。南斯拉夫也是在一九四一年被德軍佔領。

第二次大戰結束時，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努力謀求脫離西方強國的操縱，建立獨立主權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它們既借助蘇聯的勢力，同時又設法避免成為蘇聯的附庸。由於地理上較遠離蘇聯，它們不像捷共、波共那樣受蘇支配。

了解這些國家今日面對的困難，不

能只從共產黨實行一黨專政的時候開始，而要顧及共產黨當權前這些國家已面對的艱難局面。

羅馬尼亞走上崎嶇的獨立建國道路

在羅馬尼亞，人民希望無論經濟或政治上都保持獨立性，避免以往受德、意、英、法、蘇等強國的支配。這個壓力在羅共的發展上表現出來。羅共領導一九四四年的起義，其後推行土地改革，爭取到羣眾的支持。在一九五二年，羅共清算了黨內親莫斯科的布加領導層，由本土崛起的喬治烏——德洽領導羅共採取與蘇聯保持距離的路綫。

南共與蘇共在一九四八年交惡決裂時，羅共雖然留在華約之內，但要求蘇聯撤走軍隊（一九五八年撤走）。共產黨從本身統治利益考慮，要盡可能減少對蘇聯的依賴，然而，這樣一來，又可能前門拒虎，後門進虎，成為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和政治附庸。

在外交上，南共努力建立「不結盟運動」，聯結其他小國抗衡兩大勢力。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在一九六一年以前，親蘇以抗衡南斯拉夫的支配；六一年面對赫魯曉夫要阿共與南共修好的壓力，阿共轉而親中國；到七八年後，才迫於與更多國家建立關係。羅馬尼亞共產黨不像阿共那樣孤立，它的路綫是猛烈批評蘇聯外交行為以顯示其獨主性，同時積極防範蘇聯的侵略；例如，一九六八年，羅共抨擊華約軍隊入侵捷克，並發動國內全民動員，戒備蘇軍入侵。對羅共來說，民族主義既有抗蘇的自衛性質，也有轉移國內矛盾和為羅共統治增添合法性的作用。

儘管如此，在實際經濟發展上，羅共要求盡量以自己一國的力量發展國民經濟，在短期內建立工業基礎，趕上先進國水平，最後卻不能避免在與蘇聯集團或帝國主義的經濟交往中陷入被動受制約的境地。

在不利的國際經濟關係下，羅共訴諸比其他共產黨更專制的手法來強制榨取人民的勞動，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生活是東歐多國中最為艱苦的。壽西斯古和羅共挖掘了自己的墳墓，但羅國人民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羅國石油工業的發展與現況，最能說明問題。比起東歐各國，羅國的天然資源較為豐富，有石油、天然氣、鹽礦、煤、鐵等。當經互會在一九五六年加強各國分工計劃時，蘇共曾試圖迫使羅共接受分工安排，重點放在農業，放棄龐大工業化計劃。但羅共出於本國利益，加以拒絕。羅共以本國石油資源為基礎，大力發展石油工業。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建立大型的石油工業。羅共本打算大量進口中東石油，然後將石油產品外銷，賺取外匯。可是，七〇年代油價急升，化工業投資大失預算，在一九八〇年，羅國石油工業設備仍有三成閒置，損失慘重。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化，是羅共無法干預的；從七九年開始，羅國從蘇聯入口石油，在八五年達三百萬噸，佔當年入口石油的兩成以上。八五年以後石油價格下降，情況才稍為好轉。羅國的外債在七一年是十二億美元，七七年是三十三億，八一年已增至一百零二億；為解除外債負擔，免蹈波蘭覆轍（波蘭八一年外債達二百五十五億元），羅共向人民更大榨取，八二至八三年，物價大幅急升，迫人民勒緊褲帶，羅國的外債在八六年終於降至六十億元。

龐大的外債固然拖累羅國經濟，所以羅共急於早日還清債務；但是，造成幾疊債務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官僚的好大喜功、盲目「計劃」，而還債用的是人民的血汗。

總的來說，羅國的工業發展頗為可觀，與一九五〇年相比，一九八〇年的工業產值急增三十二倍，鋼產量增二十三倍，電力增三十倍，機器製造增一百一十倍，化工增一百七十七倍。羅國短

短三、四十年間從以農業為主轉化成工業化國家，勞動人口四成多是工人，農民只有兩成。可是，這個工業化是以對勞動人民的超級榨取，對資源的盡力挪用而取得的，勞動人民沒有從中得益也不認同。也因此，羅共要依賴特別專制壓迫的國家機器（如龐大的秘密警察系統）來維持社會的控制。

尖銳的社會矛盾，使人民在起來推翻壽西斯古獨裁統治時義無反顧，慷慨激昂。短短幾日內，形勢急轉直下：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蒂米什瓦拉五千人上街示威，軍警鎮壓；十七日，上街的人更多，有一萬人，軍警繼續鎮壓；二十日，宣布戒嚴；二十一日，首都廣場工人集會時向壽西斯古喝倒采，軍警鎮壓；二十二日，壽西斯古出走，被捕，迅速被處決。二十二日，「救國陣綫委員會」成立，組成臨時政府。二十九日，羅國改國號。三十日，羅共宣布解散。

人民在理論真空中摸索出路

羅國人民打倒了專制的代表之後，下一步是肅清仍然盤根錯節的官僚體系和國家鎮壓機器，重整社會關係和重整經濟。打倒壽西斯古為上述工作開創了條件，但以往羅共統治的惡果，卻令這個工作倍為困難。在羅共統治下，人民的聯繫組織全被遏制，既沒有知識分子或學生的持續性反對聲音，也沒有工人、農民的自我組織。在思想上，羅共自稱實踐共產主義——這個實踐為人民所唾棄，但人民對這個實踐，對羅國的歷史、對各種議論的批判、爭辯，是幾乎不存在的。於是，推翻了壽西斯古後，羅國社會普遍有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甚至反對「政治」的情緒，卻缺乏對現狀的理論批判，也提不出未來路向。

這個思想的真空狀況，主要是因為民衆力量未能結集。農民一直是消極地表達不滿的；他們用拒交糧食、殺死牲畜的方式回應政權的強迫集體化。在壽西斯古的大型農工遷徙計劃中，他們被迫遷至石屎農工社區，變成農業工人。羅國個體戶只佔農民的一成。對於這個政策，農民儘管反感，但反抗是零星的。

知識分子方面，根本不存在什麼反

對派，僅有幾名流亡作家（如高馬 Goma）在國外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關注羅國人權狀況。學生方面倒還有一些組合，但比起在一九八九年其他東歐國家的學生在民主浪潮中所起的作用，羅國學生便遜色得多。壽西斯古倒台後，在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三、四千名學生舉行首次合法示威，但主題也不過是反對教育部自定冬季學期的事宜，未徵詢學生會意見。起義之後，學生開始自組獨立學生會，但非政治化的傾向頗強烈，學生對各新生政黨的興趣似乎也不大。

工會組織在羅共統治下固然是最受節制的，但是，羅國的工人階級在相對短的時期成長起來，而且集中在一些重要的工業石油化工業、拖拉機及機械設備工業、礦場等，所以，他們有較好的客觀條件進行集體行動。

與其他社會層相比，工人積累了較多與政權鬥爭的經驗。一九七七年八月，日烏河谷三萬五千名煤礦工人罷工，迫得壽西斯古親自介入，答允礦工改善工作條件，事實，秘密警察向工人領袖報復。八一年再次有礦工罷工的消息，據說壽西斯古的座駕直升機被工人擲石。在全國第二大工業中心——布拉索夫，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幾百名紅旗卡車廠工人不滿週日要開工，遊行到礦市黨總部示威，沿途有六、七千工人加入。工人衝入黨部，撕下黨旗，秘密警察出動鎮壓。工人從這次鬥爭中感受到集體力量。在八九年推翻壽西斯古後，紅旗卡車廠的二萬工人，在幾周內進行了三次選舉，選出本廠的「救國陣綫委員會」，決定工廠的運轉決策，此外，因八七年事件被解僱的工人也紛紛回廠。布拉索夫的拖拉機廠也有二萬工人，在九〇年一月五日通過罷工撤換了廠長。由此可見，有鬥爭傳統的工人，在起義後的組織過程表現了較高的民主參與和意識。

踏入九〇年代的羅馬尼亞，在人民起義和軍隊倒戈之後，長期政治箝制突然放鬆，社會上有一種寬鬆自由，人民可高談闊論，上街示威、爭取切身權益，自行組織各種羣衆團體、工會、政黨，而且不懼怕採取鬥爭行動。例如，在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政府頒布新例，規定公開集會要事先申請，翌

日，羣衆上街抗議新例。一月底支持和反對臨時政府的羣衆（各三萬人）分別集會示威。在人民的壓力下，二月一日救國陣綫委員會政府解散，組織新聯合政府。

從上述事例可見，羅國人民所謂對「政治」反感，只是對羅共統治下一切均「政治掛帥」的反感；對「共產主義」的排拒，也是對羅共式「共產主義實踐」的排拒。

人民主動性抬頭的年代

踏入九〇年短短幾個月內，已有過百個政黨成立。民衆自行組織、積極參與基層民間團體或政黨，是人民爭取將權力掌握在手上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羅國人民在起義後表現的反對政治化，反對共產主義的言論、情緒，並不表示人民甘願放棄爭取權力。婦女反對壓迫的鬥爭，頗能顯示這個發展。在壽西斯古統治下，為快速增加羅國人口，實行殘酷的強迫生育政策，導致婦女要非法墮胎，死亡率極高。起義後，婦女迅速爭取到廢除實行了二十三年的禁制墮胎法令，並爭取一系列婦女的權益，例如分晚假由三個月延長到一年，女大學生不必服兵役等。婦女成立了「羅馬尼亞自由婦女全國委員會」，在二月初有三十萬婦女參與，估計幾個月內會增至三百萬人。這個動員組織的規模，既是對以往殘酷壓迫的反彈，同時也是人民有了自信和主動性的反映。人民不僅打破了秘密警察組織網絡的控制，而更重要的，是破除了恐怖、提升了期望；新的轉變不僅破除了客觀障礙，並且是主觀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即人民在思想、心理和行為上更為進取主動，有這點，才有人民力量的發揮，才有人民的參與建立新社會關係。

建立權力歸於人民的社會鬥爭，在羅國仍只是向前邁了一小步。壽西斯古及其家族、親信倒台後，由「救國陣綫委員會」迅速接管權力，這一批人還是舊有的統治官僚架構的人物，以往通過羅共行使權力的官僚，現在改以其他手段維持其權力。在全國上層權力架構平面，「救國陣綫委員會」的成員絕大部分是舊有官僚，它初時宣布不會參選，後來改變政策。在民衆壓力下，它被迫

與新組織的政黨分享權力，在二月一日成立聯合政府，但新聯合政府內一百八十席有一半被它操縱。

在各級政府或工廠內，舊有壟斷權力的官僚紛紛尋求鑽入新成立的各級救國陣綫委員會。羣衆力量與舊有勢力之間的爭鬥更爲激烈，因爲這些層面是羣衆能切身體會的。

今天，人民與官僚的鬥爭，不僅是爭奪政治權力，對國家機器，對物資、經濟運轉、生產成果分配的控制。羅國人民在選擇出路時，由於經濟不可能靠一國的資源來發展，因此要尋求與其他國家建立平等的經濟交往。歷史經驗顯示，當其他國家也是在官僚或財團控制的時候，當其他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也是無權無力時，國與國的平等交往是不可能的。不過，一九八九年東歐各國人民力量的興起，爲這個前景創造了較佳的條件。★



工人是這樣參加了起義

壽西斯古倒台前後

〔這篇直擊報導原載於法國《工人消息報》，經過刪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蒂米什瓦拉（Timisoara）首先爆發示威，反對驅逐托克牧師（L. Tokes）。星期日，秘密警察向示威者開火。

星期二開始，罷工在各廠間蔓延，總罷工開始了。泰米斯沃電廠（Termesvov）委員會的工人說：

「星期二，工廠的工人停了工。大家都來上班，但我們都熱烈討論時局，沒有人動工。星期三，所有工人從廠裏跑出街上。我們來自工廠——這點非常重要——我們不會是流氓。我們是來自工廠的工人（其中有兩個匈牙利裔工人說：「就像一九五六年一樣！」①）；最初走上街的光學儀器廠的工人，是手持旗幟上街的。」

工人自動罷工上街

光學儀器廠工人的隊伍遊行經過所有工廠，沿途呼籲其他工人參加，隊伍愈來愈長，由光學儀器廠的工人領頭。遊行大概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大家齊聲呼叫：「打倒文盲！」、「今日是治安人員，明日是礦工！」、「打倒鞋匠！」②、「壽西斯古滾落渠！」、「我們要你的皮來做鞋！」、「自由！」。所有人都朝歌劇院廣場去。

他們抵達廣場後，一些示威者攀上陽台講話；他們都是自發行動的，因為他們有話想說。我們自動築起了人牆，阻擋治安人員走近。人羣又揪出了五、六個他們認出的情治人員。演講的人即時組成了委員會，名叫「人民民主陣綫」。委員會號召，堅持總罷工，直至壽西斯古下台。旋即，人們自發地佔據了廣場，再不肯交出來。我們輪班接替地看守廣場，而委員會也一直據守在陽台那裏。人民送來食物，築成人牆保護委員會。來自工廠、公司和其他小鎮的消息如雪片飛來，我們將信息傳到陽台那一端。我們也向每個人宣布：「他們

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壽西斯古目睹滅亡之夜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壽西斯古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廣場舉行集會。一個學生說：

「舉行集會是他最後一個錯誤決定……我們透過外國電台及和朋友通電話知道蒂米什瓦拉發生的事。那些官員對壽西斯古說人民支持他，慫恿他舉行大集會。五萬個工人來到了廣場。他們害怕了，叫工人退出廣場，只留下自己人。工人返回近郊小鎮，然而，在回途上，一支支的遊行隊伍卻逐漸組成。有部分學生千方百計返回廣場去。當時，壽西斯古正在滔滔不絕地演講，宣布增加工資和由母親支薪。我們知道這些都是毫無實際的象徵性加薪，都叫它作糖果金。紡織女工開始大叫，學生們則從後面舉着旗幟一直向前推。這個時候，有一陣煙花爆響，剎那間，大家一同大喊：『打倒壽西斯古！』人聲咆哮起來了：『暴君必亡！』警察試圖驅散人羣，但我們跑進小鎮去，在地下鐵路車站一帶重整隊伍，並且把在車站裏的工人叫出來：『和我們一起走！』示威隊伍於是便愈來愈大。

「鎮裏立即響徹口號：『打倒鞋匠！』、『打倒文盲！』、『打倒希特拉—斯大林—壽西斯古獨裁專政！』到了午夜，屠殺開始。」

《羅馬尼亞新聞》報導：

「年青的示威者在火光熊熊之中，冒着特別部隊的槍林彈雨和可怕的催淚彈，異口同聲地大喊：『不要暴力！不要暴力！打倒獨裁專政！』」

坦克在午夜出動，把人羣逼退到共和國大道。來到了大學廣場。隆隆的坦克令稚嫩的心靈悚慄，青春的生命斷送在子彈之下。布加勒斯特人民也數十計地倒下。不過，為生命、自由和民主而戰鬥的人愈來愈多了，夜班工人紛紛趕到，他們很多甚至是從首都數一數二

的大工廠裏來的。

第二天早上。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軍隊、坦克把大學廣場所有通道封鎖了，面向着手無寸鐵的密集羣衆。人羣大部分是年青人、學生、工人。有些壯烈犧牲了，而有些則受了傷，但他們都不肯屈服。他們一起高呼：「站到我們一邊來！」跑到街上的平民都跟着他們走。在最大的工業機構，數以百計、千計的工人、管工和工程師，年青的及年老的，都成羣結隊湧向首都市中心。人潮從四方八面來到這個全國、全首都的中心點。從工廠到工廠，商行到商行，成千上萬人在一條大道上聚集，人羣的一端到另一端長約二公里；此外，有些人駐守在戰略據點；電台和電視台。人們情緒之高昂根本不能用筆墨來形容，他們不斷高喊：「打倒暴君！」、「打倒壽西斯古！」、「自由萬歲！」獨裁者夫婦的官式照像被拋到街上付諸一炬；正是在這裏，軍隊第一次對示威者表現友好。年青士兵和軍官伸出手來迎接示威者，而之前，或本來，他們得向民衆開火。

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人民；軍隊已經站在人民一邊了，人民用鮮花、麪包和牛奶歡迎羅馬尼亞坦克。數小時後，壽西斯古倒台。

工作單位設立救國委員會會議

「阿拉德（Arad）區救國委員會向本區所有企業和機構發出通告。我們建議：

在所有企業和機構的生產單位、工場內召開全體大會，並由全體大會選出地方救國委員會；

工場、生產單位救國委員會由三至五名有能力和有道德信譽的人組成。羅馬尼亞共產黨黨員若過去沒有出任過須負政治責任的職位，也可以成為委員會成員。

這些救國委員會成立後再公選工場、生產單位的領導。在每個企業、機

構，地方救國委員會應在全體大會選出工廠或生產單位的執行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構成如下：一名主席、兩名副主席和其他成員。一切和執行委員會有關的事宜及他們的工作，均須對選民和法律負責。」

（上述通告發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原載於阿拉德區匈牙利裔人報章《現實報》）

「我們的工廠委員會在十二月二十日的街壘上誕生。每間工廠都緊守崗位。當我們恢復上班，我們向工人自我介紹：『這就是我們的委員會。這是臨時會員的名單，你們贊成或反對？』我們拿着這份名單走遍了工場。後來有些人當選、有些人落選，選出來名單有變動。現在，工廠裏每個部門都有一至三個代表，視乎部門大小而定。工廠舊領導沒有反對由委員會監管他們。」

我們保留了專家。委員會監管領導層，後者不可以自行做任何決定。委員會和領導層之間有協議。委員會也負責照顧受難者家屬，協助監管建立自由的羅馬尼亞。」

人民有話要說

在布加勒斯特地下鐵路的牆上，有一張大標題寫着「獨立」的「民刊」海報。一個路人把內容繙譯給我們聽：「我們要繼承獨立報刊的傳統。儘管救國委員會會議通告第六條第四段已取消資訊壟斷，但壟斷仍然存在；我們要打破它。我們不相信任何一個文明社會能有全體一致的見解。我們的文章希望能客觀分析救國委員會會議的活動及我國發生的主要事件。我們的刊物不作人身攻擊、不散布謠言阻撓救國委員會會議的活動。我們希望能樹立批判性、客觀、有建設性的觀點。我們相信，制訂一部選舉法實在刻不容緩。我們建議：

1—解散共黨及與其有關的組織，擄奪這些組織的資產，轉為全國選舉基金；

2—開創合法途徑，讓所有社團得以改組成爲政黨；

3—提供財政資助的合法途徑。資助金額應該有所規限；

4—由各政黨組成委員會，監管基金分配和表達意見的工具；

5—共產黨假如想重組，必須認可

這項法律。

我們對近期事態發展的分析如下：電台報導把〔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一個集會說成是一羣滋事者的行動；電視台在二十七日也作了類似的處理。

但我們的看法完全不同。那次集會的參加者，是鬥爭爆發時最先投入戰鬥的人，然而他們卻被救國委員會忽視了。他們被描繪爲滋事者，是由於他們不同意救國委員會的組成成分——現在有些任職政府的人，根本沒有參加鬥爭。集會者希望把這一點事實客觀地表達出來，而不是質疑他們的位置。這次事件再一次表明，要建立自由的羅馬尼亞，必須要有獨立的報章。我們的報紙要有討論自由。」

在這份民刊的下角，有一些手寫的字：「我們是自動機械學院學生。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可協助刊印你們的報章。」

紡織女工的呼聲

我們和布加勒斯特一間大紡織廠的女工談過她們的需要。當我們問及應該立即實行什麼措施，她們的反應很熱烈，爭相議論：

「首先，應該立即禁止星期日開工。目前，我們每周工作六天、每月有兩個星期日要上班。」

「是啊，我們的時間全花在上班、坐公共汽車和回家睡覺，還要照顧孩子，此外還可以做什麼呢？還可以進修或做什麼嗎？這種情況應該結束。」

「政府必須規定每周工作五天。舊政權的政策認爲除夕和新年開工是正常的事。現在，我們今天就停工，直到一月二日才開工。」

「按目前的工作條件，我們不能照顧子女，甚至沒有機會看到他們。」

問：星期日孩子怎辦？

「我們把他們帶回工廠，放在一旁。這真不是人的生活。首先就應該禁止星期日開工。」

問：舜西斯古下台之後，工廠有什麼改變？

「削減了開工時間。」

「不過，我們的工資和舊政府制訂的『生產合約』的工作，使我們的工作條件不好。」

「我是個合格機器技工，但我找

不到工作，只好來這裡做紡織工人；可是，我連續做了三年，還是沒有認可資歷。」

「是啊。從紡織技術學校出來的年青人都不知道實際會有什麼工作等着她們；她們帶着滿腦子幻想來上班，一開工就發覺現實是另一回事。」

「我們需要停止爲外銷生產。我們要爲自己、爲國家生產，使商店有貨出售。」

「是啊，此外還有工資問題。我們在工廠一般收入一千五百元（羅馬尼亞幣）如果埋頭苦幹，可有二千元。不過，買一件嬰兒衫要六十元，鞋、衣裙要二百至三百元，而劣質的肉類——如果找到的話，要一百元一公斤……我們需要加薪。」

問：政府還應該實行什麼措施？

「我的孩子不能上大學。上大學要付錢或者是靠關係。」

「有些人在電視上用學生的名義說話，但他們毫無代表性。他們是共產黨學生組織的前領袖，指望我們忘記他們過去曾經和前政權同流合污。」

「我們不希望事情繼續一如既往。他們稱之爲『金字塔』……」

「羅馬尼亞社會一向是從上而下運作，上層爲下面的人作決定。」

「早就應該改變這種情況。應該相反，應從下而上開始建設羅馬尼亞社會。」

①匈牙利工人和學生在一九五六年曾經爆發過反官僚起義，詳見匈牙利部分。

②舜西斯古年青時曾經是鞋店學徒，所以有這個口號——編註。★

救國政府和共黨的關係

訪救國政府成員布魯坎

布加勒斯特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布魯坎（Silviu Brucan）教授，是羅馬尼亞的風雲人物。一九六七年，他公開抗議政府血腥鎮壓巴拉索夫工人，令國外熟知他的名字，而他亦因此而下獄。他被釋放後不久，再次向政府挑戰——這一遭，他在羅馬尼亞共黨大會〔推翻壽西斯古之前最後一次會議〕前夕，刊登了寫給大會的公開信，要求他們廢除壽西斯古作為黨總書記的職位。

布魯坎自少年時代已加入共產黨，在抗戰期間曾經從軍，他擔任過黨報《火花報》的總編輯、羅馬尼亞駐聯合國大使、羅馬尼亞電視台總經理和任教布加勒斯特大學社會科學院。現時，他和依利里斯古、馬茲盧（Dumitru Mazilu）及羅文（Petre Roman），都是羅馬尼亞救國陣綫政府舉足輕重的人物。①

布魯坎表示願意做支持者多於政客，他笑着對記者說自己是個「黑手」。無論如何，他是斷然決定處決壽西斯古的其中一人。作為救國陣綫行政部的一員，他宣稱不要官銜和辦公室，並說：「讓位給年青人，他們一直幹得很出色。」

現年七十三歲的布魯坎，側面輪廓看起來像一頭鷹，他現時在外交部的辦公室過着隱居般的生活。辦公室的窗簾長期閉上，他解釋說這是基於保安理由，因為隨時可能有遠程來福槍瞄準他。

□記者

■布魯坎

□：有很多批評說，救國陣綫委員會和新政府被前共黨成員壟斷，救國陣綫只是羅馬尼亞共黨的變種。

■：這種說法是荒謬的。羅馬尼亞共黨從沒在這場革命中出過任何力。在東歐其他國家，變革來自共產黨體制內的改革派動力或人民的壓力。

不過，羅馬尼亞這場革命，並不是那樣一回事。共黨是壽西斯古的體制，

而壽西斯古體制也就是共黨。人民的起義把共黨和獨裁統治一起掃走了。救國陣綫沒有共黨的存在，將來也不會有。共黨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已經聯同壽西斯古的獨裁統治一起毀滅，它已經成為歷史的見證，它的故事已告終結。

救國陣綫政府有大量前共黨官員

□：或許是吧，不過，操縱大局的仍是昔日共黨的黨員呀？

■：我重複一遍，羅馬尼亞的共黨——世界上各個共黨，已經由瘋狂的獨裁者壽西斯古、波爾布特、毛澤東和斯大林弄得政治破產，再不會有任何政治前途。基於種種社會因素，它們只可能存在於社會落後的國家。

□：救國陣綫的其他前共黨成員，和你這個前共產黨員的想法一樣嗎？

■：廣義來說，是的。我們的確曾經是共產黨員，也在這個制度下生活過；但是，我們也反對過它，反對過壽西斯古。你知道依利里斯古（現救國陣綫委員會主席）為何被逐出共黨嗎？當他任水務局長時，他寫了一個報告，揭發了國內災難性的環境問題。他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卻被政府罷免了。全國人民都知道依利里斯古是壽西斯古及其政策的堅決反對者。那些從不敢說一句話反對壽西斯古的人，沒有權利批評我們曾經是黨員。

□：可是，他們曾經擁戴壽西斯古上台？

■：是的，但誰知道一個政客將來會不會成為暴君或強盜？重要的不是誰支持過他，而是誰站出來對抗他——很少羅馬尼亞人這樣做。

□：我想再問一次，為什麼你們的政府裏有那麼多共產黨員？

■：臨時政府組織仍未完善，當組織好後，你會發現各部長會是來自不同政黨的。我們委任的新文化部長皮列蘇（Andrei Plesu），是人所共知的反共主義者。

□：救國陣綫委員會委任部長們，但是誰委任委員會呢？

■：它是和起義行動同時自發產生的，正如這是一場自發性的革命。我們是一個左翼政治團體。我重複一次，是一個左翼政治團體，而不是一個黨；救國陣綫委員會現時由三十九人組成，遲些會增加至五十人，那麼，每一個羅馬尼亞的行政部門都有代表在其中。

□：救國陣綫會參選嗎？

共黨有權參選

■：我們會在各地推舉候選人。救國陣綫會投票，但我們會把權力移交給國會大多數組成的新政府。權力將歸回政府。同時，最高法院有責任保證司法獨立。所有政黨都有權參選，包括共產黨——如果它仍存在的話。無論如何，即使共黨參選，我想它不會取得多過5%選票。

□：壽西斯古受裁判及處決的方式，引起世界爭議，你認為你們沒有犯了政治錯誤嗎？

■：那是生死存亡的關頭。革命開始，我和依利里斯古、馬茲盧及羅文一直逗留在國防部，直到壽西斯古被處決後才出來。當時情況十分嚴峻，壽西斯古和他的妻子乘直升機逃走，在布加勒斯特西北的查哥里斯特（Targoriste）降落，企圖在那裏乘車去保坦尼（Boteni）的軍用機場，那兒已安排了一架飛機，準備接載他們去北非某一個國家。

□：利比亞？

■：我們也不能肯定，但很有可能是的。當他們的直升機降落後，他們立即被當地的農民和民兵抓住。機師等不到他們，便向秘密警察通風報訊。於是秘密警察襲擊查哥里斯特，企圖營救他們。我們獲知是次襲擊釀成傷亡慘重，所以決定盡快審判壽西斯古。假如秘密警察救出他們，羅馬尼亞可能陷入一場血腥的內戰。我們沒有選擇餘地；軍隊

肯定敵不過秘密警察。

□：是誰決定進行審訊的？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的？

■：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由十一人組成的救國陣綫行政部決定的。審訊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進行，他們在中午即被處決。

十一人行政部決定處決 壽西斯古

□：哪些人是行政部的成員？

■：依利斯古、馬茲盧、羅文和我，還有一些人，基於保安理由，不便公開他們的名字。他們是一些和我們一起在國防部的學生們。

□：你會否高估了敵人的力量？秘密警察真的能夠成功營救壽西斯古嗎？

■：你不懂得，他們是專業的秘密警察，經過嚴格訓練，配備先進的美國武器，絕不是我們軍隊那種舊式蘇製衝鋒槍。他們的槍裝置了紅外線。我自己曾在委員會的總部見過十一個士兵在晚上被殺，子彈直射進他們的前額。那段時期，我們只乘坐裝甲車出入。每一次，我們的車輛都受到他們的射擊，他們知道我們在車裏，他們真是無處不在。

救國政府把秘密警察編入軍隊

□：他們有多少人？

■：約有五至六萬散布於全國，他們比我們的軍隊精幹。不過，壽西斯古被處決後，大部分人都投降。他們被繳械後，經過重組，被編入正規軍隊。我們要給他們重生的機會，不能逼虎跳牆。而秘密警察的主腦人物將會被審訊，普通人員則不會。

□：由誰來審判？什麼時候？

■：由剛成立的特別軍事法庭主持。審訊的時間多的是，我們不用着急，因為他們沒有威脅力，軍事狀況已經穩定下來。目前，只剩下少數好戰分子仍持着遠程來福槍恐嚇我們，他們企圖暗殺我們，以終止這場運動。所以我們不離開這裏。我們處決壽西斯古的決定十分公允，不單是為了令秘密警察投降，更因為人民渴望處決他們——我們是知道的，在政治領域裏，這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在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國外的保留之間，我們當機立斷，處

決了壽西斯古夫婦。你知道嗎？看守壽西斯古夫婦的一百二十個士兵，全部自薦執行處決呢！我再強調一次，他們一日不死，國家便有很大危險，我們犯不着冒這個險。不考慮這一點的人都是發白日夢的。

□：軍隊可靠嗎？

■：我們一直很信賴軍隊，但除了那些將軍們。有一些將領被革職了，他們在重要關頭，沒有堅決的站到救國陣綫這邊來。

□：他們會被審訊嗎？

■：一般來說，我們只會審判證據確鑿及肯定要負上責任的人。我們不願國家陷入復仇的氣氛，也不要每人都作出交代。過去在壽西斯古的高壓統治之下，很多人都失去了勇氣；曾經屈服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回復自尊。國內的確瀰漫着復仇的欲望，可是，我們必須抵擋這股欲望。而我認為，復仇的意欲是指向壽西斯古的。當人民冷死街頭的時候，他正在把千百萬元偷偷轉入自己的瑞士銀行戶口……這一點，人民是深刻難忘的。

□：你有證據指出壽西斯古斂財嗎？

■：瑞士已通知我們，將把壽西斯古在當地的存款退回給我們。壽西斯古的弟弟馬寧（Marin），當了十五年駐維也納貿易大使，是他替壽西斯古存款入瑞士銀行的。他死了〔他被發現在他的大使館地庫裏懸樑自盡〕。而壽西斯古的三個子女，他們每人都有存款十一萬英鎊，而羅馬尼亞普通一個工人平均月薪卻只得一百八十五至二百二十英鎊。依蓮娜每年都存三千五百英鎊進每一個子女的戶口，那簡直是強盜的行為。

□：有些傳說稱秘密警察之中有外國人，你知真相嗎？

■：這一點，我們得審慎調查。不過，事實上，一些來自阿剌伯國家的學生，在一個特殊秘密警察營內受訓，而他們的領導人是壽西斯古的另一個弟弟，他們在營裏接受游擊戰和恐怖主義訓練。

□：米尼亞（Mileal）將軍是自殺的嗎？

■：他反對壽西斯古運用軍隊鎮壓示威者的命令，所以被暗殺。

□：但軍隊那時已經向羣衆開了槍？

■：那只是在蒂米什瓦拉，而不是在布加勒斯特。關於米尼亞之死，有兩種說法，其一說壽西斯古親手殺他；另一說法是被他的兩個近衛謀殺。我們仍在調查之中。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會在短期內為米尼亞將軍舉行國葬，並授以勳銜。

〔原載於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英國《衛報》周刊。訪問者是法國《世界報》記者馬里翁（G. Marion）〕

註釋：

①布魯坎已在一九九〇年二月四日辭去政府職務；他持的理由是：「政壇有太多野心家。」——編按 ★

工廠內的革命才剛開始

訪全國最大工廠的工人活躍分子

〔羅馬尼亞第二大城市巴拉索夫是工業重鎮，一九八七年曾發生過一場工人起義，深富工人戰鬥性傳統。市內有一所全國最大的貨車廠「紅旗貨車廠」，僱有二萬工人；隣近的「能動拖拉車廠」也同樣有二萬員工，兩廠工人總數佔巴拉索夫一成人數。以下三位受訪者都是和上述兩廠有關的工會活躍分子：

●杜都斯（Eugen Tudose），「紅旗」廠工人，因一九八七年事件被捕及流放外地，至九〇年一月八日才回國。

●伊安尼斯古（Ovidiu Ionescu），也參與了一九八七年起義，他當時是兼職學生，僥倖沒有被捕；伊一直是「紅旗」廠工人，兩個月前才離職，在一間小工廠內當工程師，但他和「紅旗」廠工人保持密切聯絡。

●丹尼拉（Juliu Danila），是三十八間工廠（包括「紅旗」廠和「能動」廠）的統籌中心的工程師。

訪問者是《國際觀點》記者伏尼（G. Foley）和美國明尼亞波里斯一份鐵路工會刊物《直鐵軌》的記者韓達信（L. Henderson）。這個訪問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在「紅旗貨車廠」進行〕

□ 訪問者 ■杜都斯〔杜〕，伊安尼斯古〔伊〕，丹尼拉〔丹〕

□：一九八七年的起義是如何開展的？

■杜：首先我必須說，很高興我回來了。那次示威後，我一直渴望回來。這是我的地方。惡劣的生活條件導致了示威；工資低、社會補助差，管理階層從不正視工人提出的問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的示威由這裏開始，我們呼籲其他人加入；我們由布加勒斯特大道遊行至市中心，沿路有很多人加入。出發時我們只有約七百人，但到達市中心時已有七至八千人。在共黨分區總部大樓前，羣衆高呼：「我們要求權利。」遊行期間，他們喊出要求更高工資和人權的口號。

在分區黨總部大樓，市長出來與示威者談話，但卻激怒了他們。他說：「你們今日是勇敢的，但且看看你們明日及以後如何勇敢。」羣衆在此之前都是和平的，但聽過市長講話之後，他們便強行衝入大樓，打碎了所有窗戶，並痛打了市長。他們闖入大樓，發現了為後日舉行的慶祝大選勝利活動而設的滿桌子食物。他們卸下掛在牆上的壽西斯古像及黨旗，但沒有除下國旗。他們在這裏搗亂了一個半小時，然後去了本地的黨委員會總部，照樣搗亂。在那裏，沒有任何人出來說話，那些人早就像過街老鼠般逃竄了。

之後，秘密警察和軍裝警察出現，以警棒及水砲驅散示威者，並展開拘捕。我不是在那天被捕，翌日他們來我家帶走了我。他們在一高層樓宇內攝下一切情況。

□：誰帶領示威？官方工會有沒有擔當任何角色？

■杜：工會只屬紙上談兵，工人諷稱之為「老祖母」。動員是自發的。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是星期日，工人被召開工，他們在各自單位聚集，開始議論紛紛：「我們是什麼？是動物嗎？我們什麼權利也沒有，收入不好，現在甚至要我們在星期日開工了。」

□：一九八七年示威與目前的形勢有什麼關聯？推動成立自由工會是否因為官方工會毫無作為？

■杜：目前的形勢對於人們來說是嶄新的，令他們目瞪口呆，不懂得如何利用時勢，只有小部分人明白應做什麼。

■伊：我想一九八七年及目前的形勢是有關聯的。羅馬尼亞人被八七年的事件震動了，他們了解到，若團聚在一起，可以是強而有力的。他們並不能忘記這一點。

□：舊的工會還存在嗎？

■杜：舊政權的所有結構已經解體了，黨青年組織及工會都不復存在。

□：工人的自衛組織是否在這裏組成的？

■杜：軍隊只在緊急關頭才將機關槍交予國民警衛軍。國民警衛軍約在二十年前建立，以保衛工廠及戰略性重點，差不多由國內每一個男人組成。壽西斯古沒有料到國民警衛軍竟然會反對他。但工人總不能自相殘殺。他們有時接受軍事訓練，因而懂得開槍，有制服。在軍官授令下，工人取得槍械，保衛工廠。他們由軍官指揮。

□：誰在工廠指揮國民警衛軍？

■杜：是軍隊。國民警衛軍總部以前存在，但歸併了入軍隊。

工廠內的救國陣綫

□：救國陣綫在這裏有沒有任何分支？

■伊：在這工廠內組織了救國陣綫，但有一些困難。有些人不喜歡紆尊降貴與羣衆一起，他們只想保持原位。

□：管理階層及官員希望保持原位？

■伊：是的。這構成一個很大的問題。羅馬尼亞人並沒有政治觀察力，普通百姓只有有限的政治經驗。

■丹：剛開始時，管理階層建議維持舊架構，所有人都等待上級下令。大部分人均沒有勇氣做任何事。但亦有部分工人想做點事情，他們是政治上較先進的。

起初，一羣人在統籌辦事處自選為救國委員會，他們有十一人，全是過去的主管。人們都很詫異。於是便有人建議委員會擴大至二十一人；因為，主管只有十一個，若委員會能擴大了，則工人亦可以參與。主管們不能表示不願有工人參與，只能爭辯說十一人是較好的數目。他們知道不能激怒全廠數以千計工人——經過一九八七年後，可以發生另一次起義。

■伊：管理階層並不愚蠢。在革命後，他們說：「你們現在自由了，想有

多少工會便有多少工會，不一定只要一個。」他們的目的是要分裂工人。我們還在起步點。工人在不同的工廠裏開始接觸，不久便會有所發展。

工人組織自由工會

□：在部門層面是否已有自由工會？

■社：我們嘗試組成一個初級階段的委員會，明天將會選出代表。基本的意念，是每一個部門均有一名代表。這裏有很多部門，而所有代表應聚合在自由工會的總委員會中。委員會必須能有機會討論，並且能夠解決問題。在革命之前，只能討論問題而不能解決；我肯定，從今以後，所有問題均會由工人權力來解決。現在我們正建立一個真正的工會。

■丹：在我們的中央統籌處，我們選舉了二十一人而非十一人，但情況並無改善。那些老闆們推薦他們的追隨者，追隨者又推薦他們，結果是他們互選對方。但這個選舉結果將一觸即發，徹底改變。

明天的選舉將是真正的選舉。人們舉行了多次示威及騷亂，說：「不要忘記，權力已經在我們手中了。」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新選舉，有些人感到害怕，但示威有足夠壓力迫使新選舉舉行。我們建議新選舉用另一種形式進行：我們給人們一份職員名單，進行不記名投票。我們處在開步階段。在其他一些工廠內，還沒有過任何自由選舉。

□：你相信工人能控制工廠？

■社：開始的時候將會很困難，因為工人仍未有政治醒覺；肯定會出現很多錯誤，因為他們仍未知道怎樣去產生一個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組織。不過，隨着事態的發展，大家都會學懂，如我一樣，會學懂什麼是自由及民主。也許你們可以幫助我們，因為你們有經驗。

□：前共黨工會領導人、主管和他們周圍的人都有豐富的掌權經驗，所以將有一場鬥爭。你認為你會贏嗎？

■社：我甚至不問自己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已經贏了；我們已將權力及管理層從黨和國家的活動中分家。我們不能接受工會內有任何管理層代表，因為他們的利益不同。

■丹：對於秘密警察的消失，我們

非常高興。他們令到人們沉默，現在人們可以自由會面及談話。

救國委員會監督工廠管理

□：救國委員會及自由工會之間有什麼關係？

■社：正如救國陣綫政府領導人埃利伊斯庫所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組成工會，不須有國家的指令，不再會有禁制。救國陣綫將會接受所有工會，彼此是一種合作性，而不是從屬的關係。工會絕不會接受救國陣綫的指令。我們將爭取救國陣綫接納我們的要求。我們希望意見不要太紛紜，而只有一種意見。

□：在工廠內，自由工會和救國陣綫委員會的關係如何？既然兩者的領導人都是由同一羣工人選出，他們之間的關係怎樣？

■社：人們不能同時兼任救國陣綫委員會成員和工會的領導人。救國陣綫有非常清楚的地位，關注秩序、組織及實際問題；工會則着力於人文興趣、社會補助及人權問題。

□：你認為救國委員會是管理工廠或監察管理層的機關嗎？

■社：委員會是要監察管理層，而不是管理工廠。在革命初期，救國委員會一度管理工廠，但當管理層回來，他們重新接手管理。救國陣綫委員會現在視察着他們，以肯定他們不會進行任何陰謀破壞。

□：有沒有任何要求選舉工廠管理層的叫聲？

■丹：有一間拖拉機廠換了一個經理。救國陣綫委員會因為罷工而撤換了主管，這是一月五日發生的事，當時曾發生戰鬥。

□：為什麼是救國陣綫委員會而不是工人撤換主管？

■丹：工人們不知道誰是勝任的工程師。

工人和舊管理層的鬥爭

□：還有沒有其他在工人壓力下撤換經理的事例？

■丹：公共交通工人昨日舉行了罷工，要求驅逐他們的經理霍里亞將軍（Folea），霍里亞也是該市救國陣綫的成員，是混進去的。工人要求除去他以上兩項職務，他們不自稱為罷工，而

是說：「我們在開會。」當被問及何時結束會議時，他們只答：「不知道。」

□：你認為，在拖拉機工廠中的救國陣綫委員會有代表性嗎？

■丹：它是由廣大的羣衆選出來的。委員會主席從過去工廠經理的手中接了權力。

舊主管用他的花紅買酒給他的密友，並在革命後把偷自外國送來的救濟品送給他們。他對他們說：「兄弟們，我要離開了，因為他們驅逐我出去。」他們回答：「我們的父親！要走了嗎！」他們喝得醉薰薰，場面很激動。

那舊經理把他的密友叫到離別舞會上，他也呼籲所有有話要說的人去那裏。但當其他人來到時，發覺滿場都是醉薰薰的舊經理的同伙，而且還在開始呼喊支持舊經理的口號。有人通知了在布加勒斯特的救國陣綫，他們派來了尼古尼亞斯古（Sergei Nicolaescu），他是陣綫成員，也是一名導演。在打鬥開始時，他正好在場。在擾攘結束後，喝醉酒的人都被送回家，而在場工人羣衆的主流意見是：「我們不要這個主管。他偷取人道援助，他的事業完蛋了。」

工人當時在工廠並不很有組織，但他們知道再不要這個經理了。

□：這間拖拉機廠的工人是否較其他工廠進步？

■丹：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後，這間工廠均有小規模的罷工。由於有罷工的歷史背景，工人來得較有組織。中央統籌處也設在貨車工廠同一大廈內，因此，這裏有兩層管理階層。

不過，這裏的官僚和舊政權的人，如告密者，比其他工廠更多，管理層也很強。很多人仍然害怕。中央統籌處的年輕人正嘗試組織一個工會，但管理階層卻用文書工作來束縛我們。他們說：「沒有從事政治的時間。」並且要我們把同一份統計表做兩三次。

■伊：（向其中一個訪問者韓達得[韓]問）在美國，你們的工會有沒有這種趕走主管的權力？

□韓：沒有。所有老闆都享有私產者的特權。工會對企業管理全沒有發言權，至多只能爭取較佳待遇和工作條件。

■伊：但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韓：不是所有時候都可以。過去十年，由於工會領導層非常差，老闆們可以削減我們的工資、減少醫療保障，要我們工作更長時間。

■伊：我們希望能夠改變很多事，不過我們的工會還是初生嬰兒，必須學習說話、行路。

■丹：最重要的事情是學習為自己着想。★



巴拉索夫拖拉機廠（鍛鑄組） 救國委員會綱領草案

巴拉索夫拖拉機廠T32組（鍛鑄組）救國委員會

- 1—企業的工作非政治化。
- 2—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寫作自由而不受限制、不受恐嚇。
- 3—成立一個鍛工自由工會，以維護工人利益；工會領袖由自由選舉產生。
- 4—如本部門職工全體作出緊急要求，工人可依法罷工，可派出代表與管理層商談重要問題，如工作問題、工作環境、薪金及工人的社會地位。
- 5—工人有權與企業內其他委員會和企業外其他會社團結。
- 6—為保障工人有文明、有尊嚴的人生，應改善工作環境。
- 7—進行每日工作八小時，如管理層要求工人加班，可與工會協議，並依勞工法規定的工資比率，發放額外工資。
- 8—星期日須定為假期。
- 9—重視重要節日（如復活節、聖誕節），給予工人假期。
- 10—每周工作日減少至五天。
- 11—企業和社會向鍛工提供免費醫療及社會福利。
- 12—為了實行由T31（生產服務）指定的生產計劃，我們有下列要求：
 - （1）根據基本技術標準穩定地供應基本物料及能源。
 - （2）確保技術能力。
 - （3）確保能根據製造商提

供的運作手冊，定時維修廠內機器及設備，並有後備配件。

（4）確保有足夠維修、技術監察及各級生產人員。

13—採取以下措施，以穩定危險部門的合格勞工：

（1）追補第一組退休金予所有員工。

（2）給予員工預防中毒的食物；因工中毒的員工可得額外花紅。

（3）員工如有特別健康問題，可享受免費醫療服務。

（4）根據員工、薪金、保護及工作等情況，制訂一個鋼鐵生產制度。

14—廢除要求無兒女士繳交捐款的規定。

15—不硬性規定勞工與技術人員之薪金，而是據他們工作的質量計算。

16—給機器部小組委任一主管，負責管理修理事宜及後備機件。

17—為T32部門的全面檢查，作好準備。

18—簡化參與生產的員工之合約。

19—準確釐訂技術員工及生產員工的角色（檢討企業職級表）。

20—本部門員工可優先獲得解決住屋問題。

21—工人有義務遵守科技操作標準以保證生產素質，否則，將受有關法律行政制裁。

22—以物質鼓勵新發明、新方法，從而改善效率。

23—把高熱部門設於另一所自管的工廠，方便錘煉及鑄造零件。

我們作為自由工會，呼籲所有工人遵守工作紀律及聽從技術專家指示（包括電機技工、管工、技術員及生產管理員），我們需要這些專家。

高級技術員作出的所有決定必須經過理性與共同分析。

我們呼籲所有工人不要作出流氓行為、報私仇；要學會個人教養，遵守國家法律及共同工作的規則。★

巴拉索夫拖拉機廠（鍛鑄組） 自由工會章程

- 1—T32自由工會建基於：一依從工廠作業原則；二搞好工廠、部門及企業管理，以保障會員利益。
- 2—T32自由工會採用自願參加原則。
- 3—所有決定採用簡單絕對多數票通過（50%以上票數），但罷工決定要全體會員三分二票多數通過。
- 4—每月至少舉行一次工會會議；若三分之一會員認為有需要，工會亦須召開會議。
- 5—與其他行政機關的交往，皆由工會領袖或兩名領導層人員接洽。
- 6—工會領袖及其兩名代理人由民主選舉選出，任期約一年，不能連任，及十年內不能出任四屆以上。
- 7—工會領袖及領導層人員不能出任政治職位，以免受主觀主義影響。
- 8—工會領袖須與工會協商及受工會委託，才能下決定。
- 9—當工會認為領袖及其代表不稱職時，只要過半票數通過，即可撤換。
- 10—提名誰參與更高層工會應個別地作出，不應內定名單；候選人不能是地方工會領導。
- 11—地方工會領袖及代表的權利，不可多於工會會員。
- 12—改動章程須經工會正式會議過半數（50%）絕對多數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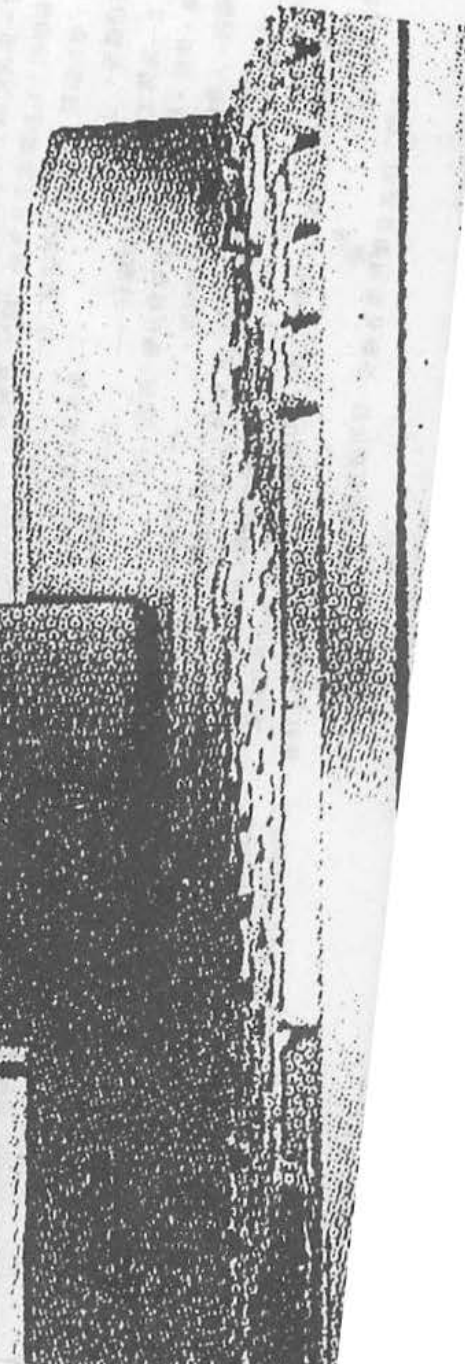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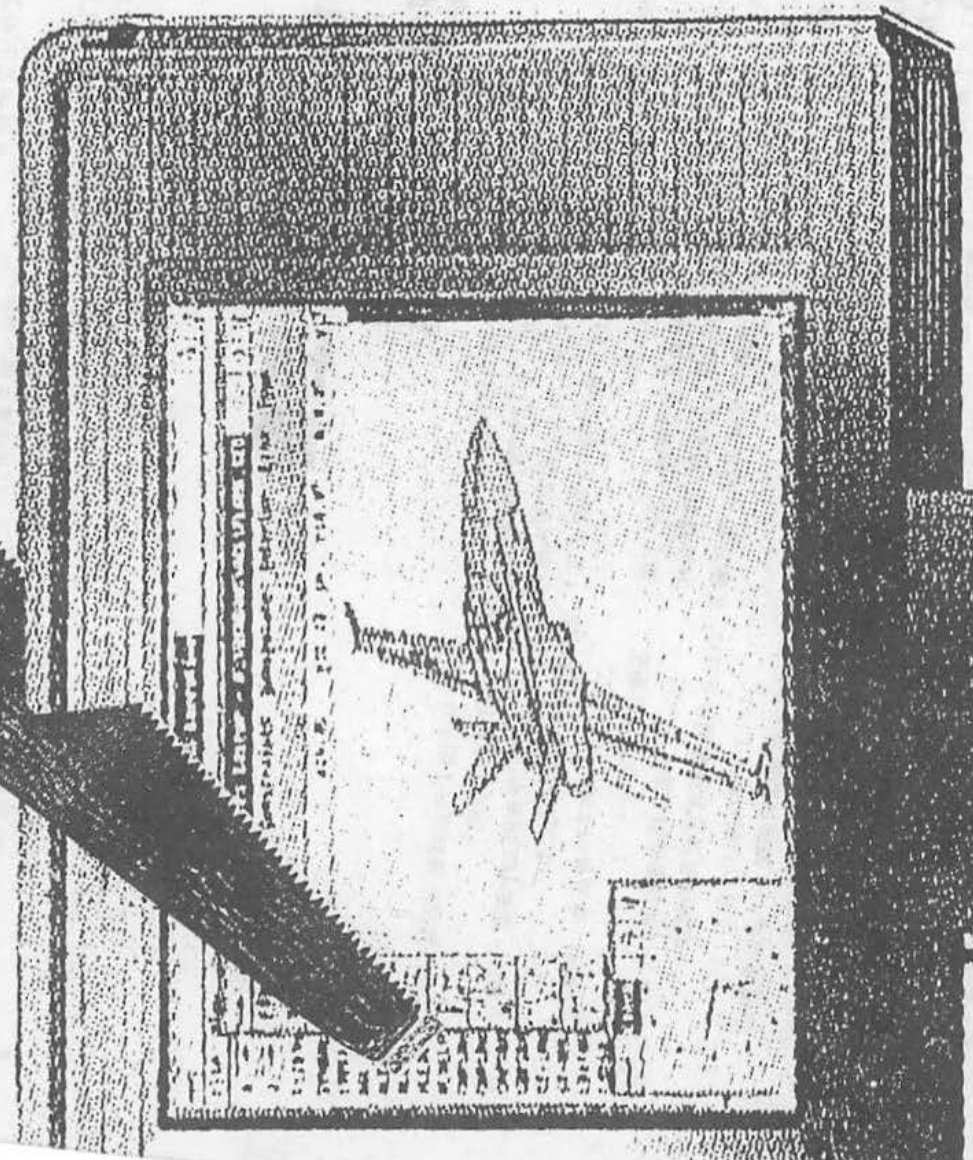
印刷工會及記者工會 第一次大會綱領

- 羅馬尼亞印刷工人及記者自由工會將爭取下列權利：
- 1—出版自由。
 - 2—印刷工人自由工會聯會以及記者工會內各式結社的自由。
 - 3—每周工作不可多於四十小時。
 - 4—為印刷工人及出版職工提供最佳工作環境、保溫設備、燈光、清新空氣、運作正常的工具及工作時間調整。
 - 5—提供工業安全及衛生設施。
 - 6—工人有權請願、示威、罷工，以維護工會會員之利益及基本人權。
 - 7—恢復印刷工人工會及記者工會的舊有權利，包括降低退休年齡、縮短工時、增加假期，工人在惡劣環境工作可獲賠償等。
 - 8—保障工會成員的社會權利——就業、休假、接受教育、享有社會及醫療福利、人身保障及美好工作環境等。
 - 9—公衆假期、宗教節日假期為有新假期。
 - 10—保障年青印刷工人及新聞工作者的特別權利。
 - 11—新聞工作者有權搜集各種資料，以確保新聞工作自由。
 - 12—取消一九七四年訂定的新聞法及所有限制新聞工作者及印刷工人權利之規定；修改及制訂新聞法等新法案，須諮詢工會代表。
 - 13—新聞業所需設備，如打字機、錄音機、照相機、錄像機、複製器材、電子計算機等，可獲減價及優先購買權。
 - 14—重新承認新聞業運作所需的權利，例如記者採訪時可乘搭海陸空各種交通工具；免費贈閱各報章及電子傳媒報導，可免費出席文化、藝術表演及體育賽事。
 - 15—按新聞工作者及印刷工人的專業水準發放薪金，並尊重員工的尊嚴。
 - 16—若文章有助報紙銷路，作者可得額外花紅。
 - 17—工會頒獎予年中有傑出表現的新聞工作者及印刷工人。
 - 18—爭取員工有機會修讀不同課程（包括錄像課程），加強外文知識。
 - 19—近年未獲證書的新聞工作者，皆可獲得頒發。
 - 20—員工因工作或採訪而惹起任何官司，皆可獲法律援助。
 - 21—新聞工作者因工作需要，可得國內及出國交通費折扣價。
 - 22—設立新聞工作者基金、印刷工人基金及假期基金。
 - 23—成立審裁局處理新聞工作者的訴訟及有關取消專業資格的訴訟。
 - 24—工會要保障言論自由，阻止以任何方法企圖強迫新聞工作者背棄良知及信念，寫作或出版謊話文章。
 - 25—在獨裁統治期間，新聞工作者及印刷工人在從事工作時受到阻撓，或因相反立場、支持民主而遭解僱者，應予平反，及可獲賠償。
 - 26—發還原有記者工會的財產。保障印刷工人自由工會聯會和記者自由工會的財產。
 - 27—以歐洲普遍認同的水平為標準，為印刷工人及新聞工作者設立退休金；工會亦會發放額外退休金。印刷工人自由工會聯會及記者工會有各自獨立的出版喉舌。★



蘇聯

it n
moi
pov
moi



蘇聯官僚改革造成巨變

葉新

蘇聯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領導推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最近兩年國內出現的工人運動和民族運動浪潮，東歐的巨大變化，以至蘇聯政權體制的改變，都與他領導的改革不無關聯。在這些改革的背後，是蘇聯在八十年代面對的重大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

改革的原因

二十年代斯大林奪得大權後，進行農業強迫集體化，大力發展重工業，進行粗放延展式的發展，投入大量資源和人力，取得可觀的經濟增長。同時，斯大林大規模清算黨內、軍隊和社會上的異議聲音，對全社會實行暴力獨裁統治。在他死後，這個生產和統治模式，已令社會和經濟深陷危機，迫使赫魯曉夫在六十年代進行一些改革。但改革受到保守的官僚層的反對，又因為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的影響而中斷。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保守因循政策，令政治更為腐敗。粗放式生產在蘇聯已到了盡頭，但在斯大林式官僚獨裁統治之下，也沒有轉向集約式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條件。經濟增長進一步減慢，到七十年代後期基本上已停滯不前，生產效益更每下愈況，投資龐大，回報卻少，科技發展停滯，食物和消費品短缺更趨嚴重，質量也愈來愈差。人民的生產積極性極低，勞動生產率下降，人力資源嚴重短缺。經濟和外貿愈來愈倚賴高成本 and 資源逐漸枯竭的原料開採。不顧後果的生產開採，令環境生態問題極嚴重。社會服務、教育、醫療衛生素質劇降。社會問題激增，酗酒、離婚嚴重，犯罪率劇升。人民對前途感到灰暗、沮喪、冷漠、疏離。這個社會死氣沉沉。

官僚統治愈來愈腐敗，缺乏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甚至出現黑社會或罪惡官僚集團。在經濟增長率跌到低過歐美國家之後，官僚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和「追上歐美」的神話已不能再維持。官僚統治的合法性受到根本的質疑。

在美國里根政府擴展軍備競賽的壓力下，蘇聯經濟也不能承受已佔國民生產總值二至三成的軍費負擔，這論增加它了。

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全面爆發的威脅下，迫使戈氏進行由上而下的改革，但嚴峻的局勢也束縛着改革派官僚的活動空間。

「開放」與「經濟改革」

數十年來形成的龐大保守官僚層，早在六十年代的改革中，證明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工人在官僚專制統治和消費品普遍短缺的情況下，缺乏生產熱情，並與企業官僚達成某種妥協，合作應付上級官僚和計劃。

戈氏推行「開放」改革^①，揭露社會和官僚等多方面的問題；又有選擇地平反過去的歷史，如贊成市場和向農民讓步的布哈林及平反莫斯科審判案的大部分受害者（但沒有平反托洛茨基），將問題推到斯大林身上。戈氏希望以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和譴責官僚，喚起人民的改革熱情，為經濟改革爭取合法性和支持。

在對外關係和軍事上，戈氏提出大量裁減軍備，鼓吹各國統治者和平共存，並逐漸撤回對東歐的經濟援助和對這些政權的支持，以集中資源應付國內的問題。

在經濟和管理制度方面，戈氏推行多方面的改革，包括增加國內生產投資、減少消費、減少入口食物和消費品；官僚上層人事變動；推行禁酒、品質管制和反對不正當收入運動；又通過農地承包試驗計劃、新工資制、新企業管理法、個體勞動法、合作社法，以至一九九〇年二月的土地出租法等。

不少改革如禁酒和品質管制運動，並未觸及問題的根源，只能取得短暫和表面的效果。一些運動，例如反對不正當收入運動，更被中層和地方官僚利用來加強壓榨和迫害人民。龐大的官僚層

阻礙和扼殺了不少改革，例如農地承包試驗、企業管理改革等；一些改革則直接影響到大部分工人的收入和權益，引起工人不滿和反對，例如新工資制擴大了工資差距，令很多工人收入減少。此外，容許解僱工人的措施，幾年下來造成三百萬工人失業，此外輪班制等措施也加強了工人的勞動強度等等。個體勞動法和尤其是合作社法，容許社會一部分人利用社會上供求的嚴重不平衡而攫取高收入，加劇物價上漲，擴大社會不平等和生活壓力，令人民普遍不滿。

表面上浩大的經濟和體制改革，實際上受到根深蒂固的各級官僚的巨大反抗；同時，由於要工人階級負擔改革的代價，已經遭受工人明顯的反對。因此，改革剛起步，便不敢進一步推行。直到今天，真正而深刻的經濟改革並沒有出現，反而造成經濟情況更為惡化。

蘇聯經濟現在普遍停滯，甚至減產，國家預算赤字達到國民總產值一成以上，通貨膨脹率也高達10%，外債迅速增加。經濟癱瘓和基礎設備失修，加劇了各種困難。食物、日用品、燃料等的短缺更為嚴重，連麪包也出現短缺。

工人運動興起

「開放」改革和因此出現的政治自由化，令工人不再忍受官僚的貪污、壓迫和特權，也不再忍受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惡化；更重要的，是工人不再害怕表達不滿和付諸行動。工人與企業官僚過去的合作妥協關係也因此終結，轉而採取獨立的行動來對抗整個官僚統治制度。

工人的不滿爆發為廣泛的罷工。最矚目的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在西伯利亞中部和北部、烏克蘭、卡扎斯坦等多個地區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見另文〕

佔全國礦工五分一的25萬罷工礦工，廣泛成立了罷工委員會，向政府提出多項要求，包括針對生活困難、惡劣工作條件、衛生安全、工會權利、環境

生態問題、企業和地區經濟自管、合作社問題等。一些地區更提出取消一黨專政、權力歸蘇維埃、直接選舉人民代表、撤換地方官僚、成立獨立團結工會等。工人的要求明顯指向管理生產和成果的整個權力制度和官僚架構，要求工人民主管理權力。在罷工期間，礦工表現了高度組織和管理能力，成立工人民兵，控制生產和管理社區事務，禁酒等，基本上接管了地方政權。在罷工暫時結束後，罷工委員會轉變為長期運轉的工人委員會。

礦工大罷工加速了其他工人不滿的爆發。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全蘇聯的罷工已達到二百萬工作日；下半年這個數字劇增，令全年數字達到七百萬工作日。

工人成立罷工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工會等，並尋求建立廣泛的聯繫。一個「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已宣告成立，嘗試發展獨立的工會運動和清晰的社會主義傾向。

一九八九年廣泛興起的工人運動，是蘇聯工人階級自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以來最重大的覺醒和自覺動員，有劃時代的政治意義，標誌着工人階級再次踏上政治舞台。

工人運動的興起，迫使傳統上支持改革而視工人為保守、落後的知識分子，重新評價工人的政治角色。以往在異議運動中的左翼，更積極籌組成立社會主義政黨，與新生的獨立工會運動和工人力量聯繫，尋求發展一個結合工人自管和民主計劃經濟的前景，為解決蘇聯改革面對的困局，提供出路和動力。

複雜的民族問題

戈氏的改革，也觸發蘇聯民族問題的廣泛爆發。在俄國這個被稱為「民族的監獄」內，民族問題有悠長的歷史。但現在爆發的各種民族問題，卻更主要是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及其民族壓迫政策數十年來造成的後果。

過去在沙皇統治下，各少數民族受着專制統治和壓迫。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蘇共在內戰取得勝利，部分原因是由於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民族自決政策得到少數民族支持。

二十年代中期以來，斯大林官僚統治全面加劇了民族壓迫和矛盾。從上面

下、從中央到地方到各民族，以俄羅斯官僚為基礎的官僚專橫統治，令其他民族受着官僚對人民和大俄沙文主義的雙重迫害。

二、三十年代的強迫集體化，令許多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受災難性打擊，一些少數民族因此死了一半人口。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大審判及全國黨、軍和人民大清洗運動，對少數民族更進一步戕害。二次大戰前後，至少有七個民族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包括克里米亞鞑靼、愛沙尼亞等，被指為叛變或有叛變意圖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造成很多人死亡；不少民族至今仍不能回到原居地。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東部、西烏克蘭等地區更是在二次大戰前後被斯大林強迫併入蘇聯之內；在這過程中，數以萬計的人被驅逐、流放或殺害；一些反抗蘇聯吞併的獨立武裝運動更持續到五十年代。

大俄民族主義官僚有計劃地推行俄羅斯化運動，強迫其他民族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化、風俗傳統、生活方式、宗教等。無數人因此受到迫害。在政治方面，各民族也普遍受歧視；各級官僚由中央委派，政治和經濟決定權操縱在俄羅斯官僚手中。教育政策也在母語教學和升讀高等學校等方面歧視其他民族。此外，官僚推行或鼓勵俄人移民計劃，將俄人移居到其他民族的大城市，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部分。在一些共和國，例如愛沙尼亞，俄人的比例達到四成或以上，令當地民族反而成為少數。

多個民族現時面對的問題，與社會民生和經濟有更大關係，而斯大林主義官僚對這些問題是難辭其咎的。為了追求高速經濟增長，官僚不顧環境污染，例如化學污染、核污染等；在大規模開採礦產、森林資源之後，官僚便置諸不理，形成廣泛的生態環境問題。此外，例如在中亞和南部減少投資，形成嚴重經濟破敗，失業普遍，一些地區的失業率高達25%以上。而全蘇聯物品短缺、生活素質下降的問題，對民族地區的打擊尤為嚴重。

在經濟和社會問題惡化的情況下，一些民族地區和共和國的官僚更有意掀起民族問題，將社會的不滿引離官僚統治這個焦點，轉為民族之間的對抗和衝突，以達到分而治之 and 維持暴力鎮壓統

治的目的。

民族運動浪潮

從最初戈氏改革帶來的一些政治空間開始，多個民族運動都成功動員和團結人民，成為廣泛的民族運動浪潮。

這些民族運動爭取民族的政治和經濟自決權，以至爭取民族獨立，從反抗民族壓迫發展到反抗官僚專政、爭取人民民主權利和自由，將問題帶到核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方面。

民族運動成立壯大的人民陣綫，是他們普遍的特點。在各民族運動之中，由於不同的歷史、社會、經濟等發展差異，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動力和水平，這都反映在各地的人民陣綫的綱領、立場和要求之中。

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的經濟在蘇聯內比較發達，過去幾年也是經濟改革的前衛試點。它們由於位處北歐，受瑞典式社會民主主義影響，加上二次大戰時被蘇聯吞併的歷史因素，都助長了它們的獨立傾向。在三國的人民陣綫之中，知識分子、中間階層和農民的影響比較大。在各民族運動浪潮之中，這三國往往站在前列。一九九〇年二月立陶宛更選出第一個非共黨控制的國會，並旋即宣布獨立。

另一方面，波羅的海三共和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國內其他民族問題的困擾，例如與俄人和波蘭人的關係。擺脫本身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局限，爭取結合包括俄人的其他民族，並結合工人，包括為數不少的俄羅斯移民工人，共同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和大俄民族主義的壓迫和分化，找出一條民族自主、各民族合作，符合大部分人利益的民主道路，是它們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蘇聯南部，阿塞拜疆官僚和一些人民對亞美尼亞人的迫害、屠殺，成為令人擔憂的焦點。

早在一九八七年，阿塞拜疆共和國內的納哥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亞美尼亞人已動員爭取該自治州歸入亞美尼亞共和國。在阿塞拜疆官僚的煽動下，一些阿塞拜疆人屠殺亞美尼亞人，激起該自治州和亞美尼亞共和國更大的動員和大罷工，但遭受蘇聯以軍隊鎮壓。阿塞拜疆官僚繼續煽動人民對亞美尼亞人

攻擊，進行經濟封鎖，挑起邊界衝突和兩個民族武裝對抗。終於，在一九九〇年一月，蘇聯派大批軍隊進入兩國，殺死數以百計的人，遠超過兩年來雙方衝突中的死亡人數。在阻止種族衝突的名義下，蘇軍實行軍管，藉機鎮壓兩國的獨立羣衆組織和所有政治、文化活動。阿塞拜疆人民陣綫未能阻止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亞美尼亞人的民族迫害行動，令蘇聯中央官僚有機可乘，帶來嚴重的挫折和慘痛的教訓。

蘇聯第二大共和國和有麪包籃之稱的烏克蘭，也出現了民族運動。烏克蘭知識分子和人民在三十年代受斯大林嚴厲迫害，其後又經歷了俄化過程。西烏克蘭更是在二次大戰後才被併入共和國之內，當時的武裝反抗運動持續到五十年代。一直以來，烏克蘭成爲保守官僚的堡壘之一。另一方面，八九年在烏克蘭東部以俄羅斯工人爲主的煤礦工人大罷工，令工人力量加入了這個政治圖畫之中。因此，烏克蘭人民陣綫基本上結合和協調了西部的民族主義、中部的改革派官僚和東部的工人力量，加上共同面對的環境污染問題和保守官僚層的龐大壓力，而訂出了一個團結廣泛人民力量，爭取民主、人權、民族主權、共和國自治和人民權力的綱領。相對一些民族主義色彩較重的人民陣綫綱領，它的民族主義要求是比較溫和及平衡的。

在衆人民陣綫之中，莫斯科人民陣綫其實並不是一個民族運動，而是繼承以往的知識分子異議運動傳統的多個社會小團體的聯合。他們包括民粹派、社會主義派和環境保護分子等，以爭取社會的民主化爲基本方向，並支持葉爾辛等黨內激進市場改革派以反官僚、反特權來動員人民的行動。但陣綫內的一些左派團體則與後者的市場改革主張區分開來，鼓吹一個符合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出路。

與官僚統治更大對抗

以戈氏爲首，由上面發動的改革，觸發了龐大的工人運動和民族運動，令政治局勢起了官僚始料不及和控制以外的驚天動地的變化。東歐的民主化巨變浪潮，更激發蘇聯人民進一步動員，例如一九九〇年二月的兩次數以十萬人計的大示威，迫使蘇共廢除一黨專政的條

文。人民動員的矛頭愈來愈對準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獨裁統治；反官僚、爭民主逐漸成爲貫通各種運動的中心要求。

面對着人民、工人和各民族的廣泛興起，以戈氏爲首的官僚嘗試以限制罷工權利，派軍鎮壓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民族運動等手段對付人民的動員。九〇年三月，戈氏更將大權集中到總統職位，並由自己出任總統，希望以更集中的權力挽回愈來愈威脅着官僚統治的發展。官僚與人民更正面的衝突，正在迫

近。戈氏上任後立即宣布要對付立陶宛獨立一事，便是明證。

工人運動、民族運動等各種人民力量，如何把工人爭取看管和民主計劃生產及被壓迫民族尋求民族自決以至獨立等要求，匯合成爲反官僚、爭民主的統一團結力量，並找出能符合社會大部分人民利益、解決社會各方面危機的出路，是蘇聯人民運動面對的關鍵考驗。

★

蘇聯十五共和國的民族分佈

資料來源：《自立早報》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共和國名	總人口 (百萬)	各民族所佔比例	民族主義團體
愛沙尼亞	1.5	愛沙尼亞人69.6% 俄人27.9% 烏克蘭人2.5%	「愛沙尼亞人民陣綫」，及籌組中的反對黨「共和國」
立陶宛	3.6	立陶宛人83.7% 俄人8.6% 波蘭人7.7%	「立陶宛人民陣綫」
拉脫維亞	2.6	拉脫維亞人67.2% 俄人32.8%	「拉脫維亞人民陣綫」，「拉脫維亞國家獨立運動」
白俄羅斯	6	白俄人80.1% 波蘭人4.2% 俄人11.9% 烏克蘭人2.4% 猶太人1.4%	「文藝復興運動」
摩爾達維亞	4.1	摩爾達維亞人79.3% 俄人1.2% 加瓜吉人3.5% 猶太人2% 烏克蘭人14%	「摩爾達維亞人民陣綫」 「史蒂芬大帝會社」
烏克蘭	51	烏克蘭人77.7% 俄人21% 猶太人1.3%	「烏克蘭人民重建運動」
格魯吉亞	5.2	格魯吉亞人78.5% 俄人7.4% 亞美尼亞人9% 阿塞拜疆人5.1%	「格魯吉亞人民陣綫」 「正義聯盟」 「民族民主黨」
亞美尼亞	3.4	亞美尼亞人92.4% 俄人2.3% 阿塞拜疆人5.3%	
阿塞拜疆	6.8	阿塞拜疆人84.2% 俄人7.9% 亞美尼亞人7.9%	「阿塞拜疆人民陣綫」
土庫曼	3.3	土庫曼人76% 俄人12.6% 哈薩克人2.9% 烏茲別克人8.5%	
烏茲別克	19	烏茲別克人81.1% 俄人10.8% 土吉茨人3.9% 韃靼人4.2%	「伯利克」(Belik)
塔吉克	4.8	塔吉克人61.7% 俄人10.4% 烏茲別克人27.9%	
吉爾吉斯	4.1	吉爾吉斯人58.9% 俄人25.9% 烏克蘭人3.1% 烏茲別克人12.1%	
哈薩克	16.2	哈薩克人53% 俄人40.8% 烏克蘭人6.1%	
俄羅斯	145.3	俄人佔82% 其餘共有32個民族	「紀念」

蘇聯民間左派發展近況

訪問「莫斯科人民陣線」發言人

〔原載《辯證的轉變》一書，訪問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八日〕

□訪問者（西蒙 Rick Simon）

■卡哥里斯基

□：你對人民代表大會〔三月二十六日選舉〕結果的總評價怎樣？

■：選舉的結果很矛盾和混亂，因此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面，這是一次重要事件，可以令不同層分的市民政治化，了解目前的政治爭論。至少在制度內而言，這次的確顯現了一些真正的政治分歧，所以對人民有教育意義。另一方面，成千上萬人對選舉的結果非常失望。

進步力量在這場選舉有兩大失誤：所謂開放的人大代表或自由知識分子，沒有形成或提出一套真正可行的綱領向官方派挑戰——他們沒有興趣這樣做。如沙哈諾夫、波波夫（Popov）及阿方納葉（Afanasyev）這些所謂進步集團的領袖，只是和官方領導人爭執一些次要問題。他們這樣爭吵，和官方領導人搞壞了關係，令他們的議案肯定無法通過；與此同時，他們又只想和這些領導人對話。他們從未想過走到人民中去，動員人民反對這些官員；他們的策略是說服官員做他們認為理性的事，這是種自招失敗的策略。

人民過分樂觀

另一方面，在莫斯科日益龐大的人民運動在選舉中顯出其無能。在莫斯科，有過十五萬人大集會；最近一次有二十萬人。在國內其他有強大動員力的地區也有這種大集會。「莫斯科人民陣線」〔莫人陣〕能夠在某種程度支配一些街頭行動。但羣眾運動支持的人民代表大會內的進步分子，卻提不出真正嚴肅而可能的另一套綱領，這使羣眾運動如泥牛入海，結果是喪失了動員力。

□：人民代表大會怎樣處理經濟災難？

■：說實話，沒有人期望它對經濟

會作出任何改變。人民只想「人大」奪權，變成民主工具，成為改革中心，在黨架構之外發揮主動性，變成某種民主機構。然而，一如所料，進步候選人和人大成員的力量不夠強，不足以達到這個結果，注定失敗了。人們的想法過分樂觀；廣大人民當中有許多人一廂情願。

□：你對葉爾辛（Yeltsin）當選有什麼看法？

■：葉爾辛可說是最大的輸家；他沒有當選上重要職位，他只靠一些政治伎倆才得以躋入最高蘇維埃；不過，更重要的是他顯示了自己是個軟弱的政治人物，尤其不能抗衡戈爾巴喬夫；他的激進支持者很不支持戈氏。所以，不只在「莫人陣」的左派中，甚至在葉爾辛派，很多人對他感到懊惱。另外兩個人大成員：格利任（Gdlian）律師和伊凡諾夫律師已經逐漸冒昇成為人民運動激進一翼的象徵或領袖。不過，葉爾辛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還是有龐大的支持者。

葉爾辛的綱領討好每個人

□：是否由於他們直接打擊官僚？

■：是的。格利任和伊凡諾夫不管共黨領導機關的決定，堅持不改立場，而且攻勢更加猛烈。葉爾辛則已經公開表示服從黨決定，不會競選總統。

□：你不以為葉爾辛有發展他的綱領嗎？

■：葉爾辛運動最強而有力的一點，是缺乏具體綱領；這樣，他就可以把廣泛的社會層分鞏固或團聚在他周圍。他答允人們任何要求，提出空洞的激進口號，甚至用象徵性的建議措施來組織人，使到各種人都能夠帶着不同的理解來接受。

□：你是指他反對特權那些口號嗎？

■：對，尤其是涉及社會公義那些，引起很不同的理解。譬如，他說

「砍掉官僚」，這很好。可是，下一步怎樣？怎樣做到？由誰來做等...？這些問題很對，但他卻不提供答案。

人民陣線運動的性質

□：「莫人陣」有沒有新發展？

■：我們在城市的日常政治生活裏似乎打下了更深的基礎。雖然在莫斯科某些區域，我們的進展還非常有限，但所有區域已經有了我們的團體，而在某些區，我們甚至介入了日常生活，對人民有真正影響。在影響力弱的區域，我們如果有行動家，而事態發展又對我們有利，我們當然可以發展得更強。不過，也有些負面因素。當運動發展得太急速，就會使地方的組織出現內部分歧，衆見紛紜，令致政治癱瘓。譬如在我們影響力最大的謝度莫斯科（Chedomoshki）區，是由斯坦基維其的參選而引起的。在該區，斯氏像葉爾辛那麼哄動，給「莫人陣」帶來更大的社會支持面，擴大了組織。但到了實事實幹的時候，人們才發現分歧很大。這個發展最快的區也是麻煩最多的。

必須認識蘇聯的人民陣線和西方人民陣線在觀念上的差異。在西方或南美洲，人民陣線協調不同的政黨和組織，而這些政黨和組織已經成立了相當時候，有各自的支持者、政治文化、綱領和傳統等等；人民陣線不過是協調或集合不同組織架構，找出共同認可的行動策略。而在蘇聯，這是在未有明確面貌的政黨和組合間，共同組成的左派大聯盟，所以不斷會發生認同危機。

□：莫斯科最近有一次籌備創建社會民主黨的會議，你有什麼看法？

■：籌組這個會議的人，對成立社會民主黨還是成立社會主義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不能達成協議。這不是字面分歧。右派希望是有社會意識的自由主義；左派則構想激進的自管模式。雖然這些團體有機會可以謀求某些妥協，成立一個真正的組織，但還是有一股強烈

傾向，希望成立兩個不同組織：一個是社會民主派，另一個是社會主義派。我想這樣一來會更富進取性；我們有機會可以克服認同危機。所以我投入組織一個名叫「社會主義黨委員會」的組織，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城市已着手建立籌委會。這會是左派政治組織爭取實現目標的真正工具。參與這個計劃的所有人還有和社會民主派組織協調行動，例如我們會參加愛沙尼亞社會民主黨在八九年七月於達連（Tallinn）舉行的討論活動。這個組織主要由俄羅斯人領導，而非愛沙尼亞人，他們希望建立工人階級基礎。必須明白，他們更近似本世紀初的社會民主派，而不類同今日西方的社會民主派，更不是歐文博士那種！不過，我相信這些力量很難達成團結，尤其現在面對的不僅是團結不同政治組織，而且還是是締造某種認同性。

蘇聯左派發展新動向

□：建立新黨對「人陣」的共黨成員有什麼影響？

■：這個問題最棘手。有很多共黨成員參與籌建「社會主義黨委員會」，我們正試圖解決這些矛盾。我們認為，現時的共產黨不是一個政黨，我們也不視它為政黨，它只是提供政治參與的國家機構。因此，是不是黨員無關重要。然而共黨領導層並不是這樣看，它會懲罰參與籌建活動的成員。政治上我們並無壓力，因為黨員正發起要召開特別大會的運動，如果會議召開，就會出現分裂，因為要求開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公開和黨領導的分歧，讓各式各樣實際上是社會民主派、激進社會主義派、馬克思主義派和共黨自新派等意見有機會組成真正的派別。大會假如召開，黨的某些部分可能會被迫靠攏成立社會主義黨的運動，最後甚至要參加進去。

在共青團裏也有類似傾向，譬如立陶宛共青團便脫離了共青團聯盟，此外也有「蘇格運動」（共青團的中下層幹部在蘇格聚會，通過了一份宣言，要求徹底改變共青團的組織結構，他們實際是成立一個新的政治青年組織）。我們和「蘇格運動」的一些人很密切；我們對他們建議，如果要創立一個新的青年聯盟，何不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青年聯

盟。

□：「經濟改革」是否導致罷工運動的興起？

■：有，每周都可以聽到。有好幾次重要罷工，譬如在諾里斯基(Norilsk)礦工持續罷工了好些時候，期間還發生佔據礦場、絕食的事件；罷工取得了局部勝利，管理層接受了部分要求。不過，這是一次經濟性罷工，和其他地方如莫斯科的民主運動沒有聯繫。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在各走各路。成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組織的目的之一，就是試圖將這兩類行動連結起來。

經濟改革時期的工運

□：你說罷工圍繞經濟性要求，是否要求增加工資？

■：不是，人們沒有興趣拿錢，所以永遠不會要求加工資。要求往往是抗議管理層強迫原薪加工（這是「經濟改革」的典型措施）、工作環境惡化及管理不善致使工人蒙害等等。他們無視實際的市場規律，按照資本主義意義的利潤規律來制訂管理政策，工人的要求就是因應這些管理政策變換過程中所衍生的問題而提出的。（政策制訂者）並不是按現代資本主義盈利因素的先決條件，如企業的生存、穩定、長遠投資等來理解，而是第三世界式的：更剝削人們，以求得到更多錢。《資本論》第一卷已經形容過這種狀況了。不管我們說這是否社會主義——我認為不是——統治集團無法為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提供必需的條件，現在它更用資本主義的最壞方法來嘗試創造這些條件。我相信，他們會發現這些野蠻資本主義的方法不會更有效，只能產生不滿和恐慌。

□：工人怎樣組織行動？有沒有通過工會架構？

■：視情況而定。他們有時運用工會，有時運用官方的集體勞工議會的自管機關，這機關沒有實權，但可以借用來掩護罷工委員會的運作，罷工有時有罷工委員會，或只是野貓式罷工，沒有明確的領導層。此外也有一些較政治化的組織如「市際工人俱樂部」或「工人互助社」，但它們獨善其身，遠離民主運動和政治左派。「工人互助社」組織在八九年夏天有一個大會，我或許會去

演講。我們有很多期望，政治左派和民主運動真的必須要和工人運動連結起來。不過，工人經常提出：政治左派即使支持我們的目的，但你們能夠提供什麼實質性的支持？你們可以怎樣幫助我們？而工人們問得很對。

□：「人陣」的組織有沒有嘗試和這些罷工建立聯繫？

■：不幸，人民陣綫真是個左翼運動，意見紛紜，其基礎只限於城市知識分子，並且主要是一個競選運動。它在俄羅斯農村沒有組織，這很說明狀況。人民陣綫裏有愈來愈多工人，但他們多是在地方政治層面上活動，而不是在他們的工廠。競選運動可以這樣發展，因為必須有某些政治機制才可以保證競選成功；不過，針無兩頭利，不能既當選又能動員羣衆的經濟鬥爭。我們致力實現這個目標，但似乎目前兩種活動之間缺乏政治掛鈎。所以，我又要說一遍：我們需要一個政黨組織，能夠結合為競選而設的人民陣綫和諸如地方自管、地方自我組織，以及在企業層面爭取經濟性要求的工人運動。

□：除了企業的管理問題，蘇聯經濟目前還面對哪些主要問題？

■：你不如問我蘇聯經濟沒有面對哪些問題，那我或許會容易些回答你。改一種說法吧，我們現在面臨多年來最惡劣的情形：我們在中央化經濟、發展中市場形態經濟和經濟管理模式變換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典型問題，所有問題層層積聚，人民飽受舊制度的苦頭，也飽受無效率的改革及改革本身之苦。不過，儘管有失業的威脅，人民卻不很擔心這點；他們知道，政府不敢去得太盡，觸及這個會立即引爆社會不滿的題目。人民最怕是通貨膨脹、百物加價、商店無貨出售，及管理層強迫他們超額無償勞動。人們總的情緒，是認為「經濟改革」不只在經濟上缺乏效率，甚至還是有害的。

□：「人陣」對此有什麼主張？是否贊成葉爾辛的提議？

主張社區式社會主義

■：葉爾辛的綱領很空泛，提出諸如削減在建設方面的投資；至於削減什麼？哪種項目優先？為什麼是削減建設而不是其他或是否只削減這部門？為什

麼是這百分比而不是哪百分比……？又譬如，他脫離賦予更多權力給集體勞工議會；但，給什麼權呢？

所以，我們希望說得具體些及交代理由。

我們的立場可以這樣界說：第一點，人民不應為經濟改革付出代價；假如要提高效率、削減勞工人手，則應該在事前確立職業訓練、賠償、安排就業、開創就業的投資等一套完整系統，然後才實施傳統意義那套合理化方案。要有事前計劃，不要興之所至；控制計劃實施的權責，必須交出實權給工人集體，包括讓他們有選舉或招聘管理人員的權力，解散政府各部，改由國營企業自管機構的組織取代它們；這樣就可以有真正的企業自管了。民主選舉產生的最高蘇維埃屬下的各部，應作為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居間人。

第二點，在道危機深重的經濟中，是需要有配給的。必須設立民主和開放的機構主資配給事宜，而配給須有準則；配給不是消費者個人的事，因此也須向企業解釋情況。所以，在經濟領域必須設立民主機關的關鍵之一，是將集體勞工議會改造成類似工人議會的機構。

□：可以改造嗎？

■：如果有機會，可以的。工人議會的傳統革命含義，不僅主理管理和分配，即不止於企業運作層面，也兼備分配收入和產品的部分責任。

我們的綱領又構想把分散的國家部門市政化，把國家財產變成社區財產，因此，毋須將這些財產變成私有就可以更具備社會性，和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我們認為，現時的國家財產欠缺社會性，不算是社會主義財產。在一九九〇年春天舉行的市政府選舉，上述提議是我們競選政綱的重點。這次選舉會是一次轉捩點，會是最重要的政治抗爭，也是我們面臨的最重要的政治挑戰。我們的政綱，會是融合了西方社會民主派、倫敦市議會和意大利博洛尼亞市議會經驗的市政式社會主義。政綱的要點，是建立某種由社會直接控制的經濟民主和自管制度，社區部門在經濟中佔很大比重、財產由社會擁有。在制訂政策方面，消費者可通過蘇維埃選舉制度發揮作用。回到前面說的削減建設投資。我

們和葉爾辛的最大分歧，在於他是中央主義，例如他主張由中央決定「裁減投資」，而我們，則認為問題不應由中央作決定，而該是把企業轉為市政財產，由社區自行決定削減投資。所以，問題不是削減多少，而是整個政策制訂的民主化，讓人們民主決定。

□：蘇聯各個共和國似乎日趨不安了？

■：是的。西方似乎較少關注莫爾達維亞（Moldavia），但那裏的情勢愈來愈緊張。所以看來蘇聯幾乎沒有一個共和國沒有民族衝突了。

□：在重新檢視和蘇聯的關係這問題上，立陶宛是否最激進？

■：立陶宛分離似乎已近一觸即發了，這個過程是由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共產黨領導的。我估計，當地的共黨官員意識到，領導獨立運動可以保存他們的社會位置，在目前這種政治和社會形勢中生存。

地方官僚領導民族運動

□：你認為這場運動只是民族官僚的現象？

■：運動裏有不同成分，譬如最高蘇維埃裏的立陶宛人代表烏奧卡（K. Uoka），他代表「立陶宛人民陣綫」及其內的左派和工人階級。但這是問題的一面；在另一面也有布拉茲斯卡斯（Brzauskas）這類黨官僚，他們十分民族主義，但不左傾，也不民主。

這場運動，是歷史家熟知的那種傳統運動：各種力量為了一些具體的結果而最廣泛結盟，直至達到目的才解散。不過，波羅的海共和國的人民陣綫的策略，是支持本民族的官僚代表，由他們反對莫斯科。這是一套自招失敗的策略，因為地方官僚在運動的發展過程裏，最後也會權力坐大、鞏固。

□：〔這場運動〕會威脅蘇聯憲法嗎？

■：我不知道什麼是對憲法的威脅。蘇聯不同美國。在美國，憲法是一切；國家的意思即是憲法。在蘇聯，問題不在於憲法；修憲很容易。問題是，國家雖然自稱聯邦國家，但實質是中央集權國家。

說實話，假如在蘇聯實行立陶宛或愛沙尼亞國會所建議的聯邦國，蘇聯也

必亡了。他們頗無保留地說過，希望把蘇聯建成東方式的英聯邦共和政體，戈爾巴喬夫可處英女皇那樣的位置。這可以是個好的解決方法，特別是對愛沙尼亞而言。不過，澳洲和英國不是同一個國家，也不是同一個邦。如果蘇聯是一個國家，則只能以中央集權形式生存。假如說，我們只管俄羅斯的問題，不管他們了——這看來好像很民主，很激進，但其實產生了另一個問題：蘇聯解體後，很多人——尤其在東亞細亞，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情形會更壞。甚至在波羅的海多個共和國內，不只俄羅斯人，還有其他少數民族，都憂慮這些共和國在脫離蘇聯而獨立之後，他們的民主權利會更少，甚至會威脅到他們的人身權利。因此，長遠來說，「莫人陣」不反對其他共和國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不反對在原蘇聯帝國基礎上建立某種共和政體，不過，我們十分關注這個發展過程中的人權狀況：我們首先會保衛人權。

□：這些民族運動會挑起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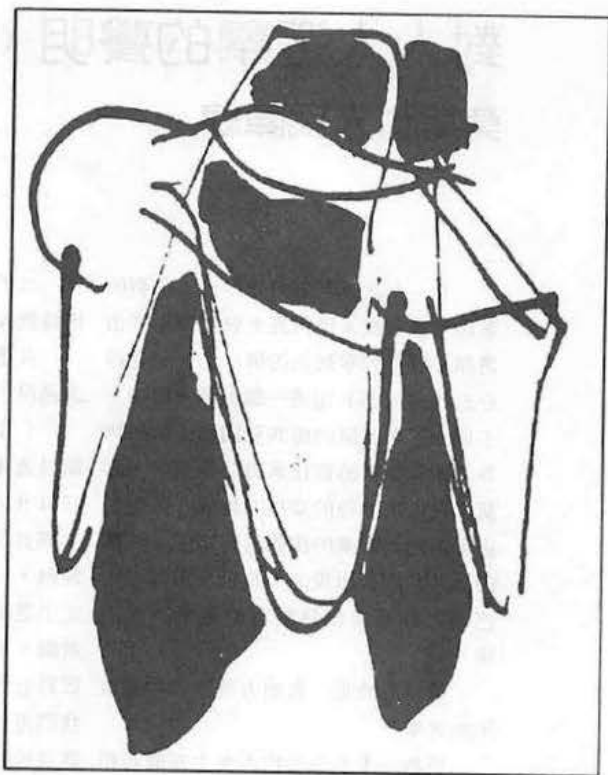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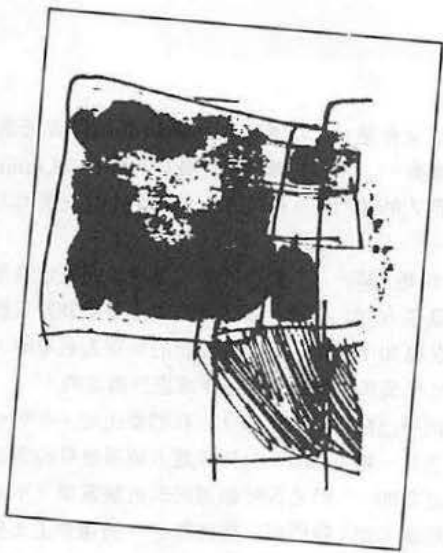
■：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不過，俄羅斯人其實並非那麼民族主義，所以不致像想像般危險。普遍的情緒其實是專注於解決自己的問題；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即使紛紛脫離或半脫離蘇聯，「歷史記憶」（Pamyat'）^①也不會立即壯大。當然，隨著事態發展，這個組織多了支持者。

□：官僚層中會有人利用這個組織來抗衡這些運動嗎？

■：當然有的。「歷史記憶」很懂得利用右翼民粹主義言詞，有時，甚至也套用左派必須使用的術語。我們的策略沒有他們般靈活，也沒有使用那些術語。舉個例子吧。他們很明白人民恐怕西方資本進侵蘇聯會令他們更受剝削，對於西方資本的敵對情緒也很明顯，可是左派最初卻沒有反應，反倒是「歷史記憶」這類組織首先利用這些例子來作煽惑宣傳。現在我們也探討這個問題，希望提出具體的批評和主張，而並非光談「閉關自守」。我們認為，蘇聯應該合理地開放，引進知識和文化，但也許不是引進資本。

①據卡哥里斯基在另一次訪問中解釋，「歷史記憶」是近年新興的俄羅斯

民族主義組織，基地在莫斯科，得到當地其黨領導的扶植。這個組織的影響力開始伸延到莫斯科以外地區——
編按 ★



「莫斯科人民陣線」簡介

〔卡哥里斯基(B. Kagarlitsky)是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九八二年因參與一個青年社會主義者的組織而被監禁十三個月。當「開放」及「經濟改革」在八七年初露曙光的時候，他在政治上開始再次活躍，當時他參加了「社會主義者社團聯盟」〔聯盟〕(Federation of Socialist Clubs)，並成為該會的秘書。當羣眾運動初起時，「聯盟」開始積極投入新成立的「莫斯科人民陣綫」，卡哥里斯基是該陣綫的統籌者，也是「社會主義黨委員會」的創會成員。訪問原載於《新社會主義者》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九九〇年一月號。訪問者是咸信(N. Hyamson)〕

□訪問者

■被訪者

□：莫斯科人民陣綫扮演什麼角色？

■：人民陣綫(人陣)的最大成就，是在三月的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活動。「人陣」是這次選舉中唯一的非官方組織，在莫斯科每區有自己的選舉委

員會，同時其中一個成員斯坦基維其能順利當選。據蘇聯的選舉法，候選人登記必須經過多重篩選，我們推薦的候選人許多均不能通過，故我們需要轉而考慮支持一些較為進步的候選人。

「人陣」的活動高潮在「人大」開會之日，我們組織了二十萬人的大集會。但後來人民開始感到幻滅，認為無論「人大」或是「人陣」均不能做到人民希望的東西。而「人陣」部分活躍分子亦感到失望，認為「人陣」支持的那些所謂進步者，在當選後，沒有實行他們的政策。

我們需要一個在企業活動的強大組織，否則很難達到長遠的效果，所以下一步我們便成立「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社工會〕，這個工會已有協調機關，我是工會其中一員，但不屬於領導層。「社工會」的創會組織大約有五千成員，希望在各企業中建立工會小組。

□：你認為市場在蘇聯的經濟中應扮演什麼角色？

■：作為蘇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一定等如反對市場的原則。我們反對市

場作為經濟的主要調節機制，但它必須有其適當位置。我們必須有制訂政策的民主架構，在不同社會主義財產(自治省市、共和體、聯邦體)的形式下，由生產者和各級政府向人民負責的民主參與，這就是我們認為的「民主規劃」。關鍵的地方不在計劃，而是由誰去計劃，及計劃的程序。

另一方面，是需要用市場來顯示究竟某一決定是否有效率。消費者應有直接操縱和參與權，但作為購買者他應該有選擇的權利。

在緊記原先經濟目標的前提下，有必要據市場的實況作出調整。由於要制訂投資計劃，我們仍需民主的決策過程；而市場合理化及民主目標必須同時兼備。

這樣一來，並不表示萬事妥當，我只是表示我們必須尋找以民主方法解決現時由現代社會、特別是蘇聯社會所造成的矛盾：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生態和擴大生產之間的矛盾等。 ★

對人大選舉的聲明（節錄）

莫斯科人民陣線

〔一九八九年三月廿六日，蘇聯的選民有機會在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作出選擇，這是列寧死後的第一次。超過四分之三的議席都有超過一個候選人競逐。不過除了在波羅的海共和國和少數的例外（如莫斯科的前任黨書記葉爾辛，和莫斯科人民陣線的斯坦基維其），提名過程都把共產黨的挑戰者摒除了。波羅的海共和國裏出現的大規模反對運動，已不容許用來粉飾櫥窗的選舉再度出現。

蘇聯有的是一套地方選舉和功能組別的選舉。

為數一千五百名代表由十五個共和國分別選出。其餘七百五十名則由共產黨、共產黨控制的工會、婦女組織、作家協會、記者協會、蘇維埃科學院等選出。

二千二百五十名的人民代表又會選出為數五百四十四人的最高蘇維埃。

共產黨人一般容易控制候選人的遴選過程]

「莫斯科人民陣線」的刊物《莫斯科通報》在八九年二月號刊登了有關三月廿六日人民代表選舉的立場如下：那些草草擬定有關選舉人民代表的條例，一點也不民主。這等條例早已決定了選舉的結果。而選舉只不過是一場遊戲。不過參與這場遊戲又是必要的，因為它使我們獲得更多的政治經驗，使我們得到選民的同情，也使我們能夠揭露當局的欺騙性。

那些獲提名為候選人的，鮮有由人民推舉。代表共產黨、科學院的通通都是「自己人」，這已經不在話下。不過那班黨官卻出盡法寶阻止工人合作社、

地方選民大會選出真能代表民衆的人士。例如在莫斯科的劉賓（Liubin）選區，有關方面竟然索性阻止選民大會的召開！

至於那些地方選舉前決定誰是候選人的大會，參與者大多受制於黨機器，故此出現在最後的候選人名單的，沒有很多人是進步或思想激進的！

到如今，我們要決定，在那些毫無選擇，又無候選人值得推舉的選區，我們是否呼籲選民去抵制選舉？不過或許我們可以積極點——將選票上出現的候選人都打上交叉！

在三月廿六日那天，我們應該進行鼓動的工作——舉行街頭集會、散發傳單、收集簽名。我們的候選人也要盡量接觸選民。選舉日前一天，我們更必須在每一個選區組織大型的鼓動行動。★

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募捐運動

在「開放」的時代中，雖然整個政治改革充滿有限性及不確定性，但真正的政治改革正在前進。與此同時，經濟改革對蘇聯平民，特別對工人階級而言已經證明是苦澀的經驗。「經濟改革」過去很少解決官僚的低效率、特權和貪污的問題，蘇聯的經濟現時陷入崩潰狀態，工人階級被迫採取行動，維護基本的生活水平。去年〔一九八九〕煤礦工人的罷工浪潮，正反映工人的不滿。

身處這種環境，社會主義者必須推出一個清楚的另類出路，強調以民主計劃，而非市場導向的改革，因為後者未能為當前危機提供任何解決辦法。

莫斯科的「新社會主義者委員會」，是新政黨的雛型，其領導層由選舉產生，具備綱領、會費和會員證。成

員來自「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社會主義（SOTSPROF），一個最近成立的獨立工會。「社會主義」希望以清晰的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指導，在礦工和其他工人間宣傳，發展獨立工運；它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反對派，甚至包括右翼的「民主工會」，及蘇聯共產黨內對馬克思主義真正有興趣的成員（他們自嘲為爭取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我們的思想均十分開放。

在列寧格勒、高爾基及其他地方已成立「新社會主義黨委員會」，儘管它們備受《真理報》攻擊。現時，我們有數千名支持者，他們希望有一個激進、非宗派的社會主義運動，致力爭取自管及民主規劃，以解決今日蘇聯的危機。

當然，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的首要任

務是抗爭你們的政府。你們若能擊敗戴卓爾夫人，打退新右派，也是給我們的最大幫忙。不過，我們也需要物質支援。我們不想依賴外力支持，但我們急需金錢為「社會主義」購買印刷器材。西方一些右派機構，如「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早已資助蘇聯的右翼自由派喉舌，如《開放》學報。社會主義活躍分子有時為勢所迫要利用這類刊物，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喉舌。因而，我們亟需要自己獨立的資訊網絡及刊物。

我們十分感激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為我們發起宣傳及募捐運動，國際社會主義者的聯繫發展十分適時。

〔「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

(SOTSPROF) 已被蘇聯官方認可為合法組織的獨立工會，但基於資源缺乏，現時尚未能正常運作]

[卡哥里斯基及「社會工」正式委

托英國九位知名人士(包括三位工黨國會議員)，發起宣傳「社會工」及籌款運動。市民捐款可還寄以下地址：

支票抬頭：Alice Mahon, SOTSPROF

地址：ALice Mahon MP, Treasurer,
P O BOX 2988, London WC1 N3XX,
UK]

★

我們主張工人自管和集體所有制

訪問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二日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一名代表在倫敦舉行記者招待會。以下訪問載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英國《社會主義組織者》]

我們認為，蘇聯從來未有過真正的工會。自斯大林掌權以來，官方工會成為國家結構的一部分，不能夠發揮工會的基本功能：保衛工人利益。

蘇聯一向有罷工出現，不過，由於消息封鎖，所以人們不得而知；譬如，在一九六二年，在南部城市新切爾卡斯克(Novo-cherkassk)發生過一場罷工，但被國家和秘密警察鎮壓了。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曾經有過數次組織獨立工會的嘗試，這些組織的規模很小，影響力不大。

大約在一年前，有三個人(他們是工程師、學者和工人)在莫斯科見面，為發起組織獨立工會「社會主義工會聯合會」(「社會工」)訂定了基本立場。

我們利用蘇聯憲法的漏洞找到了立足點：我們開設了一所印刷所和銀行戶口，工人委員會在它的名下，得以成為合法組織。

「社會工」發展最迅速的時期，是去年夏天的礦工大示威的時候。在頓巴斯、庫巴斯(Kusbas)和西伯利亞的伏柯達，開始有「社會工」的組織。目前，「社會工」有三十個組織成員，合共有六萬名會員。不過，我們仍然很弱小。

此後，陸續還有組織加入我們，譬如，今年一月，鐵路冷庫工人加入了我們的隊伍。「社會工」利用法律為這些工人爭取了降低退休年齡、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環境的安全條件。

軍隊工會「防御盾」也參加了「社會工」。

過去兩個月來，我們協助「西伯利亞鐵路」工人組織，他們有可能會參與

「社會工」。

「社會工」的基本要求，是工人自管和企業集體所有制；因此，我們自稱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取用了「團結工會」早期的許多戰術。

我們相信，今春會爆發階級鬥爭，「社會工」可以從這些鬥爭中發展成一個龐大的組織，吸納數以十萬計會員。「社會工」和蘇聯一個籌建社會主義黨的團體緊密合作。

□：記者 ■(「社會工」)代表

□：「社會工」對「經濟改革」引入市場的政策持什麼態度？

■：最初，我們覺得「經濟改革」是好的。「經濟改革」一度廣受歡迎，不過，我們相信戈爾巴喬夫的方案不會對工人有好處。

戈爾巴喬夫不是為工人利益而做事，他的政策只幫助了體制內的中上層分子。

□：軍官工會「防御盾」參加了「社會工」，他們的主張是什麼？

■：他們主張精簡軍隊！他們支持軍隊專業化。「防御盾」裏有幾個成員(他們是上校、少校)說，假如削減50%軍人、80%將軍，不會損害蘇聯的防衛能力！

「防御盾」裏沒有普通士兵成員。由於這個工會的成員不會宣揚他們的會籍，所以很難確實知道誰參加了「防御盾」。

□：「社會工」和地方蘇維埃的關係怎樣？

■：我們相信，必須全面投入地方蘇維埃的選舉；我們的展望是地方蘇維埃充分民主化。

工廠工人開始關注時局

在列寧格勒和伊爾庫茨克(Irkutsk)，即我的根據地，發展的機會

良好；至於在其他地區，我們希望能夠在地方蘇維埃建立強有力的左派反對派。

□：什麼時候可以成立社會主義黨？

■：社會主義黨的建成，端視乎幾個因素：第一，有廣大的工人運動的產生。在礦工罷工時期，好幾個罷工委員會的成員立即參加了「新社會主義黨委員會」。

第二，要看蘇聯共產黨的內部動向。我們有些成員是蘇共內部的「民主立場」成員。至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則整個消失了，由新建立的「民主青年運動」取而代之。

如果事態發展迅速，將可以召開新社會主義黨成立大會。事實上，我們的策略，是號召「一九九〇年成立社會主義黨」。

□：工廠裏有沒有廣泛討論時局問題，還是討論只局限在活躍分子的小圈子？

□：現存有工人討論圈子的工廠運動，不過，這個運動有不同的層次。

運動是有右派，成員主要是條件較好、和體制關係密切的工人，他們成立了「工人聯合陣綫」。這是一個壞的發展，「社會工」也有在這個組織裏活動，用意是制止壞的發展。

大部分工廠工人對我們的理念不熟悉，不過，他們憑直覺傾向自管。譬如，我競選最高蘇維埃的時候，到一所大工廠演講，那裏的大部分工人接受了我提出的自管口號。

□：你希望在英國的巡迴宣傳活動有什麼成果？

■：身為「社會工」和「新社會主義黨委員會」的成員，我希望能夠有更多工人知道我們的活動，我們也希望得到精神和物質支持。★

「社會主義社團聯盟」立場書

自主活動的社會組織於一九八七年八月在莫斯科聚集，參與名為「在『經濟改革』範疇下的社會倡議」討論會，作出下列聲明：

1—與「經濟改革」有關的過程已導致獨立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政治組織的成立。根據蘇聯憲法，社會的所有權力屬於人民。因此，作為人民的一部分，獨立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政治組織有權獨立表達意見，不必透過任何中間人來保衛他們的利益。

2—簽署這份聲明的團體和聯會的信念，主張以社會主義前景來發展我國。作為社會主義的忠實支持者，我們認同一九一七年十月宣告蘇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走向國家消亡的路綫。我們認為，成立獨立團體和聯會並加強它們在社會的作用，是建立社會自管的途徑之一，後者表示消除官僚和行政架構。

3—在現階段，我國正經歷重大改變。變革的成功依賴群眾對「經濟改革」的支持和他們的參與程度。「經濟改革」的勝利關乎蘇聯社會主義的存亡。

我們承認憲法上蘇共在我們社會的作用，但黨並非一個均一的整體。它的隊伍內也包括那些對過往的濫權和錯誤要負直接責任的人，以至脫離群眾需要、希望的龐大的官僚體。

我們會盡力支持黨內代表着健康和進步力量的領袖和普通黨員。

4—在中央和地方上，「經濟改革」遭遇到那些恐怕失去特權，和企圖繼續壟斷消息和決策權的人的絕望抵抗。新的倡議和行動被他們或是阻擋，或是漠視。

支持蘇共二十七次大會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和民主的政策立場的獨立團體和組織結盟，有必須存在的另一個理由。在民間運動內，一些保衛反動觀點、種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組織正在形成，並採取極

端的行動方式。我們團結起來可以抵擋獨立運動內的極端主義，並散放有關這些組織的行動的消息。

5—基於上述考慮，簽署本文件的各組織決定，根據蘇聯憲法下的集會自由，共同成立「社會主義社團聯盟」；它的主要目的是支持「經濟改革」。聯盟的目標如下：

在意識形態領域：

- 發展令我們社會民主化的觀念，思考如何解決行政權力與社會自管之間的辯證矛盾。

- 分析社會組織在蘇聯社會和在自管制度之內的作用和位置。

在政治領域：

- 為獨立的組織爭取法理地位和享有立法倡議權力；有系統地施行蘇共一中委大會有關選舉制度民主化的決定；爭取社會組織在各級人民代表蘇維埃不受任何限制、不受協議制約地提出候選人，候選人有免費利用新聞媒介的權利。

- 延長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工作會期，以能有建設性地工作。

- 在法理基礎上提高人民代表蘇維埃的預算經費，保證它們完全獨立地獲取資源。

- 在法律上清楚區別對現存制度缺點的批評與反國家活動。

- 實施「俄國社會民主黨」綱領第一點：市民有權獨立於國家檢察院而控訴可能犯非法行為的當權者。

在經濟領域：

本聯盟倡議：

- 共同合作將國家計劃和管理機構從現行基本上是行政的方法轉為經濟的方法。

- 幫助擴大貨幣-商品關係的應用範圍，俾調節國內經濟活動的基本機制；這個改變的同時必須堅決保證維持工人的社會成果（全面就業、生活工資、退休權利等）。

- 爭取下列各點：減少國家架構的開

支；將經濟轉變為自管的基礎；設立從下而上地監察管理架構的制度；將社會生產資料（工廠）轉變為將自管企業租賃給合作社的制度；計劃制度要民主化；創立條件，容許所有形式的社會主義財產所有制的自由發展。

在文化領域：

- 藝術聯會和團體有財政自治的權利。

- 容忍不同流派的社會意見和藝術品味，只要它們表現的方式不與蘇聯憲法衝突。

- 人民有權自由取閱統計資料、歷史文獻、博物館和圖書館藏書；廢除特別藏書類別。

- 廢除出版前的檢查制度；擴大獨立合作社或印刷所網絡；終止行政阻礙獨立組織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和報刊自由、示威和遊行等權利。

在生態和文化生態領域：

- 建立真正機制，讓社會組織和運動參與保護環境和保存歷史、文化古蹟的鬥爭。

國際關係的領域：

- 支持和支援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民族解放和革命運動的鬥爭和活動。

一九八七年八月★



礦工罷工浪潮衝擊蘇聯改革局面

夏博

作為改革中首次大規模的、獨立的勞工行動，89年7月的礦工罷工的確值得我們小心地分析，因為它能夠揭露蘇聯（特別是俄國）工人階級的特性和它的渴求。蘇聯的官員和新聞界一致地聲稱，此次罷工是下層支持改革的表現。但這個說法却相異於戈爾巴喬夫在最高蘇維埃上所說的話：「對我們來說，這是四年改革中最困難的局面。我們經驗過切爾諾貝爾核子災禍。我們也經歷過其他的困局。但是我可以說目前這事是最嚴重、最困難的。」

柯茲巴斯區的克密洛伏礦場的罷工委員會主席伊夫秀可夫說：「改革已經震撼了人民，特別是年青人。近幾年來，人民的政治意識發展得特別快。」

工人和政治、經濟官僚的關係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方面，工人在小規模罷工中試探以後，已慢慢

地不再懼怕鎮壓。中央政府和新聞界對經濟管理的批評也鼓勵了工人的抗議。

在另一方面，工資改革和企業中的其他改變，只能逐漸損害工人和經理人員之間一向就有的共謀關係，却不能代之以有益經濟的合作。這種共謀關係，對工人的意識本來有很大腐蝕作用，現在終於被中止了，所以工人可以以集體力量來抗議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以及經理人員的獨斷獨行。在過去，他們對這些惡劣情況和獨斷行為不得已採取容忍態度，來交換經理的「特別照顧」。

「這種管理方法不可忍受」

礦工態度的改變，可以從多納茨克罷工委員會成

員布代勒夫以下的話反映出來：

「在煤炭工業中，經理人員對屬下特別沒有禮貌。粗暴和踐踏人的尊嚴非常普遍，昨天，人們還以為這是正常的『辦事』方式。但是今天，由於民主化進程，這種管理方法是不可忍受的……。」

改變態度後，工人們更迫切感覺到他們缺乏一個能夠保衛自己權益的組織。現有的工會只是經理人員的代表。所謂企業民主，雖被國家企業法正式規定，也只是紙面文章而已。

基本上來說，礦工之所以罷工，不但是抗議官僚層管理經濟不善，而且抗議制度內在地傾向於不把人民作為生產的目的，而當作殘餘的因素：只要社會安定不受到威脅，人民的需要可被忽視。自從當局在1958年決定把主要的能源從煤炭轉移到石油和煤氣，上述那個傾向在煤炭工業中就特別明顯。這就是說，煤炭工業的投資大大地減少，造成產煤區的社會消費很低，因為大多數房屋和社會的基本建築資金來自這個工業。

同時，像其他礦業一樣，煤炭工業不太能夠利用經濟改革的規定來獲得額外收入：它們主要是單一產品的工業，所以不能夠改變生產方式來製造價格較高的貨物；它們不能宣稱產品性質有所改進而擅自提高價格；在罷工以前，它們也不能以額外生產來交換消費品或者建築材料，因為它們的全部生產是按照國家合同進行，所以與消費者不能發生直接的接觸。

「工業廢料淹沒這個地區」

工業污染是另一個問題。諾伏柯茲納茨克和克密洛伏的居民平均壽命比全國少十年。柯茲巴斯區的生態是各區中最壞的，因為是露天採礦。伊夫秀可夫說：「這個地區幾乎給工業廢料所淹沒。水源和稀少的可耕地在喘最後一口氣。在大開掘機的挖斗和新的巨型工業機器的鐵蹄之下，稀薄的泰加森林快要絕滅了。」

煤礦工人的工資和退休金是蘇聯各工業中最高的，但情況却是最壞最危險的。即使如此，在目前的五年計劃（1986—90）礦工工資增加率只有全國平均增加率的一半。理由就是以上所說的。因此，在過去三年中，這個工業已失去了34,000工人。據布代勒夫說：

「多姆巴斯礦場的生活情況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愈來愈壞……礦工的職業聲譽已降到零，他們的勞動已不值錢。許多礦工的工資低於地面工作人員，他們的可憐的加薪幾乎馬上被貨物的漲價所吞沒。」

礦工的正式工作日是六小時，但是他們往往要在

礦場化十小時以上（因來回路程及等待換班）。這額外時間是得不到工錢的。雖然1987年的法令已規定值夜班有津貼，但是，礦工仍得不到。除這些以外，因為制度不能保證經常供應生產材料，所以常常停工而損失工資。這在目前新的成本會計控制下，使工人特別難受。最後，工資改革雖然使工資提高了一點，但通貨膨脹和國營部門的消費品供應愈來愈少，却抵消了收入的增加。

另一個不滿來源是不定的假期。這是工會建議引進的，但沒有徵求工人同意。這反映出政府部門的典型辦事方法。浮動的假期可以使政府以最少投資增加生產，完全犧牲工人的利益，因為礦工要忙於工作，很少有時間與家人在一起。

爆發罷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當局的專權和貪污。這不是新的問題，但在改革聲中，已使人不可忍受。工人的很多要求可以由地方當局來解決，而且原則上甚至可由工人自我管理的會議來解決。但是由於民主化尚未在地方上推行，地方當局還是依照上司的意旨辦事。另一方面，官僚特權一點都沒受到約制。一個礦工埋怨說：「蒸汽浴、夏天假期旅行、夏天休假——這些是老闆專有的。」一位蘇聯記者報導說他「在會議上和普通交談中聽到無數次」這種說法，而且他們說時「充滿了憤怒和痛恨。這種情緒已經積累了很久，所以一定要發洩出來。」同時，礦工感覺到，騎在他們頭上的是過分龐大的官僚結構。他們把這個官僚架構看成為一群寄生蟲。他們所生產出來的財富，都被這個官僚層所吞沒。當有人向工人說，罷工使國家損失了數以百萬計的盧布，工人就指着一大堆因缺乏運輸工具而運不出去的煤炭。有些煤炭還因着火而被浪費。

歷史性的罷工浪潮

對當局而言，礦工不滿的強度已不是秘密。一九八九年一月間工會報紙《勞動報》登載了一封米茲杜慶斯克三位模範工人寄來的信。該信慘痛地埋怨：「對社會問題的完全忽視」，和礦業部「採取了只解決容易問題的反改革的態度」。但是，礦業部一向以空頭諾言來回應一切批評，這次却連答覆都沒有了。

這次礦工的罷工是蘇聯歷史上空前的罷工浪潮的高峯：1989年上半年損失了二百萬工作日，平均每天有15,000工人罷工（大部份罷工牽涉全國性問題）。在1989年上半年，煤炭工業中就發生了12次罷工。它們抗議的大都與七月份的罷工目標差不多。但是先前的罷工只贏得局部的讓步和空洞的諾言。

最後，米茲杜慶斯克的息夫雅可夫礦場的礦工就和當局攤牌。七月初，礦工們把一份要求書送給礦工工會的中委會、市黨委和礦場主任，要他們在7月10日以前滿足這些要求，否則就要罷工。7月4日談判無結果。7月10至11日的夜班就開始罷工。到了第二天中午，當地的4個礦場以及其他企業都參加了。12,000名穿工作服的礦工在大街上遊行，最後在市委辦公廳隔壁的廣場上靜坐。他們選出的全市罷工委員會提出了41項經濟和生態要求的請願書。

在12日，全市罷工委員會向蘇維埃政府送了一封公開信，要求改善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食物供應，結束官員的特權，立即發動大眾對憲法草案的討論，而且希望能在1990年11月7日通過這個新憲法。

公開信也要求黨政領導人親自到柯茲巴斯區來。為了使他們快點到來，它號召柯茲巴斯區發動總罷工。米茲杜慶斯克的工人7月14日復工。

各處的情況都一樣。礦工佔據市中心廣場連續開會。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在罷工委員會要求下，全部停止賣酒、關閉酒舖、在主要街口設立藥物檢查站。除了極少數情況以外，礦工們保證繼續進行維護礦場的工作。

罷工此伏彼起

7月15日，在礦工擠滿了諾伏柯茲斯克文化宮的大廳中，部長及該區第一書記和礦工們重覆進行協商。但是，他們這次不止要對付五個礦的1萬2千名礦工，而是158個礦場的17萬7千名礦工。這次討價還價比上次更厲害。礦工們要求戈爾巴喬夫和總理賴茲可夫親自到來，以作為不再使他們受騙的保證。

這兩人並沒有來，但是，7月16日戈爾巴喬夫打來一個電報，說派來了一個高階層代表團，它包括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書記史立庫可夫在內，要礦工馬上復工。但礦工要有具體的結果。7月18日，地區罷工委員會宣稱，談判進展極佳，基本要求都得到滿足，所以建議從夜班開始就復工。許多工人復工了，但是到第二天還有91個礦的64,015名礦工仍然罷工。到了7月21日，柯茲巴斯礦區的礦工才全部復工。

多姆巴斯礦區的罷工於7月15日夜間開始。雖然政府保證柯茲巴斯協定包括整個工業，礦工仍堅持高級政府官員直接與他們談判。多姆巴斯罷工運動擴大了，好像是柯茲巴斯的協定和復工鼓勵其他礦工採取行動。多姆巴斯的地區罷工委員會也組成了。110個礦的9萬名礦工參加了罷工。除了連串經濟要求以礦外，多姆巴斯礦工們也提出了政治要求。7月20日罷

工蔓延到烏克蘭的其他礦區。

政府代表團於7月20日到達多納茨克，7月22日就簽了協定。那天，戈爾巴喬夫和賴茲可夫呼籲礦工復工。直至7月24日早晨，73個礦結束罷工，但仍有50個礦堅持繼續，要求得到法律上的保證。多納茨克罷工委員會成員和多姆巴斯區的人民代表合組一代表團，於7月24日飛抵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賴茲可夫。他們擬定了整個工業的具體行動計劃大綱。賴茲可夫又呼籲所有礦工馬上復工。他們本來應在7月25日復工，但有部份人還再堅持了兩天。所以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的罷工，直至7月27日才完全停止。

在極北部的彼卓拉盆地，罷工在7月19日開始。到了7月24日，當人民代表路茲尼也夫在最高蘇維埃上正式提出礦工的要求，他們才結束罷工。

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哈拉甘達盆地——蘇聯第三大煤田——的罷工，是從7月19至20日的夜間開始，罷工委員會的一位代表解釋罷工原因是新聞媒體沒有披露柯茲巴斯礦工的全部要求。他們在7月22至23日夜班才復工。

各地的罷工雖然結束，但罷工委員會沒有解散，而只改名為工人委員會，以監督協定的執行。

新聞媒體封鎖政治要求

大報並沒有把礦工的要求全部登出來，而對於在協定上不顯著的、政治性較重的要求，只簡略地提一下。礦工的要求大約可分為四類：工資和福利、工作條件和工作規則，環境保護，政治要求。

根據烏克蘭中央新聞處交給西方記者的一份要求單，多姆巴斯礦區的主要要求包括：夜班工資津貼；來回礦面的時間應付全部工資；星期日休息；承認一系列疾病是由工作所引起；連續二十年地下工作後可以退休；額外退休金；三年的產後休假；礦方的停工時間應獲全薪；轉換工作應不損失工資；嚴禁懲罰性的工作調動；礦方因礦工義務工作所得的利潤應由工人集體來決定它的分配。〔見另文〕

要求企業自主

其他的超出企業範圍的經濟要求包括：解決水、煤氣和電的供應問題；肥皂配給量問題；有十年工齡的礦工應分配一間寓所；根據醫學標準供應食物。還有較「政治性的」經濟要求：減少管理人員；罷工期間的工資由工會基金付出；禁止建立新合作社和解散現有的醫藥和食物合作社；引進地區性的財務自管。

企業自主的要求並沒有出現在要求桌上，而且在礦工工會中央委員會交給部長的要求中也沒有提起。但是這個要求却在罷工中作為中心要求而正式提了出來。

除了修補生態損害的一般要求以外，也有些關於當地環境的特別要求：在米茲杜慶斯克建立清潔化的工廠；停止興築湯姆河的水力發電廠，停止在哈薩克的核子試驗。

其他要求直接攻擊官僚的權力和特權。就像那條公然違抗經濟改革基本方向的解散合作社的要求，這些攻擊官僚特權的要求受到官方發言人和報紙更戰戰兢兢的處理——事實上很少被提到。

地方官員的這種冷淡態度是會議的主要討論項目。在會議上，你可以常常聽到這些官員是「市政黑手黨」的說法。要求撤換企業和托拉斯的主管、工人集體會議、地方蘇維埃、黨和工會的官員，馬上舉行選舉，特別是蘇維埃選舉的呼聲非常普遍。礦工要以他們自己的罷工委員會的領導來取代這些官員。在烏克蘭西部的雪伏諾拉特，工人也要求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市黨委第一書記、警察局長和國家安全局的頭子辭職。此外，他們要求成立一個獨立工會，名叫「團結工會」。

礦工亦要求中央方面進行基本改變。其中一些要求——特別是廢除那個誇耀「黨的領導」（官僚統治的代用詞）的憲法第六條文，主張人民代表應該由普選產生——事實上是要結束官僚的權力。要求最高蘇維埃主席應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含蓄著對戈爾巴喬夫的合法性表示質疑。米茲杜慶斯克的結束官僚特權的要求，被所有其他礦工重複提出。普洛可布巴夫斯克的工人甚至親自去檢查地方官員的寓所。

罷工幽靈的連鎖反應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社會基礎狹窄，嚴格限制了他的抉擇。如果他採取鎮壓行動，那不但會使工人對他的經濟改革失去信心，而且會直接上了官僚層中反改革的份子的當。另一方面，由於礦工對政府的懷疑和不滿已經非常深，以對工人讓步和允諾加薪等舊方法來籠絡礦工，也已行不通。但是，對礦工的要求作出嚴正的反應，就會放出連鎖反應的全國罷工的幽靈。

戈爾巴喬夫當然不希望罷工發生。但是，一旦發生了，他就決心要把壞事變成好事，不但要加強他在工人階級中的微弱社會基礎，而且要打壓他在官僚層中的敵人。他所用公式很簡單但很巧妙：他宣布這次罷工是支持經濟改革的群眾運動。他同時把工人的憤怒轉移向地方官員和礦業部，指摘後者阻礙改革。因

此，我們重複地聽到工人的「中心的」和「主要的」要求是企業自主。

着重企業自主，就使官僚層可以經過礦業部和地方官員造成礦工的目前處境。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多納茨克地區工會會議主席所發表的文告：

「在多姆巴斯工業力量驚險的發展過程中，社會方面被忽略了。這是在部長及中央機關縱容下地方機關的權力太獨裁太武斷的後果。」

「跟我走，否則你的位置不保」

事實上，社會方面的忽略是官僚制度本身、官僚層對蘇聯人民專權的後果。不管中央計劃和規範的程度是如何，這後果決不會在真正民主制度中發生。如果要追究責任，那麼最大的成分就要歸罪於最高領導人、黨政治局和書記處。他們決定經濟制度的全面結構，而且定出政策交部長們執行。

戈爾巴喬夫用同樣的策略來減少官僚對改革的反對。當罷工蔓延時，他再三地向黨書記們保證，黨（那就是黨機構）仍是統治的黨，雖然它必定要改變它的統治方法。在同時，當他主張大小幹部都要更新時，他提出警告：跟我走，否則你的位置就保不住。他也主張地方黨和政府及工會官員召開特別會議，考慮工人的要求，包括開除沒有反應的官員。他這個做法，不但預先阻延了全國罷工浪潮的發生，而且還利用工人的行動來趕走散佈反改革情緒的、缺乏主動的地方官員。

企業自主的觀念雖然受到宣傳部門的大力鼓吹，其他的直接向經濟改革挑戰的要求，特別是關閉合作社，却未被提起。戈爾巴喬夫在一次演說中，提到了這點，但又馬上拋棄它，說「這麼做很容易，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

官方的立場是：要求是合理的，但罷工不是爭取這些要求的好方法。政府企圖動員輿論來迫使礦工復工。地方當局採取同樣立場，口頭上支持礦工的要求，同時反對採取罷工的方法。但是，在實際行動中，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在整個罷工中採取被動的姿態。工會組織也支持整個運動，供給免費膳食，提供交通工具，甚至提供法律服務。但是，只在極少情況中，他們才領導罷工。

「只有禁令和威脅才能強迫我們簽字」

政府一方面對礦工罷工採取容忍態度，另一方面却採取措施勸導其他工人不要參加罷工。其中一個措施

已在上邊提過，就是戈爾巴喬夫指令地方黨委員會和工人代表開會。政府也直接與鐵路工人的代表談判，因為他們要在8月1日罷工。它同時告訴他們不要企望它會像對礦工那樣的縱容。却尼奇夫地區的一位鐵路工人寫道：他和他的同事已被迫簽署不要罷工的承諾書。這事發生在一個會議上。會上宣讀政府拍來的提高紀律和停止罷工的電報。他寫道：「只有禁令和威脅才能強迫我們簽字。不過，領導對我們的這種態度並不能孕育互相了解和更好地工作的願望。它只加深現有的緊張狀態。」

這就是許多蘇聯知識分子所保證的：要改革成功，就需要這樣「堅定的手」。但是，那是進退兩難的事情：最近波蘭經驗證明，市場改革不能夠從上面強加下去。這就是為什麼雅魯澤斯基要請馬佐維斯基，一位團結工會的知識分子中「工人的朋友」，來擔任總理。

罷工的解決分為兩部分：簽了字的經濟協議和政治協議。政治協議並沒有公開發表，而以當局採納不同的措施來表達。不同的地區經濟協議，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處在於當地的要求。

雖然戈爾巴喬夫提到一個地區的協議有35項條文，但是，柯茲巴斯地區的協議只有17項條文。第一條依據國家企業法讓礦場有充分的經濟和法律的自主權。企業可以有不同的財產形式——國家、合作社、租借、聯合股份及其他。第二條文讓企業有權以合同的價格在國內外銷售國家合同以外的產品。國家的定單也要重新檢查。

有些主管在罷工後被免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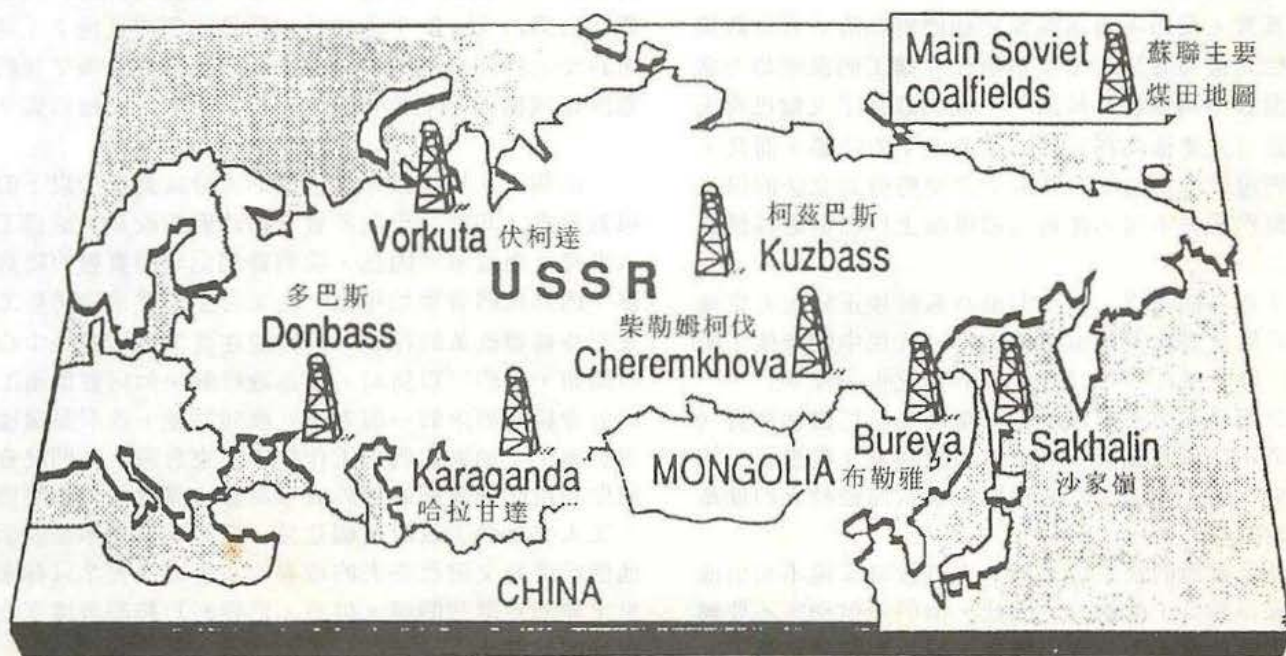
第三條文主張根據真正的開採成本來提高煤價。這開採成本應該包括重新培育的全部費用，而且要把自然環境的改變考慮在內。企業亦應該有權對工作成果的指標作某些修正。第四條文允許企業獨立地定出出產規範和工資率。地區的規範只作參考之用。

這四項條文是政府對工資和社會投資要求的回應。因此，這些方面的增加，至少在某程度上，是依靠生產力的提高和礦工的努力。在舊制度下，生產力的提高會導致工資率的降低和出產規範及計劃定額的提高，因此，懲罰了效率較高的企業。

其他條文滿足了以下各種要求：夜班工作的額外工資、來回礦場所花時間照付工資、星期日休息、退休金和退休時間（一個主要的要求）、產後休假、假期、工作有關的疾病和減少多餘的管理人員，等等。

協議中比較政治性的東西並沒有被中央新聞機構所發表，雖然它約略地提到個別的要求。這些較政治性的協議包括：增加那些缺少的消費品供應，提高西伯利亞工人的地區工資津貼。它也提供工會委員會和勞動集合體會議的新的選舉。在某些地區，礦場和企業的主管在罷工後馬上被免職。在多姆巴斯協議的48項條文中，就有取消醫藥、食物、和商業中間人合作社的條文。哈拉甘達盆地的礦工埋怨新聞媒體沒有充份報導其他區域的要求，是真實的。

對於免除地方官員和舉行新選舉的要求，戈爾巴



喬夫建議最高蘇維埃改變它先前的、把地方蘇維埃的選舉從1989年秋天延遲到1990年夏天的決定。先前的決定爲了對地方官僚作出讓步，因爲他們恐懼，如果準備時間不夠，他們就會完蛋。目前，有工人代表參加的地方黨大會，可以考慮更新幹部的問題。到目前爲止，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的民主化、以及新憲法草案的討論，尚沒有新的決定。

蘇聯知識分子中流傳這麼一個觀念，認爲蘇聯工人是野蠻的、酗酒的、沒有階級觀念的、官僚反動的法西斯社會基礎的潛在力量。工人沒有能力來當家作主，議會和政府應該由「有才幹的」人、「受過教育的階級」來管理。礦工的罷工向這個普遍流傳的觀念挑戰。

雖然這個運動自發地興起和散布——罷工委員會只在罷工開始後才組成——礦工却顯示了驚人的組織力、紀律和自制力。幾乎沒有暴力事件發生。罷工組織了自己的糾察隊。警察報告犯罪案件大爲減少。酒類的買賣完全禁止。在多納茨克，兩個在廣場上的礦工看起來像飲醉酒，他們馬上被送回家。罷工委員會命令基本需要的企業不要參加罷工。

高度的政治意識

這次罷工也顯示出工人的高度政治意識。他們決不是右傾民族主義和官僚層的法律和秩序的信奉者。罷工以經濟要求的運動開始，但礦工們知道，更基本的問題是保證的問題，而且唯一的真正保證就是權力，即是說，民主。

其實，我們不得不震驚於他們對各級的官僚政權（包括其最高層）的極度不信任。礦工們漠視地方當局，而且不滿意與部長談判。他們忽視了戈爾巴喬夫和賴茲可夫要他們在談判結束前復工的呼籲。而且，當他們達成協議時，許多礦工還堅持得到立法的保證。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在最高蘇維埃上作出很難爲情的承認：

「在多納茨克，礦工要最高蘇維埃正式地鑑定他們與政府代表團共同協議的文件。人民中間產生了所謂[!] 缺乏信任……其他區域的情況也一樣。」

戈爾巴喬夫不得不要借助葉爾辛幫忙這個事實（葉爾辛不以最高蘇維埃名義，而以議會「激進派」的名義來呼籲工人復工），證明蘇聯當局最缺乏的就是人民對它的信心。

甚至當他們決定復工時，大多數礦工還不相信他們已經得到真正的勝利。因此，他們不但決定不要解散罷工委員會，而且發出警告，只說暫時停止罷工。

巴夫洛格勒罷工委員會主席說：「我們現在是復工了，但是我們還要等一個月。如果我們再次受騙，我們還會繼續鬥爭，直至勝利爲止。」

蘇聯記者報導，雖然黨委員會是在地方掌權的機構，但在罷工之時，他們根本沒有感覺到它們的存在，反而發覺它們是工人咒罵的對象。真理報也批評地方當局，說它們似乎已經隱居幕後。

這個空隙由罷工委員會來填補。工會的《勞動報》評論說，「特殊情況發生了。罷工委員會事實上變成了地方的當權者。他們忙着解決貿易、運輸和維持秩序的問題。從早到晚都有人到罷工委員會來要求幫助，因爲長期以來，他們沒辦法得到其他機構的幫助和支持。委員會的成員調查每個問題，詢問詳細情況，而且儘量幫忙解決醫療、修理、轉換工作等問題。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如何團結起來，如何組織起來，如何勇敢地保衛所有勞動者的利益，要求解決國家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看到了罷工怎樣顯示人民的不尋常、獨立、能幹、勇敢和準備獻身給人類。我們看到了這些人以後，不禁要問：爲什麼這些人早先不受人注意，爲什麼那些對人漠不關心的、不經常公開露面的、絕對聽從上司的人們，却被指派爲公共機構的主管？

工人階級領導人在罷工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只使那些人（他們原先奇怪爲什麼知識分子的代表沒有出場）比較安心一點，因爲這事的發生出於他們意料之外。這種態度並不使人驚奇，因爲甚至在「非正式」運動的左派人士中，我們有時也聽到蘇聯工人已失去階級成分的說法。法國《世界報》駐莫斯科通訊員在罷工的第八天，即7月19日，發了一個消息說：「莫斯科知識界開始生動地討論：我們該去那邊嗎？我們應該建議協調嗎？我們應該支持它嗎？用什麼形式？」

這個工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大分歧是基於以下的現實考慮：知識分子大多數支持政府的改革，認爲工人群眾反對改革。因此，我們聽到記者們寬慰的嘆息聲，因爲他們着重地指出，企業自主的要求證明罷工是支持蘇聯改革的行動。因爲這在罷工以前不是中心的問題，我們可以猜測，這是政府解決如何資助礦工的社會經濟要求的一個方法。換句話說，政府是這樣告訴礦工：如果你們的工作效率愈來愈高，我們就會讓你利用你們勞動的額外成果來直接滿足你們的需要。工人們接受了政府這個意見。但是，這是不是表示他們已經被戈爾巴喬夫的市場改革爭取過去？只有未來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已經有足夠的證據支持懷疑的態度。

這次罷工基本上是有關權力的問題。事實上，工人是要求對生產和對他們的剩餘產品的控制。根據市場改革的邏輯和提倡市場改革的利益，政府企圖把這些渴望引導致反對中央控制和中央計劃，而且朝向把控制權分散到企業平面。這就把工人對自主企業運轉的環境施行集體控制的鬥爭引開。

利潤與自然條件掛鉤之弊

有一位罷工領袖曾在蘇聯電視上要求煤礦工人召開一次不受高級官員所管制的全國大會，但這事以後就沒有提起。但是，從邏輯上來說，在一個開採資源的工業，如果利潤大部分要靠自然條件，那麼企業自主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多姆巴斯區的煤礦很深，而柯茲巴斯區的煤礦較近地面，所以前者的開採費比後者高得多。據我們所知的工人對於公平的看法，工人一定會認為，自主的礦場在價格由市場決定的情況下進行的競爭，是不公平的。甚至波蘭，雖然團結工會的領導是非常親市場的，但根據最近的調查統計，只有百分之四的產業工人同意工資應該與市場所決定的利潤率掛鉤。

不過，協議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寫清楚，因為它只要求煤價的提高應與開採和重新培養的真正成本有關。同時，它也讓企業有權調整工作成績的指標。這是不是表示煤價將會依據地方的成本，而不依據市場競爭的情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就不止是正被大力譴責的所謂「拉平水平」了。

工人們感覺工作非常辛苦，而生活沒什麼改進。但是有人却把這個受剝削的感覺引導到離心的傾向上。克密洛伏罷工委員會的主席說：「柯茲巴斯區的居民已經懂得：到現在為止，這個區域推行了殖民政策；拿走的愈來愈多，而投資却愈來愈少。」

官僚管理的浪費性

但是，這就是各民族共和國的分離主義者所說的：莫斯科在剝削我們！在蘇聯，沒有一個區域的居民不這樣說的。但是，一位經濟學家最近寫道：「莫斯科人不但沒有生活得更好，而且在許多方面比其他城市的居民更壞。」

問題顯然不是區域之間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不均，而是官僚管理的浪費和違反民意，更不必說一部分國民收入被官僚特權所吞沒了。但人們不一定從這裏得出結論，說區域和企業的自主是萬應靈藥。將市場範疇應用到多姆巴斯煤田，勢必導致大量煤礦的關閉

、數以萬計礦工家庭的離散，以及許多社區的解體。幾年前，英國礦工也曾拚命反對將這些範疇應用到他們的礦上。

在罷工前幾個月的一次圓桌討論會上，一位內閣部門全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用以下的話解釋方興未艾的罷工浪潮：

「隨着向充分的自籌財源的轉變，集體的財政福利也向各方面發展。這種發展常常不太依靠集體本身，而依靠外面的經濟條件，以及該企業所屬的部門。市場機制是朝向貨幣刺激。誰能提高產品的價格，誰就能養尊處優……。」

「工人們知道他們收入的增長跟不上條件較好的部門。我們在煤礦業和五金工業中看到同樣情況。在某些礦場，工人停止工作，甚至他們的要求被滿足。這樣，有關改進食物和生活條件的問題才得以解決……」

「糧食漲價和物資缺乏，也促成罷工運動。合作社不能填補所有的孔洞。事實上，他們掠奪國家的資財，而不改進人民的生活。基金從一個容器抽到另一個容器，從國家抽到合作社貿易。另一個原因是地區的不平均發展。重工業高度發展而農業較弱的地區遇到的困難比較大。在自籌財源自管財務的情況下，一個地區所出產的糧食有時不夠該地區自己用。以前所要求的是專門化，即片面的發展、優先發展生產資料。農業遠落在後面。工人覺得工作愈來愈辛苦，但所得則愈來愈少。」

「前途的預料不是很好。許多負面的因素（主要是經濟中的市場因素的加強）使工人不得不採取罷工行動，這些因素不會很快消失。因此，罷工將會繼續，而工人階級的情況將繼續會變壞。」

「社會的保護力不足」

這個分析並沒有被其他與會者所質疑。他們只加上一句：舊的制度也不公平。還有，這個分析最近被一群出名的（而且無疑地親市場改革的）社會科學家在《真理報》上證實：「社會保護力不足，已經在新的經濟管理情況下出現。我們看到了大批人員被解僱、結構改變、企業關閉。這就是人民的社會不滿爆發、社會活動加強和勞動減弱的主要原因。」

以親改革的觀點來解釋這次罷工的人們，也要對工人階級的平均主義強烈情緒，作出滿意的解釋。下面的一封信表達了人民對於市場作為社會正義根基的一些想法：

「近日來，我對於『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個

公式（這應該是改革的基本原則）有些看法。這是不是表示合作社的年青社員、足球隊員或者搖滾樂手應該拿很多錢，而我這個經歷了戰爭、寒冷和飢餓而工作了四十四年的老工人，都應該得到麪包屑？

富人階級和窮人階級？

「但是，爲什麼要談我和他們呢？有一間工廠，在新的經濟模式下因提高價格而發財，這工廠的機器修理工賺錢不錯、甚至非常好，因爲他的工資是靠利潤。這工廠想辦法把國家定單減少到只包括較貴的貨品，而讓便宜貨品自由地交換肉類和房屋建築材料。另一個工廠只製造不昂貴的貨品，雖然這些貨品極爲經濟所需。政府不讓它改變生產。所以你就不能以這些貨品來交換其他東西，因爲這些貨品是工業所用的零件。這個工廠就窮，它的機器修理工跟先前那個工廠的修理工做同樣的工作，但他也窮，得不到肉類和房屋建築材料。平等的工作，不平等的生活。

「我在廣播中聽到我們有4千萬窮人。將來的數字會是多少？我們的國家會不會成富人階級和窮人階級？」

罷工背後的基本問題（權力的問題）尚沒有解決。導致這次罷工的動力，遲早會導致工人去召開全工業的會議，以解決他們的共同問題，因爲他們再也不能把這些問題信託給部長或市場去處理。

「我們的錢哪裏去了？」

這樣一個全工業的工人大會將會提出二個問題：一、那些集中化的職能應該由政府部門來運轉；二、如何使政府部門民主化以致它不但對這個部門的企業的工人負責，而且對全體人民負責。

這也許是遠東漁業工人（他們的經濟狀況與礦工十分相似）所要採取的方向：數以百計的集體漁場已要求他們的工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罷工的礦工也提過的問題：「我們每日在海上辛苦工作十二小時所賺到的金錢到哪裏去了？爲什麼工會中央委員會同意中央部門這種『掠奪人民』的立場？……漁民的數以百萬計的金錢落到你所喜歡的地方，但沒有落到漁民所需要的地方。」

這樣的會議也清楚顯示出與其他部門的工人協調合作的必要。運動的內在邏輯會導致全國計劃民主化的要求，而不是導致取消全國計劃或者使計劃的設計和規定仍舊留在官僚層的手上。從商品生產首次在歐

洲成爲主要力量開始，人民大眾就已採取鬥爭，一方面反對所謂「自由的」市場，另一方面支持一個公有的經濟制度來保證社會安全和公正。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蘇聯的獨立工人階級運動不會朝這個方向發展。

主要的字眼當然是「獨立的」。工人委員會本身包含了獨立工人組織的種子。這些罷工委員會已經在礦區的市鎮和區域的平面上存在。礦工們把這些委員會的功能看成比單單監控所訂立的協議還要廣濶。克密洛伏委員會的首腦說：

「我們現在已經決定在礦場中舉行會議。會議的目的，不單是考慮公眾團體在罷工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工會委員會、勞工集體會議（我們也要考慮他們的功能）的作爲。總而言之，要考察誰是誰，然後也許會考慮新的選舉。但是城市罷工委員會也不會完全交出它們的權力。從8月1日開始，它們變成公眾團體：監督協議的執行，保衛工人集體的經濟和社會的權利……。」

這次罷工已經逼使工會作出抉擇：或者是完全站在工人一邊；或者是面對另一個工會的創立。他們現在正要趕緊自救。全蘇總工會在七月底通過一個決議，要求工會委員會在罷工定要發生時站在工人一邊。克密洛伏地區工會委員會已經建議取消官員的特殊利益。

知識分子和這些委員會會否建立聯繫？將來即會分曉。這個挑戰自然而然地落在知識分子中社會主義派的肩上。

罷工開啓了改革的新局面

將來臨的地方蘇維埃選舉，具有至少是同樣的重要性。經過這次罷工以後，特別是有了富戰鬥性的工人委員會的存在，官僚們就更不容易搞不民主的動作，像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那樣了。在目前階段，真正的蘇維埃權力（也就是完全獨立於黨官僚的權力）很可能在地方上重建起來。

在柯茲巴斯礦區的一個名叫布勒左夫斯科的鎮上，工人委員會已經表示對地方蘇維埃、特別是它的主席不信任。米茲杜慶斯克委員會號召人民起來要求他們的蘇維埃代表向他們作報告，並且罷免不稱職的人員。柯茲巴斯的人民代表最近開會決定：「考慮罷工委員會的要求，考察在十月召開地方蘇維埃的選舉問題。」但是，地區的黨委員不贊成。

礦工罷工在蘇聯改革中開啓了新的局面：工人階級已經以獨立的政治角色在這個舞台上出現。

〔譯自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國際觀點》〕★

礦工罷工要求

工類全辦對育封文
策類文談的華文齊聯'婚

〔根據《烏克蘭中央新聞處》一份資料，多納茨克（Donetsk）礦區的要求，包括下述；這些要求和庫茲涅斯克（Kuznetsk）礦區罷工的要求大致相同〕

自管

□多姆巴斯（Donbass）地區經濟自管。

工資

- 中班工資增加20%，夜班增加40%。
- 來回礦場的時間應算入工作時間內。
- 取消最高工資限額。
- 婦女礦工危險工作，應增加工資60%，增加六天假期。

工作條件

- 每年有四十五日假期。
- 因工作引致殘疾的礦工，可獲平均工資的50%作賠償。
- 連續工作二十年後可以退休。
- 十年工作後可獲分配房屋。
- 嚴禁懲罰性調職。
- 女工工作滿三年後有全薪產假。
- 接受治療時，獲資助及有薪假期。
- 暫時裁員應照發工資。
- 改良食物的質與量。
- 退休礦工獲免稅優惠。
- 星期日休假。
- 在地上工作使用風鑽和重型機器的工人，由於長期受震蕩影響，應有特別津貼和特別假期。
- 檢討濕煤規則，以杜絕不公平罰款。
- 退休花紅須相當於一年平均公資，一次過付款。

生活條件

- 須對頓巴斯區的水、電、煤氣供應作出決定。
- 檢討肥皂配額。
- 幼稚園學生費12.5盧布〔22美元〕。
- 幼稚園膳食費追上生活水平，提高至

60盧布〔108美元〕。

健康與安全

- 承認下列疾病是職業病：如石末沈積病、炭疽熱、肺癆、風濕症、皮膚癌、引起甲狀腺、耳、鼻、喉痛楚。

工會權利

- 將工會的職員減去一半。
- 官方礦工會資助罷工經費。
- 罷工不會受清算。
- 保證全國性的新聞媒體對罷工的情況如實報導，直至要求獲得完滿解決。

合作社

- 禁止建立新合作社和解散現有的藥物和食物合作社（這些合作社，相信是為了掩飾私營抬價倒賣國家公價貨物才設立的）。

政治（部分礦場的罷工工人提出）

- 伏柯達（Vorkuta）區的彼卓拉（Pechora）工人的要求：
 - 廢除蘇聯憲法中規定由共產黨領導的條文，即憲法第六條。
 - 「權力歸於蘇維埃」；工人議會並非橡皮圖章。
 - 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廢除由「羣衆團體」選舉人大代表的規定。
 - 地區和地方議會的主席、領導人選舉，應由不記名的直接選舉產生，廢除立法規定。

烏克蘭雪伏諾拉特（Chervonohrad）工人的要求：

- 撤除下列官員職務：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及其他地方領導、警察局長、國家安全局局長。
- 設立命名為「團結工會」的獨立工會。

哈薩克工人的要求：

- 終止在斯美帕拿定斯克（Semipalatinsk）的核彈試爆。

★



愛沙尼亞一份周刊的漫畫：你可以出來，不過要先交罰款

女性有權做全職工人或全職母親

談「經濟改革」的婦女政策

〔在有關蘇聯改革政策的衆多分析中，很少提及女性的處境。沃羅尼納（Olga Alexandrovna Voronina）是蘇聯科學院的一位哲學家，同時也是蘇聯國內極少數探索婦女問題的作家。下面的訪問原刊於意大利雜誌《雙週刊》，現節譯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國際觀點》〕

□記者 ■沃羅尼納

□：沃羅尼納，有好長時間俄國女性是世界上最解放的女性。你們擁有平等權、男女平等法律、分娩保障、免費墮胎和全民就業。女性在各行各業（由醫療到教育）都佔了大多數。不論在任何地方，你們都比男性顯眼。已高度解放的俄國女性對她們自己的處境有什麼看法？

■：你試試對我們中任何一個說「但你已經解放了呀」，我保證她立即在你面前抱頭痛哭。如果我對朋友說，西方對我們很感興趣，我肯定她們會立即反嘲說：「替我取個外國簽證吧！我已準備好講辭，題目是『我的一天——分分秒秒』。」

每天工作十六小時

蘇聯女性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是八小時在外面工作，八小時在家裏做事。蘇聯很少研究會認真探討我們的狀況。即使僅有的研究也顯示，今時今日的蘇聯女性，每星期花四十小時做家務，另外再花四十一小時在「外面」工作。由於蘇聯的物資嚴重短缺，市場輪候購物的人龍永無止境，加上公共設施不足和效率極低，家務勞動是極疲累的事。

七十年前，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是先鋒。我們擁有一切「新穎」和「現代」的事物。現在，在同樣的事情上，我們却比其他國家落後。幾日前，我翻讀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①的作品。她認為，只要女性享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和平等的權利，她們所受的歧視自

然會消除。列寧也是這樣認為。就是現在，人們還是這樣想，但這看法將女性問題簡約為問題的一方面——工作。這嚴重地簡化了女性問題，結果妨礙了有關兩性衝突的辯論。

□：你的意思是人們還未真正處理女性的問題？

■：我想這樣說：重要的問題在於沒有人（不論男性或女性）認識到，伴隨着革命，人際關係也得改變。從一個具體真實的奴隸社會，轉變為一個個人獨立的社會，過程中必須研究新的方法去處理人際關係，尤其是兩性間的關係。

在革命成功之後的幾年，男性感到已獲得自由，但他們沒有問，如果女性也要感到真正的獨立和解放，還有什麼應該改變。女性在工作方面享有同等的地位，但我強調——只是在工作方面。女性承擔的家務勞動重擔，一點也沒有減輕。除此之外，連所謂女性享有的就業權利，也成為一種對社會的義務。

□七十年後的今天，一切都沒有改變嗎？

■：沒有。開始時，女性只是作為勞動後備軍加入工作，沒有人想到要為女性提供專業訓練。這情況絕非偶然。它顯示了一種想法，就是：無論如何，女性真正、首要的工作是家庭。我認為，女性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矛盾。

「經濟改革」要女性回家

□這樣，戈爾巴喬夫提出要女性回家去，是否表達了社會的要求和需要了？

■：不，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建議迴避了勞動婦女合理的要求。一個勞動婦女曾對我說：「看看我的生活。我天亮就起床，為孩子和丈夫煮早點，之後忙着送孩子上學，然後趕去乘地鐵或巴士上班。車程要四十分鐘到一小時呢！下班後又要去市場排隊購物，之後去接孩子回家，煮晚飯，哄孩子上床睡，之

後還要洗洗燙燙……這樣的生活，我實在過不下去了。」

我想補充，大多數勞動婦女從事的工作都要消耗大量體力。很明顯，如果提出讓她們回家，開始時她們一定很高興。

但我們仔細想想，如果將晚上的洗燙搬到中午來做，將排隊買薯仔的時間由傍晚六時改為早上十時，還有整個下午在家裏照顧小孩等等，這樣的生活實質上有什麼改變呢？當然，這樣每晚可以多睡幾小時，但生活仍沒有改變啊！

還有，從此你金錢上就要依賴丈夫。如果他半夜醉酒回家，你只能默默忍受。他從此認定自己是一家之主。如果他離開你，或者你決定自己生活，你還剩下什麼呢？除幾個孩子外，一分錢也沒有。我對上述那位勞動婦女說了這番話後，她答：「不錯，這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認為唯一的辦法是要社會組織上進行根本的改變。但國家領導人要女性回家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想法。

□：你是否認為，他們的建議，目的是把要耗用大量公衆收入和國家預算的社會服務轉嫁到女性身上呢？

■：回答這問題很困難。事實上，我不認為現時提出要女性回家的人（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真正相信這是解決的辦法。女性佔勞動人口51%。如果她們離開勞動市場，會發生什麼事？經濟災難！此外，女人做的都是非技術性和疲累的工作。你以為男人願意取代女人這些位置嗎？

統計數字顯示，半數女工的工作需要手力和腳力，但不需要思考。蘇聯各地的鐵路、輕工業和農業，主要就是靠這些女性。在波羅的海共和國，女性的工作需要多一點技術，她們種植棉花、薯仔、小麥，播種和收成。在建築地盤，是女性用她們的肩膊抬灰泥。在飯店，她們洗碗碟。在服務行業，她們的技術屬最低水平。如果要她們放下這些

工作回家，想像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所以，叫女性回廚房只是一種口號，目的是獲得一些當下的支持而已。

蘇聯女性地位的變遷

□：但工業改革會大大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部分勞動力會被新科技取代。勞動力中女性的部分，不會因此獲得「釋放」嗎？

■：我想問題遠比這來得複雜。現時人們通常強調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今時今日我們已在建立一個基礎，讓女性發展事業。第二種看法認為，女性天生的角色是在家庭內。這些看法有什麼意思？雖然不明顯，但它們背後的真正理由是，如果女性要工作，她們就要接受社會提供給她們的工作，這些工作還有待發展，但女性應當保持沉默。

有關社會服務的問題也一樣。社會服務一直沒有改善，是因為大家心知肚明，女人總在那裏，隨時準備好養育孩子、照顧老人，為社會負起這類責任。「女人回家去」這種主張只會引向死胡同。它既不能解決經濟危機也不能解決家庭的危機。

□：但一般來說，女性想要什麼？

■：大部分不願回去廚房。幾個月前，在一項以一百個女性為對象的調查中，有八成想要一份工作和社會服務設施。只有兩成想做家庭主婦。我個人贊成大多數女性的選擇。我們應該發展社會服務設施，解決長期被擱置的社會問題。我們國家將這些問題稱為「女性問題」。我看正因為這樣，這些問題被無限地放在最後一項議程。

□：「女人回家去」的口號是否代表父權主義的復甦呢？

■：事實上，俄國從來就是一個父權社會。革命前，農民佔國家人口的八成，伴隨着的自然是父權文化和偏見。革命像是對這集體意識的一場暴風。故此在二十年代，雖然沒有真正和有效的女性主義動力，但女性主義的價值觀一度獲得推崇，部分最古老的偏見也隱沒了。

這些年來，參與建造新社會的女工受到所有人的讚揚，就連母親角色也一下子跌到第三位。格拉德科夫（Fyodor Gladkov）的小說《水泥》（主要的「五年計劃小說」之一）就是一例。小說中

的女性才生下孩子，孩子就被交給機關。之後孩子就沒有在小說中再出現。機關代替了舊家庭。新一代集體生活，社會負起照顧和教育孩子的責任。家庭作為一個消費單位不再有什麼作用。女性裹着紅色頭巾去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在這情況下，孔武有力的男性形象受到打擊。即使在形象方面，男性與女性也看似平等。他們都努力工作，並且將工作做得很好；他們為未來而努力。他們看來沒有其他急切的需要，譬如愛情或個人問題。然後戰爭爆發。戰爭很可怕，而且將很多其他事情完全倒轉了過來。

□：在上述的兩性形象方面，戰爭引起了什麼改變呢？

■：隨着戰爭，所謂「真正男子漢」的偏見又再出現。也許不像五十年代美國那樣顯著，但也相當普遍。雖然女人也手持武器保衛家園，但保衛家園的榮譽却完全被男性壟斷。他們再次成為英雄，再次獲得戰爭帶來的榮譽和地位。但沒有人指出，戰爭期間，是女性支撐整個經濟。一直以來，人們都將男性看作為唯一的積極分子。

但和平之後，種種失望也隨之而來。經濟一團糟，這削弱了英雄的地位，也動搖了他們的信心。收入不足夠養活家人，找兼職不容易，發展事業要看他人面色（要看黨的決定）。

還有，有一個因素從沒有人分析過，但我認為對男性的心理有很大的影響。戰爭期間，女性意識到她們不需要男人，也可以自己面對最困難的環境。感情上而言，她們當然想念男性，但女性如果沉迷於這種感覺，她們只會被指誘入資產階級陷阱。男性回來後又想做一家之主。這引起了很多衝突和失望的情緒。

我想，這是導致男性和女性酗酒的原因之一。這同時導致男性和女性對社會和對家庭都抱着冷漠的態度。可以說，現時女性的態度是順從多於冷漠。這種態度其實是將一切交給社會——男性的社會——去處理。男子氣概達到最高峰。現在，經常可以聽到男性和女性說應由男性來主事。

改革缺乏女性觀點

□：但在近期開展的重大辯論中，

女性是否已開始說話？她們可有參加選舉？他們可有提出要求和推出政綱？

■：作為女性，作為主體——沒有。人們強調問題不是男性與女性間的衝突，一點也不是。如果女性有參與，也只是作為對政治感興趣的人，或者作為想有改變的個人。

而且，候選人、報章和會議關心的是什麼？政治、經濟、價格改革、合作社、農業改革。有些人支持改革，也有人反對。但沒有任何人（包括選舉候選人）用女性的觀點去看這改革過程。當然，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是有分別的。後者較多考慮社會服務和女性生活環境的問題，而保守派則要女人回廚房。

□：你強調社會服務。你認為首要的是什麼呢？

■：我這樣強調我們的居住環境可能會令你感到奇怪。我不想過分強調這問題，但我敢絕對肯定，如果我們不能夠成功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對女性而言，便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不知道怎樣向你解釋。我希望女性可以工作、學習、在社會中發展自己，但我也希望她們可以在生命中某些時期放下工作，譬如，當她們有幾個孩子時。現時她們不能這樣做。一些地方完全沒有家庭津貼，就是有，也只有一年。而津貼每月只有可笑的三十五盧比。

我來自中亞細亞。那裏的女性即使有十個孩子，她們不懷孕時就要工作。還有，她們還需要獲得工作單位的保證。對婦女的保障都白紙黑字寫着，但有誰會執行？譬如，一個女工的孩子病了，她想請假一天，她知道她有這樣的權利，但這不等如她可以行使這權利。大多數情況下，上司會說：「不成。如果你惹麻煩，我便解僱你。」你看，這些問題都有待解決。

□：你的看法跟「婦女待在家裏，祖國是她們的命運」的口號有什麼分別呢？

■：不，這是她們應有的權利。問題不是女性「必須」待在家裏。我們要將這論點倒過來看。「女性有權做全職母親」，而不是在做丈夫的傭人、地板清潔工、社會服務的供應者之餘，做一個全職母親。

女性這些權利必須透過非常具體的方法發展出來。首先要對我國女性的處

境進行認真的研究。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社會學家這樣做過，而我正嘗試去做。我們一羣年青社會科學研究員非正式地組織了起來。但我們將會需要一個全國範圍的網絡，讓我們做更多訪問，建立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女性的問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明斯克、諾沃斯比爾斯克、塔什肯特等都不同。她們需要的解決辦法也不一樣。但我們人力不多，資源也不多。因此我們決定以挑畔作開始。

開展關注婦女處境的研究

□：什麼挑畔？

■：首先，我談論做全職父母的權利。我們說，不論男人或女人都應該享有這權利。應由一對夫婦自行決定：誰放棄工作（放母親假或父親假），在孩子出生後或其他情況下照顧孩子。在我們國家，男性在家裏清潔家居或為孩子洗澡的想法，若不是烏托邦就是醜聞。正因如此，我們公開宣布我們要求「做全職父親的權利」。開始時，這種論點帶來嘲弄和訕笑。之後，人們開始願意聽我們講說話。

最急切的是改變人們的習慣和文化。在一個連「個人」這詞語也含有貶意的國家，你以為「女性」這詞語會有什麼含意？

□：你談到挑畔時，我以為你指性。這話題至今仍是禁忌。你們怎樣提出這問題？

■：性至今仍是一個沒人談論的話題，是秘密。我們的傳統向來壓抑性，就是現在，我們仍不談論這問題。談論性會被認為「不恰當」，就是學校也不談論。你知道嗎？蘇聯和美國女性曾在電視上進行過一次討論。有人問：「性關係又如何呢？」蘇聯女性答：「這裏沒有性愛。」但翻譯員用英文說：「這裏沒有與性欲有關的問題。」但這個譯法不是原意。

□：據《星火》畫報透露，蘇聯每年有六百五十萬女性進行墮胎。這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官方沒有發表墮胎數字。你講的數字可能與真實情況很接近，但要獲得這問題的真實資料很困難。正因此，我們堅持要成立研究婦女狀況的社會研究組織。

□：但為什麼那麼多墮胎？你們用甚麼方法避孕呢？

■：首先是沒有性教育，其次是避孕方法很少。偶然有供應的唯一避孕器具是子宮帽。很少夫婦的居住環境可以過像樣的性生活。此外，人們較以前早開始性行為。十二到十四歲的女孩懷孕人數日增，其中很多要非法墮胎，否則她們要先獲得父母同意，才可以透過正常的途徑墮胎。

註釋：

①科倫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二）是列寧時代第一任政府的社會福利專員和政府中唯一女性。一九二一年她成為第三國際的國際婦女部秘書。她的著作論及多方面政治問題，包括女性主義。★



我們希望蘇聯恰如其名， 成爲自由自治共和國聯邦

訪問愛沙尼亞「人民陣線」領袖

「愛沙尼亞人民陣線」（後稱人陣）領袖之一塔馬克（Mark Tarmak）說：「國際性接觸對我們是重要的，我們希望交換訊息，亦願意與來自其他國家的代表會面。向外界澄清愛沙尼亞當前發生的事是很重要的。」

塔馬克負責「人陣」的國際關係工作，他被選爲「人陣」議會107個代表之一。

他解釋說：「我是共產黨黨員，不過這不太重要。」

「人陣」的活躍分子中，有相當多共黨黨員；在最高領導層，六人中有五個是共黨黨員。在「人陣」代表大會上，共黨黨員則佔了二成。此外，在全部愛沙尼亞人中，有百分之十是共黨黨員。

蘇聯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人民陣線」，是「愛沙尼亞人民陣線」最重要的外界關係，而與芬蘭左翼的接觸則是剛建立。在東歐方面，「人陣」與捷克「民族陣線」及波共政府試圖設立的較廣泛性的諮詢組織 PRON 有聯繫。

塔馬克疑惑地說：「團結工會是一個工會組織，非法的，因此與我們仍未有接觸。可能這有點愚蠢。」

「我們知道 PRON 是由上層組織的，而且不是很有民間基礎。不過我們的目標之一是要將愛沙尼亞的工會團體轉變成真正的工會。」

「愛沙尼亞人民陣線」曾給予尼加拉瓜經濟協助，亦曾以多種形式協助過亞美尼亞。

塔馬克說：「我們的目標，是要使蘇聯恰如其名，成爲一個自由自治共和國組成的聯邦。」

贊成列寧的民族主張

他解釋，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被斯大林歪曲了。在蘇聯，民族主義是個污穢的字眼；對於愛沙尼亞人，却是另一回事。細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有別於

大民族，後者通常都是進侵性的。「人陣」可以接受列寧的觀點，不過他們不願意自稱爲列寧主義者，因爲這個詞語在愛沙尼亞那裏是被曲解的，再沒有多大意義——反對「人陣」的人通常斷章取義引用列寧的語句，以挑起反蘇情緒。塔馬克說：「我們要求自己決定國家的情況，不要莫斯科的管治，我們要求所有地區民主化。」

「對於我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保護和保存愛沙尼亞語言。」

「人陣」亦要求重組經濟及經濟民主化；塔馬克稍作沉吟，說：「我們所談論的自管經濟制度，適用於蘇聯所有地方，以至整個歐洲。」

他說，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是一個難題，不幸有很多愛沙尼亞人將俄羅斯人和蘇聯制度混爲一談。

「人陣」由不同層分的組織組成，沒有個人會員；組織包括鄰舍團體、家庭、一群朋友，或是工廠內的團體。「人陣」有結社自由，完全有別於莫斯科從上而下垂直式的組織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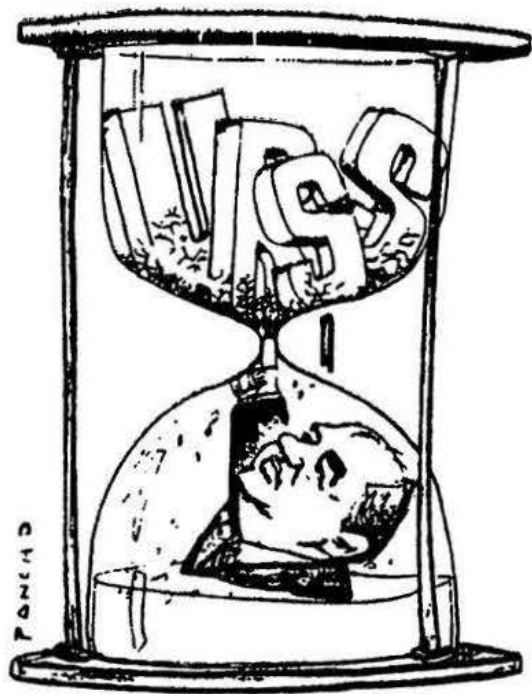
避免使用暴力

塔馬克不知道有多少人參與「人陣」，只知道基層組織團體選出有二千名代表；此外，「人陣」在一個有50萬人口的城市舉行成立集會，有30萬人參加——這個數目相等於愛沙尼亞人口的三分之一。

既然「人陣」是一個群眾組織，有什麼可以阻止它呢？這把問題帶到蘇聯干預的威脅去。塔馬克認爲確是有這種威脅，不過愛沙尼亞也早有蘇聯駐軍了：「如果我們保持冷靜，循序漸進，有可能避免暴力。在北方和南方可能會有一些暴力，那裏的情緒比較不同。」

「如果我們達到目的，那將不再需要「人陣」。到時將會有民主的機構，各種形式的組織和黨派都可以活動。」

〔原載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瑞典《國際主義者》〕



拉脫維亞「人民陣線」綱領

(節錄)

蘇維埃權力的衍生和發展，是要實現全民的願望——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對自由、生活、社會公義和各民族平等的願望。不過，斯大林的專制統治和它帶來的國家停滯期嚴重扭曲了公共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官僚機器和人民之間出現了深刻的鴻溝，社會瀕臨危機邊緣。

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契機，可以讓我們自沉重的歷史包袱下釋放出來，讓列寧主義原則的社會主義復甦，依據人民的利益、需要和願望締造新社會。社會重建從上層展開，但要它不走回頭路，只有人民廣泛的積極參與——從下而上的民主和公義才是保證。

(一) 總原則

1—拉脫維亞人民陣線 (Latvijas Tautas Fronte-LTF，以後簡稱「人陣」) 是一個社會和政治性群眾組織，是人民的愛國和政治活動的結果，包羅志同道合的人士。「人陣」一貫的宗旨，是爭取徹底重建拉脫維亞，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原則。「人陣」以人民的願望為依歸，依據維護拉脫維亞共和國主權的原則，參與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法治政府。「人陣」反對任何形式的權力和觀點壟斷。

2—「人陣」的目標，是實現拉脫維亞全體人民——不分社會觀念、語言、政黨、宗教或民族——渴求民主和重建社會道德的願望。

「人陣」的活動，與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其他專權思想互不相容，與支持官僚和行政指令、宣揚種族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宗教思想或散播仇恨和暴力的行為不相為謀。

3—「人陣」本着列寧教導的人民自決和平等權利的原則，致力發展其建設性的民族關係。

4—「人陣」與蘇維埃人大、其他國家機構和社會團體保持合作，並不企圖取代任何國家機關或社會組織的功能。

蘇聯共黨第十九屆聯合大會的議決結果，拉脫維亞共和國提交該次大會的主要建議，以及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作家協會八八年六月的領導擴大會議議決結果的原則，都是「人陣」的活動綱領。

(二) 國家和社會民主化

1—「人陣」支持蘇共第十九屆聯合大會公布的激進改革，落實憲法所列國家為人民政府的原則。過去只是以人民之名實行政治制度，却是脫離人民的。人民真正的權力和統治必須確立。工作合作社選出的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必須反映工人的想法，維護他們的利益。

選舉法必須重新制訂，保證各級人以公平和直接的全民投票選出，避免等額選舉，保障言論自由競爭，訂定規例，嚴格監察選舉結果。

2—「人陣」崇尚以法治國。國家要向人民負責，但人民是向國家以正確程序樹立的法制負責。人民必須透過公開討論和全民投票參與立法。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修改最高蘇維埃已經通過的法律的做法必須停止。「人陣」建議，拉脫維亞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成立一個特別部門，監察執法機關、軍隊、國家安全部和內部軍隊的運作，確保符合法制。

3—「人陣」致力粉碎斯大林主義和新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統治制度，促使蘇聯從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聯邦國轉變為主權國家組成的聯盟。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宣告的共和國主權，和重新推行列寧主義的聯邦制，都是「人陣」努力不懈的目標。

各加盟共和國彼此間的關係，及與蘇聯間的權限劃分，都要以法律為依據。在涉及共和國利益的問題上，共和國須擁有否決權，亦應享有與其他國家和國際機構建立直接關係的權利。拉脫維亞的憲法應加添公民地位的內容，及

訂立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法律。

4—「人陣」反對一切行政指令式的及國家機器官僚化的運作。每個工作合作社必須自行決定其內部運作的事情。所有政府官員應服膺在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之下，接受人民真正的監管，並全面揚棄斯大林主義的統治手法，走向權力分散，政府機器選任重要職位人選時，必須徵詢人大和獨立部門。

如有任何人士可壟斷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都是破壞民主權利的。

5—要求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國家和黨的功能分開，以免權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或集團之手。應設立獨立的憲制法庭，審理國家和社會機構，以及政府高官的行徑。

6—國家和社會生活，應嚴守全面公開的原則。干擾外國電台和電視廣播的做法必須停止。

7—群眾組織，包括「人陣」，要確保可使用大眾傳播媒介宣揚他們的信念。

8—要改善共和國內的政治氣候；令人胆戰心驚的不安氣氛，不可在政治及其他社會行動中出現。複雜的問題，應透過適當的討論辯明。「人陣」反對任何人因其政治或宗教信仰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政治煽惑、污蔑或誣告。

(三) 人權和公民權利

1—「人陣」認為，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的公民權利，應以聯合國人權宣言和蘇聯接受的國際文件——《人權和政治權利國際協議》、《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協議》，和在赫爾辛基簽署的《歐洲安全及合作最終法》——為基礎。上述文件應大量印行，它們的內容須納入拉脫維亞憲法。

2—「人陣」確認人的人身、生命、居所、通訊隱私權等必須獲得憲法保障。市民須有權向公營機構提出訴訟。無罪假設的原則必須貫徹。有關扣留和拘捕市民的法律須改善，避免非法

濫用的情況繼續發生。須確保被捕者有即時聯絡律師的機會。損害市民尊嚴的行為，責罰應加重，以加強保障。

3—要求給予市民查閱政府機關儲存關於他們的資料，和申請更改該些資料的權利。

4—要求將斯大林政權在三十年代對蘇聯境內的拉脫維亞難民，和四、五十年代對拉脫維亞居民所犯的罪行列為違反人道的罪行；組織和執行該等罪行者，和推行斯大林主義鎮壓的人的名單一併公開。這些人的特權和官銜應要褫奪，及須為所作所為接受聆訊。被鎮壓人士的權利應全面恢復，國家除恢復他們的名譽外，還須給予物質補償。

5—「人陣」認為，拉脫維亞公民如有犯法被判刑的，應在本共和國服刑；在其他共和國定罪的人士，不應在本共和國服刑，在他們服刑期滿後亦不應遣送到本共和國。

6—「人陣」贊成拉脫維亞公民有與別國公民自由往還的權利，進出國境的限制應依法執行。申請護照被拒的，有權向法院提出訴訟。

7—要求重新確認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中有關軍事訓練的條文，讓拉脫維亞公民，不問民族身分，在本地服兵役。因宗教或和平理由不參軍的讓他們以社會服務代替軍訓。

8—「人陣」崇尚和平，贊成解除軍備，主張社會的非軍事化，爭取波羅的海和斯堪的納維亞區為無核區；撤除拉脫維亞境內的非常規裝備，減少常規武器。

(四) 民族問題

1—「人陣」認為，現時以斯大林主義教條為基礎的民族政策亟待改善。任何民族，包括拉脫維亞人，都有繼續存在的權利。「人陣」不會支持民族消亡，社會才有進步的民族觀點和政策。

2—民族問題應在尊重所有民族的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原則下解決。鼓勵民族仇恨或損害拉脫維亞居民的尊嚴者，都不可接受。維護本身居民的本土語言的文化，是每個加盟共和國應有的責任。

3—拉脫維亞人既長期在拉脫維亞生活，在此地保存、發展他們的民族、語言和文化，他們在拉脫維亞共和國享

有基本重要的地位。所以，「人陣」認為，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應規定，在蘇維埃原則和其他選舉中，應保留大多數議席給拉脫維亞人民的代表，保證拉脫維亞人民可實現民族自決。

4—要求將拉脫維亞文在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中訂明為法定語言，共和國內各機構書信往還應使用拉脫維亞文；俄羅斯文則應作為聯邦關係使用的語言。市民與拉脫維亞政府交往，可用拉脫維亞文或俄文；社會服務方面，亦是如此。

「人陣」呼籲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他共和國政府合作，在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下，將斯大林統治期受民族政策戕害的人士送回原居地，並幫助他們重建家園。

拉脫維亞政府應確保共和國內外的拉脫維亞少數民族獲得維護他們文化傳統的保障。

6—由於大量移民湧入，使拉脫維亞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在其本土上成為少數，這使到他們將來的存在和自管權受到威脅。「人陣」認為應立即遏止移民潮，但已入境的不得驅逐。

7—「人陣」認為斯大林主義和新斯大林主義時期推行的民族民粹主義政策，是導致民族關係之間話困難的主要因素。要改善各國間的關係，須尋出民族變質和糾紛的原因，須承認斯大林放逐主義政策大規模遷徙拉脫維亞人民的慘痛歷史，以及對其他種族的人民所犯的罪行……。

8—蘇聯政府必須正式承認，拉脫維亞共和國併入蘇聯是武力的結果，是違反拉脫維亞人民願望的事情。

9—「人陣」呼籲共和國全體居民，不論國籍，團結起來對抗斯大林主義、官僚和專權主義，積極討論拉脫維亞和俄羅斯的政治、社會、經濟和生態等各方面問題。

拉脫維亞的主權，要以確認共和國領土內所有人民的民族身分主體為基礎。

(五) 道德

2—「人陣」主張，政治應服膺以人為本的道德原則。

3—「人陣」同意宗教組織在重建社會道德和提倡普世的人本價值十分重要。建立法治社會的同時，保障教徒和

宗教組織的法律權利尤為重要。

教育制度方面，建議廢除強迫灌輸無神論，應容許學生有權自由選擇宗教教育。

(六) 文化、教育、科學

1—反對將文化簡單二分為進步和反動兩類，又反對將文化濫套上意識形態和政治規條。

2—維護拉脫維亞民族的權利。它的土地、歷史、文化、民族身分、語言和特有的生活方式，都應發揚光大。

3—拉脫維亞各方面的文化發展，都應由拉脫維亞共和國自行決定。

4—致力確立本共和國所有居民與其他共和國及別國人民自由維繫的權利。

5—「人陣」認為，居於海外的拉脫維亞人的文化工作，是拉脫維亞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他們應享有推動拉脫維亞文化傳統的機會。

6—「人陣」支持拉脫維亞境內各族人民的文化自治，擁有學習本身的語言、組織社團、交流訊息和在無損整體利益的前提下，發展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7—「人陣」相信，社會熟習拉脫維亞悠久的過去和近年的文化價值；研習拉脫維亞內外波羅的海文化、保存和推廣拉脫戈里人及里弗利^①文化歷史，保證拉脫維亞本土各族人民文化的發展。重新推廣波羅的海日爾曼傳統都是當務之急。

9—廣大市民有知情權，為此電台和電視台應派駐員在各國際政治和文化中心。

10—反對無能的官僚統治文化、教育和藝術範疇，反對文化是達成意識形態目的之粗糙觀點，反對只將剩餘的資源分配予文教的壓抑態度。藝術商業化、服膺市場原則是「人陣」不能認同的。

12—兒童人格是教育發展的焦點。現時在學前和小學教育強迫灌輸意識形態的做法必須停止……無論採用那種教學語言，拉脫維亞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的教育制度必須依據共和國的需要規劃推行，中學的學年須與別些共和國相同。大學應該自主，有自己的學術出版社。

「人陣」要求停止在中學推行軍事

訓練，豁免學生入伍的義務，大學的軍事訓令應徹底改革。

14—「人陣」呼籲修改根據斯大林主義、唯意志論和緊縮政策在社區、經濟、其他組織、街道、公園、標誌等隨意更改的名稱。應恢復沿用舊名稱；新設事物根據拉脫維亞的歷史和文化另立新名。

15—「人陣」反對資訊和文化高度集中化，因此應停止將中央電視和電台的廣播轉錄到拉脫維亞的節目。

16—不容許無能的唯意志論經濟政策藉科學和技術發展之名盛行。發展農業的科學部門有優先權。

17—「人陣」擁護在科學範疇引進民主和開放的原則；科學家應有權自由表達意見，這對保障科學家獨立、不受行政部門利益左右至為重要。

（七）社會主義和社會環境人道化

1—每個拉脫維亞公民有自由選擇工作，發揮才能、按工作質量取酬的權利。

2—要求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人獲得合理的基本生活保障，其水平應隨生活費高漲而調整。優先滿足人文需要不能成爲紙上文章。

4—「人陣」完全反對委任官僚層的延續，任何特權編配社會服務，尤其是醫療、康樂、社會保險，都有違公認的道德，亦與社會主義原則背道而馳。

5—「人陣」主張，拉脫維亞共和國各區發展規劃的社會公義原則，要符合社會和文化需要，和分配工農產品。

6—人口分佈正常化是解決社會和民族問題的主要任務。必須設立一套有效的法律和經濟措施，停止人口盲目遷移。

（八）經濟

「人陣」認爲，經濟必須是達到社會目標的手段，必須徹底人道化。經濟生活的理論基礎必須徹底變更，從屬於人民及個人的需要。

2—「人陣」支持在共和國推行徹底的經濟改革，革除所有阻礙人民經濟發展的因素和機制——唯意志論、部門壟斷、任意管制合作社及私人工作等。反對官僚主義傾向和政府部門阻延經濟改革，喪失革命內涵。

3—「人陣」致力謀求共和國的經濟自主權，即在生產管理、發展、和分配產品各方面自決。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在管理經濟、發展和維持生產力、社會建設、保護自然等方面的角色必須加強。

5—「人陣」贊成徹底而持久地改革管理人民經濟的制度，給予企業完全調配社會勞動力的權力，而企業須依據《國家企業法》（戈爾巴喬夫新立的經濟法的骨幹）行使權力。

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的發展，應完全倚仗本地勞動力。

8—發展農業是人民經濟的主要命脈。

合作社和租賃國家土地的，須給予長年期的經濟和法律保障（九十九年租期及使用權保證）。「人陣」認爲農場是國家財富，應在社會管理制度中營運。

9—要求所有重大的經濟計劃，要透過報章、雜誌和電視作廣泛討論。

所有經濟及建築計劃應由有關的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九）生態

1—潔淨環境是保障人民的道德和身體健康的要素，必須成爲主要關注的問題。因此，有必要進行有關的科學研究和具體工作以解決生態問題，亦應探討與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及波羅的海盆地國家就此合作的可能。

2—公共的經濟計劃只應在有足夠資源清潔所用設施時才應進行、擴展或投入營運。

對污染環境者，包括個人，必須採取有效的罰款制度。對生產過程產生廢料的狀況須作有效監督，定期公布環境污染的最新數據和污染者的資料。人民經濟要朝保護環境的方向發展，風力和水力發電等對環境破壞較少的能源須多加使用。危害人體的化學品（有毒物、化學肥料、輻射性物質），包括運輸經過共和國的危險品，須作監察。

3—「人陣」支持農業革新，使其更符合生態規律。拉脫維亞境內舊有的自然保護區應復闢，新的保護區有待開發。軍部和邊防區域亦應重視保護環境和生命圈。根據拉脫維亞環境，劃分工業、住宅和康樂區；合理使用土地，應順應地區氣候、土壤性質和循環培植

農物；公路規劃亦應考慮本地的地理和文化歷史因素。開採礦物和興建能源設施時，須確保土地的生態獲得適當保護，旨使日後還可作耕作用途。

註釋：

①拉脫維亞人中有不少拉脫戈里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里弗利人只有數百人，住在庫蘭半島沿海地區。

〔編按：拉脫維亞人民陣線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召開第二次大會，通過議決，支持脫離蘇聯獨立的前景〕★

我們主張不流血革命

訪問立陶宛人民陣線主席蘭茨貝吉斯

〔立陶宛人民陣線（立人陣）在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立陶宛議會選舉中，獲得八成選票，「立人陣」主席蘭茨貝吉斯也擊敗了對手立陶宛共黨書記，成為立陶宛議會主席。隨即，立陶宛議會宣布脫離蘇聯獨立，並更改國號為「立陶宛共和國」，刪去了原有的「社會主義」字眼；目前，事態還在發展中。

以下訪問原刊於一九八九年二月五日波蘭半獨立機構出版的天主教刊物《Tygodnik Powszechny》，其中部分內容被當局檢閱刪去。中文譯文也因篇幅關係，刪去部分內容。「立人陣」主席蘭茨貝吉斯在以下訪問簡介了「立人陣」的組織情況、主張和與蘇聯、波蘭關係的見解，對讀者了解該地區的複雜的政治形勢，當有所幫助——編按）

□ 訪問者

■ 被訪者

□：你們運動的領導核心由甚麼社會階層構成？他們之中有沒有共黨成員？你是否共產黨員？

■：我不是共產黨員，也從未參加過。有些共黨成員個人，在運動中，甚至在主動團體中十分活躍。這運動是由進步知識分子，主要是黨內改革派和知識分子圈子內的人組成。

□：「立人陣」有多少人？

■：我也說不上來，估計有十至五十萬。我們依賴社會主動性，不希望搞出一個新的官僚架構，所以至今未確立正式會籍，但現時正在登記支持者。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有些與我們的綱領和鬥爭方式相反的煽惑行為被推諉到我們身上，我們才作出登記的決定，我們必須具備能力，把與我們目標相悖的行動劃清界線。

在很多問題上，有明確大多數的人民支持我們。例如，在反修憲簽名運動中，我們在一個星期裏收集到180萬個簽名。我們要包下整列火車，把名單帶去克里姆林宮。

要求主權不等於脫離蘇聯

□：那麼說，那相等於立陶宛共和國所有成年人了。可否簡介你們綱領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的最高目標，是立陶宛的主權。這並不一定意味脫離蘇維埃聯邦。西歐國家正趨向逐漸緊密結合，蘇聯也有可能轉化成一個我們自願接受的共同體。我們綱領的引言，一開頭便清楚指出，我們認為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與希特拉的交易並不合理。我們並按此分析出從這些交易派生的後果。

我們認為，立陶宛擁有自己的經濟，是它的主權的基礎。這個經濟必須跟中央完全分離，並可自力更生。交易必須公平，由市場機制自由達成協議。

□：有這個可能嗎？

■：必須如此。整個經濟已陷入泥淖中，只有徹底改革才能把它救出來。這些改革不會削弱蘇聯，反會給她動力。遭削弱的只會是中央官僚制的權力。

我們重視環保，現時的情況已是災難性。我們還關注提高立陶宛的語言和文化地位。

真正有主權的先決條件，當然是法制和經濟的獨立，其他一切都只是姿態。我們亦敦促天主教會社會生活應有它的適當位置，取回它的產業和內部自主。

□：在教會周圍有沒有反對派聯合組織，像波蘭哪樣？

■：教會是重要的道德及民族力量。在本世紀初葉，以及四、五十年代，它都是立陶宛尊嚴的所在。教會周圍談不上有什麼聯合組織。我們雙方，互相包容，但淵源各異。

「立人陣」是開放的基層運動。我們承續十九世紀末的自由主義刊物《瓦巴蘇》（Varpasu）的傳統。立陶宛的傳統讚歌內並沒有神的概念，因為那是每一個人的讚歌。兩次大戰期間，教會人士幾次試圖加進「天主」兩字，但都沒

有成功。

我們一向保衛宗教信仰者的要求。他們佔國民相當的大多數，而他們的信仰自由，是民主範疇的重要因素。我所考慮的是人權和公民權。我們為這些權利的全面實現而鬥爭，同時也爭取公民可享有自由教育和文化活動的權利。

我們抗議政府強迫人民接受無神論的宣傳。我們獲得斯拉基基斯埃斯主教的同情和精神支持。他曾說：「我們以為自己是最後的〔立陶宛人〕了，現在看來我們的民族可以長存！」

□：你們心目中的立陶宛主權，是否包括獨立國籍、貨幣和軍隊？

■：我們的綱領雖然有獨立貨幣的前景，但目前卻沒有此打算。國籍已經分開處理了。我們也認為，共和國政府有需要控制湧進立陶宛工廠工作的移民勞工。

我們要求所有立陶宛公民——包括立陶宛人、俄羅斯裔和波蘭裔，都能夠留在原屬的共和國內服兵役，除非他們要求外調往特種部隊、學校或其他兵種。

□：究竟怎樣才能實現這個綱領？

■：我們排除叛變、暴力或集體非暴力抗法行動的方式，寧願合法和公開地行動。這是我們的力量基礎。

主張不流血革命

□：你們接納自由思想，但這股思潮包含着「非暴力抗法行動」。

■：我們無疑得承認有時需採取這種手段，〔一九八八年〕七月九日的羣衆集會上，我們就曾號召抵制立陶宛《真理報》。人民普遍罷買該報，就連報販也勸告顧客：「你不應買這份報章。」數周後，該報主編便被撤職。接替的編輯，後來也不再刊登所謂「震驚的讀者」所寫的有指向性的來信。

綠色運動分子也號召過抵制牛奶、乳類製品和受污染的水果。過半的乳牛都患病，會傳染人，牠們都應宰掉。

□：立陶宛以農業著名，這真令人難以置信。

■：自從發生過抗議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代表拒絕修憲的示威以後，官方傳媒開始污蔑我們的運動，說我們以「經濟改革」為擋箭牌。我們其實試圖實現戈爾巴喬夫的思想；我們並非反黨，反黨的是官僚層內那些自我中心的保守集團。

□：你們認為你們的運動是否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延續？

■：不是！那是個完全不同的階段，完全不同的政治層分。改革的思想是由官方上層制訂的。我們是支持者，代表着全國絕大多數人的意願，而不同政見者是個別的抗議者。兩者有基本的分別。

□：你們透過羣眾性行動和羣眾性傳媒運作，可否描述一下？

■：我們仍然有運用電視，每周有兩小時，通常是直播的。電視也播出我們的大會，為期兩天，不經刪剪（修憲衝突之後，我們的電視時間的確被取消了）。我們的刊物是合法的，而且還不經新聞檢閱。他們現時正考慮改變這個狀況。

「立人陣」的中央機關刊物是《阿之米馬斯》（Atgimimas），初時發行十萬份，目前，立陶宛文版發行量是十萬份，俄文版二萬份。「立人陣」地區委員會也印行自己的刊物。

□：你們說你們要的是自我約制的革命，你們會有哪些約制？

■：有指稱說我們要求太多、太急躁。這並非事實。我們只是要求多一點、快一點。約制包括：不要暴力行為、提防挑釁者、永遠依法公開活動。我們相信持久的羣眾壓力和社會意願是有效的。

□：你們認為，立陶宛人是否背叛了愛沙尼亞人？

■：整體來說，立陶宛人都全力支持愛沙尼亞人和他們的最高蘇維埃。我們的運動發出過有關的聲明，也在刊物上登載過。只有立陶宛最高蘇維埃才不接受修憲，它還違反立法程序，沒有就修憲草案進行投票。我們所支持的原則是：與立陶宛憲法一致的聯邦法，才具有法律約束力。在最高蘇維埃會議廳門外集會的羣眾，譴責蘇維埃代表背叛，

「立人陣」的代表團，則提早離開最高蘇維埃會場，以示抗議。我們被指煽動羣眾……〔訪問原文被檢閱〕。

□：剛才你提到抵制農作物的運動，能否談談農村的狀況？

■：農村裏的關係有需要重整。地方政府對集體農場的農民有全權。地方官員拒絕供應畜牧所需的產品，甚至不同意集體農場出售所養的豬隻。

立陶宛人和波蘭人互相猜忌

□：談談波蘭—立陶宛關係吧。有關立陶宛出現反波蘭事件的報導愈來愈多，聽說立陶宛人曾向米基域茲紀念碑①擲雞蛋；維爾紐斯教堂出現過「猶太人送往以色列，俄羅斯人送往俄羅斯和波蘭人送往火葬場去」這類的標語。

■：我沒有聽說米基域茲紀念碑事件，而那破壞性的標語，的確出現過，但卻是在一次集會中，而不是在教堂外。當人們看見這個標語，便把它撕毀。我們的刊物對這次挑釁提出抗議。我們肯定這是挑釁。

奇怪波蘭人為什麼看不見事實。你們的報章熱衷報導這類事情，可惜卻不去找出真正應該負責的人。連串這類不公平的指摘，十分損害立陶宛人民的感情。這類報導所造成的偏見，令你們難以看清立陶宛的真實情況。

□：「立人陣」對立陶宛少數民族持甚麼態度？

■：我們的綱領相當注意少數民族，認同少數民族有權保留語言和民族身分。我們樂意協助少數民族，尤其是波蘭人從事自己的文化活動。我們認為少數民族應有自己的學校，或者使用自己語言的課程，可以組織自己的會社等等。同時，亦應提供機會，讓少數民族學習立陶宛語言，使他們得以全面參與社會或公眾事務，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少數民族亦應認同立陶宛共和國的領土完整。今天，波蘭裔的立陶宛人，甚至連立陶宛語言的報章也不願意看。

□：你們的國民對我們波蘭人有何看法？

■：民族神話仍然影響着我們對彼此的看法。一般來說，我們抱持猜疑的態度。我們猜疑你們對立陶宛的崇拜〔作為中世紀波蘭黃金時代的一部分〕有什麼想法。波蘭家庭裏的奧斯杜巴馬

聖母像「維爾紐斯守護神」有什麼含義？華沙教會對維爾紐斯卡可華軍的紀念，構成什麼威脅？可知你們如此尊崇的游擊隊，在立陶宛人之間聲名狼藉？

□：波蘭對立陶宛人有沒有特殊意義？

■：這個當然了，波蘭是我們〔除蘇聯外〕唯一的鄰居；即使從歷史角度看，你們對我們也有特殊意義，雖然這些意義有點曖昧。

波蘭一直是我和我的同事們的世界窗口。我們從波蘭看得到有助了解歐洲的書籍、藝術展覽、音樂會和外國報章。波蘭人又可以把我們的消息和困難告訴歐洲，也可以寫文章評論和剖析我們的困難。

註釋：

①米基域茲（Adam Mickiewicz, 1798-1855）是波蘭著名浪漫主義詩人，被譽為受壓迫的波蘭民族的代言人和精神領袖；他在立陶宛出生，在維爾紐斯大學受教育，一八二三年因參加政治活動被放逐到俄羅斯，後移居巴黎，並客死該處——編按 ★

「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綱領

〔「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的成立大會，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開始一連三天在基輔召開。自從一九七二年謝爾比茨基（Shcherbytsky）被委任為共和國的黨書記後，烏克蘭「民族離心分子」遭清洗，六十年代一度蓬勃的烏克蘭文化復興遭破壞；在高度壓迫的環境下，「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成立大會遲遲不能召開。

這次大會，標誌着烏克蘭共黨領導層的失敗。大會的第二天，宣讀了由十八名烏克蘭共和國人大代表的一封聯署信，要求戈爾巴喬夫撤除謝氏的職務。結果，九月下旬的蘇共中央特別會議上，謝爾比茨基被撤出政治局，稍後再被撤除在烏克蘭共黨領導人地位。

在較早前的清洗保守派行動中，謝爾比茨基能夠不受影響，一般分析認為是由於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地位重要，蘇共中央不願看見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發生的事，在烏克蘭重演，但現在一切均不可避免了。

以下是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成立大會的宣言〕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數十年，我們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以至道德觀念上，均陷入了嚴重危機；這是強加於我們身上的一個極權、虛假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果；斯大林主義官僚們強奪了蘇維埃的權力；人民與生產資料及成果疏離；中央殘酷而荒唐的獨裁；共和國的主權消失於無形，地方政府毫無權力；在國際主義的名義下，實施非民族化政策，不同民族被機械地融合在一起，毫不顧及各民族的利益。

這些危機，其實在整個蘇聯都有出現，而在每一個加盟共和國內，又各有特點。

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二十世紀一度令烏克蘭人民重現希望，以為可以重建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忘却民族曾經歷的苦難。俄羅斯及

奧匈帝國瓦解之後，先後宣布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及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烏克蘭人重新擁有自己的國家；烏克蘭人建立國家的過程，在錯綜複雜的歷史環境下，最後促成了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一九二二年，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白俄羅斯及高加索透過聯盟條約，聯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

加盟蘇聯初期，烏克蘭人的確享有發展民族文化的權利，亦享有主權。但斯大林命令式的行政制度出現後，嚴重地違反了建立蘇維埃聯盟的原則；烏克蘭的主權遭踐踏；和其他加盟共和國一樣，烏克蘭實質變成了一個極度中央集權國家內一個毫無特色的行政地區。

推行列寧主義民族政策的官員，被撤出烏克蘭共黨及政府領導層。在「反富農政策」的口號下，開始了恐怖手段，在農村推行集體化政策，結果導致一九三三年出現了一次人為的大飢荒，有數以百萬計的人餓死。

烏克蘭境內的知識層分，在斯大林時代亦受到殲滅；任何以民族良知發出的聲音，均在「打倒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大前提下遭鎮壓；人權及民族權利廣泛被違背。烏克蘭民族的歷史及文化被掠奪、歪曲及謾罵。烏克蘭及其他民族的歷史文物均被搶掠；民族遷徙政策把烏克蘭人不斷調居外地，導致境內烏克蘭人數目減少，使烏克蘭人數目與其他民族人數的比例，相應下降。

文化發展遭敵視

在烏克蘭共和國，不再使用烏克蘭語，烏克蘭人的文化發展受到敵視，而烏克蘭廣泛地區的自然環境，亦受到不可挽救的破壞，並且發生過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意外事件。

但上述仍只不過是斯大林主義者，以及新斯大林主義——勃列日涅夫主義者對烏克蘭人所犯的部分罪行。

如果將內戰、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

大飢荒，德國法西斯主義者佔領時期，以及一九四六至四七年的大飢荒加起來，就會約略知道，二十世紀當中烏克蘭人死了多少。

如果要避免烏克蘭民族出現大災難，所有擁有愛國熱情、願意承擔烏克蘭歷史責任的力量，不論國界、國籍、宗教、黨派、社會身分、教育水平、性別、年齡的人，便應該聯合起來；團結的方式只能是「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

蘇聯很多的共和國及地區，均出現類似要求重整^①的力量，他們都是支持重整的，而重整內容同時又顧及各自的民族特色。

蘇聯全國現正在重整當中，為人民帶來新希望，「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就是在改革浪潮中衍生出來的。

建設一個民主、人道的社會

〔烏克蘭人民重整運動〕〔烏人運〕的原則、目標、方向及行動綱領：

1-在行動中，「烏人運」以人道主義、民主、開放、多元化、社會公義及國際主義為原則，反映全烏克蘭共和國的人民，包括各族人民的利益，透過「烏人運」聯結共和國人民的愛國精神得以發揮，構成烏克蘭政治、經濟、文化復興的力量。「烏人運」支持蘇聯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黨大會第十九次會議，及第二十七次全國黨大會所提出加速改革的原則。

2-「烏人運」的主要目標，是為人民提供合乎人道的的生活條件，讓他們可以在烏克蘭發揮創意，參與建立一個民主、人道的社會；這社會將擁有真正的人民力量，人民獲尊重，烏克蘭民族得以發展復興。所有民族各自的文化需求，都可得到滿足；這社會將是一個真正擁有主權的烏克蘭主權國，它將與蘇聯共和國在更新共和國條約的基礎上，和其他加盟共和國建立新關係。

3-「烏人運」秉持下列目標：

- (1) 全力促進個人發展成負責任的個體。
- (2) 鼓吹建立民族國家，使烏克蘭加盟共和國變為一個法治的民主國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展；民族以至個人權利，都得到保障，基本民主權利得以貫徹。
- (3) 在財政及管理獨立自主的基礎下，加快共和國的經濟改革步伐，但同時顧及共和國經濟上的地區及結構特點，亦須照顧到各類產權中管理層所擁有的真正經濟獨立權。
- (4) 堅定不移地對抗非民族化政策，為烏克蘭人民在歷史上屬於自己的領土上，能自由安穩地發展造就先決條件；在國家的支持下，促進烏克蘭民族恢復信念，支持烏克蘭復興其語文，全面發展文化；喚起烏克蘭人對歷史及民族的醒覺，保存烏克蘭民族自尊。
- (5) 促進境內其他少數民族、團體的語文及文化發展，保障他們各項基本權利。

4-「烏人運」的行動原則

- (1) 保衛人權、自由、重整社會、個人道德。
- (2) 蘇聯社會及政治生活全面民主化。
- (3) 透過加速改變蘇維埃聯盟的內容，使烏克蘭共和國的獨立自主，享有實質意義。
- (4) 把烏克蘭共和國經濟納入正軌。
- (5) 社會公義。
- (6) 保護社會自然生態。
- (7) 建立民族文化。
- (8) 道德及宗教。
- (9) 保障健康、提倡體育。
- (10) 積極爭取和平。

「烏人運」工作大綱

5-「烏人運」以下列方法推展：

- (1) 「烏人運」將與中央、共和國及本地的黨機構及其他

團體合作，解決「烏人運」所提出的問題。

- (2) 會推選候選人參加選舉，並且支持一些競選政綱和「烏人運」目標無衝突的候選人；「烏人運」會提出將那些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撤職、重選；「烏人運」亦會參與監察選舉。
- (3) 「烏人運」會向有關中央機關提出意見書，要求地方蘇維埃問題由地方解決。
- (4) 「烏人運」會向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提交草擬，重新審議及修改法例。
- (5) 「烏人運」會有組織地收集民意，發表結果；如需要，會要求就某些問題舉行全民投票。
- (6) 「烏人運」會透過合法途徑，向國家機關施加壓力。
- (7) 「烏人運」會密切關注，保證烏克蘭共和國以至全蘇聯，不會違反《聯合國人權法》、《赫爾辛基歐洲安全合作協議》及其他國際條約中有關保障人權的條款。
- (8) 「烏人運」會參與監察社會狀況。
- (9) 「烏人運」將舉行活動，紀念有民族意義的日子及假日，並會提倡恢復民族傳統及習慣。
- (10) 「烏人運」會發展自己的經濟活動，會組織各類的社會計劃，及保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文物，以及天然財富。

籌辦交流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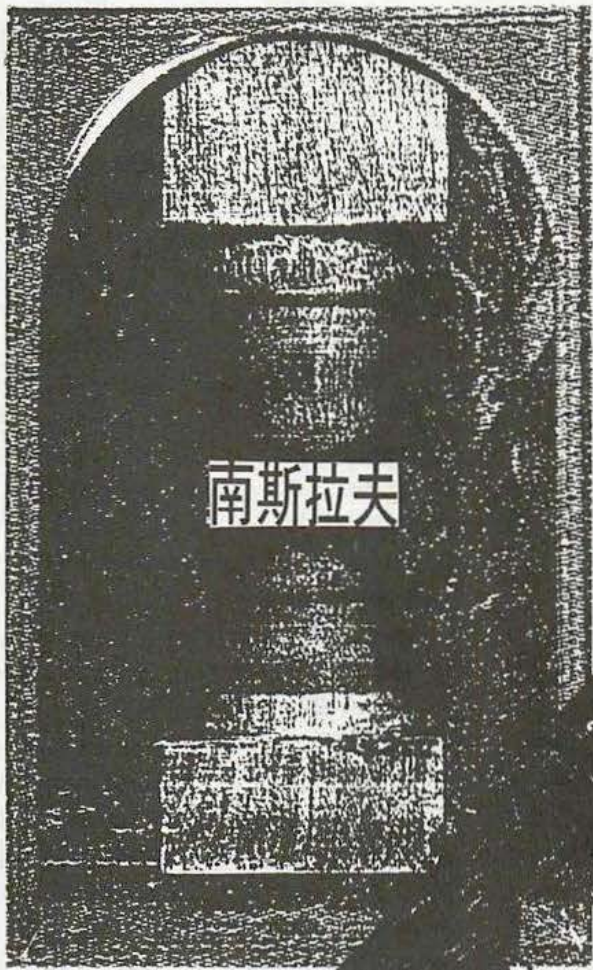
- (11) 「烏人運」會就緊急問題召開辯論及不同形式的研討會，並會組織專家小組，安排演講，組織討論。
- (12) 「烏人運」會出版自己的刊物、期刊、新聞簡訊，透過單張、海報、聲明、公開信及傳播媒介發表意見。
- (13) 「烏人運」會組織大型集會、示威、遊行。

6-「烏人運」會按照其綱領和章程，在烏克蘭共和國的憲法及法律範圍內活動。

註釋：

①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可譯作「重整」。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運動中，普遍也使用「重整」這名詞——編按

南斯拉夫
著名人工的...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市場箝制下的工人自管

文樂

南斯拉夫四十年來實行的工人自管制度，為國際工運提供了寶貴的正、負面經驗。在原則上，自管制度是直接生產者的聯合協作，是民主經濟制度的基礎，強調生產者是社會的主人。在實踐上，南斯拉夫人民比其他共產黨掌權國家的人民享有文化、政治、社會生活上的更大自由，對企業運作、社區運轉也有大得多的發言權、決定權。可是，南斯拉夫同時卻負債累累，貧富懸殊、民族傾軋，社會日趨分化，瀕臨崩潰瓦解。

出現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工人自管制度受到政治上南共聯盟一黨專政和經濟上市場機制的雙重卡壓箝制，以致大大削弱自管制度應有的民主內涵，可以發揮的功能被嚴重約制。南國經驗顯示，將工人自管制度置於「市場社會主義」之下，官僚便可保留中央權力的壟斷，因為市場本身發揮了制約制度民主化的功能。

南共堅持一黨專政

工人自管制度在一九五〇年立法推行，但是，一九五七年已出現第一次工人罷工。工人有自管的「權力」而仍然要訴諸罷工，這本身證明自管陷入困境。這次罷工值得注意的，是罷工者的訴求，標示出自管制度面對的核心矛盾。當時，斯洛文尼亞的礦工抗議煤價被固定在低水平。由於煤售價低，按市場結果取酬的礦工收入自然也降低。礦工認為按市場取酬的做法付出的勞力更大，但收入卻比其他行業低。

市場與計劃的矛盾，在這裏充分顯現出來。一方面，官方宣揚社會主義原則和工人自管制度的優越性，強調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但是，當市場被視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唯一方法時，在現實中，分配的邏輯便由市場來決定，工資與利潤掛鉤；在基礎結構或資源較好的企業或地區，生產者收入便較高，製造了企業、行業間的不平等，也造成共和

國間、民族間的差距愈來愈大。本來，社會主義原則以至南共推行自管制度初期的目標之一，是通過計劃進行重新分配，減低工業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差距，創造平衡的經濟，有利社會整體的長期發展。可是，市場原則卻與此背道而馳，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短期的利潤回報。

「市場社會主義」內含的矛盾，不斷影響工人自管制度；當危機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中央官僚架構便實行干預，推行非集中化或是重新集中化。四十年來自管制度經歷的波折，本質矛盾在此，至今未走出困局。

一九五七年，南共聯盟確定南斯拉夫走「市場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削減中央計劃的再分配功能（但中央仍控制七成的投資），一方面加強自管組織在本地基礎上的自主性。較富裕的共和國開始提出要擺脫「中央的干預」。一九六五年的改革旨在解除中央的控制；廢除中央投資基金，自管組織可控制利潤，物價不受限制。一九七一年，克羅地亞的民族主義運動興起，該共和國的黨領導層要求保留從旅遊業取得的可觀外匯收入。聯邦中央對這個分離傾向加以鎮壓打擊，同時重新局部集中化，擴大工人自治範圍，使之可以控制社區的整體消費，以協商的合約來推行自管計劃。一九七六年，通過《聯合勞動法》，大企業拆散為較小單位後的企業，正式獲擴大權，而技術層分不准進入工人委員會內，以保證自管制度不受技術管理層操縱。這個規定在形式上加強了工人的地位。

自管制度的源起

上述改革不斷以加強工人的利益和權力的名義來進行；實際上，改革的內容、轉變，都是在自管制度以外，由南共和上層官僚架構作出決定。這個特點從自管制度源起時已如此。

一九五〇年南共自上而下地推行工

人自管制度，是南斯拉夫和蘇聯在一九四八年決裂的直接後果。南共聯盟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在國內領導游擊戰爭，打退德軍，在東歐多國中，最有羣眾支持基礎。蘇共和南共決裂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南共拒絕接受蘇共的安排——放棄發展工業，改而大力發展農業，為整個蘇聯集團提供農產品，一如蘇共要求羅馬尼亞所做的一樣。蘇聯集團向南斯拉夫實行經濟封鎖，企圖迫它就範。南共在孤立的情況下，要取得人民支持，於是推行工人自管制度，鞏固政權的社會基礎。但要注意的，與此同時，南共在黨內整肅親蘇和異議的黨員，加強上層的一元化領導。這個貌似矛盾的發展，其實反映了南共統治的事實和政策。南共領導層從來沒有打算放棄一黨專政，它所進行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地在它支配控制下實行的，但它取得合法性及賴以維持統治的一個因素，是取得人民的支持。

南共在困境中推行自管制度，工人的力量、社會地位和重要性不斷受到褒揚，工人通過自管制度能享有一定的文化、政治、宗教、民族權利。但是，這些權利是有限的，不能超越上面定下的範圍，工人若有更大的由下而上的集體組織或行動，政權不會容忍；在實際的生活上，工人則愈來愈受到貧困化的威脅。

一九五七年發生了第一次罷工。一九六五年，隨着價格放開，通貨膨脹趨勢一直無法遏止。一九七一年，失業人數有三十萬（全國人口是二千萬）。通脹和失業，在進入九十年代時，只是更為惡化，發展到一百萬人失業（就業人口的兩成），另有一百萬人到國外做移民工人；二百億美元外債，人民實際收入自一九八〇年以來下降了超過四成。

地區間的差距也更擴大。在八十年代末期，較發達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與落後的科索沃、馬其頓相比，平均個人收入分別是341萬、221萬、142

萬和140萬第納爾（南斯拉夫貨幣），民族的界限，在工人和人民利益的立場上團結了廣泛的力量，抗衛民族沙文主義、地方主義、官僚控制。

到八十年代後期，南國經濟更無法自主。在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指令下，推行進一步的緊縮政策，人民更無法生活，地區差距更擴大，八七年，科索沃、馬其頓和黑山宣布破產。民族問題也更激烈地爆發。

面對社會狀況惡化、生活質素下降，工人的反應是不滿、抗罷、罷工。大企業自管的改革使自管變得非常零碎，零碎得完全無能，實際是黨想重新加強控制和集中化，從地方官僚和管理層分收回部分權力。這個制度不是發展民主，而是發展混亂，不是加強工人的參與和權力，而是加強工人的消極和分化。

在南斯拉夫實行了四十年的工人自管制度，顯示了它的局限與矛盾；這些局限和矛盾，是與南共一黨專政和市場經濟改革緊密聯繫的。但同時，工人自管制度源起的背景和理念上的支柱，是把工人放在社會的價值系統的中心。即使四十年來許多負面的實踐經驗，也不能招滅工人自管制度內涵的社會主義理想。要擴充這合理的部分，就先要結束南共的權力壟斷，結束一黨專政，由下而上地建立工人自管制度，使生產級上的民主結合着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的民主化，建立自管議會，由全社會民主地考慮需要，制定優先次序；即是說，工人自管制度要在民主社會的基礎建立和運作，這樣，它與民主的計劃、民主的社會主義便是一致的了。

工人開始自尋出路

從七〇年開始，罷工愈來愈頻密，尤其是在工業較發達地區，而且大部分罷工是工人自發的；罷工發生後，工人自治會、管理委員會等一般都會參加罷工。七十年代末期，開始有罷工委員會出現。經濟情況在八十年代愈趨惡化，八五年有七百次罷工紀錄，有些維持頗久。八七年春天又有一次罷工浪潮。較為突出的，則是一九八九年二月科索沃省的阿爾巴尼亞礦工的總罷工，這次罷工提出的不是經濟要求，而是政治主張——要求三名官員辭職，反對塞爾維亞共黨在憲法上削弱科索沃的自主權。

礦工的鬥爭是南斯拉夫工人和人民鬥爭的里程碑。不僅科索沃省人民總動員進行鬥爭，斯洛文尼亞的礦工更率先作出聲援；三月一日，《盧布爾雅那宣言》（盧布爾雅那是斯洛文尼亞省府）發表，斯洛文尼亞全人口二百萬人，有一百萬人聯署支持這個宣言，反對在科索沃省實施軍管。這個鬥爭運動突破了

南斯拉夫
與夫社共南

一九九〇年一月底，南共宣布放棄一黨專政，容許實行多黨制。阻礙向上述民主社會主義前景推進的一個當前障礙被移開了。★

泥足深陷

南斯拉夫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關係

〔南斯拉夫民間代表團出席一九八九年「國際利馬人民法庭」的演詞〕

多年來，南斯拉夫被列為世界上負債最深國家之一。她是在六十年代中開始負債，亦正是第一次經濟改革剛推行的時間。這些發展全不是偶然的。

一九六六年，南斯拉夫的外債總額達到十億美元。在其後二十年間，增幅達到十八倍之多。一九七一至七三年間，南斯拉夫的外債由二十七億增至三十四億再達到三十六億美元之多。當時，經濟改革中斷，由改革引發的政治危機也紓緩。

一九七三年，南斯拉夫的外債急激增加。一九八〇年，外債達到一百八十五億美元。一九八〇年至八八年，外債在一百八十五及二百二十億美元之間上落。一九八九年則為一百九十億美元。一九八〇至八七年間，南斯拉夫支付了三百七十六億作為債務開支，其中一百四十六億是利息，二百二十九億是還本。儘管如此，國家的負債情況還沒有得到改善。

單就債務開支金額來看，南斯拉夫名列世界第五負債最深國，在一九八四年，金額達到四十九億元。同年，在償還利息方面，南斯拉夫在巴西及墨西哥之後，排行第三。

在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及歐洲共同體支配下的債務情況及指示下進行的首次經濟改革，導致南斯拉夫開始產生經濟危機。

儘管官僚行政帶來偏差，而最重要推動南斯拉夫經濟發展的因素——民主——被窒息，但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及計劃經濟仍比資本主義優勝。

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南斯拉夫享有高速的工業化及在一九五二至六四年期間，她有世界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期間，這個國家的工業化更帶來人口成分的改變，70%農民變為70%城市居民。

在這個發展階段，外國的投資還沒有佔顯著的角色。

與此同時，當外國資本在累積過程中的成分逐漸增加，對外國金融集團——其壓力促使了一九六五年開始經濟改革——的依賴亦相應增多。這次改革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實行市場機制，提高成本效益及生產效率。

這次改革的結果，損害了發展過程，增長放慢，更引致大量的閒置、失業、工人透過罷工大規模反抗。

六十年代進行的第一次改革，引致社會廣泛不安及政治危機；為應付這個危機，南斯拉夫於是試圖在權力下放、引入市場機制、入口自由化及向外舉債的可能性等方面，停止改革的步伐。75%的外債是在一九七三至八〇年間造成的。所有外債都是由南斯拉夫所隸屬之國際貨幣基金會所控制的。今天，人們常談到這些借款不被善用，投資不適當，空置廠房，及購入一些殘舊過時的技術設備等等。

與此同時，有關政府人員的貪污醜聞却傳遍整個國家。在這方面，根本無法估計哪些借貸是貪官污吏偷去的，亦無法計算哪些由官僚私自收受回佣而花在購買沒有用途的器材上。

在過去數年來，南斯拉夫已經體驗到一種恆久性的危機。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如果未經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及歐洲共同體的許可，根本無法作出決定。而官僚在這些組織的壓力下宣布開放本國市場，且節節退讓。這些政策的後果對南斯拉夫人民來說是影響重大的。

為了償還外債，國民的消費被迫大量削減。

政府的主要宣傳口號是「不惜代價，加強出口」。推行這個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控制物價、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削減社會福利及文化、教育、醫療的支出。

物價急劇上升。消費物價指數有如下的增長：一九八四年，157%；一九八五年，176%；一九八六年，188%；一九八七年，218%；一九八八年，299%；一九八九年頭幾個月，通貨膨脹已劇增至1000%；根據官方估計，通脹到一九八九年間將增至2500%。

全體國民受到普遍貧窮化所打擊。超過半數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而一九七九年的人數只是15%；一九七九年，每月工資介乎四百至八百美元之間。根據官方數字，失業人數為一百二十萬，但實際上却超過二百萬。

一些被認為是解決的辦法，如透過重新安排債務，將債務轉化為投資貸款（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意思），其實將整個生產部門拱手交給外國資本手裏，亦即是恢復資本主義的運作，國家被重新殖民主義。

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勾銷所有外債。外債不是人民搞出來的。人民對於如何控制及使用這些借貸，從來沒有決定權。

這些借貸是不合法的政府搞出來的，這個政府剝奪人民的人權及公民權。

直至一九八〇年，國家才向公眾公布有關的負債資料。在鐵托病入膏肓的四個月中，在一次秘密的黨會議中，才向黨員宣布有關國家所欠下外債的機密報告。作為黨員對這些政策也沒有任何影響力，更何況一般市民呢！

今天，反對外債的鬥爭不單是人民爭取國家自由及獨立的鬥爭，同時也是爭取生存的鬥爭。★

阿爾巴尼亞裔礦工罷工的前因後果

雅爾基 (N. Jerkic)

塞爾維亞共和國兩個自治省之一的科索沃，有九成人口是阿爾巴尼亞裔人，其餘是塞爾維亞和蒙特尼哥羅人。長期以來，阿爾巴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之間的不和，是省內衝突的焦點。

塞爾維亞共和國在一九七四年在憲法上賦予科索沃省自治地位，可是，塞爾維亞近年企圖收回權力，對待阿爾巴尼亞人如二等公民，壓迫增加。塞爾維亞更孤注一擲，提出修改憲法，收緊對科索沃的權力。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為數一千二百名特普卡鋅礦工人展開罷工，堅持留在八百米深的礦洞，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科索沃是個貧窮的省分，然而礦工們只是關注政治問題——反對塞爾維亞人透過塞爾維亞政府收緊兩個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意圖把南斯拉夫變成大塞爾維亞帝國的策略。

絕食罷工觸發總罷工

礦工要求開除科索沃共黨領袖，前警察局長莫連拿 (R. Morina)，及科索沃共黨另外兩個領導人阿贊米 (Azemi) 和壽里亞 (Shukrija)。據斯洛文尼亞周刊《青年報》(Mladina) 報導，省內阿爾巴尼亞人只有千分之一支持這三個共黨領袖——他們因支持塞爾維亞政策而冒名，而原三個較得阿爾巴尼亞人信任的阿爾巴尼亞裔領袖則被貶黜。礦工要求讓這三名前領袖復出。

此外，礦工也要求：

□南斯拉夫新聞媒體停止污蔑阿爾巴尼亞人，不要把他們說成要滅絕塞爾維亞種族，或要進行「政治強姦」（據《青年報》周刊在科索沃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7.5%的阿爾巴尼亞裔人相信阿人出於政治理由而強姦塞爾維亞婦女，反之，有60.2%的塞爾維亞人和蒙特尼哥羅人卻持這種見解）。

□共黨領導人應接受和確認這個事實：阿爾巴尼亞裔人的示威是對塞爾維

亞八年來壓迫的一種正常反應，而不是由分離主義者組織的反革命活動。不是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民主；過去一年來，塞爾維亞人的集會被塑造造成民主的最高極致，而阿爾巴尼亞人的同類活動，卻被稱為「個別分離主義者的喧嘩」。

□那些廢除阿爾巴尼亞裔人的旗號、族徽、語言和減少自主權的憲法修改條文，應該撤銷。如塞爾維亞現行憲法的第四十七條，規定科索沃議會召開前須先得到塞爾維亞議會同意。

政府宣布緊急狀態

罷工者要求和塞爾維亞黨領導人（特別是密瓦斯城）開會，但塞爾維亞要了政治花槍：國家沒有派出與事件直接有關的負責人，而只是派出政府官員和礦工談判，宣稱：「你看，我們一如你們所要求的，黨和政府已分家了。」

二月二十日，即礦工開始罷工的同日，普里什蒂納 (Pristina，即科索沃省府) 大學學生把自己鎖在體育館內靜坐，聲援礦工。商人和手工業者也關上店舖；總罷工開始了，經濟生活全面癱瘓。

政府旋即宣布緊急狀態——然而，這個行動是南斯拉夫憲法所不容的：憲法規定，只有在受外國威脅的時候，官方才可以宣布戰爭狀態。

政府實施保護「憲法秩序」的緊急措施。情況近乎荒誕：示威者本來正是想維護憲法而不是破壞它！政府禁止舉行公眾示威，又部署了軍隊，並且召來了阿爾巴尼亞裔後備軍。

此外，工人稍被懷疑為與反革命活動有關，亦可以被開除。罷工者須像響應徵兵那樣應召上班；軍用飛機和直昇機在普里什蒂納上空盤旋，坦克也開向特普卡、普里什蒂納和其他大城市。

官方從塞爾維亞的森馬迪亞 (Sumadija) 地區調來更多軍力和防暴警察。科索沃和塞爾維亞官方指稱罷工者被阿爾巴尼亞分離主義者煽動，而南

斯拉夫全國人民也第一次看到這些「威脅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臉孔：一羣紆思滿臉、體弱力衰的礦工，他們除了生命，一無所有；現在，把生命也豁出去了。

〔當罷工結束之後〕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工人接受訪問說：「我在礦坑裏過了五天，到第六天才出來喘一口氣，然後又返回下面。在八天罷工裏，只有三十個礦工出過去，但是他們立即又回來了。整整一千二百個礦工沒有離開礦坑，大部分人沒有吃東西……」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有數百個礦工因呼吸和眼睛毛病，需要藥物治療，他們中很多人將長期不能工作。坑道設立了臨時診所。我們返回地面的唯一條件，是要莫連拿、阿贊米和壽里亞三人下台。〕

「當他們說，這三個人已經辭職，我們便決定返回地面，但要有先決條件，就是不得拘捕我們任何人。我們離開了礦坑，大家都精疲力盡了，所以我們訂在三月一日才開會討論其他要求〔罷工在二月二十七日結束〕。我們在三月一日當天去到礦場，卻發現大批警察封鎖了入口，他們要我們回家聽候消息。」

三月二日，警察拘捕了前黨領袖華拉斯 (A. Vilasi) ——莫連拿正是接替了他的位置——和一些經理，他們被控組織反革命示威，可能被判監數年。指稱華拉斯是分離主義活動分子的「證據」，不過是他探訪了礦場。政府展開了秋後算賬，科索沃人心惶惶。

〔原載《國際觀點》一六一期〕★

在地層深處的罷工者

羅芙力(J. Lovric)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在南斯拉夫科索沃特普卡(Trepcja)鋅和鉛礦場地下礦坑，一羣阿爾巴尼亞裔礦工作出誓死決心的罷工以爭取民族及政治權利。罷工者在部分要求獲得勝利後，在同月二十日宣告結束長達八天的行動。有關這次行動的來龍去脈，請參看前文——編按〕

在狹窄的通道中，礦工們擠迫地緊緊靠在一起。在深黑的礦坑裏，陰暗潮濕。泥土淤黑；空氣中，凝留着重重的鉛塵，稀薄的氧氣，任人怎樣健壯，逗留久了也會蒼白、疲弱，何況礦工們更夙夜未眠，有部分甚至正進行絕食抗議。只要尚存微弱氣力，任何人都不願作讓步——走上地面；事實上，他們當中很多已深患重病。在如斯惡劣的環境中，藥物的援助根本不可能。他們的容忍瀕臨崩潰，大伙兒的情緒由理性的爭辯轉向緊張狀態。今次工運多虧南斯拉夫領導人的決絕，令礦工留在地下的時間打破了世界紀錄。

礦坑共有十二層。我們抵達第五層。礦工臉上的痕迹，說明了他已在這地方度過了悠長歲月，當我問及為何會有這次罷工時，他激動得流下眼淚。

「礦坑的第八層中，空間狹窄得根本連坐下也艱難。我們阿爾巴尼亞人，除了向南斯拉夫人及鐵托歡呼以取得他人信任外還可以做什麼？……」我們的談話被擴音器的聲音截斷。擴音器的聲音說：南斯拉夫領導人迪茲達雷維奇欲與礦工代表團會面。立即惹起了礦工的不滿。他們咆哮說：「叫他下來！」於是擴音器推辭說總理的健康不太好——但此情此景，難以成爲一項有力的說辭。後來從礦工工頭得悉，爲了共同抗爭到底，有一個礦工連妻子的喪禮也忍痛不去；另一同志喪失了只八個月大的孩子，他仍堅持參與今次行動。

深入至第九層的礦坑裏，情況更加

惡劣。在攝氏五十度的溫度下，我們腳下踏着稀泥。當礦工聽到科索沃黨領袖莫連拿(Morina)不願下台的消息，發生了一片鼓噪，騷動隨時一觸即發。在有限的空間下，人卻愈來愈多。他們勸諭我們離去，說他們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不能說什麼。最後他們同意讓我們留下。一個年青人激動的表示是次行動參與者都表現了個人犧牲的精神。他的親兄弟在旁支撐着他，說他會一直陪他至死。剎那間，死亡充斥於礦坑四周，大多數礦工似乎已經垂手等待死亡。當中有一個說：「人只能死一次。」他說完忍不住啜泣起來，哀傷散播開去，一百個、二百礦工也漸漸低泣，整個礦場就像患了悲痛的傳染病。

他們已豁出去爲民主而努力，但也不願自己的意願爲媒介所扭曲。他們謹慎的再三叮囑我們說：我們不是民族主義者，請你們如實報導。礦工又抱怨說，以往鐵托會親自走到礦坑裏和他們談話，爲何他的繼任者不能呢？

礦工的情緒已到了沸騰的地步，他們自知已經很難保持自制，爲了不願我們備受牽連，他們再三促請我們離去。礦工們就被我們遺棄於黑暗、擠迫的空間。

全體礦工堅持到底。他們的尊嚴卻被無動於衷的政府所出賣；僅存殘餘階級代表合法性的社會主義政府，至今可說地位蕩然無存。礦工整體的力量是懾人的；傲骨往往連理性也感到無地自容。現在礦坑裏只有他們。他們手牽着手，在黑暗與死亡邊緣奮力互勉。他們說，世界上沒有哪種同志愛，比得上在這地底的黑暗和危險中建立起來的同志愛。

高於薩格勒布城的丹納斯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原載於一九八九年《東歐勞工焦點》第二期〕



民主是聯繫各共和國的唯一力量

南斯拉夫首個廣泛政治聯盟的發言人 談近年政治動盪及種族衝突的因由

訪問公義委員會成員

【一九八七年五月，南斯拉夫政府拘捕了四名斯洛文尼亞青年；七月，軍事法庭控告他們「洩露軍事秘密」，並裁定有罪。四人上訴，獲得保釋。

逮捕發生後不久，民間為此成立了「公義委員會」，並曾動員了數千斯洛文尼亞人起來保衛此四名青年。

「公義委員會」成員在歐洲宣傳期間，馬里（Ariane Meri）訪問了他們：夏倫[夏]（Marko Hren）、盧達[盧]（Braco Rotar）、馬勒克[馬]（Tomaz Mastnak）。訪問刊載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的《國際觀點》。以下是訪問節錄：

□：你能否告訴我們在盧布爾雅那（Ljubljana）進行的審訊中最關鍵的問題？

■馬：為求了解盧布爾雅那案件，你必須考慮南斯拉夫自一九八四年以來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一般來說，南國有兩種政治傾向：第一種為要求民主化及現代化的運動，另一種為反傾向，希望保留現狀，更新現有制度，及保證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或多或少保有權力的人繼續在位。

民主化的傾向最初在南國北部的斯洛文尼亞出現，但不限於該地；反傾向目前則在南部的塞爾維亞佔優。因此，我們可以說境內有南北分野。南部較先進，支配着北部，意識形態及政治方面則較為保守，較近布爾什維克正統。

當我們說民主化，首先必須記着我們是談着一個來自下層的運動；它來自社會上獨立的自我組織，是民間主動性及獨立的社會運動向政治制度施壓，使之現代化、更有能耐和更民主的努力結果。

民主化和保守傾向

爭取民主化的力量包括民間主動性及某些斯洛文尼亞政治組織。關於後

者，「斯洛文尼亞社會主義青年聯盟」（斯青盟）（SSYA）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視。我們有時形容它是政治制度內的公民社會代表。在社會運動和政權之間，它扮演了中間人的角色。

斯洛文尼亞共產黨本身亦開始進行了現代化。它一改十年前的態度，變得更開放，嘗試合理解釋它的活動，視自己為社會變革、更開放經濟、政治及經濟決定過程更獨立的擁戴者，並且準備與社會進行對話。

另一方面，保守力量已失去了所有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公信力。他們不能動員任何社會支持，唯有盡可能取得國家機器的支持。他們躲藏在軍隊及警察的背後，不過，軍隊在維持法紀方面的作用大於警察。

自一九八四年後情況便如此，但在八六年後更明確。「斯青盟」在八六年舉行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可以視為另一種出路的政治綱領。軍隊擔當着一個決定性的角色，他們是打擊斯洛文尼亞等地區的民主運動的最主要力量。可以說，那是民主力量及軍隊間的直接抗爭，軍隊已成爲現狀的守衛者。審訊無疑只是軍隊和保守力量反攻的一次事件。

軍隊隨時準備鎮壓

讓我們列舉一些事實。軍事局於八七年三月在貝爾格萊德開會。軍事局擁有諮詢權，在戰爭或緊急狀態下，向總統提出意見。在那次會議中，軍事局通過了斯洛文尼亞發生了反革命的宣言，這是非常明顯的一份政治宣言，隨後，軍隊便開始討論以實際的方法來鎮壓這場所謂反革命。

在軍事局會議後兩星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LCY）的中央委員在貝爾格萊德秘密開會，斯洛文尼亞共黨總書記嘗試駁斥這些指摘。他反駁軍事局，並在發言中揭露了一些事實：軍隊中的高層領導人曾組成特別代

表團，詢問盧布爾雅那內政部，若軍隊拘捕部分曾參與民主運動的人，警察是否有能力控制局面。

這些及其他詳情來自南斯拉夫領導人米蘭庫崗的講話，我不知爲什麼那些會議紀錄公開了。但事實是自五月初以來，關於軍隊已準備干預的流言不僅傳遍斯洛文尼亞，而米蘭庫崗秘密講話的影印本也廣泛相傳。就是在四、五月這段人心惶惶的時期，拘捕發生了。斯洛文尼亞人及其他民主力量均認爲這次拘捕行動是以武力來恢復「秩序」的第一步，以直接打擊斯洛文尼亞的民主化。因此，有很多人準備隨時反抗。

在拘捕發生後三天，爲協調各個社會及政治組織，反抗鎮壓的「公義委員會」成立了。委員會現時擁有龐大的聯結組織及個人會員，約超過一千個團體會員及七萬個人成員，合共約有十萬人，他們大部分來自斯洛文尼亞。

團體會員有各式各樣。一方面我們有來自社會運動的組織，同時亦有基層工會及共產黨組織。委員會包括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專業組織、宗教人士、文化團體及報界等各階層人士。這是自世界大戰以來，教會首次有明確的政治立場。我們的組織代表了整個社會。斯洛文尼亞社會中所有階級及所有階層均參與其中。這是一場全國的民主運動。

政府已喪失公信力和合法性

委員會主要致力於分析違憲行爲、聆訊及審訊過程，以及協助那四名被判有罪的被告。成員團體的活動中，團體領導者及聯絡組定期每天至少開一次會，有時兩次。此外，每星期至少召開一次全體會議，每次有數以百計的人出席。還有示威，例如六月二十六日在盧布爾雅那四萬多人參加了示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

在七月四日，南國獨立紀念日，委員會組織了第二次重要示威。這個紀念

活動通常由政府慶祝，但這年在官方紀念儀式之外，還有另一類的活動。官方的遊行隊伍只吸引了數百名個人參加，但委員會組織的示威卻有超過一萬人。更重要者，委員會這次活動是和曾經參加解放鬥爭的人合作的。民族抵抗力量的傳統首次與民主運動有共同的目標。這種傳統通常被用作打擊被視為傳統敵人的民主改革分子。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單顯示出政權不僅已喪失了公信力，連歷史上的合法性亦喪失殆盡。

□：根據你所言，是否意味南國的政治危機已到軍隊攤牌的局面？

軍隊一直控制了社會

■盧：社會主義國家中，軍隊所擔當的角色往往與現政權的本質緊扣一起。我相信這種特別的角色是由斯大林建立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而來，政軍不分。軍隊的干預往往能懲戒人民，在南斯拉夫也不例外。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高度軍事化的政權。差不多所有領導人都在軍隊或警察中。軍隊有能力干預社會生活；憲法中一些條文及一些法律細節，留有很多可讓軍隊干預的空隙。他們可宣布地區進入緊急狀態，可拘捕任何被懷疑危害國家的人。這些法律的規範含糊，隨着事態的需要可以無條件地實施。

□：軍隊是否已準備好掌權呢？

■馬：南斯拉夫社會及其政治制度已非常軍事化，軍隊因而不需要直接介入，它已存在於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目前，假若實行軍法統治，軍隊便會全面控制局面。軍隊不用政變，現時已掌有實權。

我們可以指出，軍隊試圖更直接介入斯洛文尼亞事件，這在南國從未出現過的。情況會是社會的進一步軍事化及軍隊的政治化。若朝這個情勢進一步，則國家將更不穩定，經濟瓦解、政治生活更形消失，整個形勢將會更動盪。

□：那麼，事情會否保持如目前般？

■盧：現狀得以保持只是一種錯覺，已經維持了多年的現狀只是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但現時再沒有資源維持下去。要嘗試繼續保持是沒有可能的了。

我相信目前有兩種頗為類似的趨向

：一種是在塞爾維亞共黨領袖密瓦斯域（Milosevic），及可被稱為「開放的」塞爾維亞主義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另一種是「南斯拉夫主義」趨向，這趨向主要由塞爾維亞人領導，因而實際上只是改頭換面的塞爾維亞主義。聯邦政府及其機構均有非常明顯的塞爾維亞特質。

■夏：所有軍官都是黨領導人，所有文職官員也是軍隊官員，因此，他們不需要奪權，他們已掌握權力。最能反映這種關係的是鐵托元帥，在他去世後，曾經發生了一場要界定軍隊和共產黨角色，以及增強民間權力的運動。人們建議國防部長由平民出任而不要軍人。我們也是這樣要求。

■盧：我們相信軍政分家將有助於解決南國的經濟危機。例如一間在馬里博爾的車廠為軍隊生產了一定數量的汽車，但軍隊卻聲稱沒有能力付款。斯洛文尼亞政府唯有建議增收新稅以補助軍隊還債！部長否決了這議案，政府便向市長們施壓，十五天後便成功達到他們的要求，要求評估對低開發地區如科索沃、蒙特內哥羅及馬斯當尼亞的「團結」程度。

■夏：就是這些民主運動、「斯青盟」及《青年報》周刊一直為國家非軍事化而努力。

□：在南斯拉夫各個共和國的敵對民族主義正在冒升……獨立運動能否最終克服各種分歧，而不會反而達到政府的目的？

■馬：我們一直面對兩種不同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斯洛文尼亞式和塞爾維亞式。很多人都不明白塞爾維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過去幾個月來，我們均有參加在那裏舉行的大型示威；與此同時，亦有參加在科索沃舉行的塞爾維亞少數民族的抗議。

地方官僚煽動民族衝突

密瓦斯域去年秋季掌權後，塞爾維亞領導層煽動及鼓勵當地的民族運動。此後，他一直試圖鼓吹愛國主義情緒及政治非理性。他首先整肅塞爾維亞報紙編輯部，將之控制在手；隨後，傳媒亦開始領導一場針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及針對斯洛文尼亞人的運動，指稱斯洛文尼亞的民主力量為反革命。

這場羣眾運動與法西斯運動有些相同的元素。它是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是斯大林或新斯大林主義特色與法西斯特質的結合。他們的示威號召使用武器及暴力，要求軍隊進入，實行軍事干預。

另一方面，我們有斯洛文尼亞的羣眾或民族運動，但這個運動和上述的運動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分別。在斯洛文尼亞，民族問題只是較廣層面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只是其中的一項要求。故此，談及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再生的時候，分辨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非常重要。

至於斯洛文尼亞民主運動與南國境內其他民主運動的聯繫方面，我們經常嘗試與他們建立關係。我們與斯洛文尼亞中一些小團體有聯絡，特別是薩格勒布，那裏有女性主義、和平主義及生態主義者的組織；此外還有貝爾格萊德的一些聯繫。

但在過去兩年，由於出現針對斯洛文尼亞的運動，已愈來愈難就某些事情取得共識。我們發現在貝爾格萊德的民主圈子中竟有一些密瓦斯域的支持者，令我們十分不滿。由於存在着緊張情緒，很難與他們討論科索沃或斯洛文尼亞的問題。

■夏：南斯拉夫很多的獨立運動是在斯洛文尼亞組織的，不單在盧布爾雅那，還有馬里博爾等城市，以及一些小鎮也有組織。當地有些保護環境團體就具體的生態問題如核電廠或污染等共同合作；在盧布爾雅那，有兩個女性主義組織，此外還有同性戀者組織、和平主義組織等。所有這些運動在「斯青盟」或現存的學生或文化團體掩護下活動，好使運動能合法地組織。

起初，八三至八四年間，盧布爾雅那的另類運動組成了一個組織，但後來分裂為七個具有不同主題的團體。在克羅地亞首府薩格勒布，三年前亦有一團體成立了，但它很難合法活動，有段時間只能進行地下活動。正如在斯洛文尼亞般，在克羅地亞小鎮中的另類組織也是最熱衷於環境問題。

斯洛文尼亞的組織與克羅地亞的組織均有非常好的關係，尤其在薩格勒布。我們處在同樣環境有一樣的憂慮。在其他共和國如波斯尼亞、塞爾維亞、

馬其頓或蒙特尼哥羅中，並沒有組織性的另類團體，只有個人。

伏伊伏丁那卻例外，一些和平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及人權組織在非常自由開放的青年組織的贊助下走在一起。兩年前，當他們為反對建造一所新核廠時非常積極活動，但在近來似乎沉寂了少許。

□：你們與其他東歐國家的獨立運動有否聯繫？

民運是統一國家的唯一力量

■馬：若論南斯拉夫境內的民主或獨立運動與東歐其他類似運動的關係，盧布爾雅那的和平主義運動可說是建立這些關係的最中心角色。

這個組織曾異常艱苦地與東歐國家包括匈牙利、捷克、波蘭及東德的獨立和平主義運動建立聯繫。而我們亦開始與蘇聯的組織聯繫，至少是書面通訊。我們相信這些聯繫對於東歐集團的民主化以及歐洲真正的民主一體化非常重要。

我們明白要建立東西方對話非常困難，但我們亦明瞭要在東歐集團內對話則更加困難，而我們自八五、八六年便嘗試這樣做。我們曾有時合法地、有時非法地共同組織論壇及研討會。我們非常高興地見到這些獨立運動已愈來愈強大。

□：說回南斯拉夫本身的獨立運動，組織間的關係是否制度化？

■馬：我們不論何時何地，會與任何出現的主動性保持關係，但政府會盡力阻止任何獨立架構的聯繫，不論它們是關注社會、文化、政治或勞工問題。掌權者力圖將南斯拉夫分裂成多個互相仇視的組織，但同時又藉着武力來粉飾國家的統一。

■夏：這種社會隔離政策的最佳例子便是近數年來發生的礦工罷工浪潮。雖然罷工發生在南斯拉夫每一個地區，但礦工與礦工間全無任何聯繫，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從來便沒有公開的一體組織出現過。

■盧：在分散的人與人間，從沒有真正的溝通。因而直至今日為止，「公義委員會」所達致的水平已是非常重要的先例。它開創了人與人間建立可信賴關係的空間，瓦解了由於鎮壓及告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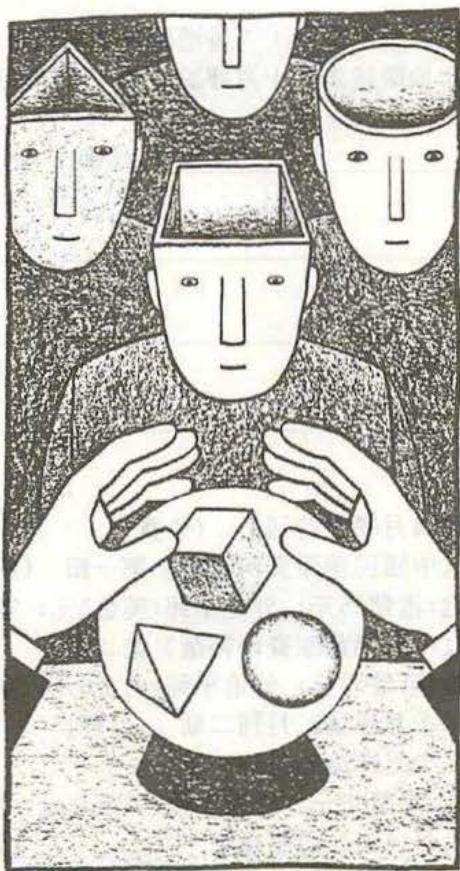
所形成的普遍不信任。由於我們在斯洛文尼亞是公開活動，促使了上述情況得以實現。

■夏：由於有關當局往往嘗試孤立各個共和國，以求使運動變為純民族主義，因此，不同共和國中的獨立運動能夠交流、合作便很重要。政府經常使用同一個詭計：任何一個共和國出現任何運動便會被冠稱民族主義、反南斯拉夫、分裂主義者等等。故此，國內有運動說明他們是為全國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而共同鬥爭，便十分重要。

□：在現時的南斯拉夫，共和國是否處於爆炸邊緣？

■馬：必須重申，被官方抨擊為破壞南斯拉夫的政治及社會力量，只是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各個共和國間真正聯繫的唯一力量。那些聲稱自己是維持現存南斯拉夫的保證人，例如軍隊，都是在摧毀着國家。

任何以武力方式達成的統一都只表示將矛盾衝突激化，在短期內必會導致國家走向滅亡。但不幸地，某些政治勢力卻似乎未能掌握這點道理。 ★



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

大字報、小字報、傳單、民刊 (第一、二輯)

從八九年四月中開展的學生和民眾民主運動，不僅迅速以獨立自治的形式發展，而且在思想上也非常活躍。在大量的校園大、小字報和街頭傳單中，學生和市民大膽說出他們的看法，批判時局，探索前景。

儘管民運受到暫時的鎮壓，但人民思想衝破了牢籠，就不可能再加以禁錮。

本社收到多位讀者提供極為珍貴的第一手圖片、傳單、民刊、錄音帶。將這些原資料整理以廣作流傳，既是讀者的付託，也是本社義不容辭的責任。

本社在八九年五月出版了《四月學運特刊》，在六月出版了《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在十一月出版了《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除了三百多幅彩色、黑白獨家圖片外，另有國內民運人仕、學生、工人、市民、共產黨員、軍人等寫的大、小字報、傳單、文章、詩文等三百多篇，及由《十月評論》讀者進行的訪問記十多篇。

這些珍貴的原始資料，記載了八九民運參與者的思想感受，協助讀者直接掌握八九民運的思想內涵。

請影印或剪下回條，填好寄回：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十月評論社收
(支票抬頭請寫「十月評論」或 "OCTOBER REVIEW")

回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職業：_____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意見：_____

條 _____

我想：

- 索閱《四月學運特刊》 (免費)
- 郵購《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 (第二版)
(本地:港幣15元; 外地平郵:美金3元; 空郵亞洲:美金4元, 其他:美金5元)
- 郵購《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
(本地:港幣30元; 外地平郵:美金6元; 空郵亞洲:美金8元, 其他:美金10元)
- 索閱《十月評論》月刊二期 (免費)
- 訂閱《十月評論》月刊一年
(本地:港幣60元; 外地平郵:美金16元; 空郵 亞洲:美金20元, 其他:美金23元)
- 捐助十月評論社出版經費 (_____元)
- 訂購下列書籍: (本地免郵費) _____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十月評論》月刊是一份全人雜誌，一九七四年創刊。本刊從中國和全球勞動人民的利益出發，報導、分析有關工人運動、民主運動的動態發展，探索全球勞動人民的出路。

本刊歡迎讀者來論、交流。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歡迎郵購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平裝）	彭述之著	30元
（精裝）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平裝）	彭述之著	45元
（精裝）		60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平裝）	彭述之著	35元
（精裝）		50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22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其他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蘇聯及東歐民運資料輯》第一輯

出版：十月評論社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南街321號A座四樓

電話：3862780

通訊地址：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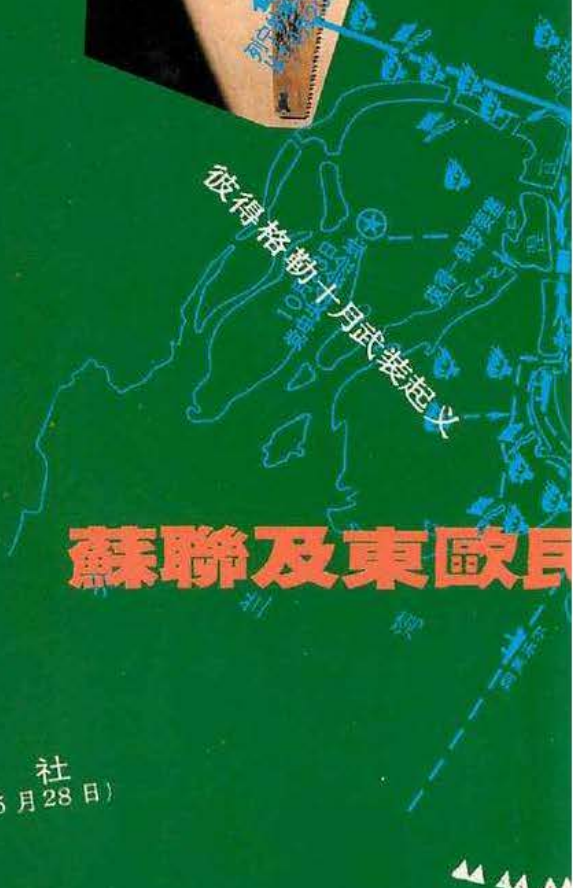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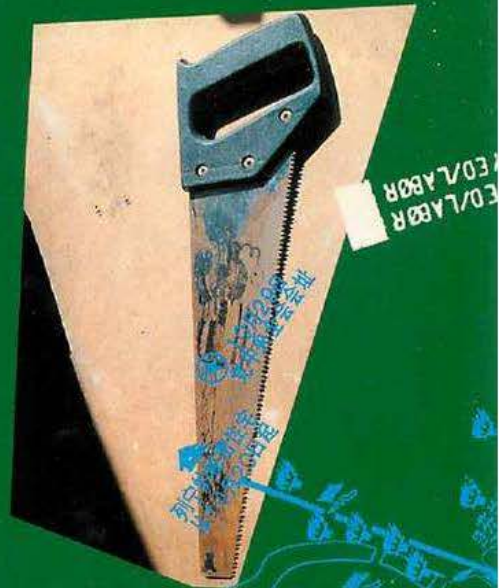
定價：港幣三十元

出版日期：1990年5月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EMOCRACY MOVEMENTS
IN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VOLUM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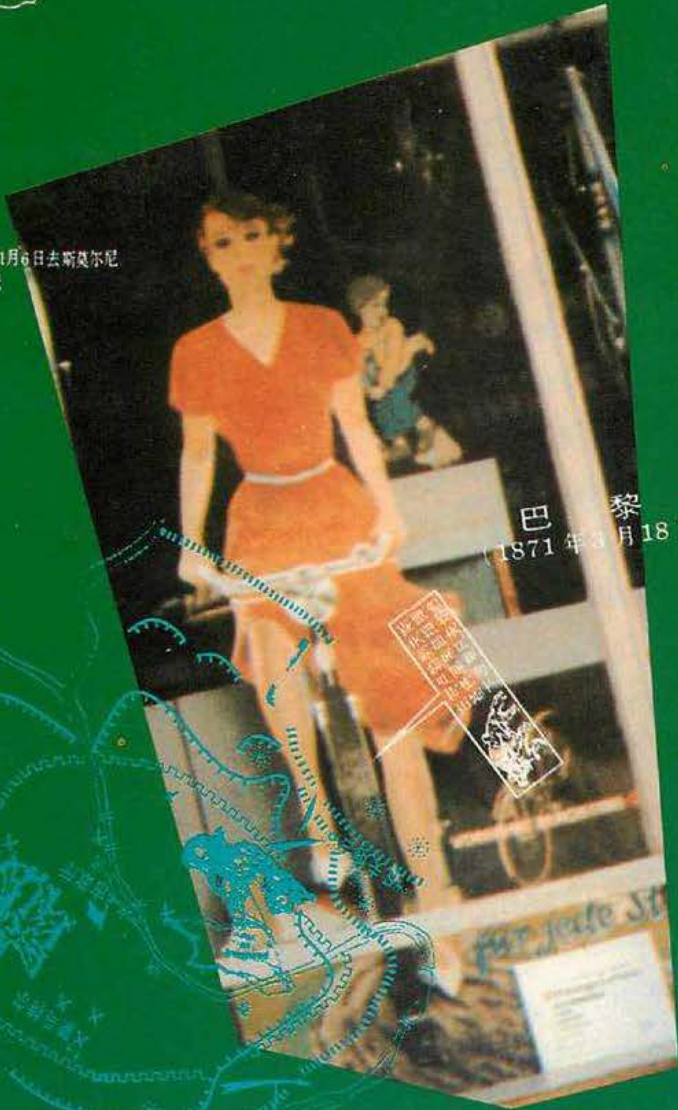
published by : OCTOBER REVIEW

address :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蘇聯及東歐

← 列宁在11月6日去斯莫尔尼宫的路线



巴黎公社
(1871年4月18日 - 5月28日)

